

# 中国民族学史

The History of Ethnology in China

## 上卷

Part I

(1903 ~ 1949)

王建民 / 著

Wang Jianmin



云南教育出版社

Yunnan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 中国民族学史 上卷 (1903-1949)

The History of Ethnology in China Part I

王建民 / 著

Wang Jianmin

云南教育出版社

Yunnan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责任编辑：张 强  
封面设计：向 炜  
责任校对：张娜娟  
监 制：汤家力



# 中国民族学史

THE HISTORY OF ETHNOLOGY IN CHINA

## 上 卷

PART I

(1903~1949)

王建民 / 著

Wang jianmin

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昆明市书林街133号）

昆明市文化印刷厂照排 深圳当纳利旭日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开本：889×1194 1/32 印张：15 字数：360000

1997年9月第1版 199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7-5415-1308-3/G·1094 定价：29.00元

## 内容提要

研究民族学在中国的发展史，对中国民族学的发展有重要意义；认真总结中国民族学发展历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是学科发展的基本要求，亦是中国民族学家的责任。本卷主要研究20世纪前半期中国民族学的历史演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历程，将在下卷中阐述。

本卷分为十章，从早期的中国民族学的学术思想和流派的形成、主要民族学家的学术经历及其学说和观点、学术机构的活动与学科的教学科研情况及成果三个方面，较为系统、全面和清晰地叙述了中国民族学的起源和创建过程，研究了20世纪前半期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和变化，探讨了民族学中国化等中国民族学发展史中较为重要的问题。强调民族平等、重视文献资料的运用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是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民族学发展的主要特点。同时，作者也总结和分析了这一时期的中国民族学发展中的经验、缺陷。最后，概括地分析了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民族学对以后的学术发展的影响。

## SYNOPSIS

21/6/07

Part I of *The History of Ethnology in China* consists of ten chapters cove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development of ethnology since the 1950s will be addressed in Part II which will be published later this year.

The writing of the history of ethnology in China is important for its future development. The author traces the process of scholarly preparation and data accumulation of ethnology as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resulting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ethnology in China. Special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ethnology and the discourse of ethnological sinicization.

This book sums up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experience of China's ethnology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century. The author provides a brief analysis as to how early ethnological development in China has influenced academic development within the later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will continue to influence in the future study of ethnology.

## 序 一

如果从宣传现代民族学的一些思想开始算，民族学在中国经历了接近 100 年的历程。我作为一个较早就从事民族学研究的老人，亲眼目睹了这个过程，亲身体会了其中的酸甜苦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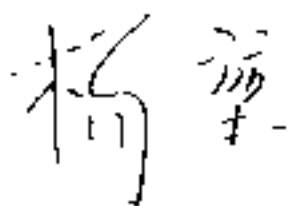
从本世纪 20 年代起，我和当时的许多中国青年学生一样到欧美去学习，我曾经在法国巴黎大学的学术实习学院和巴黎民族学研究所两处进修民族学与原始宗教学。回国以后，除了介绍法国杜尔干社会学派的理论与方法之外，我试图利用在国外学习的观点、理论和方法，研究我国各民族的民间文化与原始文化。自 40 年代后期以来，我主要从事民族学研究，曾多次深入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进行调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国民党政府不关心学术的发展，再加上战争的影响，民族学的发展受到许多制约。后来有了民族学发展的条件，但是自 50 年代中期到 70 年代末，运动不断，中国民族学又经历了许多波折。在差不多 20 年中，我全是被批判的对象。不过，我始终主张，民族学在中国应该得到发展，而且我一直在为建设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而努力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

后，我国的民族学迎来了她的春天，民族学不仅作为一个学科得到承认，而且有许多新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一些大学建立起了民族学系，一批新的民族学家逐渐成长起来。

研究民族学发展史，特别是民族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是更好地掌握民族学的需要，是建设中国民族学的需要。因此，我很早的时候，就写了一些文章介绍和评论当时的中国民族学发展的情况；及时地总结经验教训，看一看我们已经做过的事情，有哪些地方是成功的，哪些地方还有不足，这样，努力的方向才更清楚。这个世纪很快就要过去了，在这个时候多作一些总结更有必要。最近一些年，虽然也有一些同志研究中国民族学史，但是，这方面的研究仍然不能适应民族学在中国的发展需要。

对于王建民同志，我是很熟悉的。他是“文化大革命”之后我国自己培养出来的民族学硕士；以后，又在陈永龄教授的指导下攻读民族学专业中国民族学史研究方向的博士学位。在准备博士学位论文时，他曾经几次到我家里来访问，了解人们已经很模糊的1949年以前中国民族学发展的情况和我个人的学术经历。后来，我担任了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认真地评阅了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民族学在中国的早期发展史（1903—1949年）》。建民同志作研究很扎实细致，跑过许多地方，访问了許多人，资料引证和例证相当详实和丰富，涉及的学科跨度大；他搜集到的许多材料，是我这个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以前未曾见到过的。他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了史料研究与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较好地把握叙述和评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融合在全书的各个部分中。他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结合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对中国的早期民族学的历史分期问题、学术派别的性质问题和早期民族学发展

的特点、经验、问题及作用与意义，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 and 探讨，提出了不少有特点的新观点和新见解；能够历史地、客观地看待和评价早期的中国民族学工作者的学术成果和经验，实事求是地总结了这一段历史中的问题。因此，我们答辩委员会一致认为：他的著作“加强了中国民族学领域中的薄弱环节，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为发展中国特色的民族学，建设中国民族学理论作了基础性的工作，对现今往后的民族学工作者了解中国民族学的这一段历史，借鉴前人的经验更具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我也很希望他的研究成果能够在适当地修改之后早日出版，并且希望他能够继续努力，接着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我国民族学的发展情况。现在，我得知他的《中国民族学史·上卷》即将出版，下卷也已经开始写作，特作此文，以为序。



1996年10月于北京皂君庙



## 序 二

---

民族学在中国的成长和发展过程的确是历经坎坷曲折的。迄今，在中国的学科体系中，她应该属于什么样的一个学科，仍存在争论。这，一方面说明她仍处于一定的发展阶段；另一方面，也说明她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和若干兄弟学科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紧密联系。所以，这样的争论还可能继续下去。

民族学传入中国已有百年历史。从最早的翻译、介绍西方民族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而试图以西方的民族学理论解释、分析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抗战后，政府西迁，大批的高等学校和科研机关也随之西移。西部地区是研究民族学理想的区域，而过去的学者对之也少有触动。民族学学者们也正是利用这个机会，对西部地区的各个民族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在深度和广度两方面都显示了中国民族学的大步迈进，这也正是民族学在“中国化”的号召下进行了新阶段的实践。民族学在中国的成长和发展，是与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实践分不开的，这也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进行全面、系统的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调查作出重要的铺路准备。

民族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发展也并非平坦的。初受社会学被斥为“资产阶级”的学科而蒙受牵累，尽管当时新中国的民族工作也迫切需要民族学来参加。继而反右开始，许多老一辈的社会学家、民族学家都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民族学更不敢提上日程。以后，全国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调查开展起来，老、中、青三代学者都集中精力进行调查研究，切磋砥砺，互相学习，的确是一番好学风。但事后，又涉及“新中国没有民族学”，许多老一辈民族学家都被斥为“资产阶级”学者。过去的“民族学教研室”也不得不改称“民族志教研室”。这种情况直到1980年，社会学得到全面恢复名誉后，民族学才得到正式承认。这其中的甘苦更是非一般同志所能理解和体会的。

中国民族学史，是一门比较偏僻的学科史，过去注意的人很少。至于立志搜集资料写成专著的人则更难寻觅。王建民同志有志于此，穷其数年钻研，广搜博采，遍及若干图书馆，并进而对一些老一辈民族学家作个别访谈，以探索中国民族学成长、发展的细节，无论巨细均作记录不辍。这种刻苦勤奋的精神促使其完成博士学位研究论文《民族学在中国的早期发展史（1903—1949年）》，这是超过前人研究成果的一部相当系统、完整的力作。在这部力作中，王建民同志对中国民族学史必须涉及的几个基本问题都作出了明确的回答。更为可贵的是，他在总结中国民族学的前期发展过程中，除了充分肯定其正面的成果外，也明确、公正地指出其若干缺陷。他特别提出，对理论和实践的关系认识不够全面是这一时期存在的最主要的问题之一，它限制了民族学的理论在中国的发展，也使民族学中国化的全面实现难以完成。这是实事求是的论证。

现在，王建民同志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重新修订而成

《中国民族学史·上卷》，它可是本学科史的一部先锋之著。

建民还很年轻，我很为他的学术成就而高兴。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祝愿他与民族学同根并茂，继续努力，作出更大的成绩。

陈永龄

1996年7月于北京

# 目 录

序 一 .....	杨 堃	1
序 二 .....	陈永龄	4
<b>第一章 导论：中国民族学史研究的若干问题</b> .....		1
第一节 民族学的定义及其学科地位 .....		1
第二节 对中国民族学史研究的认识 .....		10
第三节 中国民族学史的研究现状 .....		18
第四节 中国民族学史的分期 .....		33
<b>第二章 民族学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背景</b> .....		38
第一节 中国古史中关于民族学资料的记载 .....		38
第二节 西方民族学学科的建立 .....		47
第三节 近代中国有识之士的努力 .....		55
第四节 外国人在中国的早期民族学研究 .....		61
<b>第三章 西方民族学在中国的早期介绍</b> .....		73
第一节 最早的民族学译著与民族学观点的介绍 .....		73
第二节 利用民族学理论解释中国的历史和文化 .....		79

第三节	民族学及相关学科的初期活动	84
第四节	中国民族学萌芽时期的特点	97
第四章	中国民族学的创建	102
第一节	蔡元培与《说民族学》	102
第二节	民族学的最早专门研究机构	107
第三节	最早的民族学实地调查	111
第四节	中国民族学学科的建立	118
第五章	对中国民族学发展的探索	123
第一节	为发展民族学而进行的理论介绍	123
第二节	学科理论的百家争鸣	131
第三节	人文区位学与功能学派对中国民族学的影响	139
第四节	多种学派的出现	145
第五节	中国民族学的三大研究区域	160
第六章	中国民族学各项工作的初步开展	167
第一节	民族学田野调查的广泛开展	167
第二节	中国民族学会的建立及其活动	185
第三节	民族学的研究机构和民族学的教学活动	189
第四节	民族文物的搜集和整理	203
第五节	民族学的调查方法与全国风俗调查的设计筹备	210
第七章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民族学的发展	215
第一节	民族学的研究机构和人员向西部的转移	215
第二节	抗战时期对西北的民族学的调查研究	223
第三节	抗战时期对西南和华南的民族学田野调查	229

第四节 民族语言学家和体质人类学家 对民族学研究的贡献 .....	243
第五节 沦陷区的民族学调查和研究 .....	250
第八章 民族学中国化的问题 .....	257
第一节 综合诸学派思想的思考与实践 .....	257
第二节 民族学与现实问题研究 .....	263
第三节 民族学中国化的探索 .....	276
第九章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民族学 .....	291
第一节 对于调查成果的整理和总结 .....	291
第二节 处于动荡局势中的民族学的发展 .....	298
第三节 20世纪前半期中国民族学的结局 .....	313
第十章 20世纪前半期中国民族学的特点及问题 .....	318
第一节 20世纪前半期中国民族学的特点 .....	319
第二节 20世纪前半期中国民族学发展的经验 .....	322
第三节 20世纪前半期中国民族学发展中的几个问题 .....	327
第四节 早期中国民族学对以后学术发展的影响 .....	331
附录一 主要参考文献 .....	334
附录二 主要参考期刊目录 .....	372
附录三 20世纪前半期中国民族学家学术简历 .....	375
附录四 中国民族学大事记（1895—1949年） .....	413
附录五 索引 .....	441
后 记 .....	458

## CONTENTS

Preface 1 .....	Yang Kun	1
Preface 2 .....	Chen Yongling	4
Chapter 1 Introduction: Issues Regarding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Ethnology in China .....		1
Section 1 Ethnology, its definition and disciplinary position .....		1
Section 2 Perceptions on the study of history of ethnology in China .....		10
Section 3 Status quo of the study of history of ethnology in China .....		18
Section 4 The stages of history of ethnology in China .....		33
Chapter 2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Dissemin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thnology in China .....		38
Section 1 Ethnographic records in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		38
Section 2 The establishment of ethnological discipline in the West .....		47
Section 3 The endeavors of modern intellectuals in China .....		55
Section 4 Early ethnological studies by foreign scholars in China .....		61
Chapter 3 Early Introductions of Ethnology into China .....		73
Section 1 Early translations of ethnological works and introductions of ethnological opinions .....		73

---

Section 2	Employing ethnological theories to explain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	79
Section 3	The initial undertakings of ethnology and relevant disciplines in China .....	84
Section 4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mbryonic ethnology in China .....	97
Chapter 4	The Establishment of Ethnology in China .....	102
Section 1	Professor Cai Yuan – pei and his “On Ethnology” .....	102
Section 2	The earliest institutions of ethnological studies .....	107
Section 3	The earliest ethnographical fieldwork .....	111
Section 4	The establishment of ethnology in China .....	118
Chapter 5	Probing the Development of Ethnology in China .....	123
Section 1	Theoretical introductions to ethnology .....	123
Section 2	Disputes on the fundamental theories of the discipline .....	131
Section 3	The influence of human area studies and the Functional School .....	139
Section 4	The rise of diverse schools .....	145
Section 5	Three major ethnological bases in China .....	160
Chapter 6	Unfolding the Branches of Ethnology in China .....	167
Section 1	Extensive fieldworks .....	167
Section 2	The founding of the Society of Ethnology in China .....	185
Section 3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their teaching activities .....	189
Section 4	Collec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ethnic cultural relics .....	203
Section 5	Ethnographical methodology and the design of “National Folk Customs” .....	210
Chapter 7	Ethnological Development During the Anti – Japanese War .....	215



Section 1	The westward shift of ethnological institutions and personnels .....	215
Section 2	Ethnological fieldworks in Northwest China .....	223
Section 3	Ethnological fieldworks in Southwest China .....	229
Section 4	Contributions by ethnolinguists and physical anthropologists to ethnology .....	243
Section 5	Ethnological research and fieldwork in the Japanese occupied area .....	250
<b>Chapter 8 The Sinicization of Ethnology .....</b>		<b>257</b>
Section 1	Synthetic contemplations and practices .....	257
Section 2	Ethnology, social practices in China .....	263
Section 3	Initial efforts in the sinicization of ethnology .....	276
<b>Chapter 9 Ethnology in China After the Anti – Japanese War .....</b>		<b>291</b>
Section 1	Collections and summaries of previous fieldwork Achievements .....	291
Section 2	The development of ethnology during social turmoil .....	298
Section 3	The outcome of ethnology in China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	313
<b>Chapter 10 Characteristics and Questions of Chinese Ethnology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b>		<b>318</b>
Section 1	Characteristics of ethnology .....	319
Section 2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ethnology .....	322
Section 3	Main ques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ethnology .....	327
Section 4	The determinate effects of the early trajectory of ethnology in China leading to its later development .....	331
<b>Appendix I</b>	<b>Bibliography .....</b>	<b>334</b>

---

Appendix II	Major Journals as References .....	372
Appendix III	Profiles of Chinese Ethnologist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	375
Appendix IV	Chronicle of Events in the Ethnology of China 1895 – 1949 .....	413
Appendix V	Index .....	441
	Postscript and Acknowledgments .....	458

## 第一章

### 导论：中国民族学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中国民族学史，是以民族学在中国的学科发展历程作为研究对象的。这里主要指近百年来民族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现代社会或人文科学学科在中国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为了更清楚地进行阐述，有必要首先对中国民族学史中的若干问题加以简略的说明。

#### 第一节 民族学的定义及其学科地位

现代民族学，是研究各民族群体文化的社会科学学科，起源于西方，中国的现代民族学最初也是由西方传入的。然而，

0005935

到目前为止，由于学术研究的传统不同，各国学者对民族学下的定义也不尽一致。限于我们的研究主题，难以对国外学者纷繁的民族学定义一一枚举，若采取概括的办法，进行大致的分类，我们认为有三种主要的看法：其一，认为民族学是研究人类文化的科学，分析和有系统地解释文化资料，进行文化比较研究。持这种观点的多数是欧美学者。其二，主张民族学是研究民族共同体的科学，一切现存的和过去存在的民族都在民族学研究之列。前苏联学者过去多数持这种意见。其三，提出民族学是从群体观点去研究民族及其文化与生命史的科学，强调文化史在民族学中的地位。国内外侧重历史研究的民族学家中的部分人主张此种意见。中国学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受西方学术影响较大，他们基本上偏向第一种看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我国大陆学者在前苏联的影响下，多数人主张民族学是一门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民族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认为民族学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把民族这一族体作为整体进行全面的考察，研究民族的起源、发展以及消亡的过程，研究各族体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它是社会科学中的一门独立学科”<sup>①</sup>。“一般说来，民族学是研究民族的科学。如说得更具体点，民族学是研究现代各民族发展规律的社会科学。”<sup>②</sup>另外，还有人认为它是“以民族和民族问题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问”。这种情况到1980年以后逐渐有所改变。20世纪80年代前期，

<sup>①</sup>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民族》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1版，321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sup>②</sup> 杨堃：《民族学概论》，1版，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已经有一些学者主张：“民族学是研究世界各民族历史的和现实的生活与文化的一门科学，是一门考察各民族文化，从事于记录和比较的学问。”<sup>①</sup>在当时拟订的学科分类目录中，也将狭义的民族学之后加上了一个括号，注明即文化人类学。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许多学者对民族学的定义进行修正，不仅将民族学作为文化的载体，而且明确地加上了文化的内容。

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关系，是讨论中国民族学史时必须涉及的问题。所谓民族学，按目前我国学术界较为普遍的看法，大致上与文化人类学等同。林耀华主编的《民族学通论》认为：“英国的‘社会人类学’、美国的‘文化人类学’和当前合称的‘社会文化人类学’，无论从研究对象和范围来说，都基本上等同于民族学，彼此间也经常互相通用。”<sup>②</sup>杨堃的看法与此类似，认为若就学科本身来讲，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应指一门学科而言<sup>③</sup>。从研究方法上来说，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也是一致的，即都是运用参与观察等田野调查的方法，多进行比较研究。我们认为，直到现在，美国学术界多数人主张人类学包括体质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和文化人类学，其中的文化人类学与中国所说的民族学有相当大的同一性。

中国部分学者还有另一种意见，即认为文化人类学包括考古学、语言学和民族学（或狭义的文化人类学）。用这种体系划分民族学的范围的方法，实际上是美国部分学者的意见的翻版；作为当代美国学术界的一种意见，它反映了美国学术队伍

① 江应樑：《民族学在云南》，载《民族研究》，1981（1）。

② 林耀华：《民族学通论》，1版，1页，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

③ 参见杨堃：《民族学概论》，1版，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的部分实际<sup>①</sup>。不过，即使在美国也有人主张：“在民族学家和文化或社会人类学家之间并无明显的区别。范围之差异可能由于用字不同而产生，但因二者过于重叠以致难于把它们分开。”<sup>②</sup>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罗伯特·F·墨菲在其代表作《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中，也将民族学作为社会人类学或文化人类学的同义词<sup>③</sup>。虽然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和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拥有相当强的考古学实力，然而，从总体上来看，由于考古学、语言学在中国已经成为比民族学更发达的独立学科；直至今日，在我国大部分地方的科研单位和学者，并不具备将语言学或考古学整个学科完全容纳于人类学之中的实力和现实条件。中国悠久的历史，为考古学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源，并使之在中国大有作为；因而，很多大学将考古学专业多设于历史系中，或单独设系。中国的语言学是现代语言学和音韵学、训诂学结合的产物，语言学除少数单独设系者外，多数分散在中文系、汉语系或其他语言文学系中。考古、语言方面的人才分布情况也大致如此。中国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只是在研究中利用考古学和语言学方法，而不能囊括这两个学科。因而，美国人类学家在考察中国实际后认为：“在今天的中国人类学家中很少能看到有像美国人类学系内的惯常那样，在一个系内的专家群中全而拥有体质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和社会人类学

① 参见 Ember, Carol R. & Ember, Melvin (C. 恩伯、M. 恩伯) *Cultural Anthropology*, 杜杉杉译：《文化的变异——现代文化人类学通论》，1版，9~14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② Titiev, M. (M. 蒂提也夫)： *The Science of Man*, (《人的科学》), New York, Henry Holt, 1954, P.329.

③ 参见 Murphy, Robert F. (罗伯特·F·墨菲) *Cultural and Social Anthropology*, 王卓君等译：《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1版，1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四个方面的专家。”<sup>①</sup>

在研究 20 世纪前半期的中国民族学发展时，民族学经常是“文化人类学”的同义词。凌纯声认为，“因民族学研究的对象为文化，故又称‘文化人类学’。”<sup>②</sup> 在当时我国国内出版的唯一一本民族学大学教科书《文化人类学》中，林惠祥认为：在欧洲大陆民族学等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这一名称在英美也很盛行，其意义与欧洲大陆无别，而与文化人类学可通用。在英美文化人类学又别称为“社会人类学”。因而，他将三个名称的关系标列为文化人类学 = 民族学 = 社会人类学<sup>③</sup>。

江应樑指出：人类学的研究范围扩大之后，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研究人类社会及文化。但老派的人类学家，仍坚持主张人类学只能研究人的本身及人种的学问，至于人类的文化，应另立一门学科来研究。于是又产生了“民族学”这门学科。在英、美等使用英语的国家中，人类学研究者是把民族学作为人类学的一个部门，即“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欧洲大陆的一些国家，则把民族学划在人类学之外，把对本国以外的欠发达民族及殖民地民族的研究称为“民族学”，对本国的民族、民间知识的研究则称为“民俗学”<sup>④</sup>。

从实践上看，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最初设有民族学组，历史语言研究所内则设有人类学及民俗学组。当时，前

① Rossi, A. S. (A. S. 罗西):《中国人类学的发展》，载《人类学研究》“试刊号”，1985。

② 凌纯声：《民族学与现代文化》，载《国立中央大学日刊》，第八七三号，1932-12-21。

③ 参见林惠祥：《文化人类学》，1版，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④ 参见江应樑：《人类学的起源及其在我国的发展》，载《云南社会科学》，1983（3）。

者研究各民族文化，后者除部分研究民族学之外，基本上以研究体质人类学为主，不久就与考古学同置于一组，乃至实际上撤消。以后，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与历史语言研究所合并，改为其第四组，并且增加了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内容，始改为人类学组。在其基本介绍中，仍自称其研究对象是文化与体质并重。筹建体质人类学研究所之后，体质人类学部分分出，又恢复民族学组名称<sup>①</sup>。由此，亦可看出当时学者们对于民族学与人类学关系的一般见解和认识。台湾中央研究院后来建立的民族学研究所，仍秉其传统。近几年来，大陆一些研究机构同时挂民族学与文化人类学两块牌子，亦是类似的举动。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民族学在中国就是文化人类学的同义语。

不过，由于大陆民族学一度受到前苏联的民族学的强势影响，并主要围绕民族工作的任务开展对少数民族的研究，当代中国部分学者对民族学的认识和文化人类学略有一些区别，同时“民族”一词在现代汉语中的歧义性，也可能会带来一些误解，所以文化人类学与民族学出现了一些小的差别。

在19世纪的西方，民族学和社会学较为接近。由于中国的现代民族学和社会学都出现得较晚，当这两个学科在西方分化已经逐步扩大之时，中国的民族学和社会学才刚刚起步；在研究理论和方法方面，社会学和民族学相互渗透，许多学者的研究都涉及两个领域，不易简单地划定到底哪项属于民族学，哪项属于社会学；中国学者在这两个学科发展初期，分工不明确，兼容并蓄，时常在实际中表现出交叉或相近关系，有时甚

<sup>①</sup> 参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概况》，载《中央研究院档案》393—2636（系档案序号。前序号为档案总目号，后序号为案卷号。后同）。



至是同一的。许多老一辈的中国社会学家也是民族学家，他们研究的课题往往涉及两个学科，他们的一些著作既被视为民族学杰作，又被列入社会学书目。由于西方社会学多侧重于研究本国工业社会，而19世纪前半期西方的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则多研究异民族，中国和西方学者根据田野调查所作的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研究著作，被西方学术界理所当然地视为文化人类学著作。杨堃认为，解放前民族学和社会学是很难划分的<sup>①</sup>。

不过，我们认为，民族学和社会学在研究对象、方法、研究角度、出发点和归宿上都有差异<sup>②</sup>。所谓民族学，并非少数民族学。从研究对象上看，在西方国家通常被认为是落后的汉族，到中国就成为主体民族。研究中国社会，特别是研究中国边疆，在研究对象上很难把汉族与少数民族完全分开。有些学者主张民族学与社会学的分工在于研究对象上，即研究汉族者为社会学，研究少数民族者为民族学，尽管反映了这种意见提出之时一定的现实情况和部分学者的见解，但我们认为这种划分是欠妥的。某一项研究在中国属于社会学，到了国外就列入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是一种封闭的学术体系划分方法，不利于国际交流。从国际学术界的普遍看法和学科体系的科学性上讲，应当突破过去将对汉族的研究排除在中国民族学之外的成例。这两个学科的研究对象的差别，在于社会学的研究单位是社会，而侧重于行动；民族学的研究单位是文化的载体——民族群体，而侧重于价值。所以，我们将把中外民族学家（或自称为人类学家）采用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

<sup>①</sup> 参见杨堃：《民族学概论》，1版，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sup>②</sup> 参见王建民：《民族学的学科地位及其与社会学的关系》，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1）。

汉族群体及其文化的著作纳入中国民族学史的研究范畴。

被部分学者视为一个学科的民俗学和民族学的关系也是较为密切的。早期的一些民俗学的调查与研究，与早期的民族学研究活动是很难区分的，其中不少还是民族学家进行的。过去也有人将民族学看作是研究少数民族的学科，民俗学则是研究汉族的学科。这种看法虽然未必有理，但亦是部分学者在实际操作中的认识。我们认为，在20世纪前半期，两者间存在的差异往往表现在：民俗学通常注意民俗事项的一般调查和叙述；民族学则不仅进行田野调查，而且在此基础上进行更多方面的比较研究。当然，这种划分只是理论上的。林惠祥在其著作《民俗学》中指出，民俗学的著作可以分为两类，即综合研究的论著和民俗的记载。他认为综合研究卓有见解的论著包括弗雷泽的《金枝》、泰勒的《原始文化》、威斯特马克的《人类婚姻史》等，而这些作品正是人们所熟悉的民族学的经典著作。杨成志则认为，在民俗学中存在着人文学派、人类学派和心理学精神分析学派三大学派，人类学的民俗学家是用社会科学的理论来检验民俗学材料的。人类学派的民俗学家，实际上就是民族学家。同时，在民族学的研究中，并未将研究习俗的部分划出作为民俗学来看。在民族学和民俗学之间，至少在部分学者心中存在着一个模糊阈。事实上两个学科的界限有时更为模糊。杨成志认为，中山大学人类学研究的开始，是在该校语言历史研究所历史组之下设立民俗组<sup>①</sup>。

民族学和体质人类学分别从文化和体质两个方面对人类群体进行研究。从理论上来说，特别是考虑到国际学术潮流的发

<sup>①</sup> 广东日报：《中山大学人类学会成立纪实》，载《广东日报》，“民族学刊”专栏，第34期，1949-01-14。

展趋势，民族学即文化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应当统称为人类学。民族学和体质人类学在中国曾经一度置于同一研究机构中，研究者们也不乏两者兼而习之者。特别是在一些两个学科的结合或交叉课题的研究上，两者之间的距离更近。在中国学者中也有民族学和体质人类学一身兼二任者。然而，即使从包含分支学科的人类学整体来看，民族学和体质人类学也毕竟有所不同。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对民族学的发展不可缺少，从人类学学科发展的未来看，具有进一步加强整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不过，由于体质人类学本身具有自然科学的性质，过去中国文化又往往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对立起来，民族学与体质人类学在中国真正组合为同一系统的难度颇大，一时难以完全归于人类学旗下。

许多中国学者对历史学较为熟悉，同时，在民族学的早期研究中，人们喜欢利用民族学的理论分析历史问题。从丰富的史籍中搜集出大量的材料，作出新的解释，是中国民族学的早期主要研究的方向之一。从民族学本身的学科结构上来讲，民族史研究也应该成为其一部分。因而许多中国民族学家也把民族起源和发展的历史研究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在民族学有了初步发展之后，许多中国的民族学家为了更好地说明民族文化发展的大致脉络，凭借他们相当好的历史学功底，在研究课题中将中国古史中非常丰富的历史资料加以稽考和分析，并往往把有关的研究列为卷首。当时被视为新派历史学家的历史学者也不乏试图利用民族学的材料和观点分析中国历史问题者，此种方法和理论为中国史学界带来了新鲜气息，为更科学地解释中国历史的发展提供了新路。

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的大陆学者进行了社会文化研究与历史研究相结合的探索。尽管存在过于依赖简单进化论构

建历史的倾向，对历史资料的高度重视与积极搜集，却为中国学者在民族学学术风格的建立和延续方面提供了实践的机会。对于这一问题，应当在研究 20 世纪后半期中国民族学发展历程时给予特别的注意。台湾、香港和其他华裔学者，也在运用中国文献研究中国社会与文化的过程中积累了许多经验。

## 第二节 对中国民族学史研究的认识

有人认为，20 世纪前半期的中国民族学始终是西方民族学的附庸，甚至提出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的民族学仍然是国外民族学的舶来品，并没有形成自己的特点。这种看法是否符合实际？中国民族学是否有自己的发展特点？假如有特点，这种特点又到底表现在哪些方面？这些特点究竟是如何形成的？这些应该说是研究中国民族学发展史首先要注意和研究的问题。我们在本书中力求能够回答这个问题。

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理论的发展是一个社会过程，是历史时空中的产物。研究民族学史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入手，可以选择不同的立意，研究也有不同的目的。民族学史的研究在有的作者眼中，被视为历史的复原和再现；现代人类学则将学科史看作建构学科理论与方法或加强学科认同的途径。学科史的研究，是为学科建设服务的，但依然应当考虑用何种方式来达到目的。从国际、尤其是欧美研究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发展史的著作来看，有些从学者的经历和所提出的思想来窥视理论

的发展<sup>①</sup>；有的按分支学科阐述学术发展的脉络；最近的一些著作则将焦点放在方法论的发展和变化的历史透视中。学科史的研究与学科的发展关系十分密切，对学科史的探讨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在许多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上，人类学史往往作为重要论题<sup>②</sup>。一些学者进而提出，人类学史自身，也是一个应当给予认真调查研究的人类学问题<sup>③</sup>。

可见，研究学科史有多种方法。但是，就研究中国民族学史的实际情况来看，走哪条路好呢？到目前为止，由于有关中国民族学史、特别是关于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民族学发展状况的研究成果还不够丰富，虽然这段历史并非是遥远的过去，但由于过去人们不注意学科史的资料的积累，又经历了如此之多的风风雨雨，许多史实较为模糊，如果直接进行理论的总结和归纳，难以令阅读者信服所得出的结论。由于民族学本身强调实地研究，学科与实践活动联系的强度较大，学者们的经历

① 如《图腾与教师：人类学历史的透视》（*Totems and Teachers: Perspectives on the History of Anthropology*, Sydel Silverman e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他们研究了人》（*They Studied Man*, 卡尔迪纳、普里勃著，孙恺祥译：1版，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

② 如第九届国际人类学民族学大会有一个题为“历史透视中的当前学术难题”的会议，并出版了《走向人的科学：人类学史论文集》（*Toward a Science of Man: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Anthropology*, Timothy H. H. Ihorssen ed., Mouton & Co., 1975）；欧洲社会人类学家协会第一次会议上，也组织了一个专题讨论会，题为“欧洲人类学史”，会后也有一本文集《田野工作与脚注》（*Fieldnotes and Footnotes: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Anthropology* Vermeulen, Han F. & Roldan, Arturo Alvarez ed., Routledge, 1995）出版。

③ Vermeulen, Han F. & Roldan, Arturo Alvarez ed. (弗穆伦、罗尔丹编)；*Fieldwork and Footnotes: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Anthropology*, (《田野工作与脚注》), Routledge, 1995, P.1.

与活动、特别是田野调查比较显著地体现着学术理论发展的由来与线索，反映出学科发展的主要脉络；同时，在20世纪前半期中国民族学家将主要力量集中在具体的调查和研究工作中，有关科学理论的系统建树不够充分，不易只从理论的总结窥见学科发展的全部。因而，我们在本书中采取了通过对学科史的实际情况的回顾，以有影响的学者的学术观点和研究经历的发展与变化及各种学术活动的开展为材料，总结中国民族学学科发展的特点。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一《中国民族学史·上卷》中，选择了一条将史料研究和理论分析结合的道路，希望将来可以更多地澄清史实的基础上从事更集中的理论总结和阐述。在《中国民族学史·下卷》里，由于历史资料相对丰富一些，同时也更为人们所了解，理论分析的内容也就更多一些，在理论与方法上的探讨也就更充分一些。

对历史发展的追寻，是系统而扎实地了解民族学、学习民族学的重要途径。追寻民族学的历史发展，就是要考察学术思想和流派的形成，总结民族学田野工作的经验，了解各学派和理论的代表人物的学术经历和学说与观点的发展过程，明了学术机构诞生和成长的历程。通过这个过程，对于民族学的理解将会更加深入。研究中国民族学史，对于中国学者掌握民族学体系，外国学者了解中国民族学的特点，无疑都会有所帮助。前苏联学者C·A·托卡列夫指出：“不知道民族学的历史，要比较完整地掌握民族学是不可思议的。”<sup>①</sup>同样，不知道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史，就谈不上了解中国的民族学。

总结前人的经验是后辈的责任。只有在汲取前人的学术研

---

<sup>①</sup> Tokareff, C. A. (C. A. 托卡列夫) 著，汤正方译：《外国民族学史》，1版，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究经验的基础上，才能使学问有所进步。建立中国民族学的学科体系，实现民族学中国化，需要有基础。这个基础，一方面是积极、审慎地吸收国外同行最新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另一方面，也需要总结我国老一代学者是怎样将国外的民族学理论和方法用之于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实地研究、在研究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和成果。新的、对学科发展，特别是对中国民族学的进步有贡献的思想和看法，来源于学者们的积极探索，得益于对国外学术理论和方法的批判性的吸收；同样，也离不开对本国学术发展历程的认真而富有思考的回顾。发展民族学，需要寻找认同和重构学术传统的历史。不总结前人成果，新的建设就可能是空中楼阁。

但是，到目前为止，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及国家教育委员会、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等主管部门制定的专业目录和国家技术监督局核准的国家标准学科分类表中，民族学学科没有民族学史的二级或三级学科。学科史在学科分类中的地位，正是中国民族学发展不充分的反映。学科史方面的研究，是学科建设中亟待弥补的薄弱环节，因此须予加强。

在我国当代一些大的民族学研究项目中，忽视了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借鉴，出现重复研究，甚至出现某些后来的研究较前人退步的现象。从每个课题的具体研究来讲，研究中国民族学史，可以更好地对所研究的题目进行更科学的论证，为新的研究处于学术发展的前沿提供可靠保证。

同时，研究中国民族学史，是保持和发扬老一代学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良好学风的需要，也是建立学术研究规范的要求。近年，许多学者在著书立说时，可能参考了很多前人的研究成果，但却很少系统地阅读有关著作，表现出对全面研究所进行的课题的准备不足。有些学术著作对有关引用和参考的书

目很少加以注解，或引用不规范，在其著作中往往缺乏研究有关课题的历史回顾和现状介绍。

从中国民族学发展的总体来考虑，学科体系的建设，学科理论的完善，都需要对前人已经作出的成就加以认真地总结。从现有的大量材料中可以看出，过去的民族学家们在研究中不乏真知灼见；总结他们田野调查和理论研究的经验，可启发我们站在更高的高度去思考、去研究，以推进学科的发展。

亦在同时，又要探讨过去的研究缺陷、教训，乃至失误，对学术发展的历史进行反思和批判，使之发挥前车之鉴的作用。前人在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因为观察文化和社会的观点不一，研究问题的方法有别，认识世界、认识社会的深度各有不同，不可能十全十美。即使我们今天的研究，在尽心尽力的前提下，可能一时感觉较为完备和周密，但随着学科的进步，人类视野的开拓，发现的问题和疑问将会越来越多。有些在某一时期和环境中的不易发现的错误，到另一时间和环境中却显而易见。20世纪前半期，中国的许多民族学家由欧美留学归来，虽然有过系统和良好的训练，但基本上接受的是西方的学术传统；中国民族学家们当时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生活，他们对于学术问题的认识必然受到时代的局限，难免有某些偏见，对中国的社会、民族和民族问题的认识可能有偏颇或错误。20世纪50年代以后，国内外的政治风云一度变幻跌宕，人们的某些话语和行动在当时被认为是颇为正确的或当然的，但事后反思却不无几分遗憾或痛楚。经过研究，我们不仅要求看到问题，而且要分析概念和话语的语境，认识其意义，力求看到问题产生的原因，力求透视究竟是哪些因素导致了问题的发生和存在。

不过，我们认为，在民族学史的研究中不应当简单地、笼



统地否定前人的观点。虽然是基于当代的学术需要,以当今时代已经发展了的理论和方法去研究中国民族学过去的历史,但是却应当注意过去的时代条件,在研究和了解其他可供构建的材料的基础上去反思,而不应对那个时代出现的不足和发生的错误求全责备。历史地观察人类认识世界、认识社会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变化,对其在学术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影响,才能有一个科学的评价。由此,我们才有可能理解某一事件、某一概念、某种话语在它发生的时代意味着什么,对于我们当前又具有什么意义。

一种学术思想的产生和演变决不是偶然的,必然有其所以如此的缘由,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受到整个时代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的影响,与其他相近学科的学术思想发展有关,如果把民族学从整个社会总体中分离开来,我们所能见到的就只是琐碎的史料的堆积或支离破碎的片断。

民族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学科,与社会的整体发展密切相关。在研究其学科发展史时,首先必须与各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联系起来。社会政治的发展,对于社会的各个方面发生直接的影响。民族学作为应用性和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受社会政治的影响更为明显。20世纪20年代,北伐胜利和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使得中国民族学队伍的组合和民族学工作的开展有了初步的条件;抗日战争时期,举国投身抗战,对于民族学家积极从事西部边疆民族文化和民族问题的调查研究,无疑是有力的推进与鞭策;中国共产党经过长征,到达陕北,面临着新的形势,需要解决新的问题,使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研究开始走向民族工作的实际。各种政治运动都会对学科的发展产生较大的影响。一个世纪以来的许多政治运动,如新文化运动、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中国化运动、新生活运动、反右

斗争、“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等，都带来了学术的变化或转折，学术的发展都打上了各个社会运动的烙印。与此同时，社会政治的进步，必然给人们带来新的视野、新的思考，又为学术发展提供了前提和可能。许多民族学家们积极入世的治学态度，使他们从一开始就把个人的学术活动与祖国的前途、社会的发展紧紧地联系起来。而随着社会政治的发展和变化，人们的认识、态度和行为也会随之变化，这些关心时事的学者的变化也更为迅速和敏感。

其次，应当注意到在与学科发展密切相关的环境中，某些个人和群体会发挥更大的作用，集团势力也必然影响学术研究。在20世纪前半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由于当时的政府是为少数集团的政治需要和经济利益服务的，对于学术发展的考虑也是以此为为基础的，当其利益的需要与学术发展的要求相一致时，可能会做出一些姿态，在客观上有利于民族学的发展；一旦时局变化，对学术发展的政策就会发生较大的动荡，放弃对民族学的支持，或阻碍民族学的研究，使学科整体发展大受羁绊。另外，在学术队伍中，部分学者可能由于学术资历或特殊地位，而对学术发展有更大的影响力，乃至对学术的某些发展方向的构建进行指向。

第三，要注意各种社会思潮对民族学学科的发展的影响。民族学的学术思想本身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民族学的理论与实践受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特点的社会思潮的带动，必然出现一些变化，从而表现出一些阶段性特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体西用、中国本体文化论、全盘西化等各种社会思潮在社会上的影响与中国早期的民族学发展中的变化都有直接的联系。在新的社会思潮产生和发展的初期，将自己紧紧地拴在社会发展的巨轮之上的民族学家即接受和运用之，并结合

民族学本身的学术研究，就有关社会关心的问题发表意见。同时，一些社会思想家在创立他们的新学说时，也积极吸收了国内外民族学学科发展的成果。于是，20世纪以来，中国的许多新的社会思潮与民族学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了。

第四，在考虑民族学学科的发展史时，又要注意学科发展本身的特点，中国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发展在不同时期，对于不同学科又有程度不同、甚至方向不同的影响。因而，必须根据学科活动、学术思想发展与变化的史实，依据互动的实际，考虑学科发展的特殊情形。作为一个学科的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史，又不完全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发展史同步。

中国民族学史的研究，要用具体的事实说明中华民族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要阐明中国民族学在世界学科体系中的地位，指出中国民族学对于世界民族学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介绍中国民族学在理论与实践上的特色。同时，也应当注意国际学术思潮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注意国际民族学界的理论与方法的发展、变化对中国学者的影响，将中国民族学的发展与世界学术的进展和变化联系起来，分析国内外民族学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的互动关系。

虽然我们已经界定了民族学的定义，但在学术研究中，有关的研究又有专业研究和一般学者的民族研究之分。所谓专业研究，是指那些自认为是或被人们认为是民族学家的学者所进行的民族学方面的研究，这种专业认同的基础是学科已经形成并存在的学术规范。虽然这种界定不免反映了某种学术意见的主导性的认知，但依照成就和学术界的认同来看，他们的工作代表了中国民族学的学科发展方向，集中地体现了学科发展的特点，因此我们将探讨的重心置于斯。同时，还有一些从事其他学科研究的学者或文人、官员等就个人兴趣所及或遇适当的

机会，也发表过一些和学术研究有关，甚至带有学术色彩的论著，在考虑学科发展史时，不应忽视这些人的有关研究成果对学科发展的贡献，应当给予正确的评价。

在我们进行中国民族学史研究时，必须注意到民族学与其他联系较为密切的学科的交叉和相近的关系。许多学者知识渊博、阅历丰富，研究的学科跨度很大，在进行相近或交叉学科的研究时，涉猎了民族学的园地。对于一身兼几任的学者，要分析其研究成果，并将大致属于民族学的研究著作放在我们的研究范围中。

### 第三节 中国民族学史的研究现状

曾有许多学者对中国民族学史进行过不同侧面的研究，为今天我们研究中国民族学史奠定了基础；然而，或囿于资料，或限于篇幅，未能作较为全面的分析。在许多关于中国民族学发展状况的论著中，亦时常可见人名错误、史实模糊、叙述颠倒等错误。尽管过去发生的事情距今天时间不长，但中国民族学发展的诸多环节至今我们并不十分清楚。从总体上来看，中国民族学史的发展现状与中国民族学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

对于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前人已经进行过一些研究。在20世纪前半期，自40年代起，就已经有一些专题论文对当时的中国民族学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初步介绍，并对其中的问题和

经验进行初步的总结。其中主要有《中国民族学发达史略》<sup>①</sup>、《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sup>②</sup>、《中国近三十年来之出版界》<sup>③</sup>、《中国民俗学发展史》<sup>④</sup>、《十年来之中国民族学会》<sup>⑤</sup>、《战时中国人类学》<sup>⑥</sup>、《中国民族学之发展》<sup>⑦</sup>、《我国民俗学运动史略》<sup>⑧</sup>等。这些及时总结回顾学术发展道路的文章，虽然有些篇幅不大，但均表现了撰文者对于学科史在学术发展中的地位的认识；这些文章由于学科整体工作进行的不多，多数属于介绍和一般的总结，其主要贡献不在于专业建构，而在于向知识界宣传民族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民族学家们在进行民族识别、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其他民族研究工作的同时，结合当时的思想改造，试图确立一套全新的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学的学术思想，并分派部分学者集中力量批判“资产阶级民族学”，其中也涉及到对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民族学的估价。但多数研究成果当时没有能够公开发表。不过，当时有些论文也涉及到对中国民族学的历史评价，如费孝通、林耀华的《中国民族

① 徐益棠：《中国民族学发达史略》，载《斯文半月刊》，第二卷，1941(3)。

② 徐益棠：《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载《边政公论》，第一卷，1942(5、6)。

③ 杨堃：《中国近三十年来之出版界》，载《国立华北编译馆馆刊》，第二卷，1943(7)。

④ 郑师许：《中国民俗学发展史》，载《民俗》，第二卷，1943(1、2)。

⑤ 徐益棠：《十年来之中国民族学会》，载《中国民族学会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国民族学会（成都）印，1944。

⑥ 罗致平：《战时中国人类学》，载《社会学讯》，1946(1)。

⑦ 徐益棠：《中国民族学之发展》，载《民族学研究集刊》，第五辑，1946。

⑧ 杨堃：《我国民俗学运动史略》，载《民族学研究集刊》，第六辑，1948。

学当前的任务》<sup>①</sup>等。

党的<sup>②</sup>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大陆的许多学者开始对中国民族学史进行新的认识，陈永龄、王晓义的《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民族学》<sup>③</sup>一文，是当时最重要的一篇研究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民族学发展的论文，尽管篇幅有限，未能展开分析，但该文是多年研究成果的结晶，资料丰富，叙述线索清晰，在中国民族学史研究中影响很大。后来的许多有关中国民族学的专著和介绍文章，多为篇幅不等地引用该文。

此外，一批老一代的民族学家对中国民族学史的回顾和思考的文章也陆续发表，如《我国民族学的回顾与展望》<sup>④</sup>、《中国的民族学：回顾与展望》<sup>⑤</sup>、《人类学的起源及其在中国的发展》<sup>⑥</sup>、《民族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sup>⑦</sup>、《中国人类学源流探溯》<sup>⑧</sup>、《中国早期的人类学与中山大学对人类学的贡献》<sup>⑨</sup>、

① 费孝通、林耀华：《中国民族学当前的任务》，1版，北京，民族出版社，1957。

② 书中的“党的”、“我党”，特指中国共产党，后同。

③ 陈永龄、王晓义：《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民族学》，载中国民族学研究会编《民族学研究》，第一辑，1版，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

④ 李有义：《我国民族学的回顾与展望》，载《民族研究》，1980（1）。

⑤ 林耀华、庄孔韶：《中国的民族学：回顾与展望》，载《社会科学战线》，1984（6）。

⑥ 江应樑：《人类学的起源及其在中国的发展》，载《云南社会科学》，1983（3）。

⑦ 秋浦：《民族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载《民族研究》，1984（5）。

⑧ 黄淑娉：《中国人类学源流探溯》，载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编《梁钊韬与人类学》，1版，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

⑨ 张寿祺：《中国早期的人类学与中山大学对人类学的贡献》，载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编《梁钊韬与人类学》，1版，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

《试论中国文化人类学的发展趋势》<sup>①</sup>、《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类学”传入中国考》<sup>②</sup>、《略谈中国的社会学》<sup>③</sup>、《关于人类学在中国》<sup>④</sup>等论文,虽大多篇幅不长,却也是这些学者以参与中国民族学发展的亲身经历、体验和进行学术研究的阶段性的总结的产物,其中也不乏对中国民族学史的研究有较大影响的重要文献。《解放前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在中国的传播》<sup>⑤</sup>、《三十五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发展》<sup>⑥</sup>、《中国民族学的发展》<sup>⑦</sup>、《中国民族学十年发展评述》<sup>⑧</sup>、《建设中国人类学》<sup>⑨</sup>、《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年来的人类学(1981—1990)》<sup>⑩</sup>等论文,除探讨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之外,多将视野集中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大陆学术发展之上。

在施正一主编的《广义民族学》一书中,由张崇根撰写的第十四章“传统民族学”,有较多的笔墨涉及中国民族学的发

① 刘孝瑜:《试论中国文化人类学的发展趋势》,载陈国强等编著《建设中国人类学》,1版,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

② 张寿祺:《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类学”传入中国考》,载《社会科学战线》,1992(3)。

③ 费孝通:《略谈中国的社会学》,载《高等教育研究》,1993(4)。

④ 费孝通:《关于人类学在中国》,载《社会学研究》,1994(2)。

⑤ 欧潮泉:《解放前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在中国的传播》,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3(2)。

⑥ 吕光天:《三十五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发展》,载《民族研究动态》,1984(3)。

⑦ 侯哲安:《中国民族学的发展》,载《贵州文史丛刊》,1984(2)。

⑧ 孟宪范:《中国民族学十年发展评述》,载《中国社会科学》,1989(2)。

⑨ 陈国强:《建设中国人类学》,载陈国强等编著《建设中国人类学》,1版,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

⑩ 陈国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年来的人类学(1981—1990)》,载陈国强、林加焯主编《当代人类学(1981—1990)》,1版,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

展情况<sup>①</sup>。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生龙平平在攻读硕士学位时，曾对中国民族学史的若干问题进行探讨，著有十余万字的论文，题为《从必然到自由的探索——中国民族学发展过程研究》<sup>②</sup>，其中一部分作为单篇论文发表<sup>③</sup>，特别是《旧中国民族学的理论流派》<sup>④</sup>是他的硕士论文的最精彩部分，也是其理论分析的重点部分。

中央民族学院的陈永龄教授在1988年底至1989年初的冬季学期，为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的研究生开设了“民族学在中国的实践”的课程。根据他多年的研究和先前的中文讲义编写的《中国民族学史》<sup>⑤</sup>，是对中国民族学史进行总结概括的第一部专论，资料翔实，线索清晰，叙述严谨，评价稳妥，弥补了我国没有一部本国学者撰写的中国民族学史专论的遗憾。

杨庭硕、罗康隆、潘盛之合著的《民族文化与生境》一书，有一节专门讨论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史略，尽管篇幅短小，却注意从理论上分析提炼，不乏有见地之语。但对文本研究有限，未能展开论述<sup>⑥</sup>。

近几十年，中国大陆的民族学史的研究，经历了由简单介绍到全盘否定和批判资产阶级民族学、再到客观分析和实事求是

① 施正一：《广义民族学》，1版，873～892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

② 龙平平：《从必然到自由的探索——中国民族学发展过程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学院印，1985。

③ 龙平平：《中国民族学早期情况概述》，载《思想战线》，1986（5）。

④ 龙平平：《旧中国民族学的理论流派》，载和羹、张山主编《中国民族历史与文化》，1版，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

⑤ 陈永龄：《民族学在中国的实践》，美国华盛顿大学印，1989。该讲义改编为专论，题为《中国民族学史》，因各方面的原因尚待出版。

⑥ 杨庭硕、罗康隆、潘盛之：《民族文化与生境》，1版，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22～25页。



是地评价与总结的转变。这一转变开始于 80 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人们的认识愈加冷静而深入。

由于以地区为单位地了解民族学的发展历程较为方便；同时，专家学者在某一专门地区的研究多较为深入，掌握资料丰富，易于成文，在不同时期先后发表的谈及某一地区的民族学发展情况的论文比较多。其中，对 20 世纪前半期的地区民族学发展的研究较为重要的论文有《西南种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sup>①</sup>、《论我国研究西南民族之今昔及其将来展望》<sup>②</sup>、《云南土著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sup>③</sup>、《贵州宗族研究述略》<sup>④</sup>、《近百年来外人考察我国边陲述要》<sup>⑤</sup>、《民族学在云南》<sup>⑥</sup> 等。

由专题人手进行回顾和研究，也是对于中国民族学史有兴趣的学者们经常做的工作之一。专题也有能够和学者的个人关注方向一致的便利之处，许多专题的学科史论文正是出于研究这一专题有素的学者，有些是积日常零散搜集和了解资料的工力为后学指点迷津；有的专题，本身就是学者们在此方面一个大的研究计划最先行的部分。

① 岑家梧：《西南种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载《青年中国季刊》，第一卷，1940（4）。

② 愈兄：《论我国研究西南民族之今昔及其将来展望》，载《社会研究》，1940（12）。

③ 陶云逵：《云南土著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载《边政公论》，第一卷，1941（5、6）。

④ 岑家梧：《贵州宗族研究述略》，载《边政公论》，第三卷，1944（2）。此为该文原名，现改名为《贵州民族研究述略》，收入《岑家梧民族研究文集》，1版，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

⑤ 吴传钧：《近百年来外人考察我国边陲述要》，载《边政公论》，第三卷，1944（5、6）。

⑥ 江应樑：《民族学在云南》，载中国民族学研究会编《民族学研究》，第一辑，1版，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

近年来，一批中青年学者在研究实践中注意到学科史，特别是本国的学术发展历史回顾对学科建设的重要性，发表了一些有关论文。他们的研究角度较为专一，往往就一个题目作较多的探讨，一些论著着意在理论上进行建构。研究的题目有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的南北特色<sup>①</sup>、中国民族学的构成与特征<sup>②</sup>、人类学中国化<sup>③</sup>、20世纪前半期的民族学教学活动<sup>④</sup>、民族学与现实问题研究<sup>⑤</sup>等。专题性的探讨，使得研究与学科发展的现实联系更为直接。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包智明在学位论文《论比较社会学及其在中国的发展》中，用相当篇幅讨论了20世纪前半期比较社会学这一在很大程度上与民族学相关甚至部分属于民族学研究范畴的学科的发展历程<sup>⑥</sup>。在20世纪前半期，就已经有中国民族学史的专题论文发表，对专题问题的学术发展的历史回顾具有重要意义，如《贵州边民问题研究之过去与前瞻》<sup>⑦</sup>、《中国图腾制度及其研究史略》<sup>⑧</sup>等。

① 张海洋：《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南北特色》，载和葵、张山主编《中国民族历史与文化》，1版，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

② 周星、胡鸿保：《中国民族学的构成与特征》，载《宁夏社会科学》，1994(2)。

③ 李安民：《论人类学研究的中国化》，载陈国强等著《建设中国人类学》，1版，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

④ 王建民：《20世纪前半期中国的民族学教学活动述略》，载马启成、白振声主编《民族学与民族文化发展研究》，1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⑤ 王建民：《回顾学科发展看民族学研究现实问题的意义》，载宋蜀华主编《民族学与现代化》，1版，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

⑥ 包智明：《论比较社会学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刊印，1994。以后作者又将此文加以修改，易名为《比较社会学》，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

⑦ 岑家梧：《贵州边民研究之过去与前瞻》，载《大夏周报》，第十九卷，1944(7、8)。

⑧ 岑家梧：《中国图腾制度及其研究史略》，载《中国民族学会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国民族学会（成都）印，1944。

在更多的专题研究著作中，许多学者都将研究概况的回顾放在卷首，其中也包括了从一个角度对学科史的理解和认识。

关于民族学家们的个人学术思想和生平事迹的研究，也是人们研究中国民族学史的重要方面。金天明、龙平平撰写的《论吴文藻的“民族学中国化”学术思想》，对于吴文藻在民族学中国化方面的建树有较多的分析和讨论<sup>①</sup>。费孝通教授的博士生丁元竹的长篇论文《费孝通社区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是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对于导师的理论加以探讨的尝试<sup>②</sup>。其他研究中国民族学家的生平和学术思想及活动之作有传记式和评述式两类，主要涉及范围是年岁较长的老一代民族学家。如《蔡元培和民族学》<sup>③</sup>、《吴文藻传略》<sup>④</sup>、《人的研究在中国——一个人的经历》<sup>⑤</sup>、《费孝通民族学术思想述略》<sup>⑥</sup>、《马长寿先生对中国西南民族研究的贡献》<sup>⑦</sup>、《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潘光旦

① 金天明、龙平平：《论吴文藻的“民族学中国化”学术思想》，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6（2）。

② 丁元竹：《费孝通社区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北京大学印，1991。

③ 胡起望：《蔡元培和民族学》，载中国民族学会编《民族学研究》，第一辑，1版，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

④ 林耀华、陈永龄、王庆仁：《吴文藻传略》，载《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1版，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

⑤ 费孝通：《人的研究在中国——一个人的经历》，载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编《东亚社会研究》，1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⑥ 徐平：《费孝通民族学术思想述略》，载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编《东亚社会研究》，1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⑦ 李绍明、冯敏：《马长寿先生对中国西南民族研究的贡献》，载王宗维、周伟洲编《马长寿纪念文集——纪念马长寿教授诞辰85周年逝世20周年》，1版，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

先生生平》<sup>①</sup>、《严谨治学，勤奋求索——深切怀念潘光旦教授》<sup>②</sup>、《吴泽霖民族学思想和学术生涯》<sup>③</sup>、《在文化人类学领域内勤奋开拓的杨成志教授》<sup>④</sup>等。

台湾学者中的有关民族学家的个人经历和学术成果研究，多在一些著名的民族学家的纪念活动时发表或出版的论文、文集中。台湾的民族学界经常在老学者寿诞时出版纪念文集，其中往往包括有学者经历的总结性文章，如《蔡子民先生对于民族学之贡献》<sup>⑤</sup>、《凌纯声先生对于中国民族学之贡献》<sup>⑥</sup>、《凌纯声先生与中国民族学》<sup>⑦</sup>、《中国的民族、社会与文化——芮逸夫教授的学术成就与贡献》<sup>⑧</sup>、《卫惠林先生对社会人类学的贡献》<sup>⑨</sup>等。但除了部分年纪较大的学者之外，普遍缺乏对这些民族学前辈的学术贡献的全面了解。许多论文集虽名为纪念

① 韩明谟：《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潘光旦先生生平》，“第二届潘光旦纪念讲座”印，1993。

② 胡起望：《严谨治学，勤奋求索——深切怀念潘光旦教授》，载《民族教育研究》，1994（2）。

③ 王建民：《吴泽霖民族学思想和学术生涯》，载《民族教育研究》，1994（2）。

④ 田晓岫：《在文化人类学领域内勤奋开拓的杨成志教授》，载《民族教育研究》，1994（2）。

⑤ 何联奎：《蔡子民先生对于民族学之贡献》，载《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1960（9）。

⑥ 李亦园：《凌纯声先生对于中国民族学之贡献》，载《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1970（29）。

⑦ 李亦园：《凌纯声先生与中国民族学》，载《中华文化复兴月刊》，第八卷，1975（2）。

⑧ 李亦园：《中国的民族、社会与文化——芮逸夫教授的学术成就与贡献》，载《食货》，第十一卷，1981（7）。

⑨ 石磊、许嘉明、瞿海源：《卫惠林先生对社会人类学的贡献》，载《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1984（54）。

专集,却仅有寥寥数篇与老学者的经历或其学术活动有关,其他则为著文作者的个人兴趣之作。

近年来,大陆的一些研究机构和个人编辑了《吴泽霖执教60周年暨90寿辰纪念文集》<sup>①</sup>、《梁钊韬与人类学》<sup>②</sup>、《李济与清华》<sup>③</sup>和《民族学与民族文化发展研究:庆祝林耀华教授从教六十二周年纪念文集》<sup>④</sup>等,是研究民族学家的经历和研究活动的文集。民族出版社组织出版的老一代民族学家的“民族研究文集”作为一套丛书出版,部分分集名为“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或“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文集”,是文集作者的理论和实践的成果汇集,为研究这些民族学家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活动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包括了吴文藻<sup>⑤</sup>、杨堃<sup>⑥</sup>、吴泽霖<sup>⑦</sup>、费孝通<sup>⑧</sup>、岑家梧<sup>⑨</sup>、任乃强<sup>⑩</sup>、江应樑<sup>⑪</sup>、梁钊韬<sup>⑫</sup>、马学良<sup>⑬</sup>等人的民族学研究文集。类似的民族学家个人文集,还有《民

① 赵培中主编:《吴泽霖执教60周年暨90寿辰纪念文集》,1版,长沙,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

②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编:《梁钊韬与人类学》,1版,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

③ 李光漠编:《李济与清华》,1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

④ 马启成、白振声主编:《民族学与民族文化发展研究:庆祝林耀华教授从教六十二周年纪念文集》,1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⑤ 吴文藻:《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1版,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

⑥ 杨堃:《杨堃民族研究文集》,1版,北京,民族出版社,1991。

⑦ 吴泽霖:《吴泽霖民族研究文集》,1版,北京,民族出版社,1991。

⑧ 费孝通:《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1版,北京,民族出版社,1988。

⑨ 岑家梧:《岑家梧民族研究文集》,1版,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

⑩ 任乃强:《任乃强民族研究文集》,1版,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

⑪ 江应樑:《江应樑民族研究文集》,1版,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

⑫ 梁钊韬:《梁钊韬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文集》,1版,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

⑬ 马学良:《马学良民族研究文集》,1版,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

族与民族学》<sup>①</sup>、《民族学研究》<sup>②</sup>、《杨成志民俗学译述与研究》<sup>③</sup>及费孝通等人的自选文集和《冯汉骥考古学论文集》<sup>④</sup>、《民族研究文集》<sup>⑤</sup>等。

北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编辑部和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编辑部联合编辑的《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丛书（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和晋阳学刊编辑部编的《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总结了老一代社会科学家的治学实践、治学经验、治学方法和学术思想。其中，收入了许多在民族学界颇有成就和声望的学者的自述和传记，包括蔡元培、吴文藻、杨堃、杨成志、潘光旦、李济、林惠祥、费孝通、江应樑、马长寿、戴裔煊、谷苞等<sup>⑥</sup>，是研究民族学家们的个人学术经历的较为详细的资料。

台湾学者在中国民族学史方面的研究，题目较为零散，除前面关于对学者个人的学术经历研究外，对台湾地区的民族学发展状况的介绍文章较多。台湾的民族学专题回顾，亦以二战以后的台湾地区研究为主，发表有《民族学在中国》<sup>⑦</sup>、《光复

① 杨堃：《民族与民族学》，1版，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

② 林耀华：《民族学研究》，1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③ 杨成志：《杨成志民俗学译述与研究》，1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

④ 冯汉骥：《冯汉骥考古学论文集》，1版，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⑤ 谷苞：《民族研究文集》，1版，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

⑥ 参见上述《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两套丛书中的有关各辑。

⑦ 芮逸夫：《民族学在中国》，载芮逸夫著《中国民族及其文化论稿》，1版，台北，艺文出版社，1971。

后高山族的社会人类学研究》<sup>①</sup>、《中国民族学研究的回顾和前瞻》<sup>②</sup>、《台湾的博物馆和人类学的发展》<sup>③</sup>、《四十年来台湾人类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sup>④</sup>、《谈人类学家的台湾汉人社会研究》<sup>⑤</sup>、《民族志学与社会人类学：从台湾人类学研究说到我国人类学发展的若干趋势》<sup>⑥</sup>等一批关于中国民族学史，特别是战后台湾的民族学研究状况的论文，其中亦不乏真知灼见。台湾学者还在1974年召开了“高山族研究回顾与前瞻”讨论会。但是，除少数人外<sup>⑦</sup>，台湾学术界日前对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民族学发展的整体情况和50年代以后大陆的学术发展情况普遍缺乏深入研究和全面了解。

香港地区对中国民族学史的研究状况与台湾相似，开展研究甚至更晚一些。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乔健博士对中国民族学史的若干片断进行研究，也于近年多次到内地进行学术访问，与内地的民族学界的学术权威有较多交往，先后发表过

① 陈其南：《光复后高山族的社会人类学研究》，载《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1975（40）。

② 陈奇禄：《中国民族学研究的回顾和前瞻》，载陈奇禄著《民族与文化》，1版，台北，黎明书局，1981。

③ 陈奇禄：《台湾的博物馆和人类学的发展》，载陈奇禄著《民族与文化》，1版，台北，黎明书局，1981。

④ 陈其南：《四十年来台湾人类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载《中国论坛》，第21卷，1985（1）。

⑤ 庄英章：《谈人类学家的台湾汉人社会研究》，载张炎宪编《历史文化与台湾》，1版，台北，台湾风物杂志社，1988。

⑥ 李亦园：《民族志学与社会人类学：从台湾人类学研究说到我国人类学发展的若干趋势》，“第二届潘光旦纪念讲座”印，1993。

⑦ 如陈中民：《1950年后中国大陆人类学的概况》，载《中国论坛》，第21卷，1985（1）。前述芮逸夫、陈奇禄的论文等。

一些文章，如《从西方人类学的演变说到中国学术的发展》<sup>①</sup>、《拉德克利夫·布朗在中国》<sup>②</sup>、《中国人类学的发展：个人的一些见解》<sup>③</sup>、《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困境与前景》<sup>④</sup>等，还主持了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第13届世界大会中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专题讨论会。但是因作者毕竟对中国内地的民族学界的实际处境了解和体会不多，往往或简单地叙述一些过程，或仅从理论上进行一些较简单的分析。也有一些内地的学者对乔博士的文章，特别是关于中国人类学发展中的困境的议论颇有微词<sup>⑤</sup>，对乔博士的观点提出不同角度的商榷。

国外一些学者也对中国民族学史进行了研究。美国太平洋路德大学人类学教授顾定国（Gregory Eliyu Guldin）博士，是目前西方对中国民族学史研究最多的外国学者之一。他曾经多次到中国进行资料搜集工作，担任过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访问教授，直接拜访了许多中国学者，拥有一些珍贵的面访资料，但由于其身份和处境的关系，其中有一部分访谈资料是中国学者难以听到的；他也参阅了一些中国学者的著作，分析和研究具

① 乔健：《从西方人类学的演变说到中国学术的发展》，载《云南社会科学》，1986（1）。

② 乔健：《拉德克利夫·布朗在中国》，载《中国人类学学会通讯》，1987（129）。

③ 乔健著、周旭芳译：《中国人类学的发展：个人的一些见解》，载《民族译丛》，1994（2）。

④ 乔健：《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困境与前景》，香港人类学讲座教授就职讲辞，香港中文大学刊印；又载《中国人类学学会通讯》，1995（185）。

⑤ 参见庄孔韶等：《人类学民族学面向未来——北京部分博士、博士候选人关于本学科发展座谈纪要》，载《人类学记事》，1995（1）；李建东：《〈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困境与前景〉及其在大陆的回应综述》，载《西北民族研究》，1995（2）。



有旁观者的独到角度，一些观点显出新意。特别应当提到的是他研究中国人类学史的两本著作，即《中国的人类学：对学科的界定》<sup>①</sup>和《中国人类学的史乘：从马凌诺夫斯基到莫斯科到毛》<sup>②</sup>。前者是一部论文集，由顾定国主编，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题为总论和历史背景，是编者撰写的专题论文《中国人类学》；第二部分是人类学的四个领域的争论；第三部分讨论什么是考古学的问题；第四部分所收文章为古人类学和今人类学；第五部分题为民族学的发展；第六部分论述民族语言学问题。书中收入了许多中国人类学家在国内刊物上发表和被收入论文集的有关论文<sup>③</sup>。在文章的选取上，虽然从某些方面表达了当代中国学术界对于学科界定问题的意见，但人为影响较大，选取标准没有严格以学科界定意见为依据。同时，他以美国的人类学体系为框架，组合中国学者的论文，为自己制造了难以更全面而真实地表达中国学者意见的障碍。后者为关于

① Guldin, G.E. (顾定国): *Anthropology in China; Defining the Discipline* (《中国的人类学：对学科的界定》), Armonk, M.E. Sharpe, 1990.

② Guldin, G.E. (顾定国): *The Saga of Anthropology in China; From Malinowski to Moscow to Mao* (《中国人类学的史乘：从马凌诺夫斯基到莫斯科到毛》), Armonk, M.E. Sharpe, 1994.

③ 除第一部分外，该论文集所收入的文章有：第二部分有梁钊韬的《民族学的研究内容与作用》、陈国强的《我国人类需要人类学》，第三部分有夏鼐的《什么是考古学》、苏秉琦的《考古类型学的新课题》、曾琪的《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点和发展序列》、梁钊韬和张寿祺的《论“民族考古学”》，第四部分有吴汝康的《古人类学与今人类学》、黄新美的《体质人类学对建设两个文明的作用》、张振彪的《现代化需要体质人类学》、张森辉的《五年来中国旧石器文化的研究：纪念北京猿人第一头盖骨发现五十五周年》；第五部分有林耀华的《新中国的民族学研究与发展》、黄淑娉的《发展我国的民族学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第六部分则收录了傅懋勳的《建国三十五年来民族语言科研工作的发展》和马学良、戴庆厦的《语言与民族》等。书后附有索引。

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史的叙述性著作，偏重于中国民族学界的师承关系和学者的学术经历等，尤其是关于 20 世纪前半期的中国民族学中的叙述中，在文献资料的运用上仍显不足，许多材料系二手货，容易为他人意见左右。在他的研究中，存在的最主要问题是对于文本的语境缺乏关注，因而招致了一些中国中青年学者的批评<sup>①</sup>。另外，顾定国还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类学：变迁之风》<sup>②</sup>等论文。他表示在不久的将来，继续进行研究，发表有关中国民族学史的理论分析著作。

其他一些学者在叙述世界民族学发展时，也提到中国民族学史的发展问题。如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利奇（E. Leach, 1910—1989 年），在其著作《社会人类学》<sup>③</sup>对中国民族学的发展也进行了评论，提出了他对几位中国民族学家的看法和评价，对于中国学者的本土研究方法表示了他的批评性意见。同样，也遭到了一些中国学者和东亚学者的质疑<sup>④</sup>。

① 参见庄孔韶等：《人类学民族学面向未来——北京部分博士、博士候选人关于本学科发展座谈纪要》，载《人类学记事》，1995（1）。

② Guldin, G. E. (顾定国): *Anthropology i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Winds of Change*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类学：变迁之风》), *Social Research*, Vol. 54, 1987.

③ Leach, E. (利奇): *Social Anthropology* (《社会人类学》), Fortana Paperbacks, 1982, p. 124—127.

④ 参见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编：《东亚社会研究》，1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 第四节 中国民族学史的分期

民族学作为现代独立学科,在中国存在和发展的历史并不长;但在关于民族的记述方面,中国是历史最早的国家之一。最初,人们在与周围民族的接触中了解到关于其他民族的各种资料,并对这些资料进行推测和想象,于是有了关于其他民族的传说。随着资料的增加、知识的积累,一些哲人不再满足于推测和想象,他们对资料进行筛选,将各种材料条理化,并备载于文籍。追溯中国民族学的起源,可以从中国古代有关于民族与文化的记述之时开始。因而,在分期上,如果将民族学史定义为关于人类群体及其文化的观念和思想的历史,即将民族学放到一个更大的范畴,可以有中国古代关于民族知识的记录时期,或可称之为“前民族学”时期和现代民族学时期。

不过,在古代,民族学与其他学科的知识 and 记录是交织和混合在一起的,没有专门对民族群体及其文化进行单独研究的专门学问,没有能够形成独立学科。从现代独立学科的民族学的发展史来看,其在中国的历史由上世纪末开始,不过 100 年。中国的现代民族学,是在中国古代丰富的民族学记述的基础上吸取国外的学科理论和方法,并使之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在探讨中国民族学史的分期时,我们把主要目光集中在中国现代民族学上。由于在本书的下卷中,我们会讨论 1950 年以后的学科发展的分期,这

里主要涉及的是 20 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民族学史的分期问题。

陈国钧在《文化人类学》一书中提出，从清末至 1926 年前可称之为人类学及文化人类学在中国的萌芽时期，之后一直至今是人类学及文化人类学的发展时期。他把 1927—1970 年这一时期的发展情形又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1927—1937 年，“人类学及文化人类学在中国正由许多学术机关、教育机关、学术团体等多方面发动，业已奠定良好基础”；第二阶段是 1938 年至 1948 年，“接着前一阶段而拓展人类学及文化人类学在中国的科学基础”；第三阶段是 1949 年之后，主要讨论台湾人类学的发展，“大多致力于台湾土著族的调查研究，所得实宏”。<sup>①</sup>

龙平平对中国民族学的发展阶段也曾进行了划分，他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自 30 年代初期起至七七事变爆发为止为第一阶段，“是中国民族学实际应用的探索时期”；第二个阶段是自 1937 年 7 月至 1945 年的八年抗日战争时期，“是解放前中国民族学研究的高潮阶段”；第三个阶段是它的萧条阶段，在时间上可划在自 1946—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sup>②</sup> 他同时提出，从五四运动以后至 30 年代初期，中国的民族学处在初创阶段。但在论述时，并没有对此作出明确的阶段划分。

陈奇禄将中国民族学在 20 世纪前半期的发展的起点定在中国民族学会成立之时，即 1934 年底，此后短短的几年间，民族学成长得很快；抗日战争开始（1937 年）后，中国民族

<sup>①</sup> 参见陈国钧：《文化人类学》，1 版，12~15 页，台北，三民书局，1977。

<sup>②</sup> 参见龙平平：《从必然到自由的探索——中国民族学发展过程研究》，52~57 页，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印，1985。

学转入了另一个时期，中国民族学有了更进一步的成长；1945年至1949年是中国民族学发展的停滞时期<sup>①</sup>。

回顾中国现代民族学至20世纪中期发展的历史，我们认为可以概括地将这一段学科发展史分为三个时期：即萌芽时期（1928年之前）、创立时期（1928—1937年）和发展时期（1938—1949年）。

其间的两个时段划分点是1928年和1938年。1928年，北伐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已经在南京建立。中国民族学界发生了几件大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民族学组等研究机构建立、中国学者开始进行了民族学的田野调查等。这几件事使中国民族学的发展有了较大的变化，由此摆脱了以介绍和引进为主的时期，开始了中国人自己的研究。1927年，虽然筹建了中央研究院，但中国最重要的民族学的专门研究机构——该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民族学组还没有建立，而有关调查活动也都不是在这年开始进行的。因而，这个界标不应当提前。

1938年是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年，中国人民投入了全面抗战，中国民族学家在抗战爆发后向西部转移，加强了对民族、社会实际问题的研究，更大规模地投入到田野调查工作中。在研究阵营、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比较以前也有一个大的进步。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的一段时间内，内地的学术机关和大学纷纷向后方转移，用许多时间进行搬迁和安置工作，学者们多数还没有顾及到有关民族学的调查和研究；所以，这个时段划分点似乎也应当稍在其后；于是，我们根据学术活动开展的实际情况，认为以1938年更为适宜。至于在抗战胜利

<sup>①</sup> 参见陈奇禄：《中国民族学研究的回顾和前瞻》，载陈奇禄著《民族与文化》，1版，台北，黎明书局，1981。

后，中国民族学家们的调查活动比抗战时期确实有所减少，但我们认为提出这个阶段作为一个“萧条期”似乎有些勉强，有关理由我们在本书的第九章中进行了阐述。

学科时段的划分点与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阶段划分点是不同的。因为历史学中的阶段是以引起整个社会大变动的某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作为标志的，而学科的时段划分则以对学科学术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机构、活动等方面的事件为标志。二者所依托的标志不同，就必然出现两种划分相异的情况。而且，由于民族学的发展主要是受到社会整体发展的影响，社会重大的历史事件对学科的发展发生作用，促成学科的变化。所以，通常民族学的发展阶段划分点往往较整个社会历史的重大变化稍迟一步。

民族学的发展是连续的，学科本身的进步和变化是一种整体性的过程。中国作为地域辽阔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展具有地方的不平衡性的特点，学术队伍也具有地域性的特点，各个地区的学者在考虑同一或相似学术问题的时间上就不可能完全同步。

在同一地区，甚至同一研究集团中的研究者的学术水平不可能完全一样，我们只能由在学科发展中起到中坚作用、发挥更大影响的学者的学术活动和著述为主来建构中国民族学的发展进程，分析中国民族学发展的总体情况。在前一个时期，可能有先驱者作出跨越性的举动；后一个时期，有些研究却仍然明显滞后于整体的发展。然而，分析和研究的时段划分只能从整体出发，而不应该依据显然属于个别的、缺乏普遍意义的事件来判断。

在学科的发展史的阶段划分方面，在时间上的划分只能是相对的，是研究者的建构。之所以要划分为几个不同阶段，是

为了更好地认识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历程，探讨其发展规律。每一个时期由于学术发展的情境，也就是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状况、文化变迁、社会思潮的差异；写作语境，即作者的意图、境遇、个人经历、话语、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不同，都有其各自的特点。但由于学科发展的连续性，又不可能在每个阶段间存在截然分离的界沟。从严格意义上说，学科史中的时段划分点只是相对的标志，是研究者为了研究的方便而确定的，只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学术发展的走向；因此，学科史中的时段划分不可能是划分时代的界碑。

## 第二章

### 民族学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背景

现代民族学之所以在中国得以发展，是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条件的产物。从宽泛的角度上，我们将一些铺垫性的和较为外在的场景视为背景。这些背景从资源、理论、思想和方法上提供了传播和发展的前提。

#### 第一节 中国古史中关于民族学资料的记载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历史悠久，民族众多，且分布广泛；各民族经历了复杂的历史变迁，经过分化、融合、重新组合，各族之间的关系也有过不断的发展变化。随



着各民族间交往的不断加深，在中国古代丰富的文献中留下了大量的有关各民族情况的记载。其中一些文献并没有停留在零散地记录当时一些民族群体的情况的水平上，而是较集中地描述了某些民族群体的文化片断，有的还进行了一定的概括和分析，可以被视为古代的民族学资料。

中原华夏族与各周边民族发生交往后，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有了关于民族资料的记录。商代甲骨文已经记载了商与土方、羌方、鬼方、夷方等民族的关系。先秦的其他文献则更多地涉及了中原地区的古代社会制度与文化的内容。

自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约前 145 或前 135 年—？）的《史记》开始的中国历代正史——二十四史中的边疆和四裔传是中国古代有关民族学的资料最为系统、全面的部分。《史记》首创了在记传体史书中以专门篇章记录边疆四裔民族情况的先例，以后为各朝史家沿用。司马迁亲自到各地进行调查，与周边民族和国家的往来人员进行过直接的接触，并以严谨求实的态度将搜集的资料秉笔记载。因此有人说，司马迁不仅是中国的历史学之父，也是中国的“民族学之父”。在他的著作之后，除《陈书》和《北齐书》以外，二十四史中其他各史都有有关民族学资料的专记——边疆四裔民族的传记。在这些传记中保留了大量的民族学资料，记载得较为系统。如果将不同时代的民族学的有关资料的记载加以纵向的研究，还可以看到一些民族起源、迁徙、融合、消亡的情形，亦可了解到民族文化的变化和发展情况。这种在官方所修史书中较为连续地记载民族发展的情况，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所不具备的。

《山海经》<sup>①</sup> 是中国最古的一部自然地理、博物书，大约成书于秦汉之际，除地理知识外，记载了上古至周代的神话和历史传说，包含了周邻民族的风俗、祭祀、饮食、服饰等内容。反映周代礼制的《仪礼》和反映春秋、战国时期礼仪制度的《周礼》、战国到汉代人们述说周代礼制的文章汇编《礼记》，记录了典礼祭祀等活动、等级制度、礼仪、服饰、饮食、婚姻、丧葬等可用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与文化问题的资料。

中国古代地方性的志书数量浩繁，其间有丰富的民族学资料。东晋永和年间（公元345—356年）常璩的《华阳国志》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比较完整的地方志，同时也是现存的最早的地方性的民族学资料。书中对今四川的蜀人和30多个民族、部落的分布、名称、历史、传说、风俗及这些民族与汉王朝的关系都有记载。

有些中国古代民族学资料，是根据作者的调查写成的。尽管这些资料不是现代意义的民族学专著，文献作者也没有接受过任何有关方面的专业训练，所记录的事项不能概括现代民族志著作所要求的各方面；在记载方式、使用文字和篇章划分等方面，不同作者也各有所钟，有很大的随意性，但这些资料依然不失其价值。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把这一类资料视为古代的民族学调查报告。唐代樊绰根据在南诏的实地生活、亲身经历撰写了《蛮书》，全书共十卷，其中第八卷专门记载民族风俗，集中地、全面地记载了南诏各种风俗习惯。明代邝露的《赤雅》，是作者在粤西周游，遍及槃、蓝、胡、侯、岑五姓土

<sup>①</sup>《山海经》，作者佚名，一些篇章在战国早期可能已经形成，全书主要部分约完成于秦汉之际，可以说不是哪一个时代的某一个人的著作。晋郭璞作注，使之得以流传。

司之地后，记述其见闻之作；除记录物产、山川等之外，特别注意了当地特殊的文化族群的风土人情，涉及瑶、壮、苗、乌蛮、巴人、蛋民等，翔实而全面。

另外，一些官员出使或因故前往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写下了一些游记，其间都少不了关于民族风习的记录，如南宋赵珙的《蒙鞑备录》、南宋彭大雅的《黑鞑事略》、南宋洪皓的《松漠纪闻》等。还有一些专门记录各民族风俗的著作。南宋末年朱辅的《溪蛮丛笑》，记录了当时活动在湖南的苗族、瑶族、僚族、壮族、土家族、仡佬族等民族的饮食、服饰、婚姻、丧葬、宗教、环境、游艺等，胪列明晰，工于叙述。

明总督宣大山西军务、兵部尚书萧大亨著的《北虏风俗》，记录了蒙古族的婚姻、生育、财产分配、法律、诉讼、丧葬、宗教、礼仪、耕猎、畜牧、饮食、服饰、禁忌、崇尚、军事、贸易等情况，可以说是一部古代蒙古族的资料性的专著。

清贵州巡抚田雯著的《黔书》，共两卷，书中记述广泛，有许多人情风俗介绍。所记贵州苗族各分支和其他民族的习俗多为实地采风而成。

广东学政李调元的《粤东笔记》也是在“遍历全省诸郡县”之后写成的，除记录广东风土人情、节令集会、地理物产、方言土语外，有专卷记少数民族和特殊文化群体，对瑶族、畚族、黎族等族和蛋民的居住区域、物质生活、婚丧礼仪、风俗崇尚等都有描述。

乾隆年间赴四川抚慰藏民的官员李心衡在川西藏族地区滞留五年之久，事后他将自己的经历记录下来，名曰《金川琐记》。对当地藏族的服饰、居住、交通、婚姻、道德、信仰、宗教、节日、舞蹈等习俗均加以较为翔实的记录。

清道光年间，嘉庆进士姚莹以同知知州补用四川，在川期

间，曾三次去西藏谕抚藏民。在事后作有《康轺纪行》，对当时藏族的习俗进行了全面介绍，涉及饮食、服饰、丧葬、婚姻、居住、交通、宗教、迷信、节令等，还对四川藏族与西藏藏族的习俗差异进行了说明。

上述著作均是作者亲身调查所得，又经过悉心编辑，记述集中，条理清楚，资料准确，在民族学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

此外，随着与周边国家交往和联系的不加深，中国古代也出现了一些记录周边各国文化与民族的著作。这类作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到印度等地求经的佛教僧人，一是到东南亚等地出使的官员。他们写出了一些记录这些地区情况的旅行记，其中也包含着许多古代民族学资料，如东晋法显的《佛国记》和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义净的《南海寄归传》及元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与明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巩珍的《西洋番国志》和陈诚、李暹的《西域番国志》等。这些文献对研究所记录地区古代民族有很大帮助。

又，一些文人、官吏搜辑逸语传说，加以考订，写出包含记述民族学资料的著作，如明朱孟震的《西南夷风土记》，是记载少数民族习俗的上乘之作，作者记录了古代的彝族等民族的婚姻、服饰、居住、生产、宗教、迷信、礼仪、交换等，较为准确可信。又如明严从简著的《异域周咨录》等，也是根据丰富的文献资料写成的。

到了清代，一些作者已不满足单纯的文献记录，为了更形象地描述各民族的情况，编著了一些带有图解，甚至以图为主、辅以文字解说的著作。18世纪中叶，乾隆六十七<sup>①</sup>亲历采绘，并著有《番社采风图考》，较为详细地记录了清代台湾

<sup>①</sup>“乾隆六十七”系人名。又，人称“黄门六公”。

山地居民的风土人情。同样是乾隆年间的另一著作、官修的《皇清职贡图》，对于中国当时的各边疆的少数民族及当时所接触到的世界其他国家的民族都画有男女图，服饰和体质类型亦均有表现，又加以满文和汉文说明；这是一部利用当时所见资料，以古代民族学记录手法所作的概括性的世界民族志简编。清贵州八苗寨同知陈浩作、贵州督学李宗昉绘的《黔苗图说》，则更为专门，画有贵州的苗族及其他民族各支系的82个文化群体人物形象，并附有简单介绍，在清代贵州各民族风俗的记录方面有重要价值。

以上事实说明，中国是最早有较为丰富的民族学资料记载的国家之一。

同时，中国古代的这类著作，随着人们在记录民族学资料方面的知识积累的丰富，在质量和数量上也逐渐有所提高。一方面，数量越来越多；另一方面，资料记录也愈来愈专门化，从一般的混杂记载到设专卷，甚至作专书。近代以后，随着有关社会、民族方面的新概念的传入并为人们所接受，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在各地修史、修志的过程中，在民族资料的记录上较以前更加重视，一些多民族聚居地区的方志中辟有专门的民族志。这些著作，由于多数是在过去长期的有关资料记录中不断积累的基础上加以新的调查资料编纂的，在民族学资料的记录方面更为专一和详细，缩小了与以后传入的现代规范的民族志之间的距离。

中国古代丰富的文献典籍，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对有关各民族风俗的描述性的记载，也积累了与民族学有关的许多其他资料。例如，中国古代著名的药学家李时珍，为了修撰《本草纲目》，曾到各地进行广泛的资料搜集，并对每一种草药的来源、生长习性、采集方法、药用价值及方剂等作了详尽的考证，可

以说是一部杰出的记录人们对植物的认识和利用的民族学资料的著作。尽管记录的手法和话语与西方当代人类学大相径庭，但这部著作远在现代西方提出“植物人类学”或“民族植物学”等术语之前数百年前就已经在我国问世了。此前的许多本草著作的年代更为久远，亦记录了不同时期人们对于药用植物、动物和矿物的分类系统。

藏医古籍《月王药诊》<sup>①</sup>、《晶珠本草》<sup>②</sup>等少数民族医学著作，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晶珠本草》的作者帝尔玛·丹增彭措，在青海东部、南部和西藏东部及四川西部等地进行了二十多年的实地调查研究，并参考了百余种藏医古籍，终于修成上、下两部数十万字的著作。该书记载了2294种药物，是藏族药物分类最为详细的作品，分类颇具特点，如对动物药按动物躯体的部位来分类，是藏民在畜牧业生活中建立的分类系统。

在数量几乎同样繁浩且种类众多的中国少数民族古籍中，包含了许多古代民族的有关民族志材料。其中，许多古籍对一些民族的语言、文学、风俗、神话故事、生产状况等情况的记录具有十分珍贵的价值，是其他文献和资料无法替代的。如古代蒙古文三大历史著作《元朝秘史》、《蒙古黄金史》、《蒙古源流》，是在吸收蒙古族民间口头文学精华的基础上写成的，记录了蒙古族的起源、兴起到蒙古帝国乃至北元时期的发展历史，反映了当时蒙古族的宗教、文学、习俗、医学及社会制度等方面的情况。马赫木德·喀什噶里所著的《突厥语大辞典》，内容除涉及语言文字、历史和民间文学外，也包括了文化的各

①《月王药诊》的作者说法不一，但在公元8世纪上半期就已经成书。

②该书成书于1835年，1840年刻板问世。

个方面，如部落关系、生产技术、生活习俗、天文历法、医药等。其他少数民族古籍中的类似著作亦各呈风采，不胜枚举。

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史诗和创世纪神话，也蕴涵着丰富的民族志资料，反映了人们对世界和人类自身的认识，表现了各民族的认识分类系统；同时，也反映了人们的生活、生产活动、宗教信仰和社会制度。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有的篇幅达几十万行乃至百万行，是世界著名的史诗。其他民族也有许多史诗和古歌，内容包括天地起源、人类形成、社会形态与制度、哲学思想、宗教信仰和迁徙发展等。用各民族所熟悉的载体对丰富的内容加以表现，世代传唱和诵咏，更增加了其研究意义，成为中国古代民族学资料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古代的一些学者为搜集民族学和其他方面的资料，或爬山涉水，或旁征博引，或深人民间调查、搜集逸语传说。他们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有贡献于民族学的学者贤士。当然，他们并不是专门的民族学家，多数人没有系统地采用以观察为主的民族学调查方法。在记载有关情况时，多采用与中国古代史学著作相似的体例和手法，在文体上与民族志也有一定距离。

一般来说，中国古代民族学资料的撰写者，尤其是汉文著作的作者，多数人更相信文献记载，具有以文献为主体的特点，而轻视亲自观察和亲身体验。即使进行实地调查，主要目的往往是为了验证史籍记载的正确性。一些资料的相当部分是从过去人们的著述辑录而成的，缺乏对文献的分析，也没有能够普遍注意时间轴上的发展与变化，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误记，甚至有以讹传讹的现象。同时，许多记录的目的在于为中原统治者树碑立传，宏扬其功德或怀柔政策，赞颂其雄才与韬略，在作品中也表现出与当代民族志不同的旨趣。

由于中国古代许多人时常习惯于以中原腹地为尊长，中原封建王朝以文化中心主义为基点，视边疆地区的民族或特殊文化群体为落后、愚昧和野蛮，对他们的文化习俗缺乏了解，更无法掌握记录对象的符号系统和意义体系，无法准确地记录文化的某些内容。由于语境的差异和对符号理解的困难，对少数民族和特殊文化群体的记录往往有鬼神化的倾向，在记录初期更是如此。还有相当一部分著作杂有蔑视少数民族和特殊文化群体的字句。真正从各族群主体的角度，或以各族群主体的观点来诠释其文化的著作很少，而且被人们所忽视。因而，这些民族学资料的记录并非现代学科意义的民族学研究著作。

一些古代思想家提出了人类文化发展或进化的概念和假说，成为追溯世界民族学早期思想起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关于有巢氏、燧人氏、神农氏的记载，表现了当时人们对人类早期发展阶段的认识。中国古籍中的古代禅让制度、社会组织、家族制度、继承制度、古代法律体系等许多方面的资料十分丰富，在中国现代民族学萌芽时期，曾经被中国学者广泛加以引用<sup>①</sup>。战国时期的思想家韩非子，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分为上古、中古、近古三个阶段，将人口增长视为社会文化变迁的主要因素<sup>②</sup>。唐代文学家、思想家柳宗元在他的名著《封建论》中，说明了人类文化的起源是适应自然、克服生存压力的结果，并将政治组织及其制度的产生与人类群体之间的相互斗争联系起来<sup>③</sup>。尽管并没有使用现代民族学的话语，但中国

① 其中著名的古籍众多，如《韩非子·五蠹》、《易·系辞》、《礼记·礼运》、《吕氏春秋·恃君览》、《庄子·盗跖》、《白虎通·卷一》、《史记·五帝本纪》等。关于中国近代学者的研究，参见本书第三章第二节。

② 参见韩非：《韩非子·五蠹》。

③ 参见柳宗元：《封建论》，载《柳宗元集》。



古代一些思想家提出的社会进化论、社会起源论、社会结构论、人性论等方面的不同主张对于研究民族学思想的起源，特别是中国民族学某些特点的形成，均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早期的一些民族学家往往乐于引用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有关论述，说明新的、舶来的西方思想学说与中国传统之间的联系。

中国古代的民族学资料，不仅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重要内容，也为世界民族学及其相关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宝贵材料。在对有关中国民族学问题进行历时性的研究，特别是探讨有关民族的起源、形成、迁徙、发展方面的问题时，这部分材料特别具有其他资料所无法替代的价值。中国古史中关于民族学资料的记载为现代学者进行进一步的民族学研究奠定了基础，是中国民族学家特别应当加以有效利用的。

## 第二节 西方民族学学科的建立

一些西方学者追溯民族学的历史发展过程时，首先提及的是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前484—约前425年），并将他誉为“民族学之父”。他曾经游历埃及、巴比伦等地，在九卷本的《历史》（*History*）中，对古代希腊、波斯、埃及、西亚和中亚的许多民族的活动均有记载，涉及到这些民族的分布、活动和风俗习惯等，使该书成为古代西方最著名的民族学资料记述著作。希罗多德相当详细地描述了诸如葬俗、服饰、居住和语言等文化方面。这些材料主要来源于作者长期

对所描写的民族的亲自观察和他搜集的当地口头传说。

古罗马史学家塔西佗(*Tacitus*, 公元 55—117 年)的《日耳曼尼亚志》(*Germania: On the Origin, Geography, Institutions, and Tribes of the Germans*), 被认为是似乎“比古典时代人们的任何其他著作都更接近现代民族志报告”<sup>①</sup>的作品。他尽管没有对日尔曼人的生活进行长期的观察, 但在其著作中致力于描述这个“未开化”民族的文化细节。但是如同希罗多德一样, 他也没有激发起当时人们对于其他民族进行研究的兴趣。

古代的希腊、罗马的其他史学家和哲学家、地理学家, 也记录了古代的希腊、罗马及其周围地区的一些民族的地理分布、风俗习惯, 探讨了人类文化的发生和发展。古代希腊环境论者基于人们的生活和文化具有可塑性的信念, 认为时间造成了文化和体格的主要变化。古希腊和罗马的一些思想家们, 设想社会文化进化是一个从起源到文明的缓慢的发展过程, 相信生活方式, 包括人本身能够被划分到一个单一的等级阶梯的各个层次之上。但是他们没有发展这种思想。

中世纪的欧洲, 由于宗教、民族和封建割据势力的相互争夺, 战争不止, 文化一度停滞不前, 很多科学家受到迫害。古代的希腊、罗马文化的杰出成就很少被中世纪的欧洲人所继承, 有关民族学的资料记录保存到现代的不多。中世纪的阿拉伯人在数学、化学和医学等方面弘扬了古代希腊和罗马的科学知识, 他们也继续进行了文化方面的研究, 一些阿拉伯学者还系统地使用了文化差异的材料。

文艺复兴后, 西方学者重新注意到文化的差异, 认识到比

---

<sup>①</sup> Bruce, G. (G. 布罗斯): *History of Anthropology* (《人类学史》), Burgess, 1973, P.4.

较文化差异的意义，并首先从研究欧洲的去与现在的文化差异起步。文艺复兴开始之后不久，欧洲进入一个海外地理发现和殖民时期。有关其他民族的资料在此时开始大量增加。

不过，在古代的西方民族学资料记录、特别是地理大发现之后的有关民族学资料的记载中，表现出明显的猎奇倾向和偏见；许多著作甚至是道听途说，曲解其他民族的某些特殊习俗的现象比比皆是。如把一些民族的舞蹈形容为如颠狂的野兽行为，将祭祀图腾神灵视为凶恶卑鄙的行径。多数人并没有从学术上理解民族志资料的作用，所记录的民族学资料更多地服务于殖民当局进行更有效地统治的目的，满足贵族在家中欣赏异民族的奇风异俗的需要。同时，地理大发现时期的民族志资料不系统，也缺乏细节，许多文化的重要方面，如社会组织等都被忽略了。到1700年，关于新大陆较为详细的文化资料只局限于巴西的一个族群——图皮南巴人（Tupinamba）<sup>①</sup>。

18世纪初，法国传教士拉菲托（J.F.Lafitau，1681—1746年）到北美印第安人地区传教，并发表了《美洲野蛮人风俗与远古风俗之比较》（*Customs of American Savages Compared with Those Earliest Times*）<sup>②</sup>，对易洛魁部落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社会制度等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比较研究。稍后，另一位法国人德布柔斯（C.de Brosses，1709—1777年）研究了非洲黑人，著有《偶像神的崇拜》（*Du Culte des Dieux - fetiches*）<sup>③</sup>。这些著作不仅利用了亲自调查的资料，而且采用了比较法，较过去西方

① Rowe, J.H. (J.H. 罗维): *Ethnography and Ethnolog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16世纪的民族志和民族学》), *Kroeber Anthropological Society Papers* 30, 1964, P. 1—19.

② 该书初版于1724年，美国学者认为这本著作对现代人类学家依然有用。

③ 作者又译为布罗斯、布罗塞斯，曾任法国勃艮第议会议长。此书名义译为《论物神》，原著匿名出版于1760年。

记录的民族学资料可以说是有了一个大的进步。

法国启蒙思想家们，根据民族学资料，论述了人类社会的起源及其发展规律，对人们的思想认识的开拓有着重要的作用。以后，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A. Comte, 1798—1857年）关于社会动力学和社会静力学的提出，及将自然科学知识引入社会研究的探索，又为民族学理论的建设奠定了基础。英国学者斯宾塞（H. Spencer, 1820—1903年）更为坚决地将自然进化论用于解释人类社会，成为综合进化论之大成。他把社会视为一个有机体，同时又是一个超有机体，并将社会现象划分为各种领域，一一追溯其进化阶段。

自18世纪后半期到19世纪中期，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许多列强国家纷纷向国外扩张和殖民，他们的侵略矛头对准了亚洲、非洲、美洲、大洋洲的各个国家和地区及生活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各民族。在此过程中，为了更顺利地实现征服和统治的目标，这些列强国家已经不再满足于传教士、探险家对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民族及其文化的一般描述，而希望更为系统和科学地记录和研究。从政治上来说，对于殖民地的民族及其文化的了解是为了因俗而治，减缓当地民族更为激烈的反抗，以确保统治的顺利实施。因而，在一定意义上说，西方民族学学科是适应西方殖民主义发展的需要而建立的。

与此同时，在学术上，一些学者通过对殖民地的民族及其文化的实地研究和理论探索，逐渐建立了一套规范的概念和操作方法，提出了研究的理论体系，从而建立起一个新的社会科学学科——民族学。在此过程中，民族志知识的积累和比较研究方法的确立，使民族学学科具备了由资料搜集和整理到建立科学学科的基础。同时，进化论思想的出现和地质学、古生物学、考古学等关于人类史前状况学科的发展，成为在此基础上

完成学科进步的助推力。

德国民族学家巴斯蒂安(A. Bastian, 旧译巴斯典, 1826—1905年), 在九次环球旅行广泛搜集世界民族志资料的基础上, 提出了许多现代民族学的基本概念, 如种族观念、原始观念、地理区域等, 通过实地调查开创了民族志的归纳和比较的研究方法。他的同胞、民族学家拉策尔(F. Ratzel, 1874—1904年), 强调自然环境对于文化的决定作用, 系统地阐述了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学术观点。

英国民族学家泰勒(E. B. Tylor, 1832—1917年), 反对当时盛行的文化退化论, 认为人类文化遵循着一定的客观规律不断发展和进化, 并提出了将文化视为一个整体的思想。他对于在研究中采取严格的民族学方法颇为重视, 主张根据表格和分类法来调查各种风俗习惯的发展, 将统计学引入民族学研究, 并主张必须筛选和测试所有的证据。他的著作《人类早期历史研究》(*Reseaches into the Early History of Mankind*, 1865)<sup>①</sup>、《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 1871)、《人类学: 人和文明研究引论》(*Anthrop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Man and Civilization*), 在学术上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受泰勒影响颇大的英国学者弗雷泽(J. G. Frazer, 1854—1941年), 虽然并没有田野调查的经历, 可谓是坐在安乐椅上的民族学家, 但他搜集了十分丰富的资料, 并依托这些资料进行宗教信仰仪式和社会风俗制度的比较研究。其学术巨著《金枝》(*The Golden Bough*, 1890), 是重要的民族学著作。英国民族学家麦克伦南(J. F. McLennan, 1827—1881年)和瑞士

<sup>①</sup> 这里分别注明的是著作的书名和出版年代。本书中除特别做出脚注外, 均以此方法注出。

学者巴霍芬 (J.J. Bachofen, 1815—1887 年) 关于婚姻家庭等方面的研究, 也为文化进化论等一系列观点的提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著名的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 (L.H. Morgan, 1818—1881 年), 是古典进化学派的代表。他利用养子身份, 对北美易洛魁的印第安人的亲属制度和社会组织进行了比前人更为深入的调查, 同时也对另外一些印第安部落作了调查; 此外, 还通过寄发调查表格, 广泛了解了世界许多民族亲属制度的情况, 在此基础上, 写成了《人类家族的血亲和姻亲制度》(*Systems of Consanguinity and Affinity of the Human Family*)<sup>①</sup>、《古代社会》(*Ancient Society; or, Researches in the Lines of Human Progress from Savagery through Barbarism to Civilization*, 1877) 等著作, 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社会进化理论和家庭进化理论。

进化学派的出现, 是民族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诞生的一个重要标志。由此, 出现了系统的理论和具有学科特点的研究方法, 学科的规范也在学术实践中逐渐形成。

民族学成为独立学科的另外一个标志, 是各国专业研究学术团体的建立。1839 年建立了世界第一个民族学研究团体——巴黎民族学学会。随后, 1842 年成立了美国民族学学会, 1843 年英国伦敦建立了民族学学会, 俄国在 1864 年成立了莫斯科大学自然科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爱好者协会, 德国的人类学、民族学和史前史学会则是 1869 建立的。

---

○ 此书于 1870 年由美国国立博物馆资助出版, 第二年重印。目前国内外一些人类学工具书和教材将该书初版时间记为 1881 年, 系误。参见 Stern, B.J. (斯特恩): *Lewis Henry Morgan; Social Evolutionist*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 社会进化论者》),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1, P.208.

正是有了上述的种种理论和实践的进步，在学术上使得民族学不断发展，最后成为独立学科。民族学学科的出现，大大地开拓了人类的视野，对于人类社会与文化有了全新的认识。

在西方，现代民族学学科建立之后，学者们继续不断地探讨学科理论与方法，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些新的学派。德国和奥地利的部分民族学家提出了文化圈的理论。英国部分学者则主张世界文明是从一个文明发源地即埃及传播出去的，他们的学术思想构成了传播学派。博厄斯(F. Boas, 1858—1942年)在19世纪末先后对巴芬兰岛和北美西南部进行了考察，并开始在美国讲学，逐渐形成民族学历史学派，并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建立了美国文化人类学体系。法国社会学和民族学家迪尔凯姆(E. Durkheim, 又译杜尔干, 1858—1917年)，于1896年创办《社会学年刊》(*L'Année Sociologique*)，以后其学术继承人莫斯(M. Mauss, 1872—1950年)，在民族学方面的研究更为深入。他们讲求民族学田野资料的搜集、统计方法的运用，并对社会事实之间存在的结构、功能和因果关系加以分析，形成社会学年刊派。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英国以马凌诺夫斯基(B. K. Malinowski, 1884—1942年)和拉德克利夫·布朗(A. R. Radcliffe - Brown, 1881—1955年)为首的功能学派也建立起来，并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对世界民族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将兴趣集中于社会的功能和结构，把所研究的文化或社会视为一个整合系统，认为一切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都有其整合的系统中的特定功能。

上述种种学派在20世纪前半期的西方学术界都有一定的市场，这些学派的领袖人物或信奉者所主掌的不同教学研究机构，对各种学派理论的流传起到了更大的作用。多数中国学者

以阅读西方民族学著作的途径了解和掌握了民族学理论与方法，而在学术发展中起到中坚作用的部分学者，特别是曾在西方直接受到民族学专业教育的学者，他们将不同学派的西方民族学理论与方法带到了中国，开始了中国民族学的实践。

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像其他现代学科一样，尽管有过与外界隔绝的经历，但从学术发展的趋势上来看，离不开与世界学术界的交流。在此之后产生的国外人类学理论流派和学术观点，对于中国民族学的发展继续产生作用。这些影响和作用如何，我们将在本书的下卷中进行阐述。

西方民族学学科的出现，是现代中国民族学发展的前提之一。民族学学科的建立，使得人们有了一个新的观察世界社会和文化的视角，为现代民族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和方法的基础，明确了学科研究的规范概念，并进行了被作为示范样本的实地研究。民族学成为独立学科，成为现代社会科学的一员，在其中有了一席之地。民族学在中国作为现代社会科学学科出现，与西方民族学学科的建立有直接的联系。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实践上看，民族学在中国虽然具有自己的特点，但与世界民族学的学科总体还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现代科学学科，民族学要有其共同的、基本的形式和内容，应该有一个比较一致的学科规范，各国学者能够较为容易地进行对话和交流；各国民族学家，包括中国学者的出色的研究，对世界民族学的发展都作出了贡献，世界的民族学家共同推动着世界民族学的进步和繁荣。在这个前提之下，各国学者根据自己国内的现实情况，加以创造性的发挥，建立起本国的民族学。西方民族学的建立，为中国民族学从有关民族情况的记录到现代民族学调查与研究的飞跃铺平了道路。西方民族学诸学派的建立和发展，则构成了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民族



学各种学术思想的引进及其发展的理论基础的一部分。

### 第三节 近代中国有识之士的努力

1840年之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备受帝国主义的蹂躏之苦。在近代，帝国主义用炮火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之后，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思考，他们摒弃了传统的“华夏——君臣”的秩序观念，提出了向西方人学习科学技术的主张。魏源在《海国图志》的序中声言，该书是“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标志着中国已经有人将视线由国内转向国外。

此后，一批较早与外国人有更多接触、然而在当时政治上并非重要的人物，就针对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有了更多的提倡和行动。容闳作为从世界看中国的第一人，致力于以西学改造中学的努力，积极倡导中国幼童出洋留学，促进了中国人在学问上开拓视野，使人们听到了中国人以往所不闻的新鲜理论和学问。

王韬在英国教会办的墨海书馆任职十数年，较多地接触了西方文化，以后又到欧洲游历。他比较了中、西文化的差异，主张将西方学术和科学引进中国。他认为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不应当担心西方列强的日益蛮横，而应该忧虑中国的闭关自守。因此，将西方数十国的科学引进中国，并不会使中国削弱，反而只会使中国强盛，并能锻炼磨砺中国英雄智奇之士。

他认为闭关自守在当时已经不可能再保持下去，因为世界已经是“地球合一之天下”。

李圭赴国外考察，感受到西方文明的长处，希望中国和西方能够取长补短，而不应当彼此封闭。他提出以道德纲常为体，以“西人事为”为用的主张。认为“必体用皆备，而后可备国家器使，此尤今之所不可不知者也”<sup>①</sup>。

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将清廷的皇家禁苑圆明园付之一炬，并迫使清朝政府签定了《北京条约》。清政府中的部分官吏认识到已经无法再向西方列强采取强硬态度，于是，他们试图学习西方的现代技术，洋务运动便应运而生。

洋务派试图“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他们认为与外国交涉，必须识其性情，要借西法以印证中法；博采西学，学习语言文字、工艺之学、史地天文等；于是开始兴办西学，先后在京师、广州、上海等城市办起学堂。京师同文馆由洋文而习诸学共需八年，其课程包括语文、文法、翻译、地理、历史、数学、物理、机械、化学、天文、法律和“富国策”等。通过洋务派办西学，培养出了一批初步掌握西方科学技术、了解西方的学者。通过派遣留学生到西方国家留学，带回了西方的先进技术，同时也带回了新的思想、学说。严复就是在作为福建船政学堂的学生赴英国留学后，接受了民族学知识和进化论思想的。

在兴办西学的过程中，洋务运动受到了朝廷内外的顽固派的攻击，洋务派对顽固派的攻击进行了反击。张之洞分析了对待西学的三种错误态度，一是“恶西法者”，采取文化封闭的自塞态度，令人固蔽傲慢，自陷危亡；二是“略知西法者”，

<sup>①</sup> 李圭：《环游地球新录》，光绪四年（1877年）刻本，一〇六～一〇七页。

以为西学皆中学所已有，傅会自欺，令人言争胜，不求实事；三是“溺于西法者”，以为中西无别，庸人自扰，令人眩惑狂易，丧失所守。他将排斥变法者归结为泥古之迂儒、苟安之俗吏和苛求之谈士。他也提出学西学可有不少门径，如益智、游学、建学堂、立学制、设译馆、倡阅报、开矿学、修铁路、兴农工商学兵等。然而，洋务派认为，“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可偏废。”<sup>①</sup>他认为，民族复兴和清廷的重振之根本在于纯洁和捍卫传统文化。“中体西用”观念的提出，是中国近代部分先贤在传统文化面临破坏的处境中，对西方文化部分认可的反映。他们承认西方文化中有能够弥补中国文化的价值和作用，同时又希望传统文化的延续；因而，强调中、西文化的互补性，主张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要吸收外来文化，又需要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但是，因为学习西方科学知识时常被视为“下手工夫”，在中国学习西方知识之初，往往偏重于自然科学方面，以为只要学习西方科技知识，就可以图强保国，民族学这样的社会科学学科没有引起多数学者的关注。

近代的哲人先贤们，在经过了几十年的推进西学的实践和曲折之后，对于文化的选择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康有为在1879年冬到香港一游，他惊异地发现西方人治国有规章制度，故，不应该以过去对于夷狄的眼光来看待。此后，他遍访西学之书，并开始上书光绪皇帝，痛陈中国面临的危困局势，惊呼中国被列强瓜分的危险。1882年，康氏赴京应试不中，返乡途中，路经上海，读到广学会译出的更多的西学书籍。经过学

①张之洞：《会通第十三》，载张之洞著《劝学篇》，两湖书院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

习和钻研，开始了解了西方的政治风俗。在吸收了进化论的思想和大量的新知识之后，他在1884年开始编的《人类公理》（即《大同书》）中就已经主张人类历史是向前发展进化的。他还将自己的进化观与《公羊春秋》的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三世及中国古代历史发展附会起来，提出“三世说”的社会历史进化论<sup>①</sup>。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讲学，群学（社会学）就是其中课程之一<sup>②</sup>。他主张“鉴万国强盛弱亡之故，以求中国自强之学”，而“欲令天下士人皆通西学，莫若译成中文之书，俾中国百万学人人人能解，成才自众，然后可以给国家之用”<sup>③</sup>。

正是由于这种片面性，当时学习西学的收效甚小。中国近代第一位驻外使官郭嵩焘，在其《条陈海防事宜》中指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能通知洋人之情，而后可以应变；能博考洋人之法，而后可以审机。”“窃议为中国与洋人交涉，当先究知其国政军政之得失，商情之利病，而后可以师其用兵制器之方，以求积渐之功”<sup>④</sup>。这种一元的本末论观点和先研究政治经济再学习制器之方的主张，突破了过去轻视社会科学的狭隘性，对于中国近代的社会学、民族学等各种社会科学的进步有很重要的价值。

甲午战争的失败，极大地触动了国内的志士仁人。维新派以他们已经初步了解的进化论为理论依据，发出变法维新、强

① 康有为的进化论实际上是一种历史循环论。

② 参见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载《清议报》，第一〇〇册。

③ 康有为：《答朱荅先生书》，载《康有为全集》，第一集。

④ 参见郭嵩焘：《条陈海防事宜》，载《郭嵩焘奏稿》，1版，长沙，岳麓书社，1983。

国保种的呼声；康有为等人在传统文化中注入了新的内容，积极参与政治，鼓吹变法，终于促成了1898年的“百日维新”。然而，戊戌变法的失败，使维新派的愿望落空，甚至人头落地。人们于是更冷静地、认真地进行思考，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在思考中更多地注意到西方民族学和社会学知识的学习和引进<sup>①</sup>。这些人中，一部分是主张社会改良与强国保种的维新派，另一部分是以推翻帝制、实现共和为目的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前者在过去的基础上加深了解，后者则是站在新的起点上寻求和探索。通过这个过程，民族学知识在中国有了初步的介绍。

1905年，清朝政府废除科举制，使得学习西学成为当时青年求学者的普遍追求，许多年轻人渴望进入新式学校，甚至连较为保守的一些学者也开始读一些关于西学的书籍。由此，使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在中国有了更快的传播。

经过不断的宣传，一些西方现代社会科学学科开始在中国逐渐有了范围不大但尚可立足的土壤，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等利用社会学、民族学的理论和观点，探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社会问题，这正是清代后期文化反思与抉择的必然结果。

然而，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之后，并没有完全从政治上、经济上摧毁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势力的统治。在思想文化上封建势力的影响更为深远。尽管有了上述种种努力，已经带来了新的思想，但伴随着政治复辟活动的回潮，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复辟、复古的言论重新抬头。于是，背景不同、政治观点各异的知识分子展开了一场大论战。最初，人们侧重于比较东、西文明的优劣，罗列东、西文明的异同。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在

<sup>①</sup> 其中一些知识分子是通过日本翻译和介绍学习的，详见本书第三章。

论战的过程中，宣传民主主义的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由此发起和带动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之后，主张东、西文化调和的“新旧调和论”出台，论战双方又对新、旧文化的差异和处理新、旧文化关系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争。1920年，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和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发表之后，这场大论战进入高潮。梁启超认为西方的物质文明已经走向了末路，但要发挥中国文化，却非借助西方文化做途径不可，因为他们的研究方法实在精密。因而他提出：要尊重和爱护中国文化，吸取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中国文化，认识中国文化的真相，将中国文化综合起来，再加以西方文化的补助，形成新文化系统，最后将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全人类都得其益处<sup>①</sup>。梁漱溟则将欧洲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视为三条“路向”，三种文化的差异在于三种哲学的不同；他认为中国哲学求调和、平衡、中庸之道，最为发达的是人生哲学，孔子的人生哲学便是中国文化的最重要部分，未来人类文化就是“中国文化之复兴”<sup>②</sup>。张君勱、张东荪、胡适、吴稚晖、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在当时的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通过论战，人们对究竟怎样认识和发展中国文化，怎样借鉴或吸收西方文化有了更清楚的理解和体会。中国的民族学学科正是在这样一个思想文化的大背景下建立的。

甚至在以后的中国民族学学科的发展进程中，对东、西文化的认识也有着重要的影响。生活在20世纪前半期的许多中

<sup>①</sup> 参见梁启超：《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载《时事新报》，1920—03—25。

<sup>②</sup> 参见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9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国民族学家，乃至于此后在中国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都直接或间接、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关于东、西文化讨论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他们各自的民族学学术理论与实践方面发生了作用，产生了对研究目的、任务、途径与方法的不同认识和见解。

西方现代学术思想的传入和文化的革新，不仅提供了社会变革的指导理论、道德准则、科学知识和文化手段，而且使中国知识分子在对于人类社会与文化的认识上有了一个新的飞跃，为新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 第四节 外国人在中国的早期民族学研究

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后，一批外国传教士和西方探险家以各种名义先后进入了中国，他们的一些活动，对于中国民族学知识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部分中国学者还从他们的某些著作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发。

欧美和日本、俄国的民族学家对中国的调查和研究，对中国学者的民族学知识的获取和中国民族学知识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德国民族学的创建人之一巴斯蒂安，曾经到中国旅行。泰勒、弗雷泽等一些西方早期的民族学家，也在他们的著作中将中国人的一些文化习俗作为比较研究的材料。但对于中国民族及其文化的研究更有发言权的，则是曾经在中国进行过实地调查的学者们。

日本人类学的创始人鸟居龙藏（1870—1953年），于1895

年到中国辽东半岛进行实地调查，开始了他在中国进行人类学调查的经历。随后，在1895—1900年，受东京帝国大学的派遣，四次到台湾对高山族<sup>①</sup>进行调查。1902年7月至次年3月，又由该大学理科大学派遣，到中国西南进行田野调查。这项调查被认为是他前些时候对台湾的高山族调查的延伸。他此次调查的地区为湖南、贵州、云南、四川等地，调查的民族有苗族、布依族、彝族、瑶族等；鸟居龙藏考察了诸民族的分布与自然地理条件之间的关系、各民族的体质、服饰、居住、习俗、语言、文化等，事后根据调查编写了《中国西南部人类学问题》、《苗族调查报告》等著作。此次调查使鸟居龙藏意识到在人类学研究中文化研究的重要性，他试图通过考察各方面的文化来研究各民族遗留下来的古物遗迹。不过，在此之后，他将在中国进行田野调查的注意力转移到中国的东北地区。1906—1908年，鸟居龙藏夫妇到蒙古进行调查。以后，他又多次前往中国东北调查，1919年、1920年、1928年，他三度对西伯利亚的东部和中国的东北地区的各民族聚居区进行了人类学和考古学的调查，1921年向东京帝国大学提交了题为《有史以前的满蒙》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1915年，他出版了关于东北的研究著作《蒙古及满洲》。1943年出版的《黑龙江和北桦太》一书，是他对这些地区数次调查的资料总结。1939年，鸟居龙藏被燕京大学聘请为客座教授，1951年回国。鸟居龙藏以中国作为其民族学研究的基地，由此成为日本著名的民族学家、人类学家。他在中国的民族学调查，对中国民族学界也有很大的影响；他的《苗族调查报告》被国立编译馆译为汉文，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sup>①</sup> 台湾学术界近年已经用“台湾原住民”或“南岛民族”来替代高山族一称。



1895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取得对中国台湾的殖民统治权力之后，就派出许多学者到台湾进行有关调查，以为日本的殖民统治服务。如1896年伊能嘉矩到台湾进行调查，发表了一些调查资料，事后著有《台湾蕃人事情》，于1899年出版。

为了实施对台湾的统治，日本于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初就成立了“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明治四十二年为了起草日本在台湾统治所用的法律，由该会开始进行习俗调查，并于大正三年（1914年）完成了关于台湾汉人及平原高山族（平埔人）的习俗调查报告书。同时，该会与日本在台湾设立的殖民机构番务本署对山地高山族的习俗进行调查，到大正七年，先后出版《蕃族调查报告书》九册及《蕃族图谱》二册。这项调查以民族学调查为中心，强调对高山族的各分支的详细调查，同时征引已经出版的资料和专门记述，以民族志的要求进行调查和写作报告，具有一定的民族学价值。报告包括了历史传说、社会组织、宗教祭祀、经济生活、衣食住行、人牛礼仪、艺术游艺、教育、数及色彩观念、民间文学、基本词汇等<sup>①</sup>。该会还出版了《台湾蕃族惯习研究》八册，共分三编，对于台湾高山族的种类、心理、生活、经济、社会及法制以叙述为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sup>②</sup>。日本于1915年在台湾建立了“台湾总督府民政部殖产局附属纪念博物馆”，陈列品中有高山族的各类实物。上述调查，客观上对中国和外国民族学家研究台湾高山族提供了很好的材料。

<sup>①</sup> 参见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蕃族调查报告书》，第一册，1~2页，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印，1914。

<sup>②</sup> 临时旧惯调查会：《台湾蕃族惯习研究》，1~5页，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印，1922。

日本在侵略中国东北之前，首先对中国的东北、内蒙古、西北等地进行调查并搜集各种资料。1907年4月，日本人在大连满铁总社建立满铁调查部，旧惯调查班为其中的三个调查单位之一。调查分为文献调查和实地调查两部分。1909年开始实地调查，区域为旅顺、大连、金州等地，内容涉及土地的地目、典买关系、当地民间惯用的方式。其成果于1913年开始陆续出版，到1915年共出版九册，名为《满洲旧惯调查报告书》。

日本军官日野强1906年曾到新疆伊犁等地考察哈萨克、蒙古等民族，著有《伊犁纪行》二卷，并于1908年出版。上卷为日志之部，记录了考察的情况；下卷为地志之部，记录了各地的情况。对所考察的各民族生活状况均有描述。日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版了一些以中国的民族与文化为研究或记载对象的游记、方志、调查报告等著作，如日本东亚同文会根据俄国学者鲍兹托涅夫（即波兹涅耶夫）的原著译补、编印了《蒙古与蒙古人》<sup>①</sup>及其续编《东部蒙古》，和田清著有《内蒙古诸部落的起源》<sup>②</sup>，柏原孝久著有《蒙古地志》<sup>③</sup>，冈田雄一郎著有《满洲调查记》<sup>④</sup>，日本西藏研究会编辑了反映西藏概况的《西藏》<sup>⑤</sup>等。日本西本愿寺探险队，自1902年至1914年三次到中国西域进行探险，探险参加者之一的橘瑞超先

① 此书于1908年由日本东亚同文会印行。

② 此书由东京目黑书店于1917年出版。

③ 此书由东京富山房于1919年出版。

④ 冈田雄一郎的《满洲调查记》，富士英译，1906年出版。出版地及出版社不详。

⑤ 该书由在成都的西藏调查会译为汉文，西藏调查会（成都）印行，1907。

后著有《新疆探险记》、《中亚探险》，合著的有《新西域记》<sup>①</sup>。

俄国的一些地理学家、语言学家、民族学家和探险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先后到中国的新疆、内蒙古、东北等地进行探险和实地调查。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波兹涅耶夫(A. M. Pozdneev<sup>②</sup>, 1850—1920年)、库罗帕特金(A. N. Kuro-patkin<sup>③</sup>, 1848—1925年)、克罗特科夫(N. N. Krotkov<sup>④</sup>, 1869—1919年)、克列缅茨(K. A. Klymentz<sup>⑤</sup>)、普热瓦利斯基(N. M. Przhevaliskii<sup>⑥</sup>, 1835—1888年)、科兹洛夫(P. Kosloff<sup>⑦</sup>, 1863—1935年)等。他们的著作中记述了这些地区的各民族风俗习惯和政治、经济、法律、宗教等情况；在他们搜集的材料中，包括了民族学方面的内容。波兹涅耶夫的《蒙古和蒙古人》、《北蒙诸城》、《蒙古佛教庙宇和僧侣的生活及与人民的关系》，库罗帕特金的《喀什噶尔》，克罗特科夫的《关于伊犁地区和锡伯人的历史、统计和民族志资料》，克列缅茨的《吐鲁番考察资料》、《亚洲沙漠中的文化绿洲和文化遗迹》，科兹洛夫的《蒙古和喀木》、《1923—1926年的蒙古旅行》等都是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写成的。

俄国的人类学家史禄国(S. M. Shirokogorov<sup>⑧</sup>, 1887—1939

① 其中的《中亚探险》初版于1912年。1993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柳洪亮的汉译本。

② 这里注的是其姓名的英文转写，俄文为А. М. Позднеев，后面的俄国人的姓名的注法相同。

③ 俄文为А. Н. Куропаткин，又有汉译为克鲁泡特金等。

④ 俄文为Н. Н. Кротков。

⑤ 俄文为К. А. Клевменц。

⑥ 俄文为Н. М. Пржевальский。

⑦ 或转写为P. Koslov，俄文为П. К. Козлов，又有汉译为哥司洛夫、科司罗夫等。

⑧ 或转写为S. M. Shirokogoroff，俄文为С. М. Широкогоров。

年),是在中国民族学发展史中引人注目的外国学者,他曾在法国的巴黎大学及俄国的圣彼得堡大学作研究生,曾任俄国的彼得堡科学院人类学部主任、俄国民族学人类学博物馆研究员、海参崴远东大学人类学教授。他对中国诸民族的调查和研究工作始于1912年。他在1912年、1913年、1915—1917年和1918年多次对在西伯利亚及中国东北的通古斯人(指操通古斯语族语言的各民族,如鄂温克族等)中进行调查。十月革命后,他到中国进行调查研究。他多次对中国的东北地区的诸民族进行体质和文化两方面的调查。以后又进行了华北、华南和西南的体质人类学和民族学的调查研究;也参加了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人类学工作;培养了一些体质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对中国民族学、特别是早期民族学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他的重要著作有《通古斯人的心理情结》(*Psychomental Complex of the Tungus*, 1937)、《北方通古斯人的社会组织》、《中国北方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Northern China*)、《华东和广东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Eastern China and Kwangtung Province*)、《中国南方人类学》、《中国人的体质发育过程》、《中国南方人发育论》等<sup>①</sup>。

一些西方汉学家、探险家,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先后到中国境内进行各种资料的搜集和调查活动。美国外交官、汉学家柔克义(W. W. Rockhill, 现译罗克希尔, 1854—1914年),在1888—1889年及1891—1892年两次率领“科学考察团”到蒙古、西藏探险,著有《喇嘛之国》(*The Land of Lamas*, 1891)、《1891和1892年蒙藏旅行日记》(*Diary of a Journey through Mongolia and Tibet in 1891 and 1892*, 1894)及《藏族民族学笔记》

<sup>①</sup> 对于史禄国有关中国的民族学活动和贡献将在下文中提及。

(*Notes on the Ethnology of Tibet*, 1895) 等著作。

德国地学家李希霍芬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1838—1905 年), 于 1868—1872 年到中国调查地形和矿产资源, 收集各方面的地学资料, 足迹遍及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华西和华南等地, 回国后著成《中国旅行记和调查报告》(*China Ergebnisse Eigener Resie and Darauf Gegruendeter Studien*, 1877) 的第一卷, 以后陆续出版, 前后达 36 卷。柏林民俗博物馆东亚部主任、汉学家顾路柏 (W. Grube, 1855—1908 年), 于 1898—1899 年到中国旅行, 著有《北京民俗学》(*Pekinger Volkskunde*, 1901), 以后又写出了研究性成果《中国的宗教礼俗》(*Religion and Kultus der Chinesischen*, 1911)。

瑞典学者斯文·海定 (Sven A. Hedin, 1865—1952 年), 自 1894 年到 1899 年先后三次到中国的新疆和西藏进行探险, 除了在考古学上作出了颇具意义的重要发现外, 在他的《走过亚洲》、《亚洲沙漠》等著作中也对所经地区的民族状况进行了描述。

出身于匈牙利的斯坦因, 于 1900 年开始对中国的西部地区考古掠夺, 盗窃了大量的中国文物, 在其著述中也有关于中国的有关民族与文化的情况的记录。

其他一些西方汉学家在关于中国的著作中, 也有部分涉及中国的各民族的情况。

一些西方传教士在从事宗教活动的同时, 也对中国的各民族的生活情况和文化进行了调查和记录, 有些还具有相当的专业研究水平。美国公理会教士卢公明 (J. Doolittle, 1828—1880 年), 1850 年来华传教, 大部分时间在福州活动; 他的著作《华人的社会生活》(*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 记录了长江以南的一些地区的社会生活, 是在美国出版的较早记录中国的社

会、文化的著作<sup>①</sup>。

美国公理会的另一位教士明恩溥 (A.H. Smith, 又作明恩普, 现译为史密斯, 1845—1932年), 在中国北方传教, 以后辞去教职, 在通州专事写作。著有《中国的文明》(*Chinese Civilization*, 1885)、《中国的特点》(*Chinese Characteristics*, 1892)、《中国农村的生活: 社会学研究》(*Village Life in China: A Study in Sociology*, 1899)、《动乱中的中国》(*China in Convulsion*, 1902)、《基督之王: 对中国的概括性研究》(*Rex Christus: An Outline Study of China*, 1903)、《中国的社会进步》(*The Uplift of China*, 1906)等许多著作。其中, 《中国农村的生活: 社会学研究》应用了斯宾塞尔描述社会学的方法, 对于早期西方人了解中国乡村社会有一定的启发。

法国耶稣教会士桑志华 (Emile Licent, 今译埃米尔·黎桑), 曾获法国科学院博士学位, 1914年到天津筹建黄河—白河博物院 (Museum Hoangho Paiho)。以后, 该博物院更名为北疆博物院。桑志华到中国后, 致力于标本的搜集工作, 足迹遍及冀、鲁、豫、晋、陕、甘、内蒙、东北南部和西藏东部, 行程数万里, 采集了大量的资料, 其中包括不少民族学的资料。他搜集了 2000 多具所到各地的人类学资料。

比利时神父昂突瓦耐·莫斯特尔 (汉名田清波), 于 1905 年至 1925 年在鄂尔多斯地区传教, 对于当地的蒙古族的语言、历史、风俗、文学等都进行了调查, 并写出许多有价值的著

<sup>①</sup> 该书于 1865 年在美国纽约出版, 为两卷本, 书名为 *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 with Some Account of their Religious, Governmental, Educational, and Business Customs and Opinions*; 1886 年, 由胡德 (P.F. Hood) 修订后易名为 *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 A Daguerreotype of Dially Life in China*, 于伦敦出版。

作，其中包括《鄂尔多斯志》、《鄂尔多斯蒙古人种学资料》、《鄂尔多斯七旗地图》等。

在泰国北部地区进行传教的杜德，在1910—1918年间，到中国的南方各省进行实地调查，特别是对傣族的考察与研究在西方具有一定的影响，著有《中国人和暹罗人的关系》和《泰族——中国人的兄长》。

1910—1911年，德国传教士洛伊施纳（F.W. Leuschner）到广东乳源调查瑶族，著有《中国南方之瑶子》。

另一类记录和研究中国文化与民族的作者是新闻界人士。英国新闻记者柯乐洪（A.R. Colquhoun，今译科尔夸恩，1848—1914年）<sup>①</sup>，曾经从广州到八莫，探测中国到缅甸边境的铁路线，事后著有《通过华南边疆从广州到曼德勒旅行记事》（*Across Chryse: Being the Narrative of a Journey through the South China Borderlands from Canton to Mandalay, 1882*）、《在掸人当中》（*Amongst the Shans, 1885*）、《由陆路去中国》（*The “Overland” to China, 1890*）等。

英国人丁格尔（Dingle），在清末由上海到缅甸，途中经过中国的西南地区，皆为徒步跋涉，对于汉族、苗族、彝族、白族等民族的婚姻、服饰、丧葬等都亲自观察。事后他担任了《大陆报》通讯员，并将这段经历写成考察记，商务印书馆在1915年出版了中译本《丁格尔步行中国记》<sup>②</sup>。

此外，英国商人立德（A.J. Little，1838—1908年），在19世纪末到川边及云南等地活动，著有《峨眉山及峨眉山那边——藏边旅行记》（*Mount Omi and Beyond: A Record of Travel on*

<sup>①</sup> 又译为葛洪、高奇云、柯奎翁等。

<sup>②</sup> Dingle（丁格尔）著，陈曾谷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

*the Thibetan Border*, 1888) 和《穿过云南》(*Across Yunnan*, 1910) 等。

一些西方国家的外交官有特殊条件到更多的地方,他们也记录了一些有关中国文化等方面的情况,特别是在将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的最初阶段,他们的作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曾经担任英国驻重庆、腾越领事的烈敦(G. J. L. Litton, 1870—1906年),著有《中国:川北旅行报告》(*China: Report of a Journey to North Ssu-ch'uan*, 1898)。

另一位英国的领事官庄延龄(*E. H. Parker*, 又译为巴克尔,今译为帕克,1849—1926年),同时又是汉学家,也有一些中国的调查记和研究著作问世,如《比较中国家庭惯例》(*Comparative Chinese Family Law*, 1878)、《上溯长江》(*Up the Yangtze*, 1892)、《中国的风俗习惯》(*Chinese Customs*, 1899)和《惟天惟一——中国和宗教》(*China and Religion*, 1905)、《中国宗教研究》(*Studies in Chinese Religion*, 1910)等。

英国的印度殖民当局官员戴维斯(H. R. Davies), 1894年到1900年间多次到云南调查,除地理方面的内容外,着重搜集民族学资料。他的著作《云南:印度和扬子江流域间的链环》,根据对中国西南地区的彝族、苗族、藏族等族群的语言、习俗调查资料写成,于1909年出版,在国内外颇有影响。英国人克拉克也在云南调查后,著有《在中国西南诸部落中》。

一般来说,西方传教士、新闻记者、商人和外交官的记录多数并非专业作品,往往比较简略,或只有部分材料较为详尽。同时,对材料的解释亦有更多扭曲之处。

拉铁摩尔(O. Lattimore, 1900—1989年),在较晚一些时间开始对中国的北方和西北边疆的一些地区进行了多学科的综合调查、研究。1924年的一次商务活动激发了他从事中国边



疆研究的兴趣。1926年3月到翌年10月，他随骆驼队进行了自归绥（今呼和浩特）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越过天山和喀喇昆仑山的长途旅行。他的著作《通往土耳其斯坦的沙漠之路》（*The Desert Road to Turkestan*, 1929）和《突厥斯坦的重逢》，就是这次旅行的结果。经过在哈佛大学人类学学院的学习，其研究愈加深入。1930—1932年，在哈佛燕京学社和古根海姆尼纪念基金会资助之下，拉铁摩尔以北京为据点，实地考察了内蒙古地区，使他对中国的边疆问题的研究领域进一步得到拓展。1934—1941年间，他又担任国际亚洲问题调查机构“太平洋问题研究会”主办的杂志《太平洋事务》的编辑，并以该会理事的身份进行中国的边疆问题的研究工作。又以北京为中心，一边从事编辑工作，一边研究中国的边疆问题。由于他与中国的许多学者和政界人士来往较为频繁，以后又兼有政治使命，其中一些著作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除上述著作外，还有《满洲：冲突的发源地》（*Manchuria: Cradle of Conflict*）、《中国的内陆边疆》<sup>①</sup>、《高地鞑靼》（*High Tartary*, 1930）、《满洲的蒙古人》（*Monggols of Manchuria*, 1934）、《蒙古游记》（*Mongols Journeys*, 1941）、《论新疆民族》等。

此外，还有一些西方和日本的学者到中国各地、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进行以考古、历史等方面为主的考察，如伯希和、白鸟库吉、羽田亨等，他们对各民族的现实状况也比较注意，在著作中亦有可供参考的资料。

西方和日本的学者对中国各民族与文化的记录，对西方了解中国产生了重要作用。同时，他们的记录和探讨对中国民族

<sup>①</sup> 原书名 *Inner Asian Frontiers in China*，又译为《中国的边疆》，有重庆正中书局1941年出版的赵敏求译本。后曾多次再版，作者名有的译为赖德懋。

学家从事民族学研究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提供了一种研究模式，在较早时期，有些中国的学者初涉民族学，特别是进行关于中国的民族问题的研究，就是由研读和模仿外国的有关著作开始的。同时，外国学者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也为部分中国的学者所吸收，甚至有些人直接用这些理论推而广之，分析中国的民族问题。二是激发了一些民族主义意识较强的中国学者的自强精神，看到外国人对中国的各民族的状况进行实地考察，并已经出版了部头不小的著作，而生活在文明古国中的国人在这些方面却拿不出有影响的论著，这种令人难堪的不合理状况是当时许多有机会阅读到这些著作的有为青年所不愿接受的，他们力求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加以改变。因而，可以说西方人关于中国的民族的早期研究，也是中国民族学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条件之一。

## 第三章

### 西方民族学在中国的早期介绍

现代民族学，是以西方概念建立起来的学科；它在中国的发展，也是由属于这一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的介绍开始的。自20世纪的最初几年起，中国的学人就开始介绍西方的民族学及相关的学科理论与方法。

#### 第一节 最早的民族学译著与 民族学观点的介绍

讲到中国民族学发展的确切的最早事项，可以追溯到《民种

学》。这本著作原著于1898年出版,书名为 *Volkerkunde*,原作者是德奥帝国的民族学家哈伯兰(Michael Haberland),由英国人鲁威(J.H.Loewe)英译,书名译为 *Ethnology*。中国著名的翻译家林纾和魏易合作转译为汉文,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初八日(1903年7月2日)由北京大学堂官书局印刷,是月底发行。译者在“序言”中说:西人“考其饮食、服饰、营构之所从来与夫部落种族之所以自始,有书焉,曰《民种学》。”译者认为,西方所述各种制度与中国古代相合,而望该书“深有裨于中国之学者矣”。除了解国外风情之外,译者希望“读是书者知西人殖民之心不能一日置乎震旦,吾须严鉴其鞭笞他种恣为扑笑之故用,自惕厉则,蒙译是书之意为不负矣。”《民种学》汉译本一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从民族学的大意讲起,叙述了民族学的历史、民族发展的内外因素、人类群体的饮食、居住、服饰、武器、工具、艺术、宗教、科学、交通、文字等的发展过程和民族的形成、文明的发展、所有制的变化、各种制度的形成、交换的发展等。下卷主要讨论人类的种族差异,对于不同的人种进行了简略的介绍。清末京师大学堂中开设人种学课程,《民种学》当为教本或主要参考书。

在民族学被介绍进中国的同时,甚至更早的一些时候,与民族学关系较为密切的社会学也被介绍到了中国。严复被认为是在中国介绍社会学贡献最大者。他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译出赫胥黎的《天演论》。翻译此书的目的就是为了给中国人提供一种观察问题的新方法,使人们懂得“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道理。1898年,严复译成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斯宾塞(H.Spencer, 1820—1903年)的代表作《社会学研究》(*The Study of Sociology*, 1873)的前两篇,即《贬愚》和《倡学》两篇,在《国闻报》上发表;1902年,全书16篇全部译完;1903年4月,由上海文明编译书局出版。为了让中国人

更易理解，他把书名译为《群学肄言》。1903年，严氏又将英国的民族学家甄克思（E. Jenks）的《政治小史》（*A History of Politics*）译为中文，于翌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同样，他将书名译为《社会通论》。因此，应当说民族学最早是由西方直接介绍到中国的，但是在早期介绍民族学思想的过程中，日本也是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途径。

1902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萨端译的日本学者有贺长雄的原著《族制进化论》。原书分三编，前二编根据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和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两书编著而成，后一编则为作者在人事变迁、国势消长等方面的见解。此书译本又名《社会进化论》，1903年列入《闽学会丛书》出版。1915年，这个译本由商务印书馆再度出版。1902年，该书局还出版了由章太炎译的日本社会学家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原书是作者综合斯宾塞和季廷史（F. H. Giddings，又译吉丁斯，1855—1931年）的理论写成的。1902年上海开明书局出版了金鸣銮译的日本涩日保的原著《社会学》三卷。1903年，吴建常根据季廷史的《社会化理论》的日文版（市川源三译）译出《社会学提纲》，作为《教育志丛》丛书的第四编出版。同年，马君武将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的第二编《社会学引论》的日译本转译为中文。

福建籍的留日学生建立的闽学会于1903年发行“闽学会丛书”，将一些日文著作译成中文出版。其中有前述的《社会进化论》、鸟居龙藏的原著《人种志》（林楷青译）、日本人太原祥一的原著《社会问题》（高种译）等，并译出石川千代松的《进化新论》，计划刊印<sup>①</sup>。这套丛书是闽学会成员在日本

<sup>①</sup> 参见实藤惠秀著，谭汝谦等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1版，229～230页，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

各专门学堂课余之暇，各就所学编译的，出版的主要目的在向国内宣传，“以期广开风气”，因而“定价均极低廉”<sup>①</sup>。在此丛书中的《人种志》一书，是一部民族学专著，较为简要而明了地介绍了世界各民族的分布、体质类型、人口、语言及风俗等<sup>②</sup>。译者鉴于当时国内对世界民族志“考据之书甚缺”，“出于理想者多，征诸实验者少，未足饜讲求者之望”，译出此书<sup>③</sup>。

在西方民族学的部分学术思想已经逐渐被人们接受之后，在学术著作的翻译中就有了一些更为专门之作。许德珩曾留学法国，专攻社会学，他翻译了法国社会学、民族学家迪尔凯姆（E. Durkheim，旧译为杜尔干、涂尔干，1858—1917年）所著的《社会学方法论》，1925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蔡元培为此译本作序，称赞迪尔凯姆所采用的“共变方法”，即比较研究方法。陶孟和等译出德国学者米勒利尔（F. Muller-Lyer，今译为米勒·吕尔，1857—1916年）原著的《社会进化史》（Phasen der Kultur，1906），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进化论民族学家威斯特马克（E. Westmarck，1862—1939年）的《人类婚姻史》于五四运动时期在北平出版的《晨报》副镌上连载，前后达一年之久。

当时翻译出版的其他西方民族学、人类学著作还有麦开柏的原著《荒古原人史》<sup>④</sup>、美国学者摩耳的原著《蛮性的遗

① 参见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分署《告示》，载鸟居龙藏原著，林楷青译《人种志》附页，闽学会印，1904。

② 参见鸟居龙藏著，林楷青译：《人种学》，闽学会印，1903。

③ 参见闽学会：《图书介绍》，载鸟居龙藏著、林楷青译《人种志》，闽学会印，1904。

④ 吴敬恒译：上海，文明书局，1912。

留》<sup>①</sup>、著名科普作家房龙（Hendrik VanLoon，今译为亨德里克·范隆）的原著《上古的人》<sup>②</sup>和《人类的故事》<sup>③</sup>等。《人类的故事》实际上是一部简明人类文明发展史，叙述了从人类起源到现代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1924年，周太玄译出法国佛利野德（J. Friedel）博士的原著《人的研究》（*Personalite Biologique del' Homme*，直译为《人的生物学的人格》），由中华书局出版。社会学方面，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22年、1925年先后出版了张东荪、吴献书译的科尔晋的原著《社会学》和甘浩泽译的纳武津的原著《社会学问答》。东京文学同志会于1924年出版了严松堂译的小林郁的原著《社会学概论》。

另外，一些学者参考国外学者的有关著作，写出了中国最早的民族学作品。陈映璜所著的《人类学》作为“北京大学丛书”之四，于1918年出版，以后十年间再版八次。该书侧重于体质人类学，对于人类学的定义、语源、分类有简略的介绍。以较多篇幅讨论人类的特征、分布、起源、体质、心理发展、社会进化及未来、人种改良和教育等问题。作者引日本的理学博士坪井五郎的观点，认为人类学是研究人类之本质、现状及由来的学问，其中包括关于诸地方住民的容貌、体格和风俗习惯等方面的调查。同时，又列举了英人拉达姆（Latham）的分类法，认为人类学是研究人类与其他哺乳动物之关系，民族学是研究诸人种的相互关系。作者提出，各国人民的风俗习惯的差异，皆因其社会组织的异或同之结果。然而，作者在正文中基本上是列举国外学者的观点，并无更多的分析，也没有

① 李小峰译：上海，北新书局，1925。

② 任冬译：上海，东亚图书馆，1927。

③ 沈性仁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

关于中国各民族的实际调查材料的补充<sup>①</sup>。

1916年，孙学悟在《科学》杂志第二卷第四期上发表了《人类学之概略》一文，根据西方的有关著作，对人类学进行了简略的介绍。顾寿白著的《人类学大意》，于1924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该印书馆于1926年又出版了宫廷璋编译的《人类与文化进步史》，主要是根据泰勒的《人类学》一书择要编写的。此外，在社会学方面，1911年，欧阳钧根据远藤隆吉的社会学讲义编译了《社会学》，并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18年，严恩椿根据一些欧美的有关著作大意编译而成了《家庭进化论》，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除翻译原著外，此书亦有对中国家庭的认识和分析。当时还有更多的介绍社会学理论的编译著作的出版，如作新社的《社会学》（1919年）、梅生的《社会学浅说》（1924年）、王平陵的《社会学教程》（1926年）、吕复的《社会学》（1927年）、朱聚仁和曹源文的《社会学大纲》（1927年）、杨幼炯的《社会学述要》（1927年）、陆志青的《社会学新论》（1927年）、李继珍和夏丐尊译的日本人高岛素之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1927年）等。

西方的民族学、社会学原著被译为中文出版，中国学者根据西方的有关著作编译的问世，使中国的新一代知识界初步了解了西方进化论等新的学术思想，进而将其运用于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解释和思考。西方著作的介绍，为中国的新一代知识界提供了新的视角，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我们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评价我们世代生活于其中的文化。

<sup>①</sup> 参见陈映璜：《人类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18。



## 第二节 利用民族学理论解释 中国的历史和文化

人们在初步接触到西方民族学和社会学的基本知识之后，就开始以这种学科观点结合中国的传统思想来认识人类社会与文化。当时，许多有识之士认为：“凡人类智识所能见之现象，无一不可以进化之大理贯通之。政治法制之变迁，进化也；宗教道德之发达，进化也；风俗习惯之移易，进化也。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sup>①</sup>

严复在国外读到许多关于进化论的著作，回国之后，对西方民族学、社会学的思想加以宣传和发挥。他译《天演论》时，就加注了 29 条按语，并作了序。在他发表的文章《原强》（1895 年）中，对有关种族分类、游牧和农业文化区别及其相互关系等问题也有简略的讨论。在《群学肄言》的自序和译余赘语中，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等加以解说，并介绍了该书的主要内容和价值。

严复在他所译的《社会通论》的自序中，认为人类的进化道路都是“始于图腾，继以宗法，而成于国家”。在图腾社会中，民众的生产方式是渔猎；到了宗法社会，民众的生产方式

<sup>①</sup> 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载《新民丛报》，第一号，1902—02—08。

则为耕稼。在此二者之间，“相嬗而转变者以游牧”。在由宗法向国家的演进中，“其相受而蜕化者以封建”。在封建阶段，民众依然多以农为业，到了国家阶段后，“兵、农、工、商四者之民备具，而其群相生相养之事乃极盛而人和，强立蕃衍而不可以克灭”<sup>①</sup>。并且认为，这种进化顺序“若天之四时，若人身之童少壮老，期有迟速，而不可或少紊者也”<sup>②</sup>。在这篇文章中，他还对中外历史发展加以比较，说明中外社会进化的同、异。该书有严氏按语 16 则，夹注 102 条。其中对于图腾、宗法等方面的进化和发展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1913 年，严复发表了《天演进化论》一文，对进化论观点进行了更详明的阐述。他在文中介绍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而后论述人群社会的进化、男女夫妇的进化、妇女地位的变化等问题。他引述了瑞士民族学家巴霍芬（J.J. Bachofen，严复在文中译为巴卓芬，1815—1887 年）关于母系社会的发现，并分析了母权的变化原因，“盖人类以食为天，而能食人者，其品皆类，是故耕稼之世，则女子地位渐高；而畜牧之世，则女权最弱。虽然弱矣，而犹未至贱也。独至宗教说兴，以妇女为污秽不可事神之物，而女界乃大受影响”<sup>③</sup>。在该文中，严氏还对社会是一个有机体的理论、宗教起源的学说进行了阐发。

严复关于人类社会的文化发展的基本认识是属于进化论的。他认为中、西方在许多方面是“冥合”的，因而中、西文化具有比较与结合的基础。他所作的这类比较多是在进化论题

①②参见严复：《译〈社会通论〉自序》，载严复译《社会通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04。

③严复：《天演进化论》，载《平报》，1913—04—12 至 1913—05—02。

目上展开讨论。严复主张在精通西学之后，以归求反观，才能够体会中国古代学问中的微言精意。他在《社会通论》和《群学肄言》中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解释，实际上就是他对中、西文化比较认识的实践。

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于1902年发表了《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略传》，介绍达尔文生平及学说。以生物进化论解释社会的发展，把富国图强作为中国的出路。他的《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一文，也把达尔文列为左右世界的十贤之一，认为达氏“实举十九世纪以后之思想，彻底而一新之者也”<sup>①</sup>。他的《文野三界之别》一文，则以进化论的理论对“蛮野之人”、“半开之人”和“文明之人”进行了解说<sup>②</sup>。随后，他对新史学加以界定时提出：历史是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的学问。并提出地理学、地质学、人种学、人类学、言语学、群学、政治学、宗教学、法律学、平准学皆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反映了他对于民族学等知识的认识<sup>③</sup>。

在章太炎等晚清国粹派人物的作用下，清末就已在学术上形成了包括西方民族学知识在内的新知识系统<sup>④</sup>。在章氏的《庸书》中，结合国外的社会学、民族学理论，对中国人种的由来、民族的结构、民族的形成、巫术的起源等均有涉猎。他的《序种姓》一文，不仅考察了中国古代的各民族及姓氏的由

① 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载《新民丛报》，第一号，1902—02—08。

② 梁启超：《文野三界之别》，载《清议报》，第十七册，1899—09—05。

③ 参见梁启超：《史学之界说》，载《新民丛报》，第二号，1902—03—10。

④ 国粹派是晚清时期由一些具有中国传统学术根底的知识分子组成的，他们既主张进行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又热衷于重新整理和研究国学，关心传统文化的命运。参见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来，也论及中国古代的母系制、私有制的产生等与当时的西方民族学有直接关系的重要问题；同时，对西方民族学中的有关种族和民族的起源等知识作了简略的介绍和评论<sup>①</sup>。

刘师培于1903年著的《中国民族志》，记述了中国历史上诸民族的分布、兴衰及其同化。其中即以“物竞天择”的进化论观点来进行分析，强调中华民族必须自强，宣传反清思想，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制造舆论。刘师培对中国原始社会的分期、母系制在中国的存在、父权制的建立、私有制的产生等问题都有见解发表，基本上是运用进化学派学说，以中国古代文献资料来说明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他的著作《中国历史教科书》等，均较为强烈地体现了这种特色。由于中国的历史发展积淀深厚、资料丰富，在粗通或初步了解西方早期进化论的思想之后，用以解释中国的古代资料 and 现代风俗对文史基础扎实的学者来说是较为容易的。刘师培将《礼记》中的阳侯杀穆侯并劫其夫人视为古代掠夺婚的遗迹。梁启超等人也从《说文解字》中找出一些字句来解释我国古代的社会情况，说明中国古代的婚姻、家庭等方面的进化现象。于是，“图腾”、“答布”、“么匿”等译音字不断被人使用<sup>②</sup>。在一段时期内，这种西方早期进化论的移植成为一种时髦，许多人纷纷效法。

1904年，《新民丛报》刊载了蒋智由撰写的《中国人种考》，讨论中国的人种由来的问题。清末，京师京华印书局出版了署“抱思斋杂著”的《中国人种考原》。该书作者认为中国人种可分为五种，即满洲、汉、蒙古、回、西藏，并对各民

<sup>①</sup> 参见章太炎：《序种姓》，载《垢书》，东京，翔鸾社，1904年初版，1906年2版。

<sup>②</sup> 参见陈永龄、王晓义：《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民族学》，载中国民族学研究会编《民族学研究》，第1辑，1版，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

族进行了“探厥源泉，稽其本质”的族源的考证。

早期进化论的优胜劣汰的观点中的种族优劣方面的看法，对当时的中国知识界也有较大的影响。清光绪进士王树枬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写成《欧洲族类源流考》一书，简介世界各国民族的起源和发展。在该书的序论中，他提出：五洲有黄、白、红、黑四种，“黄种与白种智，红种与黑种愚。愚种与智种角，则智种胜；智种与智种角，则尤智种胜。今日欧洲之人，天下所称为尤智者也”<sup>①</sup>。章太炎对于中国人种的“西来说”也一度表示赞同。国粹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邓实，对西方当时流行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较为赞同，他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异是由于“上地人种不同”造成的<sup>②</sup>。

可见，清末知识分子，对当时一些民族学问题的认识与当时或此前一段时期的欧洲民族学界以进化论为主调的民族和种族的看法，是一脉相承的。

在对西方学说介绍的同时，中国部分知识分子也用自己的哲学思想对外来的部分理论进行修正，进行再思考。许多中国学者对西方民族学知识并未完全被动吸收，对西方的早期进化理论和斯宾塞的理论也有一些存异之处。章太炎对当时流行的一些民族学的学术观点曾提出批评，他认为，西方文化并不是四海皆同的共同范式，中国作为一个文化根底深厚、自成体系的国家，不应简单模仿。1906年，章太炎著《俱分进化论》一文，认为进化并非一方直进，而是善进化、恶也进化，双方并进，人类社会永远达不到尽美醇善的理想境地。章氏的其他一些文章也对严复等人主张的进化论提出批评，他主张进化没

<sup>①</sup> 参见王树枬：《欧洲族类源流考》，中卫县署印，1902。

<sup>②</sup> 参见邓实：《鸡鸣山风雨楼独立书》，载《政议通报》，1903（25）。

有规律，甚至是不可推断的，具有非延续的、偶然的特点<sup>①</sup>。说明中国的学人在开始吸收西方民族学理论精华之时，就已经有了一些较为重视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人结合中国的实际进行思考，当然还只是片断的、零散的，也没有作严谨的论证和分析。

上述这些对于西方民族学理论的理解及看法，是中、西会通和中、西文化互补的产物。这种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相调合的做法，在以后的中国民族学发展的过程中有更多的表现。

### 第三节 民族学及相关学科的初期活动

西方民族学及其相关学科传入中国后，除了解释之外，人们也开始考虑并着手从事有关知识的系统化传授，开始进行一些有关的调查研究工作。由于尚在西方学术传人的初期民族学和社会学等关系密切，很难分开，在对此阶段的中国民族学发展的回顾中，必然更多地涉及到一些相关的学科。

1903年，清政府学部所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中，将人种学列入国史及西洋史两门随意科课程中。这里的人种学，其实即民族学。国学大师王国维在1906年曾提出，在文科学大学中可以设经学、理学、史学、国文学和外国文学四

<sup>①</sup> 参见章太炎：《俱分进化论》，1906年印。印刷者、地不详。

科，其中前三科的课程都应包括社会学，史学科课程中还包括人类学<sup>①</sup>。1913年初，北洋政府教育部在颁布的大学规程中规定：文科哲学门、历史学门和地理学门设人类及人种学课程；文科文学门和理科动物学门设人类学课程；文科哲学门、文学门和法科政治学门设社会学或社会学原理课程<sup>②</sup>。此外，还规定：高等师范学校的本科历史地理部要在第三学年开设考古学概要和人类学概要各一个学期，每周三课时<sup>③</sup>；法政专门学校则在政治科开设社会学课程<sup>④</sup>。

对西方民族学原著翻译和观点介绍之后不久，部分清末民国初年赴西方学习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中国留学生也陆续回国。他们回国后，开始进行一些与民族学或与民族学有关的零星学术活动。在英国学习动物学和地质学的丁文江在出国七年之后，取道云南、贵州、湖南到汉口，再从那里乘船赴上海。此次作为地理学者的旅行，为他以后的西南地质调查作了准备。“在贵州黄果树等地，看到许多奇装异服的女人，引起了注意到贵州的土著民族，仲家子、青苗、花苗等。”<sup>⑤</sup>引起了他对于人种学的兴趣。1914年，丁文江作西南地质矿产调查时，对于云南和四川的会理的少数民族进行调查和体质人类学测量。他在《独立》杂志上先后发表了《云南的土著人种》、

① 参见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载《教育世界》，1906（2、3）。

② 参见北洋政府教育部：《大学规程》，载《教育杂志》，第五卷，1913（1）。

③ 参见北洋政府教育部：《高等师范学校课程标准》，载《中华教育界》，法令第61~75页，民国己年（1913年）五月号。

④ 参见北洋政府教育部：《法政专门学校规程》，载《中华教育界》，法令第37~38页，民国己年（1913年）三月号。

⑤ 胡适：《丁文江传》，1版，21页，海口，海南国际新闻中心、海南出版社，1993。

《四川会理的土著人种》等有关文章。

李济在美国学习了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课程，在哈佛大学学习期间，他曾于1922年给美国人类学会作了题为《中国人类学的若干问题》的报告。翌年，完成博士学位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 Anthropological Inquiry*），他的这篇著作既包括了体质人类学的数据分析，又有对于中国古籍的梳理，将现代人类学的知识运用于对中国民族起源问题的研究，是第一部中国人写的现代人类学著作。在文中，他从描述中国人的体质人手，由中国历代族姓和城邑的变化归纳出汉民族的演变趋势，并论述了中国少数民族的变迁和整个中华民族迁徙的问题。将中国民族分析建构为黄帝子孙、通古斯、藏缅族群、孟·高棉语群、掸语群五个主要成分和匈奴、蒙古、矮人三个次要成分。

李济于1923年回国后，应天津南开大学之聘，担任人类学教授。当年，在南开大学的分科中，文科有人类学系，课程表上开列人类学和进化史两门课程<sup>①</sup>。这个人类学系的学生人数不详，存在的时间也不久，因为唯一在该系担任课程的李济于1925年受聘于清华大学，担任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人类学讲师，但这毕竟是中国设人类学系之始。1924年，李济兼任南开大学文科主任，是年暑期，赴西北大学主办的暑期学校讲学，内容为社会学大要、人类学概要、人类进化史等<sup>②</sup>。

李济到清华大学并在国学研究院担任人类学、考古学讲师

<sup>①</sup> 参见南开大学：《分科概略与各科课程》，载《天津南开大学一览》，南开大学印，1923。

<sup>②</sup> 参见李光谟：《李济先生学行记略》（未定稿），7页，作者印，1994。



后，招收了人类学专业中国人种考的研究生，吴金鼎随李济学习人类学，但是有关课程以体质人类学、考古学为主。李济在清华大学正式任教前，于1925年夏曾到湖北的黄陂、黄冈等地进行体质测量，从身高、鼻阔和颅囟等方面发现鄂西北与鄂东南的居民的体质构造差别颇大，其成果《湖北人种测量之结果》在中国科学社年会上发表。翌年，他又到山西介休进行了体质人类学测量。1925年冬，李济在清华大学定期开设了题为“人文学”的普通演讲，每周二课时，为清华研究院的学生的共同必修科目，旧制的清华学校的学生也可经过教授特许后旁听。这个课程实际上就是民族学<sup>①</sup>。在此之前，清华学校早在1917年就已经开设了社会学课程，由美国人狄特莫(C.G. Dittmer, 又译狄德曼)讲授社会学与社会起源。清华学校高等科西学部还开设有西方文化(现代文化)课程，包括19世纪以来的西洋文学、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概况<sup>②</sup>。狄特莫还指导学生到北京西郊的195家居民的生活费用、清华大学的93名校役的生活费用进行调查。以后，陈达、孟天培、李景汉、甘博(Sidney D. Gamble, 1890—1968年)等也主持和参与了对北京的人力车夫、成府村的居民、安徽休宁县湖边村的居民生活费用的调查，对北京的物价、工资及费用进行调查。

厦门大学于1922年就已经开设了社会学课程，随后设立了历史社会学系，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的博士徐声金、

① 该课程注有英文名称 Ethnology。参见清华大学：《清华大学一览》，清华大学刊印，1925。

② 参见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清华大学校史稿》，1版，29~3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美国汉诺威大学的社会学学士林幽等任教，于1922年和1924年先后招收最初两届本科学生，林惠祥就是该系的第一届（1926年毕业）唯一的一名毕业生。1926年，厦门大学成立了国学研究院，其中设有社会调查（礼俗方言）组、闽南文化研究组等。国学研究院就有关苗族、瑶族的生活状况等资料由周刊社发布启事征集，该院还征求福建的汉族、回族等各民族的家谱<sup>①</sup>。史禄国后来也到该校任教，他在厦门大学期间，除承担教学任务外，还进行了研究福建人种考、福建孩童长成测验等课题。1926年秋季，厦门大学在文科中开设有徐声金讲授的社会起源和社会学原理、史禄国讲授的人类学及林幽主讲的社会学大意、家庭社会研究和乡村社会学<sup>②</sup>。

史禄国于1926年到厦门大学任教，研究课题有“福建人种考”、“福建孩童长成测验”、“东胡语言比较词典”等。在此之前，他在东北、华东和华南搜集了许多体质人类学资料，并先后于1923年和1925年出版了两部关于中国体质人类学研究的著作——《中国北方人类学》和《华东和广东人类学》，从不同的体质人类学指数的统计和比较，对中国各民族的构成、中华民族的迁徙和各族群之间的差异都有研究<sup>③</sup>。

北京大学在早年即开设了人类学、社会学课程。蔡元培担

① 参见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社：《启事》，载《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第一卷，1927（2、3）。

② 黄宗文、郑文贞：《厦大校史稿》，1版，112~113页，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

③ 参见 Shirokogoroff, S.M.（史禄国）：*Anthropology of Northern China*（《中国北方人类学》），Extra Vol. II，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Shanghai, 1923；*Anthropology of Eastern China and Kwangtung Province*（《华东和广东人类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

任该校校长后，成立研究所，其中设立国学门、社会科学门等。1917年，北京大学的哲学门通科（一、二年级）开设了人类学课程，专科（三、四年级）开设了社会学并特别讲演包括孔德派、斯宾塞、进化论等题目；该校的史学门通科开设了人种学及人类学、社会学，并特别讲演包括中国人种及社会研究、苗族之考证、中国古代文明与巴比伦文明之比较等；理科地质矿物学门专科开设人种学；法科政治学门、经济学门、商业学门分别在第三学年开设社会学课程<sup>①</sup>。

在五四运动之前，北京大学就开始进行近世歌谣的搜集工作，将研究视点转向平民生活，并成立了北京大学歌谣征集处。1920年，他们建立了群众性的民俗研究团体“歌谣研究会”，还创办了中国的第一个民俗研究刊物《歌谣》周刊。以后，又在国学门中专门成立了歌谣研究室。1923年，又成立了对民俗进行系统调查的风俗调查会，向全国印发《风俗调查表》。是年，顾颉刚、常惠、孙伏园、容庚、容肇祖到京西妙峰山调查庙会风俗。沈作乾曾到浙江调查畲族，并著有《畲民调查记》，记述较为细致生动，1924年在《东方杂志》第21卷第七期发表，以后又将该文刊载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上。在沈作乾调查浙江畲族前后，胡先骕也对该地畲族作过考察，亦有较为简单的考察记发表。1916年，北京大学开设社会学班，由章太炎的门生康心孚担任教授。陶孟和与梁宇皋在英国合著《中国的乡村与城市生活》（*Village and Town Life in China*, 1915），对中国社会进行社会学分析，但在社会学分

<sup>①</sup> 参见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文理法科本科预科改定课程一览》，载《教育公报》，1917（14），10-17页。

析手段的运用方面依然存在缺陷<sup>①</sup>。陶孟和自英国留学回国后，不久也到北京大学担任社会学教授，并开设了社会进化、社会学、人口学等课程。

英国哲学家罗素（B. Russell）教授，自1920年起在中国讲学。他于1921年秋到天津南开大学教授社会学课程，曾组织社会调查团，在天津对于中国的人家庭、人力车夫、牢狱状况等情况进行调查<sup>②</sup>。

此外，上海复旦大学于1921年前后开设社会学课程，1925年设社会学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于1924年由朱进之执教，开设社会学课。1916—1917学年，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史学部开设人类学概要课程，该课程基本是根据日本的山崎氏的《人文地理讲稿》、坪井氏的《人类学讲义讲话》、野口氏的《地理学讲义》和参考了中外名人著的人类学、地文学、原人史、人种学著作及有关杂志编纂讲义讲授；此外，该校的地理通论课程中也包括部分与民族学有关的内容<sup>③</sup>。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19年秋季学期保姆讲习科也开设了社会学，讲授社会学大意，以儿童社会为主<sup>④</sup>。另外，其他一些学校也在20年代中期前后开设了社会学等方面的课程。

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后，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宣传，

① Kulp II, D.H. (葛学溥): 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 The Sociology of Families (《华南农村生活》),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1925, P.1.

② 南开大学:《南大文科学生生活的鸟瞰》，载《南大周刊》，“学生生活号”，第五期，1924—05—20。

③ 参见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本学年教授程序报告》，载《教育公报》，1920（2），8~9页。

④ 参见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八年九月开学后现行校务状况报告》，载《教育公报》，1920（2），27~38页。

其中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化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开办上海大学，校内设有社会学系，瞿秋白担任系主任，瞿秋白、施存统等人担任教授，讲授社会学、社会哲学、社会思想史、社会问题、社会运动史等课程<sup>①</sup>。瞿秋白专门就民族问题撰写讲稿，并开设课程。施存统撰写的讲义《社会运动史》还曾公开印行。

蔡和森早在1922年就联系实际资料编写讲义，在上海大学讲授“私有财产和家族制度的起源”，以后又写出《社会进化史》（1924年由民智书局出版）。蔡和森认为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是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马克思的《资本论》齐名的19世纪的学术界的空前的大杰作。他给予摩尔根以很高的评价，认为摩氏“真是发明原始人类进化演进程序的第一人”，“他不知道马克思，也不知道唯物史观的学说，然而他于不知不觉中，竟在美洲从新发明并且系统的应用了这种真理，他所得的主要结果，大致与马克思是一样的”，而恩格斯“将摩尔根和马克思的意见联合一致，至此摩氏不朽之业才发扬光大于世，而历史学亦因此完全建立真实的科学基础”<sup>②</sup>。此书运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的基本原理来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对于摩尔根的学说进行了介绍，因而被誉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最早著作”<sup>③</sup>。中国共产党创建者之一的李达，在社会学教学与研究中也积极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

<sup>①</sup> 参见黄美贞、石源华、张云：《上海大学校史稿》，1版，48~53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

<sup>②</sup> 参见蔡和森：《社会进化史》，1~3页，上海，民智书局，1924。

<sup>③</sup> 欧潮泉：《解放前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在中国的传播》，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3（2）。

社会进化观点，在其著作《现代社会学》<sup>①</sup>中辟有两章专门讨论家族和氏族，体例和基本观点均依照《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随着早期进化论的一些观点为人们逐渐接受，对进化论的介绍性著作也更多了，如过耀根按照进化论的观点编写了《人类进化之研究》，1921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陈翰笙也编写过一本书名为《人类的历史》的著作，1927年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张伯萁著有《社会进化简史》，1925年由国光书店出版；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于1926年刊印了廖划平编写的《社会进化史》；上海北新书局于1927年出版了署名黎明的《社会进化史大要》。这些著作，宣传了人类进化的基本知识，有些还将进化与革命联系在一起，说明社会文化变革的必然性，将进化论作为进行政治宣传的工具。同时，也有部分学者从更专业的角度讨论进化论学说，陈长蘅等人的《进化论与善种学》，1924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重点研究进化论和人种改良；陈顾远则更深化一步，将进化论的思想与对中国古代典籍的研究相结合，写出了《中国古代婚姻制度史》一书，1925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当时，上海大学和上海学生联合会经常请中国共产党党员和社会名流为青年学生和民众进行讲演，宣传新思想，介绍民族学等新学科的知识。1924年，由上海学生联合会组织的上海夏令讲学会安排暑假研究科目，其中有瞿秋白的社会科学概论、施存统的社会进化论、董亦湘的唯物史观和周建人的进化

<sup>①</sup> 李达：《现代社会学》，上海，昆仑书店，1926。

论<sup>①</sup>。杨杏佛为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会演讲了“从社会方面观察中国政治之前途”，恽代英为该会讲了“中国民生问题”。1924年，美国的著名社会学家华德在北京、广州、上海各大学讲演，也被邀请到上海大学进行连续四天的系统讲演，论述了社会科学及社会问题<sup>②</sup>。

除了院、校系统外，人们也为普及新知识举办了一些宣传教育活动，如北京，于1912年先后成立了通俗教育调查会和通俗教育研究会，举行了“社会学大意”等课程的演讲<sup>③</sup>，以后又建立了十余所公立通俗教育演讲所；1919年，北京博物调查会举办了博物展览会。1922年，华洋义赈救灾总会请马伦（C. B. Malone）、戴乐尔（J. B. Tayler）等教授指导九所大学的61名学生分工调查直隶、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等省的240个村庄，该调查采用了县、村及家庭三种问题表，注重农民的生活方面<sup>④</sup>。

在20世纪最初的20多年中，西方教会在中国办的大学陆续开始教授社会学等课程。1913年，上海沪江大学由美国人葛学溥（D. H. Kulp II）执教，开设社会学课程。1915年，该校建立了中国的第一个社会学系<sup>⑤</sup>。葛氏曾为哥伦比亚大学教

① 参见黄美贞、石源华、张云：《上海大学校史稿》，1版，106~108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

② 参见黄美贞、石源华、张云：《上海大学校史稿》，1版，98~99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

③ 参见京师学务局：《京师学务局通俗教育筹办草案》，载《北京市教育档案》，4—1—61（系档案序号。前序号为档案总目号，中序号为类别号，后序号为案卷号。后同）

④ 参见李剑华：《社会学史纲》，载孙本文主编：《社会学大纲》，下册，1版，130~131页，上海，世界书局，1941。

⑤ 1993年厉天予先生口述，王建民记录稿，未刊。

育学助理教授，后担任沪江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在他的指导下，沪江大学社会学系潮州籍学生于1918—1919年进行了广东潮洲的凤凰村调查，学生主要依据表格进行调查。1923年，葛氏亲自前往实地观察，对学生们的初步调查加以修正，调查报告《华南农村生活：家族主义社会学》(*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 The Sociology of Familism*)于1925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用英文出版。此报告试图借助社会学的方法，通过对凤凰村的分析，为研究中国的学生补充乡村生活的材料。此书成为此后西方学者研究华南农村社会的重要参考书之一。1923年，沪江大学学生在美国布朗大学教授白克林(H.S. Bucklin)的指导下，又在上海附近的沈家行进行了农村调查，由张镜予(睿)主编，次年编成报告，由沪江大学勃朗社会学院印行，192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其研究成果《沈家行实况》。

1908年，上海圣约翰大学已开设社会学课程，由美国人阿塞·孟(Arthur Monn)任教。朱友渔于1911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任社会学教授。

燕京大学在1912年即组建了北平学生社会服务俱乐部，他们曾和隶属于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所属的北京社会实进会一起，对北京的320名人力车夫进行了调查研究，该校于1922年开设社会学课程，建立了社会学系，由美国人步济时(J.S. Burgess, 1883—1949年)担任主任，1926年许仕廉接任系主任。步济时和美籍传教士甘博等自1919年起调查北京的社会状况，涉及历史、地理、政府、人口、健康、经济、娱乐、娼妓、贫困、救济、宗教等项，于1921年出版了他们的考察结果《北京，一个社会调查》(*Peking, A Social Survey*)。在此期间甘博曾到燕京大学任教，他还著有《1900—1924年北



京的物价、工资和生活标准》(*Price, Wages, and the Standard of Living in Peking, 1900—1924*, 1926)。步济时著有《北京的行会》(*The Guilds of Peking*, 1928)。

金陵大学在1917年就已设社会学课程,将社会学作为在本科学生中开设的必修科目和选修科目,不久又建立了社会学系<sup>①</sup>。金陵大学农科教授巴克(J.L.Buck)在1922年指导他的一名学生在安徽芜湖附近调查102个农场(指地主及所属佃户)的状况,特别注重地主及佃户的全年的收入和支出。1923年,巴克又指导他的另一名学生用颇为详细的调查表在直隶盐山县(今属河北省)调查150个田庄的经济和社会状况,调查的结果均用英文发表。关于田庄的大小、耕作的状况、农产的数量、贩卖的方法等项,都有详细的统计。当时被认为是“在中国农家的调查里最好的报告”<sup>②</sup>。

1919年,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开始搜集包括西南少数民族文物在内的各种文物和标本。该校于1922年成立了一个研究边疆的学术团体——华西边疆学会,最初有会员16人,但多数为在该校任教的外国教师<sup>③</sup>。次年开始编印不定期英文刊物《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刊载会员们和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

然而,这时的教会学校的教学多偏重于社会学方面,对民族学方面的内容虽有所涉及,但无论在质量上还是在数量上都显不足。中国人担任有关课程讲授者较少。在教材方面更缺少

<sup>①</sup> 参见金陵大学:《金陵大学同学录》,金陵大学印,1922。

<sup>②</sup> 李剑华:《社会学史纲》,载孙本文主编《社会学大纲》,下册,131页,上海,世界书局,1941。

<sup>③</sup> 参见华西大学边疆研究所董事会:《华西边疆研究所缘起》,载《中国边疆》,第一卷,1942(2)。

结合中国现实的内容，基本上是按照国外的教科书和外国学者的现成研究著作来进行讲授。在结合教学的实地调查方面虽然已经开展了一些工作，但往往是由外国教师主持，中国教师和学生只是依照调查主持者按照国外的经验拟定的提纲进行调查，调查的主要方面同样是社会学的，而非民族学。

在这一时期，还应该提及的是一批留学生开始到国外去专门学习民族学、社会学课程。在五四运动以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推进，许多学生对社会科学学科的知识更感兴趣，到国外学习民族学等课程。中国学生大批去欧美留学，据不完全统计，1921—1925年期间，在欧洲、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主修社会学的共有35人，占当时留学生总数的2%<sup>①</sup>。由于这一时期留日学生的数量较之以往更大，在日本学习民族学及其相关课程的留学生也更多。自五四运动至1928年前后，在美国学习的有潘光旦、徐声金、吴文藻、吴泽霖、李济、吴景超、陈达、杨开道、许仕廉、江绍原、言心哲、应成一、孙本文、黄文山、陈序经、胡体乾、游嘉德、吴定良、张少微等，在法国学习的有杨堃、凌纯声、柯象峰、胡鉴民、徐益棠、卫惠林、许德珩、李璜、萧瑜等，在英国留学的有刘咸、梁宇皋、陶履恭（孟和）、何联奎等，蔡元培、陶云逵、俞颂华等先后在德国学习，林惠祥则在菲律宾大学研究院师从美国导师学习。他们在国外学习时，大多受教于当时的民族学大师，接受了民族学及其相关学科的正规学术训练，系统地学习了有关课程，掌握了较为扎实的民族学知识，为以后中国的民族学的发展储备了人才。

<sup>①</sup> 参见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原著1926年出版，上海文化出版社影印本，1989。这个百分比是由本书作者根据有关近、现代留学人员资料计算的。

#### 第四节 中国民族学萌芽时期的特点

自 20 世纪初到 1927 年前后，可以被视为中国民族学的萌芽时期。在此阶段中，虽然我们并未看到一个新学科的建立，但是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频繁，对于西方民族学的一般著作有了初步的介绍，人们逐渐接受了一些新的知识。中国的知识阶层将新的知识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关于人类发展的解释和中国古代文献资料结合起来，对进化论有了较为普遍的了解，也初步知道了民族、种族、文明、野蛮、进化、母系、父权、图腾、私有制等现代民族学概念。有几本有关研究方法和理论认识的著作有了汉译本。这些，成为以后民族学能够在中国发展成为独立学科的起步基础。与此同时，在大学里开始开设了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课程；在萌芽时期的最后几年，还出现了中国最早的人类学系。这一切，为以后这一学科在中国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与此同时，有一些关于各民族聚居地区的调查著作相继问世。除前述沈作乾的《畬民调查记》之外，1912 年，四川都督府派遣杜明烽、何元体、秉基三人到四川的峨边、马边、雷波和云南的屏边四个县的彝族地区进行考察，事后出版了杜明烽著的《峨马雷屏边务调查记》和《三边屯务调查图说集》。类似的著作还有 1923 年东方杂志社编写的《蒙古调查记》（上海商务印书馆同年出版）及 1924 年刊印的张其勤、沈古伯著

的《西藏调查记》等。这些著录虽然幼稚，而且还称不上是专业的民族学家的作品，但也都是独立成篇。可以说，中国民族学学科的建立，是其萌芽时期学术活动积累的产物。

在国外留学的学习民族学及其有关课程的中国学生，则为民族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准备了骨干队伍。民族学在中国作为独立学科出现之后，在短时期内能得到迅速的发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得益于这批已经掌握了国外学科发展的最新状况的学者。他们既进行学科理论的争论，又积极从事田野调查工作；既介绍国外学术思想和理论流派，又加以分析和综合，为建立中国民族学体系而思索。如果没有这一支专业骨干队伍，民族学在中国是不可能得到迅速发展的。

另外，考古学、古生物学、新派历史学和体质人类学在中国的初步发展，也促进了民族学在中国的发展。自19世纪末人们发现了甲骨文之后，不久即开始考古活动和文物搜集工作。1921年，中国地质调查所顾问安特生等人发掘了河南渑池仰韶村等遗址，同年他还发现了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1923年安特生发表了《中国远古之文化》。接着，考古学家们又在甘肃和青海发掘了许多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的遗址。北京大学于1922年建立了考古学研究室，两年后，该室设立考古学会。1926年，由李济主持进行了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发现新石器时代的陶片和蚕茧等。同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也创立了考古学陈列室。1926年，在北京猿人遗址出土了古人类牙齿化石。1927年，以中国学术团体联合会的名义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合组西北科学考察团，北京大学教授徐旭生（炳旭）为中方团长；该团的调查研究工作以考古为主，包括对于民族等方面的考察。考古学为民族学中的许多重要问题（如当时所普遍关心的人类和民族的起源与演

变、原始社会的状况等)提供了研究的实物材料和实证说明。

新派历史学用民族学理论解释中国古代历史,并用大量的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乐于接受的古籍文献资料为例说明进化的史实。

体质人类学的测量材料则在人类的由来与发展和中国民族的来源与构成方面,为已经建立起一定程度的科学文明的中国人提供了量化的、也更令人愿意相信的证据。

人们将民族学材料与考古学材料、历史学材料相结合,用以说明中国古代和当代各民族在历史发展中的位置,并以中国传统的文化进化观念与民族学古典进化论的理论和方法,衡量各民族所处的历史发展水平。

有了考古学、古生物学、新派历史学、体质人类学等学科的支持,对于民族学理论的研究、传播就会更深入,对于中国的学者全面认识民族学的可能性也更大。不过,在中国民族学的萌芽时期,不少人认为史前人类与现代“原始”民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方面都是一致的。因而,以古典进化论为理论主导的萌芽时期的中国民族学,具有明显的简单化和绝对化的倾向。

这时期出版的民族学译作,一般多选择较为简略和概括的原著,有些著作也是根据这类原著翻译改写的。然而,系统的民族学研究的专著译成中文者所占比例甚少。当时,一些学者已经开始以自己对西方这些学术理论的理解,提出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一些看法。但是,由于多数人并非专注于民族学的研究和实践,许多人更关心中国社会的前途和东、西文化的选择,在这些人看来民族学是政治斗争的武器和理论基础的准备。另外,有部分学者则把更多兴趣放在其他学科的发展之上,民族学方面的工作往往是顺手和捎带而做的,因而,他们

对于学科理论缺乏整体的把握，对于已经介绍了的理论在理解上也较为粗陋。

在这一阶段，人们分析中国的历史与文化时，多爬梳古代文献史料和利用人们较为熟悉的一般民俗资料，缺乏对现状的实地调查和分析。当时，由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缺乏深入调查的条件。从世界范围来看，当时强调民族学的调查资料的价值在于在实践的基础上进行实地调查的总结和探讨，国内学者在以后所强调的民族学的田野调查，特别是参与观察方面的训练还比较少；少数调查者即使进行了调查，但因方法和技术上的限制，影响了调查的科学性，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学的田野调查尚没有开始。关于民族的调查和记录较为粗浅，多是一些综合调查的组成部分，在报告中反映出的民族偏见和对少数民族习俗的误解也比较多。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感受到外来侵略的威胁，与民族主义在当时其他一些殖民地国家得到发展的状况相似，中国的许多有识之士关注起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将民族学知识与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中国人种考原》一书的作者认为，“人种之学蕃于近叶，其曼衍鸿博，颇有裨益于兼并之术。如今所盛倡之民族，帝国主义是也。”<sup>①</sup>但他又提出，人们应该了解自己所在民族的由来，“人不知其先之出，则爱国爱种之心何由而生乎？”<sup>②</sup>因而，一些知识分子利用所了解的部分民族学知识，探讨人类的来源和中国民族的起源问题，使之成为这一时期和以后一个阶段人们在民族学领域内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萌芽时期，中国民族学和一些相关学科开始有了一些活

---

①②佚名：《中国人种考原》，清朝末年印本，九页。

动，但在当时的社会学的活动比较民族学要更积极一些。当时在中国的 60 所各类大学中，开设社会学课程 308 种<sup>①</sup>。在研究和教学活动中，和民族学关系最为密切的是社会学中的社会进化或社会进化史，其次是体质人类学中的人类进化史和人类种族的起源、发展的探讨。由于民族学的活动未能够广泛开展，特别是多停留在书斋之中与讲台之上，未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田野调查，使民族学这门依托于田野调查并与实践联系十分紧密的学科难以取得独立的地位。

---

<sup>①</sup> 参见王康主编：《社会学史》，1 版，270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 第四章

### 中国民族学的创建

由于有关奠基的大量工作的推进，民族学在中国逐渐有了生存空间。在新的时局不断变化的条件下，经过学术领袖的倡导和民族学家们的努力，终于使民族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在中国出现。

#### 第一节 蔡元培与《说民族学》

1926年12月，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在《一般》杂志第一卷第12号上发表了《说民族学》，他指出：“民族学是一种考察各民族的文化而从事记录或比较的学问。偏于记录的，名为



记录的民族学，西文大多数作 *Ethnographie*，而德文又作 *Beschreibende Volkerkunde*。偏于比较的，西文作 *Ethnologie*，而德文又作 *Vergleichende Vlokerkunde*”。<sup>①</sup> 也就是说，通常有民族志、民族学，按德语语法，前者可以被称为记录的民族学，后者是比较的民族学。德国人也用民族学一词作为考察各民族文化的学问的总名。蔡元培在学术刊物上最早提出“民族学”这一术语，对为民族学下定义，对民族学在中国的发展有重要影响。虽然民族学这一术语的欧洲的文字概念在此之前就已经传入了中国，并得到了一定范围的介绍，但是，从学科名称上来讲，有人种学、民种学、人文学等多种译法，使用不够规范和统一，人们对于该学科的认识也有较大的差异。蔡元培对民族学从概念上明确了学科定义，并对学科进行了明确的界定，为民族学学科的建立做了准备。

蔡氏的这篇论文虽然篇幅并不长，在阐述民族学学科体系、理论和方法上也说不上非常系统，但对当时在中国建立和发展民族学这门学科提出了有重要价值的看法。他以中国古代的丰富材料为主，介绍了记录民族学发端于古代的情况。同时，他又结合民族学在西方发展的历程指出：真正可以认为属于记录民族学的著作，则是 19 世纪后半期出版的；现代记录民族学与过去之所以不同，“就是事实要从实地考查上得来”。他说明，当时由于实地调查是较为困难的，每一位民族学学者所考察的也不过是一部分，或以一个地方为单位，或以一个或数个民族为范围，或以一事件为范围，或以一区域的普通文化为范围；全面论述的著作，则是汇集前人的记录以成书的。比较的民族学是“举各民族物质上行为上各种形态而比较他们

<sup>①</sup> 蔡元培：《说民族学》，载《一般》，第一卷，1926（12）。

的异同”，并考究其异同的缘故、进化的阶段和顺序等问题。为了让中国人有一个参照系，他还介绍了西方比较民族学的概况。他在文中也简略地讨论了民族学与人类学、人种学、考古学、地理学、历史学的关系。他认为，“似乎人类学有可以包含民族学的倾向”，但民族学又“久已离人类学而独立”，民族学也使用人类学的方法，包含人类学分子；人种学所详求的是种系的异同，民族学详求的还是偏于文化方面；考古学所得的材料均为实质的，用民族学所得的材料来证明它，才能知道详细的作用；民族的许多活动都与地理有关，早期的一些民族学家也是地理学者。民族学被蔡氏视为历史学的一部分，他认为民族学也和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均有关系<sup>①</sup>。

蔡元培早年曾经担任绍兴中西学堂的监督，接受新学的影响；1907年又到德国留学，翌年，到莱比锡“进大学听讲，凡三年。于哲学、文学、文明史、人类学之讲义，凡时间不冲突者，皆听之”。以后，又两度入莱比锡的世界文明史研究所，研究比较文明史<sup>②</sup>。通过与民族学有关的课程学习，受到当时在德国仍有重要地位的进化学派的影响。1924年，他分别出席了在荷兰、瑞典举行的有关国际民族学会会议。随后，又接受留学莱比锡时的同学、德国民族学家但采尔的意见，去汉堡大学研究民族学，前后达一年多。这使他在民族学方面的知识增加了很多。他的篇幅稍长的民族学论文多数也是在这次学习之后发表的。1917年，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后曾一度膺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再后来他又负责筹备中华民国大学院和中央研究院。在北京大学期间，他采取了中西兼容、各学术流

<sup>①</sup> 参见蔡元培：《说民族学》，载《一般》，第一卷，1926（12）。

<sup>②</sup> 参见蔡元培：《传略（上）》，载《蔡元培全集》，第3卷，1版，北京，中华书局1984。

派和观点兼容的“兼容并包主义”，培养学术研究风气，并使之成为该校的重要学术传统，推进了包括民族学、人类学在内的各种新学问的建立和发展。在大学院和中央研究院的建设过程中，他将自己对于民族学的认识付诸实践，在中国设置了与民族学学科有关的最初研究机构，组织了最早的一些系统的研究活动。

在《说民族学》之前，蔡元培曾经写了《美术的起源》、《中国古代之交通》等有关进化论的文章，并在各地作了许多演讲。演讲中，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形，运用中国资料，阐述进化论原理，介绍民族学学科概念。

蔡氏认为，研究美术的进化应当运用考古学和民族学两个方面的材料，而民族学资料又是其中的主要材料。通过对装饰、绘画、舞蹈、音乐起源和发展的研究，他总结出美术进化的规律，“总是由简单到复杂，由附属到独立，由个人的进为公共的”<sup>①</sup>。他又根据中国古代与其他民族在交通运输工具方面的资料，提出“车为最进步，舟为最普及，楫为最先出，而楫为最希（稀）有者”。“四载之中，最普通者，实不过舟、车二种。惟就初民观之，车之发展，后于舟耳。文化既开，双者同时并进”<sup>②</sup>。这类议论表现了其进化论的观点。在研究中，他较多地使用比较方法，资料基本上是来源于中国的古籍文献资料，亦较为简略地引征西方民族学家搜集和介绍的其他原始的民族材料。

他特别重视博物馆的建设，早在1916年他就在北京通俗

<sup>①</sup> 参见蔡元培：《美术的进化》，载《蔡元培全集》，第4卷，1版，北京，中华书局，1984。

<sup>②</sup> 参见蔡元培：《中国古代之交通》，载《蔡元培全集》，第4卷，1版，北京，中华书局，1984。

教育会演说，提倡建立博物馆。他对西方的博物院备加赞赏，把博物院作为文化发展的重要部分，除提到科学、自然历史、历史、美术几类博物院外，特别指出，人类学博物院陈列的各民族的日用器物、衣服、装饰品以及宫室的模型、风俗的照片，“可以作文野的比较”<sup>①</sup>。他也把人类学博物馆视为社会美育的重要专设机关，由该馆的收藏品可比较各民族的性质和程度不同的美术。以后，在他担任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组主任期间，提出建立中国民族学博物馆的建议，并邀请德国专家来华工作，与国外交换民族学文物，进行了民族学博物馆建设的实践。

蔡氏的研究虽然在深度上似显不足，但他的研究宏大广博，涉及的面较宽，特别是对民族学进行的简单界定和说明，为以后民族学在中国的发展作了很好的铺垫。他的学术思想，表现出受德国的民族学进化理论的影响。由于他的倡导，进化论在中国民族学工作展开之初便占有了重要地位。但由于他并非系统地接受民族学专业的教育和训练，基本上没有亲自进行具体的民族学的实地调查研究，虽然对民族学的一些问题发表过看法，但从学术认识的高度上讲，主要是一些概括性的意见。他在民族学方面的主要的贡献，首先在于对学科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指导作用。这种作用，更多地体现在以他在教育界的领袖地位、国家政权赋予他特殊权力的科学研究机构首长的特殊身份对于民族学的倡导和对其他人的影响。其次，蔡元培对于“民族学”作为学科名称在中国相当长时期的存在也产生了重要作用，影响到当时民族学在中国的学术发展的走向。第三，蔡元培的一些学术观点，如人类进化由近及远、人类进化

<sup>①</sup> 参见蔡元培：《何谓文化》，载《蔡元培全集》，第4卷，1版，北京，中华书局，1984。

过程中的具体事例分析、以美育代宗教的意见等，都具有一定的意义，对当时的人们启发颇大。但若与第一、二项作用比较，他的其他一些民族学研究论文所表现的理论、方法上的意义和贡献，则显得较弱一些了。然而，无论如何，蔡元培是在当时中国学者中较早进行民族学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他的研究对于民族学学科在中国的建立有重要影响。因而，我们说，《说民族学》一文的发表和蔡氏对于民族学的鼓动和宣传，乃至他的亲自操作，对民族学在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出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 第二节 民族学的最早专门研究机构

早在1924年冬，孙中山北上时，他就主张设中央学术院为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并命汪精卫、杨铨、黄昌谷等负责起草设置学术院计划。国民党在广州曾设立过一个学术院，但主要是培养政治人员，并非学术研究机构。1927年国民政府在南京建立后，在是年5月的中央政治会议上，议决设立中央研究院筹备处，以蔡元培、李煜瀛、张人杰等人为筹备委员。在当时公布的《中华民国大学院组织条例》中规定，在大学院中设立中央研究院。同年10月，大学院建立后，以蔡元培为大学院长，聘请了30多人为中央研究院筹备委员。随后，确定中央研究院为全国最高科学研究机关，蔡元培兼任院长，大学院教育行政处主任杨铨兼研究院秘书，最初设立了四个研究

所。1928年4月，大学院的体制取消后，改为国立中央研究院，特任命蔡元培为院长。

1927年底，中央研究院筹备设立时，社会科学研究所就是分设机关之一。次年3月，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正式成立。因为南京难觅适当地址，该所暂时设在上海。不过，最初，民族学组和法制组是在南京办公，1929年3、4月间该两组才迁到上海。社会科学研究所内分四组，其中第一组就是民族学组，组长由蔡元培亲自兼任。该组最初研究人员除蔡元培外，有1929年由法国学习归来的专任研究员凌纯声、德国籍的研究员颜复礼（F. Jaeger）、1912—1916年曾随父亲商衍鎤在德国生活学习并精通德语的编辑员商承祖、从美国教授拜耶（H. O. Beyer）学习过的助理员林惠祥。颜复礼后来回到德国，曾在汉堡大学中国语言文化系任教授，1948年退休。1929年底，林惠祥被改聘为民族学组专任研究员。民族学家们也直接参加了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出版等工作，颜复礼、商承祖担任了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社会科学季刊编辑委员会”委员。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最初的民族学研究工作中，受德国的影响较大。这种影响与蔡元培的学术经历有关。除颜复礼为研究员以外，蔡元培、商承祖均有德国教育背景。不久，该组又聘请德国人史图博（H. Stubel）为特约研究员。

社会科学研究所在初建所时，计划在几年之内先后对西南各省的苗族、瑶族进行调查，对江苏的农业进行调查，对上海的社会进行调查，对长江各省的农业及社会进行调查，对中国的人口进行统计研究，对中国工资及失业进行统计之研究和对筹设民族学博物馆等项进行可行性研究。对苗族、瑶族等民族

的调查和筹设民族学博物馆是民族学组的主要任务<sup>①</sup>。

广州曾经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大本营，孙中山为了培养政治和文化人才，在广州建立中山大学。这所学校广泛接受西方的各种新学说、新思想，同时又聘请苏联教师讲学，对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较为重视。中山大学于1927年的7、8月间开始筹备设立语言历史研究所。以傅斯年为筹备主任（后为首任所长），聘傅斯年、顾颉刚和从厦门大学到中山大学任教的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等为教授。次年1月正式成立。该所以研究学术、发展文化为宗旨，内设考古、语言、历史、民俗四学会。研究工作集中在古物、档案、民俗三个方面，尤以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之研究为重心。一开始就拟定了考古、语言、历史、民俗诸学的研究计划，将人类学作为重要内容。1927年暑期，该研究所开始招收研究生，设有人类学、民族文化、民俗学等十余组。研究生在研究所各教授、导师的指导下，开展研究工作。除各自的研究题目外，还有较大规模的集体研究工作，其中一项是广东及邻省之民俗及人类学材料征集和创设人类学馆。次年研究所又将珠江流域各省之民族及人类学研究，并创设民族民俗馆作为集体工作的第一项<sup>②</sup>。

1928年3月，中央研究院“因历史语言研究之重要，决设历史语言研究所于广州，任傅斯年、顾颉刚、杨振亚为常务

<sup>①</sup> 参见中央研究院文书处：《国立中央研究院筹备经过及组织》，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总报告》，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印，1929年。

<sup>②</sup> 参见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招生简章（民国十六年度、民国十七年度）》，载《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年报》，第六集，1929（62、63、64）。

筹备员”<sup>①</sup>。该所所以建立，是考虑到历史语言学的“维新”之命，“扩充材料、扩充工具，以工具之施用，成材料之整理，乃得问题之解决，并因问题之解决，引出新问题，更要求材料与工具之扩充。如是伸张，乃向科学成就之路”<sup>②</sup>。根据该所章程，所内先后设八个组，其中第七组是人类学及民物学组。这个研究所设在广州柏园。开始工作时，人类学及民物学组没有聘请到组主任，人类学工作室的研究工作由史禄国担任，特约研究员辛树帜、特约编辑员容肇祖等负责搜集各种民物标本。此外，还有若干名助理员，辛树帜也担任文字编辑工作。不久之后，该组由史禄国在广州测量学校男、女学生，进行华南人体发育研究；自云南调查回穗后，他又对广州驻军士兵进行体质测量。该组还陆续购得广西、云南、安南（今越南）等地各项服饰用物。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合作，以广州为活动基地进行了民族学旅行（调查）等工作。

1928年9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建立。1929年5月，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到北平（今北京）的北海静心斋。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研究机构也作了调整，将原来以事业为单位之组取消，更为较大之组，改设三组，以考古学、人类学、民物学归属于丙组，由李济任组长。同时决定史禄国在广州的工作至旧有材料整理工作完成为止，完成后，亦迁到北平。不久，史禄国的英文论文《中国人体发育论》作为该所单刊甲种

① 中央研究院文书处：《国立中央研究院筹备经过及组织》，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总报告》，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印，1929。

②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章程》，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总报告》，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印，1929。



出版，并撰写了英文论著《中国南方人类学·第一部》草稿，将他在中国的体质人类学的研究进一步扩大和深入。但是，在完成关于华南和西南的有关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后，史禄国并没有继续参加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他的体质人类学研究计划，包括撰写《中国北方人类学·第二部》和《中国西北人类学》的中国体质人类学的大规模调查和写作计划，也没有能够延续下去。以后，因为第三组以考古学为主，除吴金鼎对山东的人群进行过有关体质人类学的调查和研究外<sup>①</sup>，历史语言研究所中的体质人类学、民物学的部分工作渐被忽视。在中央研究院中的有关民族学的工作就全由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民族学组承担了。

### 第三节 最早的民族学实地调查

在中国民族学学科创建之前，中国学者对于民族学方面的实地调查缺乏足够的认识。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虽然已经有了一些关于民族方面的调查和采风之类的报告和文章发表，这些报告可以说是先驱之作，在某些方面是创新的；而且一些文章已不再把边疆少数民族看作夷蛮，而视为国人之一部分，与中国传统的封建民族观有很大区别；有一些人为了各种目的，亲自到了边疆民族地区，将所见所闻报告给内地的民众，

<sup>①</sup> 参见吴金鼎：《山东人体质之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印，1931。

使人们大开眼界，这对边疆的民族有了初步的了解。

但是，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国内学者和来中国进行调查的多数外国人，在中国民族学创建之前进行的有关民族调查，除了很少几位国外民族学专家的调查颇见功力之外，大部分有很大的缺陷。其缺陷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未能深入进行调查。

由于民族学作为一个专业还没有建立起来，在田野调查方面的认识难以统一或基本一致，许多学者在探讨民族学的有关问题或运用民族学的观点分析问题，研究民族学多从文献资料、特别是古代史料入手，长于文献的分析和考证。多数研究民族学的学者，特别是那些没有将民族学作为职业来认同的作者，没有认识到田野调查在民族学研究中的意义和作用，未能进行田野调查，甚至没有搜集实地调查资料的经验。一些调查，实际上并非作者实地所得，如较早发表的广东畚族调查记《惠阳峯仔山苗民的调查》一文，分“苗民生活”、“苗民身体及性情”、“苗民民俗文化”等类。其中的大部分材料是作者的“一个曾经去过那里一回，知道那里情况颇详细的朋友”提供的，作者的朋友也说“这些材料恐或有靠不住的地方，并且太过于简略”。由作者家到峯仔山只有一百多里路，但“为了俗事羁绊”，未能去过。作者曾经托一位住在附近地方的朋友替作者去细密地调查一下，但没有等新的补充资料到手，即将所闻辑成文章公开发表<sup>①</sup>。于是不仅记录粗略，而且连调查对象的族属也没有弄清楚。1928年，丁文江曾给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编辑写信，批评当时该所办的周刊发表的许多文

<sup>①</sup> 参见钟敬文：《惠阳峯仔山苗民的调查》，载《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一集，1927（6）。

章“大抵出于编译，错误极多，例如贵州之仲家实与僮人言语相同，与苗无关，……专号中所言皆非科学的也<sup>①</sup>。”

其次，调查者没有受过专业训练。

迄20世纪20年代中期发表的许多关于民族调查的文章往往是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员撰写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作民族学研究。调查缺乏系统性，调查内容往往依作者的兴趣而取舍，不是从科学的认识出发，进行系统的、全面的调查。调查经常是处于一种附属地位，调查者有些是地方官员，有些是史官或使节，也有云游四方的文人。近代以来，又增加了西方传教士和从事其他学科研究的科学家。其中有从事植物采集的，如中山大学生物系的任国荣，在瑶山逗留两月，主要任务是采集鸟类标本，“采鸟之外，暇刻很少，对于观察方面已不能臻于缜密，文字上更是糊里糊涂，记载下去，也是毫无系统的”。但因为眼见耳闻颇多，“如果不有记载，不特无以公同好，甚至连自己也想不出来”，于是，著成一篇调查记发表<sup>②</sup>。1928年在香港出版的《五指山问黎记》的作者黄强，曾是负责设计海南岛公路的技术人员，以后又担任了海南岛的地方官员，经过在山中十余日的实地考察，目睹黎族的生活情况之后，接受过西方现代教育的作者“因思旧籍所载，时俗所传，诋为犷悍荒怪，不可以教法绳治者，良属虚诬”。所以，“将途程所记稍加整理，以贻相知”，“聊供茶后酒余谈资而已”。<sup>③</sup>

① 辛树帜：《编者的话》，载《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瑶山调查专号”，第四集，1928（46、47）。

② 参见任国荣：《瑶山两月视察记》，载《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瑶山调查专号”，第四集，1928（46、47）。

③ 黄强：《五指山问黎记》，1~2页，作者印，1928。之后黄强曾在海南担任第九区行政督察专员等职。

再次，调查中依然有听信他人传言妄记的内容。

当时人们对人类不同民族的文化知识的了解很少，又受到传统文化中心主义的影响，以为中原文化“先进”，周边的少数民族的文化“落后”，故，不能够正确地分析手中的材料。调查者依个人的好恶作为记录和评价的标准，对各少数民族的文化不能正确理解。记载时对于他人传说的奇闻逸事缺乏分析能力，无法摒弃其中的不实部分。一些西方传教士对于中国民族和文化的记录往往偏向于猎奇，在记录时主观臆断的内容较多。

因此，这一类的调查只能给一般人提供关于其他各民族的粗浅知识，不能适应民族学研究的需要。而另外一些可以称为民族学专家的外国学者，在中国进行的民族学田野调查，除了许多地方反映出受民族中心主义的影响外，往往由于文化差异的客观存在，在描述中包含不少对中国各民族文化的错误理解和认识。随着民族学萌芽在中国的渐渐成长，进行田野调查的任务也就自然地提到刚刚开始从事民族学研究的中国学者们的面前。

在未及开始田野调查工作前，一些民族学机构已经在试图改变过去远离研究对象的情况。1928年3月，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接受容肇祖的提议，由容肇祖和钟敬文邀请在广州为广东国民党党员会议跳舞的粤北瑶族同胞到中大跳舞，“并即查问其风俗习惯，以供研究”。这些研究者认识到，这种了解依然是肤浅的，只有深入所研究对象所在区域，才能得到更有价值的材料。所以，该研究所于是月拟定的研究计划中，即

有派员到各地作人类学调查一项<sup>①</sup>。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的周刊“西南民族研究”专号上，编者明确指出，“我们觉得这刊物缺少实地调查的材料，多是纸上材料的措施整理”，因此他们自己对专号也“不很满意”<sup>②</sup>。

1928年夏，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夫妇、中山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特约编辑员容肇祖和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助理员杨成志等，受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派遣，到云南进行人类学方面的调查。这次调查原定“调查彼处人类学工作大略情形，以便后来派训练成就之助员前往就地长期工作，并于就便中在省城作大量工作，兼至滇东之熟罗罗区域一行”。7月，他们由广州出发后，经香港、越南到达昆明。容肇祖因学校开学，在一个月后携带为两个研究所购买和搜集的书籍、拓本、民物学标本返回广州。这些文物共百余件，其中一部分得自越南。

因土匪未靖，又没有得到当地政府允许东行，史禄国等也感到社会混乱，土匪出没，很难继续调查。再加上当时史禄国的个人兴趣主要在体质人类学材料的搜集和研究，于是他在昆明对学生、士兵和罪犯近2000人进行体质测量，并从人类学的视野拍摄了照片150余幅，以此作为他对南方中国人身体发育研究的一部分，其间还曾在彝族家庭中居住多时，对新迁到昆明居住的彝族记其读音，编成一部较为简短的字集，作为今后进一步工作的基础。当年10月，史氏返回广州。

① 参见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本所大事记》，载《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年报》，第六集，1929（62、63、64）。

② 参见绍孟：《编者的话》，载《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西南民族研究”专号，第三集，1928（35、36）。

当时仅是助理员的青年杨成志写到：“我们赴滇的目的不是专来购书和测量体格，却是要跑到高山穷谷调查罗罗族去。容先生回，固有所因，而史教授的不敢前进，实使我失望极了。我当时觉得有两种背驰的情感：一以为调查民族是我国新辟的学田，播种的人安能任它荒废？一以为土匪遍野和山谷崎岖的滇道，独行独往恐易陷于危险！结果我的勇敢心战胜了畏惧，于是乎这种调查的重大担子遂由我一人独挑”<sup>①</sup>。此时恰有当地的军队由昆明北行，经巧家至云南边境，“只凭着一腔充满求知的热忱和缺少调查经验的”杨成志随之单独前往川、滇交界的“独立卢鹿”地区进行调查，杨成志此次调查的任务是“习俚俚语，寻其民物知识”<sup>②</sup>。他9月初出发，经嵩明、寻甸、会泽到巧家，然后深入彝族聚居区，经过诸酋长地，计程约400公里，过村落200余，越山逾岭，穿林涉水，调查了社会组织、生活、习惯、思想、语言和文字等，在鲜有汉人活动的彝族聚居区调查两月余。以后用数月时间分别学习彝族语言和苗族语言。1929年12月，杨成志回到昆明，由此取道河内、海防，乘船返回广州。在回穗途中，又在沿途进行调查，抄录资料<sup>③</sup>。自离开广州到再回中山大学，杨成志前后用了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无论从调查的时间长度、调查的深入程度

① 杨成志：《云南民族调查报告》，载《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十一集，1930（129~132）。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这段话是回到广州后写的。

② 语出杨成志：《云南民族调查报告》，载《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十一集，1930（129~132）。

③ 参见杨成志：《单骑调查西南民族述略》，载《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十卷，1930（118）。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七年度报告》，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总报告》，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印，1929。

及调查内容的明确方向和专门化等方面，都显现出他的此次调查是学科发展历史中的重要事件。以后，他利用这次调查所得的材料，发表了《罗罗太上清静消灾经对译（罗罗文—汉文）》、《罗罗族的文献发现》、《罗罗族的巫师及其经典》、《罗罗的语言、文字与经典》、《罗罗文明源流探讨》、《云南民族调查报告》等 20 多种著作<sup>①</sup>。

1928 年 8 月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遣籍贯四川灌县的助理员黎光明到川边作民物学调查。黎于 8 月自上海出发，12 月再由成都西行，“经灌县、汶川、理番、茂县，对于沿途之羌民土民及杂谷人等，均有调查。不幸至叠溪时，为松潘战事所阻，同行者又多病，因退回成都”。次年 4 月又到松潘，“以其地为中心点，四出调查西番及博罗子等之民情风俗”，6 月初调查结束，返回成都<sup>②</sup>。

1928 年夏，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派遣颜复礼与专任编辑员商承祖，随地质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联合组成的广西科学调查团，前往广西对瑶族进行调查。这个调查团的主要工作是科学采集材料，分地质、农林、人种及动植物四项。颜复礼、商承祖由百色到凌云，集中时间进行实地调查。他们的调查包括广西的一般情况、广西凌云的瑶族语言、广西凌云的瑶族来源及其与广东韶州的瑶族的关系、广西凌云的瑶族分布状况等。同时拍摄了一些各民族的人物照片，以后发表的有 70 余张。在调查中，特别注意了民族学标本的搜集，在以后写成

<sup>①</sup> 参见杨成志：《我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载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编的《梁钊韬与人类学》，1 版，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

<sup>②</sup> 参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七年度报告》，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总报告》，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印，1929。

的调查报告专门记录了在凌云的瑶族中采集的其民族的物品录。调查时间为六个月，至1929年1月结束。搜集到苗族和瑶族的文物33件及这两个民族的语言资料等<sup>①</sup>。以后，将调查结果加以整理，著有《广西凌云瑶人调查报告》，1929年由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作为专刊第二号印行。

#### 第四节 中国民族学学科的建立

中国民族学学科的建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从较为广阔的背景上看，中国古代关于民族学资料的记载、西方民族学学科的建立、近代以来中国先哲引进西方学术思想和中国知识分子对东、西方文化的认识与思考及西方学者对于中国的早期研究等，都对民族学学科的建立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正是在这样的人背景之下，民族学得以在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从学术积累方面的回顾，民族学的早期译著、民族学理论的早期介绍、利用民族学理论解释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尝试、民族学及相关学科的课程设置与活动的初步开展，是中国民族学学科建立的前期基础。中国民族学学科的建立，并不是偶然的事件，而是其学科的萌芽孕育和成长到一定阶段的结果，是在

<sup>①</sup> 参见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七年度报告》，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总报告》，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印，1929。



前期基础上经过第一代学者的努力而产生的历史必然。

同时，中国民族学的产生又是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广州是北伐战争前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在这里诞生了最早的民族学的专门研究机构。北伐战争胜利之后，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资产阶级政府在中国占据了领导地位，这个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府需要一套与旧的北洋军阀政府不同的、能够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社会科学学科来为其政治统治服务，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民族学正是这样的一种学科。南京国民政府既然已经成为全国的统治政权，虽然还未能立即掌握全国各地的实际权力，一些地区还处于事实上的割据状态，但是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统治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无论是了解民族文化的形态及其发展，还是说明中华民族的发展脉络，对于政府的政令的推行和维护国家的统一都可以提出有参考性的意见。民族学学科的建立，可以说是在一定程度上适应当时统治集团政治需要的产物。

中国民族学学科的建立，又是学术需要的产物。经过此前的学术积累，民族学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前提。许多留学生陆续回国，带回了西方国家的理论，渴望通过经受过正规专业教育所能理解的规范的学术研究，特别是田野调查来运用所学到的理论，把中国各民族的文化更准确、更全面地介绍给世界；在国内学习民族学及其相关知识的学子，也希望让所学知识有用武之地。因此，学术界也在急切地呼唤着民族学学科。

说中国民族学的产生是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还表现在当时的时局，即资产阶级政府掌握了全国政权，提供了将由国外留学归来正准备对祖国有所贡献的民族学研究者聚合起来的条件。不再是分散的个体知识传播和区域性的研究，而是开展全国性的、有一定计划和安排的学术调查与研究。在北洋

军阀统治时期割据纷争、军阀混战的状况下，整体性的协作研究是不可能实现的，有关民族学的田野工作的开展也难以顺利实施。当然，国民政府在南京建立后，并没有完全消除军阀混战的局面，因而对许多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还存在一定的困难，只是状况较过去略有改善。

1928年前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等民族学专业研究机构的建立，是中国民族学学科建立的标志之一。专门的研究机构和专门的学术研究团体的建立，是一个学科从综合学科中独立出来的主要标志。有了专门的、实质性的学术研究机构，才能保证本学科的学术研究从原来的综合学科中相对分离出来而独立进行工作。作为民族学的专门研究机构的出现，说明这一学科的研究开始在中国具有初步的学科地位。同时，可以看作民族学研究机构的，还有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的人类学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人类学与民俗学组，他们也是在民族学组成立前后出现的。这种有关研究机构几乎同时出现于中国，是政治形势发展造就的，同时也是以往学术研究积累的结果。

民族学学科在中国建立的另一标志，是民族学田野调查的开始。有关民族学的田野调查，是为了民族学学科的专门研究而做的，是学术研究工作的开端。自1928年开始的最早的有关民族学的实地调查活动，是中国民族学田野工作的开端。有了田野调查活动，就可积累大量的民族志的第一手资料，民族学学科的发展也才会有基础。尽管在最初的调查中的方法依然较为简单，成果也难免有幼稚、肤浅等缺陷，但历史地比较来看，这些调查较过去的调查有了很大的进步和变化。

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讲，中国学者自己进行的田野调查所显示出的意义更为重要。从文献到实地、从书斋到田野，是民

族学学术发展中关键性的飞跃，对中国民族学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首先，以往对中国边疆的民族进行的调查，多数是外国人所做。中国学者到边疆地区调查者寥寥可数，如此宝贵的学术资料为外国人所攫去，对于每个中国学者来说，都是令人惋惜和耻辱之事。而中国学者投身于田野调查，从基础资料的搜集做起，开始对中国各民族的群体及其文化进行研究，意义不仅在于表现出学者们的民族自尊，更重要的是说明了中国人开始真正地、务实有效地从事中国的民族学研究。

其次，中国学者深入边疆地区，以一种投入和牺牲精神，进行了开创性的工作。正如首次调查的亲历者之一的杨成志记录了他当时的感受，他列举的困难包括：疾病、夜晚突然响起的枪声、窃取钱物的儿童、六畜同堂的茅屋、生食肉食、使用木制食具、生鸦片味和一辈子不洗的衣服味、与死尸面对而睡、天气寒冷、道路艰险和野兽出没等<sup>①</sup>。然而这些学者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为学科的建立走出了艰难的第一步。正如杨成志所说：“在中国搞人类学，非到少数民族地区调查就很难成功。”<sup>②</sup> 这些最早的田野调查，为今后的调查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形成了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研究程序与规范，实现了与现代世界民族学学科的直接对接和学术意义上的沟通，为将来的研究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sup>①</sup> 参见杨成志：《云南民族调查报告》，载《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十一集，1930（129、132）。这些感受及他当时的经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曾经作为批判这位先驱者的材料。今天我们是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中认识这些表述。

<sup>②</sup> 杨成志：《我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载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编《梁钊韬与人类学》，1版，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

再次，由于调查采用了一些现代手段，所得资料包括多方面，除经过整理的文字资料外，开始有了关于中国各民族的各种文物，既有图片，还有较多的实物，许多调查还注意到语言和体质测量材料的搜集。从研究一开始，就表现出资料上的系统性，为此后研究的开展准备了资料。

总之，若以专门研究机构的建立和民族学田野调查的开展作为民族学在中国作为独立学科诞生的标志，它们十分巧合但又并非凑巧地在 1928 年出现，标志着民族学在中国从这时起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这个新生儿虽然年幼，但已经开始进行登上世界民族学大舞台的努力了。

## 第五章

### 对中国民族学发展的探索

在中国民族学学科建立之后，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30 年代初，中国民族学家们就开始了发展中国民族学的努力，这些努力可以概括为学术规范模式的建构和田野实践的开展两个方面。

#### 第一节 为发展民族学而进行的理论介绍

为了全面了解和熟悉国外民族学的理论和方法，许多学者，包括一些翻译家和从事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研究的专家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对西方民族学原著进行了大量介绍。

西方民族学中的进化学派的著作，与其他著作相比在中国较早得到介绍，除了我们已经提到的《民种学》、《族制进化论》等之外，这一时期有了更多的译著在中国出版。威斯特马克的《人类婚姻史》由王亚南译为中文，神州国光社1930年出版。张鼎铭译出了英国进化学派民族学家马雷特(R. R. Marett, 1866—1943年)的原著《人类学小引》，1930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随后，吕叔湘又译出同一作者的《人类学》，并于1933年由同一出版社出版。摩尔根的著名著作《古代社会》，则由杨东莼、张栗原合译出版<sup>①</sup>。王斐荪翻译了彭斯的原著《社会进化论》，1929年由新生命书店出版。卫惠林将法国民族学家鲁妥势的《婚姻与家庭的进化》(*L' evolution du Mariage et de la Famille*)译为《男女关系之进化》，作为开明书店的妇女问题研究丛书之一，于1930年出版。英国民族学家海顿(A. C. Haddon, 现译为哈顿或哈登, 1855—1940年)的民族志调查报告《黑白棕种猎头人》(*Head - Hunters: Black, White, and Brown*)由吕一舟译为中文，书名译为《南洋猎头民族考察记》，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弗雷泽的《巫术理论》由李安宅译为中文，书名译为《交感巫术的心理学》，193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格罗塞(E. Grosse)的《艺术的起源》不仅有了汉译本，而且有两家出版社的两个译本，一是陈易的译本，书名为《艺术之起源》<sup>②</sup>；一是蔡慕晖译的译本，书名为《艺术的起源》<sup>③</sup>。黎佛士(H. R. Rivers, 1864—1922年)的名著《社会的组织》于

① 此书的最早汉译本分别于1929年、1930年由昆仑书店出版，分上、下两册。此后，1935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同译者的译本。

② 此版本于1933年由大东书局出版。

③ 此版本于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作为汉译的“世界名著丛书”出版。

1940年有了中文译本。此外,一些日本人撰写的有关进化论著作也有中文译本,如张我军译出的日本学者西村真次的原著《人类学泛论》<sup>①</sup>,另一位日本学者立浅次郎的《由猿群到共和国》亦由马廷英译为汉文<sup>②</sup>。

在对进化学派的著作介绍之后,一些学者注意到国外民族学的新发展,陆续翻译出其他学派的一些著作。吴景崧译出了美国历史学派民族学家威斯勒(C. Wissler, 1871—1942年)所著的《现代人类学》,1932年由上海大东书局出版。钟兆麟译出了威斯勒的原著《社会人类学概论》,1935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吕叔湘在1931年译出了另一位美国历史学派学者罗维(R. H. Lowie, 1883—1957年)的《初民社会》,交商务印书馆出版,因“九·一八”事变,原译稿被毁;此后吕氏又重译该书,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杨成志在1940年译出了历史学派大师弗兰茨·波亚士(即博厄斯)的《人类学与现代生活》,194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功能学派代表人物马凌诺夫斯基的著作《蛮族社会之犯罪与风俗》(*Crime and Custom in Savage Society*),由林振鏞译为中文,于1930年出版。译者指出:马氏的著作“至少已给我们良好的考察方法和良好的演绎法的叙述”,“可以给社会学者一种研究的帮助,在某种文化的状况之下,所产生的甚么一种法律思想,怎样演绎而成为若干具体的制度与方法,如何的支配着特殊的社会机能与人类的性格”<sup>③</sup>。马氏的另一部重要著作

① 1931年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

② 1928年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③ 林振鏞:《〈蛮族社会之犯罪与风俗〉译余赘语》,载马凌诺夫斯基著、林振鏞译《蛮族社会之犯罪与风俗》,2~3页,上海,华通书局,1930。

《文化论》，即《科学的文化理论》的初稿，则由费孝通译出，除在天津的《益世报》副刊的“社会研究”上刊登了一部分外，于1938年全文发表于《社会学界》第十卷上；以后，又作为《社会学丛刊》甲集第一种出版。马凌诺夫斯基的《两性社会学》（*Sex and Repression in Savage Society*，直译为《野蛮社会中的性与抑制》），由李安宅译成汉文，于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成为该书欧洲文字以外的其他文字的第一个译本。李安宅又把马凌诺夫斯基的《巫术科学与宗教》（*Magic, Science and Religion*）和《原始心理的神话》（*Myth in Primitive Psychology*）两篇论文译为汉文，合编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由商务印书馆于1936年出版。此外，费孝通翻译了英国功能学派人类学家雷蒙德·弗思（Raymond Firth, 1901—?）的《人文类型》，作为《社会学丛刊》甲集第三种，于194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周骏章将传播学派的代表人物史密斯和功能学派大师马凌诺夫斯基、历史学派学者威斯勒等人的若干关于传播论的讨论论文汇在一起译出，编成《文化传播辩论集》，于1940年由国立编译馆出版，长沙商务印书馆印行，这是较早将各家学说汇在一起出版文集的译书实践，对于全面介绍在某一问题上诸家观点颇有帮助。

马克思主义的有关民族学的原著，也在此时期翻译成汉文。共产党员杨贤江化名李膺扬，根据英译本并参考日译本，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译为汉文，当时书名译为《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之起源》，1929年作为社会科学名著译丛之一，由上海新生活书店出版。译者认为“我们从本书，不仅获得在历史研究方法上的一般的指示，更可以看到人类原始生活中许多有趣味的事实，与三千年以来我们文明基础的



一夫一妻家族，私有财产制度及国家之沿革，还有锐利的马克思主义的对此之批判，要想知道马克思学派怎样地看男女关系，怎样地看国家，本书便是极有兴味而且重要的指针”<sup>①</sup>。该书由陶希圣作序，陶氏认为此书是“民族学开山巨著与历史唯物论交流之产物”，翻译介绍此书可以“使读者得知历史唯物论的具体论据”，同时“引起读者对民族学研究的端绪和兴趣”<sup>②</sup>。这是马克思主义有关民族学的原著的最早中文译本。这个版本到1931年已经再版了三次。1939年，重庆生活书店又出版了张仲实根据苏联的已加有注释的俄文标准译本译出的《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抗战胜利后，该书店又数次印制了这个版本。另外一个《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译本，是在张氏译本之前由明华书店出版的，但当时未注明译者<sup>③</sup>。

1928年上海春潮书局出版的、由陆一远译的《马克思主义的人种由来说》，实际是恩格斯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的译本。1929年成嵩也译出了该书的另一汉译本《从猿到人》。1939年，重庆生活书店还出版了张仲实汉译的斯大林的《论民族问题》。

在陆续译出并出版原著的同时，还有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的著作也有了汉译本，如德国柯诺（H. Cunov，今译为库诺夫，1862—1936年）原著的《马克思的民族社会及国家概念》，由朱应祺、朱应会译为中文，于1928年由上海秦东

① 李膺扬：《〈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译序》，载恩格斯著，李膺扬译《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1~2页，上海，新生活书店，1929。

② 李膺扬：《〈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译序》，载恩格斯著，李膺扬译《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2~3页，上海，新生活书店，1929。

③ 参见张仲实：《〈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译序》，上海，生活书店，1939。

书局出版；柯诺的另一著作《马克思的家族发展过程》，也由上述两位译者译出，于1935年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沙尔·费勒克原著的《家族进化论》，由许楚生译为中文，于1931年由上海大东书局出版。美国学者威廉原著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史观》，由刘芦隐译出，于1929年由上海民智书局出版。

上述著作因为翻译者的外语水平不同，特别是多数译者的有关民族学的专业知识不够，在一些作品的翻译中，存在着专业概念模糊、术语翻译不当、缺乏必要的术语注引、对民族学资料缺乏理解与消化、理论论述部分晦涩难懂等不足。然而，这些翻译著作作为人们提供了大量的民族学理论与民族志的调查资料，对西方民族学在中国的普及起到了重要作用。

除翻译、出版上述著作外，西方民族学的各个流派也同时得到了介绍。这项工作主要是由专业的民族学家进行的。其中贡献较大的有吴文藻、杨堃、孙本文、戴裔煊等。

吴文藻由美国留学归来后，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讲授“西洋社会思想史”、“家族社会学”和“人类学”三门课。通过教学的实践，他认为：当时中国的民族学和社会学处于一种全盘洋化的状态；中国的民族学和社会学最初是外国人用外国文字介绍，例证也多用外国的材料，然后由中国人用外国文字讲述，并且多数是讲外国材料；民族学和社会学在知识文化的市场上，仍然是变相的舶来品。在外国教会办的大学中，吴先生分析的这种情况更为明显。吴文藻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中国的民族学和社会学有一个大的改观。他一反在教会办的大学里的国外回来的教授多用英语讲课的常例，用带有方言音的国语在中国讲台上讲授人类学课程。更重要的是，他没有走简单地使用西方理论辅以中国材料的路，他所做的工作的第一步便是分析和研究国外的各种民族学和社会学的学术思想。为了让

更多的人参与思索，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专题论文。到20世纪40年代初，他的有关论著涉及到法国、德国、美国、英国等西方诸国的社会学和民族学，或从某一国的学科总体情况谈起，或介绍某一位民族学家、社会学家，或评介一个学派，或综论国外对于某一课题的研究<sup>①</sup>。其中，关于民族学的代表作有《德国的系统社会学派》、《现代社区实地研究的意义和功用》、《西方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功能派社会人类学的由来和现状》、《布朗教授的思想背景与其在学术上的贡献》、《论文化表格》等。以后，他又将《论文化表格》一文与费孝通译的马凌诺夫斯基的《文化论》合在一起，作为《社会学丛刊》甲集的第一种出版。

杨堃对西方民族学的研究状况较为重视，积极从事对民族学理论流派的介绍。1932年，他在《鞭策周刊》上发表了《介绍雷布儒的社会学学说》一文，介绍了列维·布留尔对原始人心理学的研究。在《与姜子匡书，论“保特拉吃”》一文中，他对莫斯关于夸富竞赛节的研究进行了介绍，并对此种风俗是否在中国存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法国民族学之过去与现在》一文，全面介绍了法国民族学的产生、发展、研究机构、人类学和社会学对民族学的贡献等。这篇论文及其姊妹篇《法国民族学运动之新发展》，是他介绍国外民族学方面的重点论文。《莫斯教授的社会学学说与方法论》<sup>②</sup>，则是杨堃先生在介绍国外民族学学说方面着力最多的一篇论文，该文从对莫斯原著的分析入手，追溯了莫斯的学术背景、杜尔干对莫斯的影响，介绍和评价了莫斯在各研究领域中的学说，并对莫斯的方法论

<sup>①</sup> 参见《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1版，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

<sup>②</sup> 杨堃：《莫斯教授的社会学学说与方法论》，载《社会学界》，第十卷，1938。

作了介绍，评价了他的学术贡献，特别还就莫斯与中国社会学的建设运动发表了意见。

孙本文亦关注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问题，较多地介绍了他所接受的美国文化社会学的理论发展历程。《社会学上之文化论》<sup>①</sup>一书，是他在美国读书时于纽约和芝加哥陆续写成的。此书对社会学的发展阶段进行了评述，特别介绍了社会学的有关文化的研究和分析。他的另外一些关于学术理论介绍的著作，如《近代社会学发展史》、《社会变迁》等，虽然也介绍了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但以更多的篇幅介绍了以孙墨楠（W.G.Sumner，现译为萨姆纳，1840—1910年）有关文化的研究为主要渊源，由乌格朋（W.F.Ogburn，现译为奥格本，1886—1959年）发展为文化社会学派的有关学说。孙本文早期的大部分著作，较多地反映出了美国文化社会学理论的明显影响。

戴裔煊对西方民族学的理论和方法的介绍，较前几位先生要晚一些。他在对民族学发生兴趣之后，将较多精力放在民族学的理论发展史的研究上，他在广泛阅读民族学史著作之后，感到中国当时的研究状况不能满足学者对于这类著作的渴望和要求。他的《鲍亚士及其学说述略》<sup>②</sup>和《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的递演》<sup>③</sup>，是两篇篇幅较长的论文。后一篇论文“主要目的在于指出每一派理论与方法的特征，迹寻其渊源所自，阐明其与时代思潮及各种科学之相关。”<sup>④</sup>

① 孙本文：《社会学上之文化论》，北京，朴社，1927。

② 戴裔煊：《鲍亚士及其学说述略》，载《民族学研究集刊》，第三辑，1943。

③④ 戴裔煊：《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的递演》，载《民族学研究集刊》，第五辑，1946。

此外，其他一些民族学家也有一些介绍性的著作问世。其中包括许多民族学专家的大量介绍国外民族学学派的论文，从不同侧面对西方的民族学理论与方法进行了介绍。

对于国外民族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较多的介绍，是中国民族学学科发展初期处于理论选择过程中必然经历的阶段。这一时期的介绍，比较以前在著作选择的权威性、学派的广泛性、知识的系统性等方面都有了明显的进步，是学科建立之后的基础工作，为进一步明确学术研究中的规范和概念、掌握研究方法、丰富研究理论都产生了重要作用。当然，在这时期的理论介绍中，不免有舶来品充斥中国学界的弊病，但较多的理论引进、各种国外学派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有关民族学的著作的翻译和介绍，不仅系统地介绍了国外的各种学术思想，而且使人们清楚了一些学派发展的背景和发展历史。这些，即使在今天，对于在理论与方法上更有比较地借鉴、更为全面地吸收国外学者的成果、建设中国民族学学科体系，依然是有益的。

## 第二节 学科理论的百家争鸣

在民族学知识得到更大范围的普及的情况下，中国的民族学学者也开始进行了学科理论的探讨。由于学术经历不同，学者们对于民族学的定义和对象等基本问题有各自不同的看法。

蔡元培认为民族学是“考察各民族文化而从事记录或比较

的学问”<sup>①</sup>。凌纯声对于蔡氏的这种意见颇有附合之意，他在《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中也说：“民族学可分记录的与比较的两种研究；偏于记录的我们称之为民族志；偏于比较的为民族学。”<sup>②</sup>他主张民族学“是研究文化的起源、发达、散布及传演的科学”<sup>③</sup>。

黄文山主张民族学是研究初民社会文化的社会科学，亦是一种应用的科学，强调民族学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价值。在理论上，“民族学之纯理研究，可以供给社会科学以无数之可靠的假定”；在实践上，“民族学之实地调查，可以供给民族改造之妥善的计划以及达到三民主义之切实的根据”<sup>④</sup>。

张少微在其《民族学体系发凡》一文中提出：“民族学是研究初民社会的生活形态的科学。”他从民族学的对象、任务和发展史三个方面解释他的定义。张少微认为，人类的生活形态即社会生活形态，人类社会文化也就是文化生活，人类生活形态就是文化形态。文化创造和文化使用构成了人类社会的生活形态，成为民族学研究的对象。而这个对象即社会文化，是人类积极地适应环境，征服、利用和改变环境的产物，即人类顺应和利用自然、改变和希求超过自然、健全和保障人类群体的产物。由原始社会人手，加以深入研究，以明其生活形态的实况，然后根据人类文化演进的原理，推求史前民族文化的外形和功能，完成民族学研究所负荷的使命。民族学形成时期为原始社会的生活形态资料的搜集，第二阶段是原始社会生活形

① 蔡元培：《说民族学》，载《一般》，第一卷，1926（12）。

② 凌纯声：《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1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印，1934。

③ 凌纯声：《民族学实地调查方法》，载《民族学研究集刊》，第一辑，1936。

④ 黄文山：《民族学与中国民族研究》，载《民族学研究集刊》，第一辑，1936。

态的资料纯理分析和推论，第三阶段是原始社会生活形态资料的应用。在他看来，民族学始终是围绕原始社会的生活形态的研究展开的<sup>①</sup>。

在20世纪前半期，比较多的专家力主中国民族学应当以中国文化和人类文化为研究对象。凌纯声认为民族学的研究对象为文化，故又称文化人类学，或简直可以说民族学就是文化学。民族学又可分为民族学和民族志，民族学研究普遍文化的原理，民族志研究特殊地方和特殊民族的文化。他进一步指出，文化就是人类应付生活（包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环境的文物和制度<sup>②</sup>。

黄文山曾明确表示了类似看法，认为民族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各种不同的原始民族及其文化”，目的是“以文明民族之价值标准，估量各民族之文化贡献，探讨文化际之相互影响，并求知一种族或民族之文化特殊类型及其所以发生之因子”。“发现民族文化之一般的类型与共通的法则，并能推寻其因果关系，说明其性质与功用”<sup>③</sup>。

李济虽然认为中国民族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人类全部文化，但具体的计划还是从中国文化以民族学的方法研究起<sup>④</sup>。

也有部分学者主张民族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少数民族。吴文

① 张少微：《民族学体系发凡》，载《民族学研究集刊》，第五辑，1946。

② 凌纯声：《民族学与现代文化》，载《国立中央大学日刊》，第873号，1932-12-21。

③ 黄文山：《民族学与中国民族研究》，载《民族学研究集刊》，第一辑，1936。

④ 李济：《民族学发展之前途与比较法应用之限制》，载《社会科学学报》，第一卷，1941。

藻在1932年就提出“文化人类学必须以代表原始人类的现代未开化民族的生活状况为范围”<sup>①</sup>。以后，他更明确主张，研究汉族的属于社会学，研究少数民族的属于民族学。这种对学科对象的认识，表现出强烈的民族学为国家政治服务的取向。同时，还应当看到，当时许多中国民族学家将民族学视为研究少数民族的学科，或研究初民社会的学科，这与当时的西方学术界的看法是较为一致的，是西方殖民主义时代产生的民族学的表现。亦与研究对象为“野蛮人”的定位不无联系。

在民族学的学科地位问题上，一些学者希望通过对边疆各民族的研究，提供初民社会的社会组织、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的原始资料，来解释史学上的一些难题。

王兴瑞提出：“民族学研究的对象，是世界上一切文化低级的野蛮民族。……这些野蛮民族给我们祖先过去活动的状态，研究他们的生活，即无异直接研究文明人的古代社会……。所以说，自民族学兴，研究古代史的困难，便可迎刃而解了。”<sup>②</sup> 这种看法代表了相当多的学者的意见，特别是那些兼有历史研究兴趣的民族学家和用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新派历史学家，更是经常明确地主张民族学应当为历史学解答难题，甚至成为历史学的一部分。

林惠祥认为：“人类学是用历史的眼光研究人类及其文化之科学，……换言之，人类学便是一部‘人类自然史’。”他提出：“人类学原是有历史性质的，人类学所要考出的原是人类

<sup>①</sup> 吴文藻：《文化人类学》，载孙寒冰主编《社会科学大纲》，上海，黎明书局，1932。

<sup>②</sup> 王兴瑞：《琼崖黎人社会概观》，载《琼农》，1934（9、10、11）。



历史上的事实，多用的方法也是历史的方法。”<sup>①</sup>

蔡元培则明确主张，民族学的研究对象是属于历史学的研究，应当把民族学视为历史学的一部分。

在20世纪前半期，中国的民族学与社会学关系较为密切，一些学者对两者的关系进行了认识。

蔡元培曾在中国社会学社成立会上发表关于社会学与民族学的演说，他主张社会学是研究现代社会的，但要知道现代社会的真相，就要知道其历史发展，研究“现代未开化民族”的民族学可以补助社会学<sup>②</sup>。

当时有人对蔡氏此文略有微词，但杨堃认为此说立论公平，态度温和。不过，杨堃对民族学与社会学的关系认识程度更深入一些。他主张民族学的对象应是一切民族，但狭义的民族学却不妨仍以初民社会为对象，社会学则以文明社会为研究对象。他也从方法上对民族学和社会学进行了分析，认为两者没有明显的区别。但他公开申明，民族学与社会学乃是两门独立的科学。两者的关系日趋密切，但不是一种从属的关系，而是一种平等的关系<sup>③</sup>。

林惠祥在说明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密切关系之后，着重对人类学与社会学之间的差异之点加以分析。他指出，人类学的性质是历史的，社会学则为理论的；社会学详究社会的生活，人类学研究的面则宽得多；社会学常就现代社会而论，人类学研究多关于史前社会及原始社会<sup>④</sup>。

① 林惠祥：《文化人类学》，1版，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② 蔡元培：《社会学与民族学——在中国社会学社成立会演说辞》，载《社会学刊》，第一卷，1930（4）。

③ 杨堃：《民族学与社会学》，载《社会学刊》，第四卷，1934（1）。

④ 林惠祥：《文化人类学》，1版，15~1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吴文藻在早年曾表述了文化人类学应当是社会学的的一个分支的意见。他提出文化人类学“专以初民部落的风俗习惯，或原始民族的文化与社会组织等等为研究的对象”。因而，是社会专门研究原始部落的一分门<sup>①</sup>。部分曾在美国学习社会学的学者在一定程度上赞同这种意见，如游嘉德就把他研究的“人类起源”作为社会学的一部分看待，孙本文也将这部分内容纳入他的社会学体系之中。

黄文山则认为民族学对于其他社会科学和历史科学的发展都有帮助，他指出：“自理论上言，我国社会演进之阶段，古代文化之原型，民族迁移之路线，皆为民族学者研究之主要对象，而一切社会科学，如社会学、经济学、史学、考古学之进展，亦皆有赖于此种问题之解答，及其解答程度如何以为断。”<sup>②</sup>

在研究方法上，一些中国民族学家也根据中国的实际和个人研究心得，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李济在《民族学发展之前途与比较法应用之限制》一文中指出，中国民族学家们应当学习欧美学者民族学的先进方法，研究中国文化，同时，“我们自己自然也应该时时刻刻想新的方法，推进这种研究”<sup>③</sup>。他以实例分析了民族学研究中运用比较法出现的问题，并提醒学者们注意痛除一切不准确的习惯。杨堃明确提出：“真正的比较法乃是根据某些相同的法则与事实，在某种范围以内互相比较，既不是主观的选择，亦不是任意杂凑。”<sup>④</sup>

① 吴文藻：《文化人类学》，载孙寒冰主编《社会科学人纲》，上海，黎明书局，1932。

② 黄文山：《民族学与中国民族研究》，载《民族学研究集刊》，第一辑，1936。

③ 李济：《民族学发展之前途与比较法应用之限制》，载《社会科学学报》，第一卷，1941。

④ 杨堃：《中国社会学之派别及趋势》，载《鞭策周刊》，第一卷，1932(3、4)。

潘光旦在《人文史观》中告诫人们，在作观察与解释时，不要把自己的学问当作唯一的学问，把自己的观察法与解释法当作唯一的观察法与解释法，也不要别种学问、别派的解释与观察忘记了、抹杀了或小看了<sup>①</sup>。

张少微在其《研究边疆社会之内容方法及步骤》一文中提出：“就边疆社会现象的性质，目今所有的科学方法中，至少有十八种是值得取而应用的，即图书法、问卷法、人格分析法、摄影法、观察法、访问法、社会个案法、语言法、征集法、购置法、地境法、测验法、量度法、地图法、清丈法、抄录法、统计法及绘制法，前两种可名为局外研究法，后十六种可名为实地研究法。这些方法，都有其特殊的价值，惟皆不是万能的，必须因地调查，斟酌需要，数种联合使用，盖非如此，使不易达到了解边疆社会的研究目标的。”<sup>②</sup>他对于各种方法进行了具体的介绍，并认为除上述方法外，边疆研究还可以利用考古法和工艺法。虽然在列举方法时，作者将不同层次的方法放在同一系列中并列，但他的看法表现了在方法上试图广为借鉴，因地制宜，结合运用的倾向。

罗香林主张民族学研究的最基本的工作就是文化原素的考察，元素的考察有赖于实地的诊测、观察、访问及其他种种有关材料的收集。没有这些资料收集工作，就谈不到室内研究；研究民族不从调查人手，是走不通的。然而，他又指出，调查方法除了访问和观察之外，还应当包括人种体形的量度、血液

<sup>①</sup> 转引自韩明谟：《潘光旦先生生平》，“第二届潘光旦纪念讲座”印，1993年。

<sup>②</sup> 张少微：《研究边疆社会之方法及步骤》，载《边政公论》，第一卷，1941（3、4）。

化验和分析、智力测验和地理测量<sup>①</sup>。他的这种观点反映了一部分学者在民族学研究中借鉴体质人类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方法的思索，表现出在方法上的综合取向。

柯象峰则以为研究方法应当是全国统一的，“在研究方法方面，初期间固可任其摸索，但一旦成熟，仍宜有一统一之研究方法，庶几所获之资料，加以比较，对于学术上及致用方面，定有裨益。”<sup>②</sup>同时，柯象峰也对民族学调查方法与表格发表了意见。

其他民族学家也对民族学的研究方法提出了意见，侧重点有所不同，既有较深入的理论探讨，也有个人调查的实际经验。如凌纯声的《民族学实地调查方法》<sup>③</sup>、李景汉的《边疆社会调查研究应行注意之点》<sup>④</sup>、黄文山的《民族学研究上的一般的原则与方法》<sup>⑤</sup>、林耀华的《边疆研究的途径》<sup>⑥</sup>、陶云逵的《社会文化之性质及其研究方法》<sup>⑦</sup>等，这些当时较为著名的学者的论文都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看法。

在研究过程中，一些学者既注意国际学术发展，又比较各

① 罗香林：《民族与民族的研究》，载《国立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月刊》，第一卷，1933（1）。

② 柯象峰：《中国边疆研究计划与方法之商榷》，载《边政公论》，第一卷，1941（1）。

③ 凌纯声：《民族学实地调查方法》，载《民族学研究集刊》，第一辑，1936。

④ 李景汉：《边疆社会调查应行注意之点》，载《边政公论》，第一卷，1941（1）。

⑤ 黄文山：《民族学研究上的一般原则与方法》，载《青年中国学刊》，第一卷，1937（2）。

⑥ 林耀华：《边疆研究的途径》，载《边政公论》，第二卷，1943（1,2）。

⑦ 陶云逵：《社会文化之性质及其研究方法》，载《边政公论》，第三卷，1944（9）。

种研究方法，倡导局内观察法或居住调查法。“尤注重于沉浸在那活的文化里被熏陶，去受熏陶，同本区人一样的感觉、思想和动作”<sup>①</sup>，从而彻底地明了社会真象与文化的全相。一些学者进而对调查方法的具体应用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他们甚至注意到研究人员的性别差异，“许多关于妇女儿童的秘密，女调查员用一天的时间比男调查员用一年好”<sup>②</sup>。

通过对学科理论各抒己见的讨论，在明确民族学的定义、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基本概念和规范学术研究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民族学家在一开始就有一批人在掌握西方民族学理论之后，就中国的社会实际进行分析，提出较为符合中国现实的见解，为以后中国民族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较为坚实的理论基础。当然，由于当时时局的限制和信息交流的不便，这种讨论还不够充分，对于讨论的归纳与整理更显不足。

### 第三节 人文区位学与功能学派 对中国民族学的影响

1932年，燕京大学聘请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派克（Robert E. Park，现又译为帕克，1864—1944年）于9月至12月担任客

<sup>①</sup> 吴文藻：《现代社区实地研究的意义和功用》，载《社会研究》，1935（67）。

<sup>②</sup> 廖泰初：《从定县的经验说到农村社会调查的缺乏和补救的方法》，载《社会研究》，1935（103）。

座教授。派克是美国芝加哥学派重要代表人物，他注重研究社区对人类组织形式和行为的影响，提出以社区作为分析和研究的单位，并把参与观察作为重要研究手段，在芝加哥大学形成了有特色的研究模式和风习，是人文区位学和城市社会学的开创者。这样的学者到中国讲学对刚刚在中国作为独立学科出现的民族学也发生了重要影响。他在燕京大学期间，讲授了“集合行为”、“社会学研究班”等课程。

在派克离开中国后，听过其课程的学生“深感悟发”，共同编写了《派克社会学论文集》，在派克讲学后一年，即1933年12月由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刊行。在文集中收入了派克的五篇文章：《论中国》、《社会学》、《社会之性质及社会概念》、《人性论》、《集合行为》。书中还有吴文藻撰写的序言和费孝通、林耀华等人的评论性文章。在该书序言中，编者指出：“先生在此短促的时间中，传给我们的绝非书本死知识，而是一种大生命的鼓舞；听课者受其陶冶诱导，无不油然而沛然，尽发其蕴积的潜力，以从事于学问的探讨。我们今日之所以起始追求学问的意义和本相，可说完全是先生所启发的。”<sup>①</sup>

派克在讲学中，将社区研究的方法和参与观察的手段带到了中国，在北京期间，派克不仅在课堂上讲授了调查研究方法，而且亲临中国监狱和妓院考察。使接受其教诲的学生懂得了只有走出图书馆、离开书本、进入生活地进行社区实地调查研究，才能够发现真理的道理。吴文藻总结说：社区研究比较普通的社会调查更进了一步。它不但要描写和记录事实，还要说明事实内涵的意义，解释事变发生的原因，侧重于对事实的解

<sup>①</sup> 吴文藻：《〈派克社会学论文集〉序》，载《派克社会学论文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印，1933。

释。而这种有很大参考价值的对都市社区的种种现象所作的极精细的专门研究之所以有如此成就，全在研究者以民族学家在实地考察异民族、异社会时所抱的客观态度，来考察本民族地方的都市文明<sup>①</sup>。

学派代表人物的亲自传授，令人文区位学理论和方法更易为中国学者接受。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赵承信曾就学于芝加哥大学，他先后发表了《派克与人文区位学》、《社会调查与社区研究》两篇文章，对人文区位学详细而系统地进行介绍。派克在燕京大学的讲学，促使一批中国青年学者由书斋走向田野，由书本走向实践，无疑是促进中国学界向社会的实证研究转变的重要助推剂。

吴文藻在介绍西方民族学、社会学理论的过程中，通过比较研究，在1935年提出：“功能学派是社会人类学中最先进，而亦是现今学术界最有力的一个学派”，请功能学派大师拉德克利夫·布朗来燕京大学讲学，同时，“将年来研究功能派学说所得的知识稍加整理，先付发表”，系统地介绍了功能学派的理论<sup>②</sup>。

拉德克利夫·布朗，是英国著名的功能学派人类学家，1935年秋他应吴文藻的邀请，到中国讲学和访问。自10月起用约一个半月的时间，在燕京大学开设了“比较社会学”课程，并主持了“中国乡村社会学调查”讨论班。其间，有百余名学生研习这两门课程。然后拉德克利夫·布朗由吴文藻陪同，南下武汉、南京、上海、广州诸城市进行访问、考察。在南

<sup>①</sup> 吴文藻：《西方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载《社会研究》，1935（81）。

<sup>②</sup> 吴文藻：《功能派社会人类学的由来和现状》，载《社会研究》，1935（111、112）。

京，他为中国民族学会作了专题报告，在其他几个城市，也与当地学者进行了交流。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将《社会学界》第九卷作为纪念布朗教授来华讲学的特辑出版，其中刊登了拉德克利夫·布朗的四篇论文：《社会科学中之功能观念》、《人类学研究之现状》、《对于中国乡村生活社会学调查的建议》和《原始法律》。吴文藻发表了《布朗教授的思想背景及其在学术上的贡献》。

拉德克利夫·布朗到中国讲学，使功能主义的理论在中国得到了更进一步的传播。他在中国讲学期间，“学生所有报告建议，皆一一指导，批评得失，鼓励学业”<sup>①</sup>。他对功能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阐发，在中国学者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针对当时的情况，提出：“在中国研究，最适宜于开始的单位是乡村，因为大部分的中国人都住在乡村里；而且乡村是够小的社区，可供一两个调查员在一、二年之内完成一种精密研究的机会。”<sup>②</sup>并对怎样做这种调查进行了具体指导。

当时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作研究生的林耀华，参加了拉德克利夫·布朗教授的课程学习，并请拉德克利夫·布朗担任了他的硕士论文的材料组织导师。林耀华为欢迎拉德克利夫·布朗，在其到达北京前夕即写成《从人类学的观点考察中国近代社会》一文，在他担任编辑的天津《益世报》副刊《社会研究》上发表，介绍了功能学派的理论特色，并运用功能学派的理论对中国近代社会进行了简略分析。他当时已经受功能学派

①《社会学界》编：《燕京大学社会学及服务学系 1934 至 1936 年度概况》，载《社会学界》，第九卷，1936。

② Radcliffe - Brown, A. D. (拉德克利夫·布朗) 著：《对于中国乡村生活社会学调查的建议》，载《社会学界》，第九卷，1936。



的影响数年，立意要下乡实地考察，抱着研究起始为实地工作、至终仍是实地工作的态度，对福建莆田宗族乡村进行考察<sup>①</sup>。他得到了拉德克利夫·布朗的指导之后，林耀华又发表了题为《从人类学的观点考察中国宗族社会》的论文，从宗族、家族和个人为起点分析宗族社会，在不同层次的讨论中，运用了功能学派关于社区是各部分、各方面互相联系的整体观点<sup>②</sup>。1935年他写成了15万字的硕士学位论文《义序宗族研究》，由于学习中接受了功能学派的理论，论文形成阶段又受到功能学派代表人物的启发，表现出明显的功能学派的影响。

吴文藻在英国征得马凌诺夫斯基的同意后，将《文化论》一书的原稿交由费孝通等人翻译出版。其中的部分章节在天津《益世报》副刊《社会研究》上发表，后将全文收入《社会学界》第十卷。以后，吴文藻又将此作为《社会学丛书》甲集之一出版。此外，鉴于当时民族学在中国已经由建立和宣传时期进入实际调查活动蓬勃开展的阶段，当时为了方便应用调查，吴文藻特地请弟子黄迪将马凌诺夫斯基编制的部分《文化表格》译为汉文。为了让人们易理解和使用方便，吴氏专门撰写了《文化表格说明》一文，对马氏的表格进行解说，对功能学派理论在中国的实际应用提供了更为明确的可供借鉴的方法论资料。

一批中国学者在这种影响下，研究中采用了旨在以实地调

<sup>①</sup> 林耀华：《从人类学的观点考察中国近代社会》，载《社会研究》，1935（108）。

<sup>②</sup> 林耀华：《从人类学的观点考察中国宗族乡村》，载《社会学界》，第九卷，1936。

查始，而以实地研究终、理论必须根据事实和事实必须符合理论的功能主义方法。费孝通和王同惠的广西大瑶山调查报告《花蓝瑶社会组织》，是他们用功能主义方法实地考察和研究文化中的社会组织方面的收获。

费孝通到英国学习社会人类学后，在其导师马凌诺夫斯基指导下，用功能学派方法，分析在江南农村的田野调查材料，写成博士学位论文《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出版英文本时，将书名改为《中国农民的生活〈江村经济〉》。他对中国农村社会的功能主义分析，“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此书的某些段落确实可以被看作是应用人类学和人类学的宪章”<sup>①</sup>。此后，费孝通的研究基本上一直秉承着功能学派的理论。

许多中国学者接受了功能学派的影响。如芮逸夫在《苗族释亲》一文中指出：亲属称谓制是社会现象的一种，也就是文化现象的一种。亲属称谓的构成，有其内在的心理因素，也有其外在的社会习俗的因素，研究亲属称谓制，特别是某些民族的亲属称谓制，可以窥觐其思想体系及社会组织、婚姻制度等的大略。与拉德克利夫·布朗关于亲属称谓制的作用的看法十分相近<sup>②</sup>。直到现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家中，仍有许多人经常运用功能学派理论分析、研究问题。

① Malinowski, B. K. (马凌诺夫斯基): 《〈中国农民的生活〉序》，载《江村经济》，中文1版，1-6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

② 参见芮逸夫：《苗族释亲》，载《中国科学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四本，1949。

#### 第四节 多种学派的出现

在对学科理论上进行思索的同时，因为人们在学术观点上意见不一，在实际调查和研究工作中的作法有别，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进而造就了中国民族学早期发展中的多种学术倾向或学派。

张崇根在《广义民族学》第十四编“传统民族学”中，论及20世纪前半期中国民族学的学派时提出：当时有一些还不太成熟的流派，即带有中国史学某些特点的历史学派、综合文化学派、社区研究学派。这种提法实际上重复和概括了龙平平在《旧中国民族学的理论流派》一文中所表述的意见<sup>①</sup>。

台湾学者唐美君认为：“南派以中央研究院为中心，与历史学派有深厚的关系，北派则以燕京大学为主，受功能学派影响较大。”<sup>②</sup>

黄应贵则进一步指出：南派即是历史学派，北派为功能学派<sup>③</sup>。

① 参见龙平平：《旧中国的理论流派》，载和羹、张山主编《中国民族历史与文化》，1版，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

② 唐美君：《人类学在中国》，载《人类与文化》，第七卷，1976。

③ 参见黄应贵：《光复以来台湾地区人类学的发展》，载《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1983（55）。

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民族学，由于其幼稚性，必然是西方的民族学思想与中国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思想结合的产物。一方面，留学归来的学者们因为受其导师和原来接受的学术思想的影响，有一定的学术倾向性。另一方面，学者们又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各种现实文化思潮的影响。

由于学者们在国外接受不同导师的教诲，学习多种西方民族学学派的理论和方法，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经历，亦因家庭、学校、地区方面的背景有别，在知识结构、学习经历方面存在差异，对于民族学的有关问题的认识角度就不可能完全相同，对于怎样建立和发展中国民族学有不同看法和意见，中国的第一代民族学家中有一些人受国外民族学学派影响较大，在他们的学术思想中对于某些学派的偏爱略有表现。对于国外的学术理论和方法，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在这种理解和对中国学术研究的实际情形进行思考之后，逐渐形成若干中国民族学中的学术倾向，或者说是完全不成熟的学派。

吴文藻、李安宅、费孝通、林耀华等人受功能学派的影响较大，他们都曾著文对功能学派加以肯定。吴文藻受拉德克利夫·布朗和马凌诺夫斯基的影响，他在比较西方各种学说之后，认为功能学派是当时“社会人类学界中最先进，而亦是现今学术界最有力的一个学派，在功能学派产生以前，社会人类学中有进化论派，有播化论派，有历史学派；但是他们不是缺乏实地研究的精神，即是没有实际应用的价值”<sup>①</sup>。费孝通、林耀华等，也较为明确地表示了类似的想法。以吴文藻为代表的这批比较倾向于功能学派的社会学兼民族学家，组成了“中国功

<sup>①</sup> 吴文藻：《功能派人类学的由来与现状》，载《民族学研究集刊》，第一辑，1936。

能学派”。

将西方民族学的概念和方法运用于中国的实际研究，如果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很容易陷入学术术语的堆砌、难以理解的描述和空泛的议论。因而，中国功能学派在人才的培养方面颇为用心，造就了一批在国内外学术界颇有影响的学者。

中国的功能学派并没有完全在功能学派的圈子中重复，中国功能学派学者，努力将西方民族学研究原始民族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到当代社会。当时，甚至现代的许多人并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的功能学派突破性贡献的意义。尽管在理论上的全面阐释并不充分，但这种突破实际上成为当代人类学变革的前奏之一。它打破了西方殖民主义时代的民族学的窠臼，不再被“野蛮人”、异民族的研究对象限制，而将视点转向在研究者心目中依然视为先进的自我民族或族群，成为以后国际人类学界将研究重点转向现代社会的前奏。当然，中国学者的这种突破在西方人心目中并没有太出格，因为在西方研究者心中，中国各民族、包括被称为汉人或汉族的那些族群，是与西方人依然有相当差异的民族，甚至是接近野蛮的文化。

尽管如此，在那个时代中国的功能学派对本土方法论的应用和发展，已经引起了世界学术界的广泛注意，也成为中国民族学功能学派的特色之一。他们“既有直接的、从该社会内部进行的观察，又运用了科学的方法，透过大大小小事件的叙述，从微观到宏观，超越一个家族、一个地区的范畴”，赋予学术上的普遍意义。希望“能够得出更客观、中肯，更加深刻、更切实际的结论”<sup>①</sup>。

<sup>①</sup> 林耀华：《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1版，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

以自己的社会作为研究对象的学者要研究他本人所生活的社会、从小就参与的社会，就要求超越自己，从“自己”中分化出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两方面。“我”一分为二，观察和思考的“我”和作为研究过程的“我”。用了解与自己所处的不同社会的办法，能够进得去、出得来，从而获得对自我社会的正确而全面的认识<sup>①</sup>。

1935年，在美国进修人类学的李安宅，在一个祖尼印第安人的家里住了三个月，用一个中国人的观点，对美国人类学家史蒂文森（M. C. Stevenson）和邦泽尔（R. L. Bunzel）等人对祖尼人研究的看法提出质疑。他说明民族学观察者对其他民族行为的认识因为文化上的假设而有所差异，一个观察者在陌生的文化模式中只能看到若干而非全部的要素，很容易受自己的文化影响而使研究结果误入歧途，错误地用自己的文化来补足所缺少的东西<sup>②</sup>。

费孝通在回复利奇对中国学者的本土方法论提出的批评时说：“我学人类学是想学习一些认识中国社会的观点和方法，用我学到的知识去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所以是有所作为的。”<sup>③</sup> 费先生的这一番话，说明本土方法论的提出是这批中

① 参见费孝通：《再谈人的研究在中国》，载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编《东亚社会研究》，1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② 参见李安宅（Li, An Che）：《祖尼：一些观察与疑问》（*Zuni: Some Observations and Queries*），载《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第39卷，1931，62—76页。评论部分参见R. M. Keesing著，甘华鸣等译：《文化、社会、个人》（*R. M. Keesing Cultural Anthropology: A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1版，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③ 费孝通：《人的研究在中国——一个人的经历》，载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编《东亚社会研究》，1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国学者立志于将学到的知识应用于中国社会实际、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尝试。尽管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尚处于尝试阶段，并非每位学者都将这种方法运用得驾轻就熟，但不容否认这一方法的提出和运用为国际民族学界学科方法论的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

中国的功能学派学者强调民族学的应用性质，主张用民族学的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和解决中国民族与社会的实际问题，在研究主题上也采取了以实际问题为主的选择。正因为如此，他们在研究中以参与观察的社区调查为特色，重点在于探讨社区内部的组织和结构，反对现象的罗列，对于繁琐叙述和材料堆积表示不屑，重视以整体的观点分析田野调查资料。

由于中国的功能学派的学者们与国际民族学界联系较多，能够经常对话，一些学术发展在功能学派学者的作品中也反映出来。林耀华在《金翼》一书中，对30年代后期的美国的功能学派中新的平衡理论的运用就是一个实例。他在该书的理论分析部分说明：人类行为的平衡，是由人际关系网络组成的，每个个体的变动在体系中发生影响，反之他也受其他个体变动的影晌。因各种干扰力的影响，人类生活摇摆于平衡与纷扰之间，摇摆于均衡与非均衡之间。人们通过不断调整内部关系保持平衡，而调适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文化的影响，文化为人们的体系结构和结构的组成提供了基本的规则<sup>①</sup>。当时，同是主张平衡理论的西方学者查普尔（E. D. Chapple）<sup>②</sup>和阿伦斯

<sup>①</sup> 参见林耀华：《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1版，206～21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sup>②</sup> 参见 Chapple, E. D. (查普尔)： *Principles of Anthropology*, (《人类学原理》)，H. Holt and Company, 1942.

伯格 (C.M.Arensberg)<sup>①</sup> 等人, 和林耀华的观点有许多相似之处。与国外学者的交流, 也进一步提高了这批中国民族学家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

他们的另一个特色是将民族学和社会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他们将社会人类学看作“是社会学的一分部, 应用到原始部落上的一分部”<sup>②</sup>。李安宅提出更直接的实用主义看法, “切乎国情的学术是用人类学来济社会学之不足, 来转移为学的方向。……你管这个叫社会学也好, 叫人类学也好, 只要用力的方向是在适当的轨道上, 则是中国起死回生要图”<sup>③</sup>。他们的这种想法, 与美国的社会学人文区位学的社区观点和英国的功能学派的功能观点影响有关。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派克 (R.E.Park, 今译帕克, 1864—1944年) 教授和拉德克利夫·布朗, 先后在燕京大学讲学, 并在此后又和吴文藻到欧洲的考察, 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把民族学和社会学结合起来进行中国社会文化研究的想法的成熟和完善。

然而, 当时此派最主要的缺陷, 是没有能够重视纵向的历史发展变化的研究。在他们的论文和著作中, 很少描述研究对象所经历的历史变化, 更少对有关史籍资料的研究。文章的结构也与其他中国民族学家不同, 多数都没有把社区或群体历史考察作为著作的开篇或民族志资料叙述的铺垫。这主要是因为

① 参见 Arensberg, Conrad M. & Solon T. Kimball (阿伦斯伯格、金布尔): *Family and Community in Ireland* (《爱尔兰的家庭与社区》), Gloucester, Mass. Pater Smith., 1961, P. 307—316.

② 参见吴文藻: 《功能派社会人类学的由来和现状》, 载《社会研究》, 1936 (111、112)。

③ 李安宅: 《人类学与中国文化》(《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译序), 载《社会研究》, 1935 (114)。



当时英、美的功能学派具有不关心历史资料的学术传统，这些中国学者虽然也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功能学派的这一缺陷，但在初期阶段显然没有很好地利用中国的文献资料。同时，当时的一些中国的功能学派的学者自身所经历的训练也限制了他们在这方面的发挥。

部分中国民族学家重视文化研究，甚至提出将文化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乃至以对象为中心构成独立学科。我们不妨称之为“中国的文化学派”。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黄文山、孙本文，他们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等院校受博厄斯、奥格本的影响，回国后对美国的文化学派社会学的理论加以介绍和发挥，在20世纪30年代初，曾被认为是当时中国民族学社会学中“最具有派别之条件的”唯一一派<sup>①</sup>。

黄文山认为：“民族学的范围似属太狭，不足以包括整个的讨论，……除依据民族学或人类学与政治学而外，尚须借助文化史、社会学、经济学，甚至生态学、人口学等等专门科学。”<sup>②</sup>他力图从理论上建构起一种综合的学问，把这种综合的探讨称之为文化学<sup>③</sup>。

孙本文在美国学习时，受教于美国的文化社会学派巨匠奥格本（W.F.Ogburn，又译乌格朋，1886—1959年），他在美国写成了《社会学上之文化论》一书，对美国当时的社会学中的文化学派的起源、发展及其主要的观点进行概略的介绍，表现

① 杨堃：《中国社会学之派别》，载《鞭策周刊》，第一卷，1932（3、4）。

② 黄文山：《综论殖民地制度及其战后废止的方案》，载《民族学研究集刊》，第五辑，1946。

③ 参见黄文山：《综论殖民地制度及其战后废止的方案》，载《民族学研究集刊》，第五辑，1946。

了他对文化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全面理解<sup>①</sup>。回国后即致力于在中国推行文化社会学。他认为，文化社会学原本就是民族学对于社会学贡献的产物，文化社会学家采用民族学家研究原始社会的方法及其所得的结论，以分析现代社会文化，以科学的态度探究社会现象。

可以归入这一学派的另一位民族学家是陈序经，著有《文化学概论》一书和一些文章，论述了其文化学观点。他和上述两位学者不同，除了理论上的讨论之外，对沙田等地的居民、南洋华侨均有实地的调查和研究。文化学派学者的学术特点，是重视对学科体系的构筑，主要从理论上进行规划，但缺少对民族文化的实际田野工作，其理论体系的说服力也因此而降低。同时，由于建构文化学的主张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许多普通读者了解人类文化的需要，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有利于学问的普及，但对理论的精研并无大的推进。于是，理论体系的构筑就必然成为已经传入或尚未全面介绍的西方有关各种学问的拼接，没有有机地贯通西方各学派，尽管建立文化学的呼声颇高，体系向深度的进展却缺乏动力，独立程度亦值得怀疑。

随着中国民族学的发展，有关民族学的田野调查资料的逐渐积累，诸多学者在共同研究过程中，对西方民族学学派有了新的认识，以中国人传统的持中、中庸方式，试图调和各种学派的差异，于是在中国民族学界出现了与西方民族学不同的新学派。

当时，中国民族学界影响最大的是将进化学派和其他学派的理论与方法组合以后形成的“中国历史学派”。不过这里的

<sup>①</sup> 参见孙本文：《社会学上之文化论》，北京，朴社，1927。

所谓“历史学派”，并非美国民族学界的文化历史学派的移植，这个学派不仅仅是以“历史的方法”对各民族的具体材料进行描述和整理，而且注重引用和研究中国历史文献资料，强调运用民族学的各种理论和方法解释中国的材料，解决中华民族文化历史的难题。“中国历史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以进化论作为主要的理论观点，对法国民族学派收集资料的方法有较多的利用，吸纳了美国文化历史学派的研究框架和步骤。

中国古代的丰富的历史记载，为中国民族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字资料。受中国传统治学方法的影响，这些学者对文史功底较为重视，有些学者还进行过关于中国古代民族发展的专题研究，写出了有影响的论文。凌纯声进行过唐代云南彝族和白族等民族的研究<sup>①</sup>，陶云逵对傣族在历史上及当时与政府的关系作了探讨<sup>②</sup>，卫惠林进行过中国古代图腾制度的论证<sup>③</sup>，芮逸夫的《中国亲属称谓制的演变及其与家族组织的相关性》则是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sup>④</sup>。马长寿关于彝族等民族的历史的研究方面的建树也颇为引人注目。尽管部分民族史学家对某些民族学专家的民族史研究成果略有微词，但重视史学研究、大量利用中国古代民族志资料，无疑是中国“历史学派”的重要特点之一。因为较多的学者利用了中国古代民族志资料，这种特点又进而扩大并成为整个中国民族学的特点。

① 参见凌纯声：《唐代云南的乌蛮与白蛮考》，载《人类学集刊》，第一卷，1938（1）。

② 陶云逵：《云南摆夷族在历史上及现代与政府之关系》，载《边政公论》，第三卷，1942（9）。

③ 卫惠林：《中国古代图腾制度论证》，载《民族学研究集刊》，第三辑，1943。

④ 芮逸夫：《中国亲属称谓制的演变及其与家庭组织的相关性》，载《民族学研究集刊》，第六辑，1948。

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视，更重要的因素是某些学者对于民族学学科地位和研究目的的看法本身就看重历史学，即把民族学与历史学联系在一起，甚至视民族学为历史学的一部分；阐述中国各民族的起源和发展过程，说明中国各民族的发展序列和各自的位置。所以，20世纪前半期，民族学家关于中国民族史的著作和中华民族各民族分类的专题论文多为此派学者的作品。如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凌纯声的《中国边疆文化》和《中国边疆民族》、卫惠林的《中国民族分类略论》、芮逸夫的《中华国族的支派及其分布》和《再论中华国族的支派及其分布》、马长寿的《川康民族分类》等。

老一代的中国民族学家中，有不少曾在法国留学。凌纯声、杨成志、杨堃、徐益棠、卫惠林等均先后受业于法国民族学家莫斯（M. Mauss, 1872—1950年）、瑞伟（Rivet）等人的训练，受法国民族学派的影响较大。较为注重实地调查资料，或多或少地保持了法国民族学派“宁肯为事实牺牲理论，绝不肯为理论而牺牲事实”的学术态度。其中，多数学者对法国民族学派以细致著称的实地调查方法较为偏爱，并在田野工作实践中应用了这些方法。一些中国的民族学家，也较为熟悉美国的文化历史学派的详尽的文化调查和描述的方法。凌纯声等人在对中国少数民族的实地调查中，就采用了受法国民族学派影响的调查提纲和受美国文化历史学派影响的方法。

这些中国学者提出的先进行广泛田野调查和积累丰富资料、再从事理论归纳的整体研究设想，反映出受文化历史学派影响的痕迹。这种影响是当时美国民族学在世界民族学中的地位稳健上升在中国的表现，同时也得益于从事民族学理论引进的学者对文化历史学派的介绍。林惠祥早年先在厦门大学，然后在菲律宾学习人类学，他的民族学知识受美国的人类学影响

较大。杨成志于1940年就已经译出博厄斯（杨译鲍亚士）的《人类学与现代生活》，对于博厄斯“不以理论代事实，不以一般代特殊，不以部分代全体，按步深入，实事求是”的方法和特有的精神加以肯定，反映他当时对美国的文化历史学派民族学理论已经有一定程度的认同<sup>①</sup>。

还有部分学者针对中国民族学研究的实际，在研究中表现出对西方民族学学派更强烈的综合意识。陶云逵提出：“我们颇希望功能与体相派的生理学、腺学、体格学式的研究法去研究边疆民族文化。但是功能或体相研究的大前提是在知道其文化形态之后，因此，历史重造派的详尽的文化形态描写也为必不可少的人手步骤。我们须得综合各法，择善而取，以应当今之需要而树百世之基”。<sup>②</sup>

中国的历史学派和其他中国民族学流派一样，只是一种学术倾向，在对各种问题的具体看法上经常各有不同意见。除了上述人物之外，另外一些学者，特别是在国内培养起来的民族学家受史学传统影响较深，对进化论往往表现出更多的兴趣，同时对中国古代史籍也更为熟悉和更加强调，有些人甚至一身兼民族学家与历史学家二任。

中国历史学派在当时阵容较大，但参差不齐。一些主要人物虽然学术训练较为全面，但也有不少人对西方民族学理论和方法掌握不足，或没有很好地解决理论与中国实际状况相衔接的问题，对批判性地借鉴西方的理论和学术观点认识不明确。

<sup>①</sup> 参见杨成志：《〈人类学与现代生活〉译序》，载弗兰克·鲍亚士著《人类学与现代生活》，1~3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5。

<sup>②</sup> 陶云逵：《云南土著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载《边政公论》，第一卷，1941（5、6）。

在研究成果方面，论著水平高低悬殊，热衷于风情描述，叙述不分轻重，甚至出现过于繁琐的现象。对理论分析重视不足，往往只是进行了周全的描写，却说不出所以然。

为了研究的便利，我们根据学者的学术思想所做的学派划分，是根据其主要的学术观点和学术表现做出的。与西方较为清楚的学派界限不同，各种学术倾向在中国民族学界互相影响。大部分中国民族学家从理论观点、研究方法到对于民族学问题的具体看法和意见，虽然有不同，但这种差异较西方的各学派之别要小得多。这也是中国的民族学与西方的民族学在学派划分上的重要区别。许多中国的民族学家在学派取舍方面，与西方学者相比取向更为广泛。中国的民族学家由于身在“庐山”之外，对于学派的认识更为客观，他们认为西方民族学的各种学派的弱点在于戴的眼镜色素太深。中国民族学的研究在实际进行中，对于西方民族学的各种学派往往能够熔于一炉，兼收并蓄。

黄文山毕生提倡文化学，也不完全排斥其他学派。20世纪30年代时，他认为功能学派意在文化类型与文化法则之发现的理论“在未来社会人类学进展上之希望最大”<sup>①</sup>。另外一位中国文化学派倡导人孙本文也对功能人类学加以肯定，他尤其推崇拉德克利夫·布朗关于文化意义与功能的分析<sup>②</sup>。孙本文综合各学派的社会学本身，就包括了对于其他学派的吸收和借鉴。陶云逵在研究中不仅继承了传播学派文化圈的思想，也注意结合历史发展和功能的观点进行考察。芮逸夫长期担任

① 参见黄文山：《民族学与中国民族研究》，载《民族学研究集刊》，第一辑，1936。

② 参见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胜利出版公司，1948。

凌纯声的助手，学术思想上受凌氏影响颇大，但他在讨论苗族亲属称谓时，对拉德克利夫·布朗关于研究亲属称谓制是对人类社会的本质达到作正确概括的唯一方法的意见表示赞同<sup>①</sup>。

同时，实际上有些学者究竟属于哪个学派界限并不明确，有时甚至因社会环境和学者本人学术思想的变化，在某一阶段倾向于这个学派，在另一阶段则倾向于其他学派；在理论介绍和分析时偏向于某一学派，在实际研究中又表现出受另外一些学派的较强影响。

除上述学派之外，还有其他一些不同的学术主张，且有一些独到的见解，但因为缺乏共同一致的意见，没有形成学术思想倾向或学派。此外，有些学者以传统史学和训诂学的功底，研究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和汉族中的某些群体；另有部分人不是民族学家，对民族学知识知之甚少，但对民族学的某些课题表示出较强的兴趣。他们的学术思想倾向如何，到底归属于哪个学派是很难确定的。

中国共产党及部分进步知识分子应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中国的民族问题进行了一些分析与探索。这些研究虽然受到种种限制，但也有一些得以公开发表。除了蔡和森等人早年的《社会进化史》等著作外，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又有一些著作发表，在中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民族学的有关问题研究方面有了新的发展。

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根据摩尔根和恩格斯的观点来讨论中国古代社会的社会发展问题。他自己明确表示，这本书就是根据《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观点来

<sup>①</sup> 参见芮逸夫：《苗族释亲》，载《中国科学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四辑，1949。又，见本书第六章第五节。

研究中国社会发展的程序，是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翻版。在书中，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原理，结合大量的传说、史籍文献、甲骨文和金文材料，对中国的古代社会的发展过程进行初步分析和概括。他论证商代以前的社会是血族群婚的母系氏族社会；商代还是一个原始公产制的氏族社会，保留有普那路亚家庭的痕迹，但社会组织已经有崩溃的征迹；西周时期是奴隶制时代，春秋以后为封建制社会，鸦片战争以来是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简单化的倾向，对中国社会文化的特殊性注意不够，在材料使用上，由于时代限制也有不谨慎之处<sup>①</sup>。然而，该书提供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有关民族学方面的论断研究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范式，对于以后中国大陆的民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吕振羽的《中国民族简史》、《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也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问题和社会发展与起源问题的著作。吕振羽十分重视对中国各民族的研究，特别是各少数民族的研究。在后一书中，吕振羽以考古材料为主，辅以古籍所载神话，研究史前中国社会。他指出：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是中国女性中心的氏族社会时代；传说中的启时代，是由女系本位转入男系本位的时代；殷代，为奴隶制社会；周代，是初期封建社会时代；由秦到鸦片战争前，为变种的封建社会时代；鸦片战争以后，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sup>②</sup>。尽管这些研究还有一些可以修正之处，翦伯赞认为，通过吕振羽的研究，无可争辩地证明了“原始氏族社会这一阶

<sup>①</sup> 参见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联合书店，1930。

<sup>②</sup> 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北平，人文书店，1934。



段，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sup>①</sup>。

此外，马长寿翻译了苏联学者的文章，介绍了当时苏联的关于人类学的发展情况，以启发国内学者的研究<sup>②</sup>。不过，当时苏联的研究在中国学术界并没有受到普遍的关注。郑伯奇著的《苏联的民族政策及其成果》<sup>③</sup>，对苏联的民族政策进行了介绍，为人们提供了可以对中国民族政策及民族研究有所启发的材料。

一些民族学家接受民族学中进化学派的影响，进而对马克思主义有关社会发展的学说产生一定程度的认同。在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学习的王兴瑞在《琼崖黎人社会概观》一文中，仅“社会组织”一节就六次引用李膺扬译的恩格斯《家族、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比较黎族与北美的易洛魁人的社会组织的异同。他认为：生黎的村峒颇似易洛魁氏族，熟黎的族则与易洛魁人的氏族完全异趣，而实同于海南汉族的宗族组织。随后，又以黎族的历史文献和实地调查资料为根据，用恩格斯的有关论述分析了黎族的峒头产生的演进过程、峒头的职务和村人之间的关系<sup>④</sup>。

参加拉卜楞藏区调查的俞湘文在其著作中，专辟“恩格斯原始社会进化阶段说之对照”一节，认为“恩格斯所述关于人类原始社会进化阶段的说法，与该区社会情形对照之下，恰有许多相同的地方”，她从社会阶级、首领权力、世袭上官的由

①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164页，新中国书局，1949。

② Eugene Colomshok (E. 果洛姆什托克) 著，马铃樾（长寿）译：《苏俄人类学的进展》，载《新社会科学季刊》，第一卷，1934（2）。

③ 郑伯奇：《苏联的民族政策及其成果》，载《中苏文化·十月革命二十周年纪念特刊》，重庆中苏文化协会印，1939。

④ 王兴瑞：《琼崖黎人社会概观》，载《琼农》，1934（9、10、11）。

来等方面分析了拉卜楞藏区的情况。作者虽然缺乏对阶级社会状况的认真而科学的研究，并不适当地认为“游牧藏区的情形与恩格斯所说原始社会的情形很相似”，但表现了她对进化论的认同<sup>①</sup>。

当然，上述这些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有关民族学著作的引用，并非完全是建立在系统地 and 全面地理解之上的，在若干问题的解释上也有一些不准确或不妥贴之处。如果从学派的角度来看，似乎在 20 世纪前半期还没有产生出一个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派。但是当时许多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乐于引用恩格斯的著作，至少表现了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民族学著作的看法。在全面认识马克思主义民族学著作对中国民族学的影响上有积极的意义。

## 第五节 中国民族学的三大研究区域

我们认为，在 20 世纪前半期的中国民族学的发展过程中，存在若干研究区域和中心。一方面，中国的第一代民族学家大部分是由国外学习归来的，他们在国外学习期间，受教于不同的导师，受到不同民族学学派的影响，形成各自有差别的学术特点，回国之后效力于不同研究和教学机构；特别是一些学术活动活跃的学术领袖，由于他们的学术地位，对所在地区的学

<sup>①</sup> 参见俞湘文：《西北游牧藏区之社会调查》，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

术发展有较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当时，各地区之间由于交通等方面的限制，交往不方便，在学术上各地区各自为阵的情况成为必然，地区性的特色顺理成章地形成。同时，中国各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差异，也是地区特色的形成原因之一。地区特色和学派是有联系的，在某一地区中，可能某一学派占主导地位，但毕竟不完全是单一学派的一统天下。当然，我们所作的研究区域和中心的划分，并不排除各种地区学术的交流和交叉现象的存在。

关于中国民族学的南、北学术特色问题，台湾学者有较多议论。除唐美君、黄应贵等人把南、北学术特色与学派直接等同之外，李亦园先生也认为：在1930年前后，中国人类学可分为两个派别，一个是以北方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为代表，一个是以南方的中央研究院为代表。在论述这两个学派的差别时，他认为：北派比较偏向于一般社会科学，而南派比较偏向于人文学。按照他的观点，北派较为重视比较不同社会中的人类的不同生活方式，研究并阐述各种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而南派则把注意力放在研究人类的文化上，研究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兴趣不在规律或原理、原则<sup>①</sup>。这种南、北划分的看法，实际上是将中国民族学划分成了南、北两大区域，两个区域都冠以有区别的学术特色，于是出现南、北特色的论题。大陆学者近年也有不少人主张，现代中国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南、北特色和过去的历史传统有关<sup>②</sup>。

张寿祺在《中国早期的人类学与中山大学对人类学的贡

<sup>①</sup> 李亦园：《人类学与现代社会》，1版，298页，台北，水牛图书出版公司，1985。

<sup>②</sup> 张海洋：《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的南北特色》，载和葵、张山主编《中国民族历史与文化》，1版，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

献》一文中提出：从30年代起，中国研究人类学的，逐渐形成三大研究区域，即华东、华南、华北三区<sup>①</sup>。另外还有三四十年代中国人类学研究中心分为北方、东南、南方、西南四个区域的想法<sup>②</sup>。我们认为，上述诸看法都有一些合理之处，但均有较为笼统之弊。

根据中国民族学在20世纪前半期发展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时期的不同阶段民族学的研究区域和中心是有所变化的。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大致有三个区域：即华东地区、华南地区和北方地区。

华东地区是当时的全国政治和经济、文化中心。南京是中华民国首都所在地，除中央研究院外，还有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院校和中山文化教育馆等研究机构。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作为华东区的辅翼，有大夏、沪江、暨南等大学。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初建时也设在上海。华东区集中了一批一流的学者，国立的研究和教学机构较为集中，在学术上受政府的帮助较多，政府对这一地区的学术发展影响较大。中央研究院是这一地区的中心。从当时的研究地位看，由于南京的政治地位较高，中国民族学会亦设于此，在南京影响较大的民族学家相对较多，这一区域的学术地位也显得特别重要。在这个地区，当时影响较大的民族学家有凌纯声、孙本文、黄文山、徐益棠、卫惠林、吴泽霖、柯象峰、刘咸、芮逸夫、吴定良、游嘉德、何联奎、胡鉴民、胡体乾等。

<sup>①</sup> 张寿祺：《中国早期的人类学与中山大学对人类学的贡献》，载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编《梁钊韬与人类学》，1版，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

<sup>②</sup> 陈国强：《建设中国人类学》，载陈国强等著《建设中国人类学》，1版，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

华南地区是中国的南大门，受东南亚及国外的影响较大，曾是中国现代民主革命的中心，新思想和新学说在这里传播较早。广州的中山大学和岭南大学，为这一区域的研究中心；同时，又有福建的厦门大学为辅翼。而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人类学组亦曾在此活动。罗香林、朱希祖、陈序经、杨成志、伍锐麟、徐声金、林惠祥在民族学的研究活动中较为活跃。

北方地区以当时中国的文化中心北京为主要基地。在北京，当时有燕京、清华、北京、辅仁等大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学（含人类学）组一度也设在北京。文化氛围较浓厚，学者群阵容整齐，既有国外归来的学子，又有深厚的国学根基，尤以燕京大学为其骨干。吴文藻、潘光旦、赵承信、杨堃、史禄国、李安宅、费孝通、林耀华等，在当时的影响较大。

华西协和大学在1922年就成立了华西边疆研究会，以后在该校博物馆中又注意搜集民族学文物，然而，由于该校的民族学在1941年之前长期由葛维汉等外国学者主持研究，基本上没有中国学者参加，与中国民族学界的交流不多，同时在研究中多注意搜集文物和对各民族文化进行一般的描述，因而不宜过分强调该校的主要研究机构在抗战之前的中国民族学中的地位。四川大学在抗战前虽有胡鉴民、冯汉骥一度任教，但为时甚短，不足以成为独立的研究力量。总体来看，在抗战之前，西南和西北地区的民族学研究还较为薄弱，只有少数学者的个别研究，未能构成有实力的研究队伍，尚不足成为独立的研究区域或中心。

在共同追求中国民族学的发展的大前提之下，中国民族学家们具备了一些共同的学术特点，与此同时，三大区域的研究

各有特色。当然，这里所列举的特点是相对的，特别是由于学术交流的开展，有些特点虽然可以说是某一区域的，但在其他区域亦可能存在，只不过表现得不那么明显罢了。因此，许多特点也可以视为中国民族学的整体特点。

华东区的民族学研究，概括地说具有一些特色：这里的民族学研究注意到了历史学、语言学、体质人类学方面的调查和资料，该区域的民族学家在这一阶段明确地提出以民族学补充历史记载的不足的看法。其中许多人虽然是由国外毕业归来的学子，但在研究民族学问题时，都较为注意从历史资料中汲取有用的东西。在民族学研究中，这一区域的学者力求尽力全面地搜集资料，既进行关于民族文化的调查，又注意语言、体质、民间文学等方面的资料；许多学者在国外接受了较为全面的训练，能够同时胜任多方面的工作，同时亦有较强的物质保证与支持，使他们的田野调查所涉范围较广、质量较高。田野调查的对象多是当时被认为较为落后的中国各地的少数民族。因为学术交流频繁，受国外的民族学学派的影响，这一区域的学者群很难归并到一个统一的学派中。

华南区的民族学研究的特色是：这里的民族学研究是和民族学、体质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历史学同时进行的，既研究各民族的文化特点和行为模式，又研究各自的体质特点，并特别注意考古、文献资料的运用。一批历史学家，如顾颉刚、朱希祖、罗香林、岑麒祥、朱谦之等，对后起的学者有相当程度的影响。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和文科研究所中的人类学组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包容在历史学部之中的，而许多历史学家都曾担任过人类学组的导师，朱希祖还担任过文科研究所主任。在民族学实地调查的对象上侧重于华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和部分汉族中的特殊文化群体。虽然受国外民族学学派的影响

较多，但是这一区域的学者们不拘泥于其中某一学派的理论，许多学者试图以中国的史学传统与西方的民族学理论嫁接，主张对各学派的综合和借鉴利用各种其他学派的方法。

北方区的民族学研究特色，是将民族学和社会学结合起来进行思考，强调社区研究，尤其重视对汉族地区的研究。这一地区的代表学者在广泛分析各学派长短的基础上，对被认为是当时“最新近”、“最有力的”功能学派理论有更多的偏爱，并有一个学者群为实践功能主义的分析方法而进行实地调查和研究。并且，这一区域的学者们以田野调查的实际资料和分析研究为拳头产品，通过和国外学者的交流与对话，获得了在国际学术界应有的地位。

在抗日战争期间，由于中国的民族学研究的主阵地转移到西部地区，研究区域也有了变化。当时的研究区域总的来说以西南地区为主，在西北也开展了民族学活动，甚至可以用滇、川、黔等省来划分研究区域，研究力量更集中在昆明、成都、重庆、贵阳等一些西部城市。这种分布的变更情况，我们将在回顾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民族学的发展时详为讨论。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迁往西部地区的诸大学和研究机构复员，但他们在西部地区的研究和教学，为西部的民族学发展造就了人才、培养了队伍，西南成为中国民族学的一个新的研究区域。以成都的华西协和大学和昆明的云南大学为中心，他们以西南地区的各少数民族为研究重点，重视实地调查。在西北地区，西北大学和兰州大学等大学中也开始进行了民族学调查和研究。在其他地区，中国民族学仍然保持了30年代的大致的区域划分，各自的理论和实践特色依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下来，只是各地区共同的东西似乎较抗战前更多了一些。这种变化，与抗战时期民族学家们在西部地区的交流有关。抗战时

期，一批民族学家相互切磋彼此的理论观点，吸收他人的长处，在实践中修正各自以往的观点。

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一代民族学家在抗战之后已经开始初露锋芒，甚至挑起大梁，他们在理论观点上互相借鉴的趋势更为明显，使理论上的交叉更为丰富。同时，由于各种原因，部分学者并未回到抗战前的原活动地区，而到了其他地区工作，如吴文藻去了日本，吴泽霖到了北京，黄文山、陈序经到了广州，李安宅留在成都，杨堃、江应樑到了云南。这种人员的流动也促进了学术观点和操作特色的相互交流。不过，随之而来的动荡局势也使学者们的田野调查和研究工作受到了影响，致使我们在对战后的区域特色分析中难以发现新的内容。

中国民族学的早期理论与实践的地域性特点，对于以后中国民族学的发展有较多的影响。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大陆的民族学和人类学恢复后，很快就形成了新的南、北学术特色，这种区域特色的产生与20世纪前半期的区域间互有差异的理论特色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 第六章

### 中国民族学各项工作的初步开展

民族学在中国作为独立学科出现之后，在学术理论介绍和理论探索的同时，将目光着眼于民族学工作的基础——田野工作。在学科规范化的工作中，中国民族学家也开始了一系列的努力，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 第一节 民族学田野调查的广泛开展

在 20 世纪的 20 年代末、30 年代初，民族学田野调查和实地研究即蓬勃开展起来。蔡元培主持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把实地调查搜集的资料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在

颜复礼、商承祖的广西瑶族调查之后，助理员林惠祥于1929年初赴台湾进行高山族的调查。因为当时台湾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大陆学者进行学术考察难以进行，林惠祥化名为林石仁，假托为商人。调查遇到了许多困难，除道路艰难、交通不便外，还有日本警察盯梢怀疑。在台湾调查两个月后，同年10月回到上海，立即将调查资料整理成《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一书，次年作为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专刊第二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sup>①</sup>。

由于人们普遍认识到民族学要想在中国得到发展，就必须对中国各民族的实际生活情形进行深入的投资，对中国各民族的文化的阐述必须由民族学田野工作中获得大量材料。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国民族学家们曾到东北、华北、华东、华南、西南各地，对部分少数民族和汉族文化群体进行了实地调查，可见，中国民族学的初步发展正是从田野开始的。

### 一、对东北、华北地区的调查

1929年4月末，新到任不久的民族学组专任研究员凌纯声和专任编辑员商承祖赴东北进行满—通古斯语族民族的调查，调查地域包括吉林、黑龙江、辽宁等省，主要地区为松花江下游等处的依兰、桦川、富锦、同江、绥远、饶河、虎林、宝清、密山、穆陵等县。实地调查时集中于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调查历时三个月，所得材料及标本颇多，调查结果编为《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书，包括东北的古代民族与赫哲族、

<sup>①</sup> 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十八年度报告》，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十八年度总报告》，中央研究院印，1930。

赫哲族的文化、赫哲族的语言和赫哲故事四部分，为两册 16 开本近 700 页的长篇调查报告，作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第十四本，1934 年出版。这本调查报告“是中国民族学家所编著的第一部具有规模的民族志专刊”，反映了“中国民族志专刊应有的水准”<sup>①</sup>，被当时学人视为“我国近年来最科学的民族调查报告，虽不免尚有缺点，然已造成中国民族学史上破天荒之著作”<sup>②</sup>。此书较以前的中国民族学家的著述，更为系统而全面，学术性更强，反映了中国民族学的进步。直到 40 年后，它仍得到很高的评价，被认为是“一本极其完整的科学民族志，它具有典型民族志书的内容与章节，而且描述至为精详生动，所以一直成为中国民族学者从事田野调查与撰写报告时之圭臬。”<sup>③</sup>当然也有人指出，凌氏的研究没有说明赫哲人是适应怎样的生活环境而创造出文物和制度的，更没有把赫哲人的各种文化现象置于其社会文化脉络中加以考察，使人们无法了解其各种社会、文化之间有怎样的联系，也无法了解其各种制度对社会有何影响或作用，因而使他的描述与其老师莫斯的功能理论联系不上。黄应贵认为这是凌纯声忽略了当时已有的理论的结果<sup>④</sup>。

华北地区，是北方的汉族聚居区，仅有一些小范围的少数

① 吴文藻：《中国社区研究的西洋影响与国内近状》，载《社会研究》，1935（101、102）。

② 徐益棠：《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载《边政公论》，第一卷，1942（5、6）。

③ 李亦园：《凌纯声先生对于中国民族学之贡献》，载《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1970（29）。

④ 黄应贵：《光复以来台湾地区人类学的发展》，载《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集刊》，1983（55）。

民族聚居区。在20世纪前半期，在此地区的人类学田野工作主要是对一些汉族社区进行调查。自1930年起，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在北京清河镇建立了实验区，经过许仕廉、步济时、张鸿钧、杨开道、赵承信、吴文藻等亲自主持或指导，在对当地实施社会服务工作的同时开展调查；以后又建立了研究股，除实验区的研究员外，也有教师及研究生和本科学生参加研究。在引进人文区位学和功能学派理论与方法之后，他们改变了传统的社会学以问卷或访问为主的做法，进行社区调查，并特别注意社会组织、社会结构、婚姻、亲属关系、文化绵绣、市集等方面的参与观察和调查，写出了许多专题论文，并由黄迪将社区研究材料加以综合整理，写成长篇论文《清河村镇社区》，于1938年在《社会学界》第十卷发表。许仕廉在此之前发表有《清河：一个社会学分析》（*Ching Ho: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1930）。经过社区调查的锻炼，培养出了一批符合人类学学科专业要求的人才。

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作为研究生的杨懋春，注意对其家乡山东省胶县台头村进行调查，为他以后的研究积累了必要的资料。此外，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李有义，对山西徐沟县农村的社会组织进行了调查，以后又继续对上郭村的材料进行研究。蒋旨昂则对北平附近的卢家村进行了颇为细致的调查，并于1934年写成带有人类学色彩的长篇论文《卢家村》<sup>①</sup>。燕京大学的这些调查成果，尽管是作为社会学调查报告发表的，但反映出文化人类学的强烈影响，因而在中国民族学发展史中具有重要意义。

<sup>①</sup>《燕京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度概况》，载《社会学界》，第八卷，1934。

华北地区的社会学调查的成果中，也有结合民族学研究的角度的方法的。李景汉撰写的著名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被认为是中国当时“最成熟的社会调查”，“因为这个调查充分的利用了地方志所特有的格局，对于民风礼仪、习惯信仰等等，都有详细记录。因此弥补了一般社会调查过于重视物质文化的缺点。又因为注重实地调查，所以亦矫正了原有地方志闭门造车的弊病”<sup>①</sup>，并被后人誉为“中国县区社会调查最详细的调查报告”<sup>②</sup>，其中包括了风俗习惯、乡村娱乐、宗教信仰和社会组织状况等。“但是这个调查和一般的社会调查一样，仍是一种静态的描写，使得我们对于定县人民的社区生活及实际活动，仍未获得十分亲切的认识。”<sup>③</sup>

美国人甘博在乡村建设运动中，也到定县进行了细致的田野调查。根据收集到的大量资料，先后发表了《定县：一项社会调查》(*Ting Hsien, A Social Survey*)、《定县乡村工业》(*Ting Hsien Village Industry*)、《定县：一个华北乡村社区》(*Ting Hsien: A North China Rural Community, 1954*)、《华北乡村：1933年以前的社会、政治及经济活动》(*North China Villages: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ctivities before 1933, 1963*)等著作。他在其著作中也是运用社会学与人类学结合的方法进行分析和叙述。

① 吴文藻：《中国社区研究的西洋影响与国内现状》，载《社会研究》，1935（101）。

② 周国兵：《定县社会概况调查》，载袁方主编《社会学百科词典》，1版，106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

③ 吴文藻：《中国社区研究的西洋影响与国内现状》，载《社会研究》，1935（101）。

## 二、对华东地区的调查

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原计划在 1932 年“赴北满调查鄂伦春人及索伦（鄂温克）人，自‘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失陷，事实上已不能进行”，于是改为调查浙、闽的畬族，以弥补前次调查的不足<sup>①</sup>。1934 年 5 月，凌纯声、芮逸夫、勇士衡到浙江旧处州所属的丽水、景宁、云和、龙泉、遂昌、松阳、宣平等地考察畬族的生活状况及社会情形<sup>②</sup>。凌纯声根据此项调查进行了浙南畬族的图腾文化之研究，研究畬族的“起源、艺术、禁忌及其与宗教及外婚制关系”。凌纯声并与芮逸夫合作进行畬民宗谱之研究，“研究其类别，考定畬、瑶、蛮三名称递变，畬民之迁移与分布及其氏族制度”<sup>③</sup>。

在此之前，在同济大学任教的德国学者史图博和李化民，得到了德国科学应急协会对旅费的支持，于 1929 年赴浙南和闽北畬族地区调查。他们在以景宁为中心的畬族居住区，进行较为细致的民族学调查，调查项目相当全面，包括饮食服饰、婚丧礼俗、奉先祭祖、祭祀鬼神、语言民歌和姓氏传说等。调查报告《浙江景宁敕木山畬民调查记》，经蔡元培审阅和推荐，

① 参见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二十年度工作报告》，中央研究院印，1932。

② 参见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致文书处签》，载《中央研究院档案》393—279（系档案序号，前序号为档案总目号，后序号为案卷号，后同）。

③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二十九年度至三十年度报告》，载《中央研究院档案》393—1373。

于1931年作为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专刊第六号出版。作者为了答谢蔡氏的鼓励和支持，在此书的扉页上题辞：“献给浙江的民族学”。

中央大学教授何联奎生长在畲族活动的地区，1932—1933年前后，又对浙东十数县畲族进行了调查。他根据调查资料撰写了《畲民的图腾崇拜》（1936年）、《畲民的地理分布》（1942年）等论文。胡鉴民也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对畲族进行了调查研究。

费孝通在1935年对大瑶山调查后，翌年暑期回家乡休息，接受其姐费达生的建议，到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进行为期一个多月的调查。这次调查并不是事先计划的，而是受当时该村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这一新事物的启迪进行的。由于调查较为系统，不久后又经过费孝通在赴欧洲的船上及时整理，成为他以后博士论文的素材。

中央大学社会学系在言心哲等人的带领下，对南京的贫儿院和棚户区进行了社会调查，主要采用了社会学的方法，也借鉴了人类学的方法。

### 三、对华南地区的调查

在燕京大学学习的林耀华，对其故乡福建莆田和福建义序的宗族社会进行了调查。除早年生活的记忆外，他的调查主要是1934年和1937年两次到福建进行的。前一次调查，是在他读研究生时，受社会学系的派遣，主要调查福建省福州市附近的义序乡的黄氏宗族村落。在得到了民族学的训练之后，以自己的家乡和福建省的汉族家族的田野调查资料，以本位观察的资料作研究。这项调查不仅是林耀华先生本人最为出色的田野

实践，而且成为中国民族学界在本土研究的典范。他根据这些调查写成了硕士学位论文《义序宗族研究》，以后的代表作《金翼》<sup>①</sup>也是以他在福建的调查作为基础。

燕京大学的学生吴高梓、陆懿薇、陈礼颂，分别对福州的疍民、风俗和潮州的村落社区、宗族等进行了调查<sup>②</sup>。

1934年，陈礼颂调查了澄海县的一个以陈氏宗族为主的杂姓村落——斗门乡，通过当面询问、局内观察、通讯方法搜集资料等，研究了当地的宗族结构、家族结构、宗族与家族的功能、亲属称谓、婚丧习俗等问题。他试图“把宗族村落社区的客观环境和各项特征，尽量描述出来，决不夹杂任何主观的见解”，不过在研究中他采用功能学派的理论，对潮州宗族进行了分析<sup>③</sup>。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陈达教授得到太平洋学会赞助，1934年9月至1935年2月主持调查粤东潮汕地区和闽南漳州、泉州地区的华侨社区与非华侨社区的状况。研究报告《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于193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调查研究侧重于南洋华侨对家乡所发生的各种影响，但也涉及到宗族、家族、礼俗等方面，讨论了家庭生计、家长权力、家庭婚姻观念等方面的变迁。陈达率领的调查者们为了便于比较，在广东选

① 此书原来是以英文写成并发表的，书名 *The Golden Wing*。另外一个汉译本是由宋和翻译的，1977年在台湾出版，书名被译为《金翅》。

② 参见《社会学界》编：a. 《燕京大学社会学面面观》，载《社会学界》，第七卷，1933；b. 《燕京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度概况》，载《社会学界》，第八卷，1934；c. 《燕京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度概况》，载《社会学界》，第九卷，1936。

③ 参见陈礼颂：《1949年前潮州宗族村落社区的研究》，1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择了潮州附近的两个村庄，一个代表静态社区，一个代表动态社区。

20世纪30年代初任教于岭南大学的陈序经、伍锐麟等，认为“南中国社会调查工作实为尚未开辟之园地，而社会情形千变万化，转瞬便成陈迹，苟不详加调查，则重要材料自不免沉埋湮没”。于是，在该校社会学系、社会研究所主持了对广东疍民的调查。1931年6月至次年8月，首先进行了沙南疍民的调查，陈序经负责历史方面的研究，由伍锐麟主持实际调查工作，另有十名社会学系的学生参加了调查。他们选择了129户疍民家庭，逐户查询，对于疍民的人口问题、经济情形、职业状况、健康程度等无不详为查询，以备研究分析。陈序经、伍锐麟还共同主理了疍民的婚姻、礼俗、娱乐、宗教、家庭生活、道德观念等24个方面的调查。调查所得结果“甚为圆满”，成果编写成150多页“极为详晰”的报告书，发表于《岭南学报》第三卷第一期。以后又刊印有《沙南疍民调查报告》油印本<sup>①</sup>。

1934年3月，伍锐麟、陈序经、梁锡辉以何格恩为向导，由广州至三水，再由河口至肇庆、梧州，调查了西江一带的疍民的生活状况。事后，伍锐麟著有《三水河口疍民生活状况之调查》，在《岭南学报》第五卷第二期发表。抗战胜利后，伍锐麟将该报告加以修改，易名为《三水疍民调查》，1948年由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作为专刊甲集第二种出版。1937年该校教师冯乐继续调查了广州的疍民。1936年10月，岭南大学西南社会调查所由伍锐麟率领研究员及调查员四人对广东

<sup>①</sup> 岭南大学：《社会研究所沙南调查所结束》，载《私立岭南大学校报周刊》，第六卷，1932（5）。

省的从化县进行了农村社会调查。除对县城进行调查外，自1937年1月起，以大江浦乡为个案研究区域，对全村农户一一调查。此次调查，由黄彰汉主持、冯乐进行协助、周信铭进行指导。调查前后历时半年余<sup>①</sup>。此外，岭南大学社会研究所还进行了广州市郊的旧凤凰村的调查、华侨调查等实地考察。

罗香林曾致力于对广东北江等地客家文化的调查。他于1932年到广东省北部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并在30年代初向广东、广西等地的客家研究专家致函，搜集各地客家的情形等资料。1933年，写成了《客家研究导论》，由广州兴宁山书出版。此外，还编辑刊印了《客家史料丛刊》。徐松石在桂、湘、黔等地调查了壮族、苗族、瑶族等民族，以后发表了《粤江流域人民史》、《泰族僮族粤族考》等著作。

杨成志在1932年去法国学习之前，除对云南、四川的彝族等民族的开创性调查外，曾到海南岛对黎族进行了两个月的调查，到韶关考查过瑶族，在广州和海丰考察过疍民<sup>②</sup>。

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1931—1932年聘请了德国人类学家史图博为特约研究员。1931年7月，史图博到海南岛对黎族、苗族等民族进行调查，为时近两个月；次年，他第二次前往海南岛进行调查。他的调查以文化方面为主，也包括体质内容。调查之后，写成巨著《海南岛民族志》，在德国出版。

1934年春，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山东大学生物学系、两广地质调查所等机构，合组海南生物科学考察团，分动物学、植物

<sup>①</sup> 岭南大学：《西南社会调查所消息》，载《岭南大学校报》，第九卷，1937（19）。

<sup>②</sup> 杨成志：《我对云南民族罗罗族研究的计划》，载《禹贡半月刊》，第一卷，1934（4）。

学、人种学、地质学四组。中国科学社编辑兼图书馆馆长刘咸，得中央研究院人类学组资助，率人类学组在海南深入黎族聚居地区，调查两月余，除测量 300 余名黎族同胞外，对民情风俗、生活习惯、精神文化、物质文明，均有调查与观察，并采集黎族人民的食、衣、住、行、安、乐等方面的各种民物标本 200 余件<sup>①</sup>。刘咸根据调查资料，先后写成系列论文《海南岛黎人刻木为信之研究》<sup>②</sup>、《海南岛黎人文身之研究》<sup>③</sup>、《海南岛黎人口琴之研究》<sup>④</sup>、《海南岛黎人起源之初步探讨》<sup>⑤</sup>、《亚洲狗祖传说考》<sup>⑥</sup>、《海南岛黎人面具考》<sup>⑦</sup>等。从报告中可见他对黎族的民间艺术和信仰、传说等方面的调查尤为细致。

杨成志早年对海南岛的黎族进行过调查。1937 年他又与伍锐麟等组织了岭南大学与中山大学合作的对海南岛的黎族、苗族的调查。这次调查，是南方大学系统进行的较大规模的民族学田野调查。调查由岭南大学西南社会调查所和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合作组成，伍锐麟、何元炯代表岭南大学，代表中山学者为杨成志、王兴瑞，中山大学在校研究生江应樑自费参加。此外，参加者还有广州三星电影社职员邝光林。调查分为两组，杨成志等为甲组，调查时间一个月；王兴瑞、何元炯为乙组，调查时间四个月。调查自 1937 年 2 月开始，杨

① 刘咸：《海南岛黎人文身之研究》，载《科学》，第十九卷，1936(12)。

② 刘咸：《海南岛黎人刻木为信之研究》，载《民族学研究集刊》，第一辑，1935。

③ 刘咸：《海南岛黎人文身之研究》，载《科学》，第十九卷，1936(12)。

④ 刘咸：《海南岛黎人口琴之研究》，载《民族学研究集刊》，第二辑，1940。

⑤ 刘咸：《海南岛黎人起源之初步探讨》，载《西南研究》，1940(1)。

⑥ 刘咸：《亚洲狗祖传说考》，载《华西文化研究所集刊》，第一卷，1941。

⑦ 刘咸：《海南岛黎人面具考》，载《华西文化研究所集刊》，第二卷，1942。

成志等人到达五指山地区后，3月中旬即返回广州。王兴瑞、何元炯两人则留在黎族地区继续调查，一直延续到1937年6月<sup>①</sup>。此次调查不仅搜集到黎族、苗族民间用品多种，拍摄了数百张照片，而且“为使社会上明了黎族、苗族实际生活及本团工作起见”，还请广州三星电影社派员拍摄了电影片<sup>②</sup>。

1936年11月，杨成志带领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生王兴瑞、江应樑及该校文学院史学系学生罗比宁、李秋云、刘伟民、宋兆联等八人，到广东省曲江、乐昌、汝源三县的瑶族聚居的山区进行调查，事后写成《广东北江瑶人调查报告专号》，分别对广东瑶族的体质类型、历史、经济生活、农作情况、宗教信仰、房屋、工具、衣饰、传说与歌谣等进行叙述和讨论<sup>③</sup>。1937年5月，岭南大学与美国地理学会合组桂北科学考察团，中山大学的杨成志教授担任该团民族组的主任，负责民族学的田野工作，研究瑶族的风俗习惯<sup>④</sup>。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的江应樑等人，也参加了这次调查。

徐益棠于1935年赶到广西南宁参加六团体年会之际，入广西大藤山瑶族聚居区进行实地调查，虽然为时不长，但调查内容相当细致而全面。以后，他陆续将调查结果整理成文发

① 参见《岭南人学校报》编：《海南黎苗考察团消息》，分载于《岭南大学校报》，第九卷，1937（12、13、17）。

② 参见《民俗》编：《私立岭南大学西南社会调查所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海南岛黎苗考察团组织经过》，载《民俗》，第一卷，1937（3）。

③ 参见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编：《广东北江瑶人调查报告》，载《民俗》，第一卷，1937（3）。

④ 参见岭南大学：《桂北科学考察团消息》，载《岭南大学校报》，第九卷，1937（26）。

表，如《广西象平间瑶民的经济生活》<sup>①</sup>、《广西象平间瑶民之生死习俗》<sup>②</sup>、《广西象平间瑶民之房屋》<sup>③</sup>、《广西象平间瑶民之法律》<sup>④</sup>、《广西象平间瑶民之占卜符咒与禁忌》<sup>⑤</sup>、《广西象平间瑶民之宗教及其宗教的文献》<sup>⑥</sup>等。

1935年暑假，费孝通与新婚妻子王同惠赴广西大瑶山进行瑶族调查。王同惠负责社会组织方面，先后在象县东南乡（今属金秀县六巷乡）的六巷、古陈村等地进行调查，调查集中在家庭、亲属、村落和族团等方面。费孝通则分访各村，主要进行体质测量。实地调查近两个月后，是年12月16日转移调查区域时，费孝通和王同惠迷路，费孝通受伤，王同惠出林呼救，不慎跌入山谷遇难。她是中国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考察研究的第一位女子，却又不幸成为中国民族学界在田野调查中死难的第一人。费孝通根据王同惠调查的遗稿，编写成《花蓝瑶社会组织》一书，由商务印书馆于1936年出版。体质调查的材料当时未来得及分析研究，1946年，因李闻事件，费孝通仓促离滇，这些材料在云南遗失了，未能整理出版<sup>⑦</sup>。

1933年5月初，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凌纯声、助理员芮逸夫、技术员勇士衡，前往湘西南的常德、桃

① 徐益棠：《广西象平间瑶民的经济生活》，载《地理学报》，第四卷，1937。

② 徐益棠：《广西象平间瑶民之生死习俗》，载《金陵学报》，第八卷，1938（2）。

③ 徐益棠：《广西象平间瑶民之房屋》，载《金陵学报》，第十卷，1940。

④ 徐益棠：《广西象平间瑶民之法律》，载《边政公论》，第一卷，1941（1）。

⑤ 徐益棠：《广西象平间瑶民之占卜符咒与禁忌》，载《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二卷，1941。

⑥ 徐益棠：《广西象平间瑶民之宗教及其宗教的文献》，载《边疆研究论丛》，民国三十年卷，1942。

⑦ 参见费孝通：《学历简述》，载《中国当代社会家》，第3辑，1版，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

源、沅陵、泸溪、古丈、永绥、乾城、凤凰、麻阳、芷江、黔阳、洪江、武岗等地，考察苗族、瑶族诸民族生活状况及社会情形，实际调查集中于湘西的凤凰、乾城、永绥三县边境地区。同年8月1日返回南京，调查共历时三个月。在地方人士的帮助下，调查人员日夜分工合作，凌纯声负责苗族地区的地理和苗族的生活、习俗、鼓、舞等方面的研究；芮逸夫负责语言、歌谣、故事的搜集和研究；勇士衡专事照相、拍摄电影和绘图。在调查之后，当地部分少数民族代表向蒙藏委员会致函，指责凌纯声等人“以苗俗古陋，多方采集，制成影片，以为谈笑之资、娱乐之具、谋利之用”<sup>①</sup>。针对这种指责，凌纯声等解释时指出，这种看法纯系误会，是不明了科学研究的性质所致。“科学的目的在于求真，欲知苗族生活之真相，非借标本影片不足以表显。多方采购标本，及摄制影片，正所以求其真，而保存其文化之特质也”<sup>②</sup>。不过，目前尚不知道当时拍摄的电影片如今的下落。尽管当时人们不可能充分估量影视在人类学资料记录过程中的作用与意义，但根据现有材料看，这却是中国民族学家运用活动影视手段记录民族学资料的最早记录。如果谈到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出现，其标尺应当定在此时。民族学调查中运用新的影视手段以保存民族学资料，表现调查对象的文化状况，在中国民族学发展史中是一种新的尝试。事后，又由石启贵等进行补充调查，丰富了调查成果。凌纯声、芮逸夫的调查结果于1939年整理为《湘西苗族调查报

① 石青阳：《致蔡元培函》，载《中央研究院档案》393—280。

② 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致石青阳签函》，载《中央研究院档案》393—280。

告》，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sup>①</sup>。

#### 四、对西南地区的调查

1934年10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研究员凌纯声、编辑员陶云逵、技术员赵至诚、勇士衡去云南作民族调查。他们分为两路，凌纯声、勇士衡为一路，主要在南至河口、麻栗坡、蒙自、金平，西至大理、腾冲、泸水，北至鹤庆、丽江、维西等地区调查，任务是考察边疆民族生活状况及社会情形；陶云逵、赵至诚为另一路，调查区域为东南至麻栗坡、河口，南至普洱、澜沧，西至腾冲、泸水，北至兰坪、丽江、维西，任务为考察边疆人种及语言。调查对象包括摆夷（傣族）、麽些（纳西族）、倮倮（彝族）、倮黑（拉祜族）、倮倮、卡多（哈尼族）、扑拉（彝族支系）、茶山（景颇族）、崩龙（德昂族）、阿佤（佤族）等。调查注意了采用先进仪器设备，利用当时已有的先进手段进行田野调查，以更为全面地搜集资料。两组调查者都携带一些进口设备，凌纯声等携带有电影摄影机、照相机、测高仪等；陶云逵等则准备了人体、面部、头部测量尺、眼色表、皮色表、发色表、照相机、录音机等。调查时间也比较长，凌纯声至1936年6月才回到南京<sup>②</sup>。1936—1937年，勇士衡又对云南的部分民族进行了补充调查。在调查的基础上，凌纯声进行了滇、缅边界的阿佤山的佤族研

<sup>①</sup> 参见：a. 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致文书处签》，载《中央研究院档案》393—280；b. 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

<sup>②</sup> 参见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致外交部公函》，载《中央研究院档案》393—6。

究，并与芮逸夫合作进行了滇、缅南段未定界内之民族研究；陶云逵进行了傣傣族文化和傣族体质、生育婚丧等方面的研究；芮逸夫进行了拉祜族的经济生活、记傣傣语音兼论所谓傣傣文等项的研究<sup>①</sup>。

在华西协和大学任教的美国人葛维汉（D.C.Graham）教授，对四川等地的苗族和羌族等民族有较多的研究，他也到西南诸民族聚居地区进行了实地调查，在抗战前他重点调查的区域及其族群有川南的苗族和川西的羌民。

四川大学的教授胡鉴民于1936年在四川西部理番、汶川一带进行了羌族调查。

1936年至1937年初，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马长寿等人，对四川的雷波、美姑、竹核、昭觉等地的彝族和茂县、汶县、理县、松潘等地的羌族、藏族等进行了实地调查，除了解文化各方面的情况外，他们还设法搜集了许多实物资料。

中国西部科学院于1934年春组织了雷马峨眉考察团，研究人员全部都是生物和地质方面的研究人员。自1934年5月至11月，到大、小凉山地区进行以生物（包括植物、动物）、地质方面为主的调查，也包括“夷务调查”一项。其报告《四川省雷马峨眉调查记》，也对彝族社会阶层、生活、语言文字、历法、分布状况及对彝族地区的统治方略等情况作了描述<sup>②</sup>。

1935年，民族学家、历史学家方国瑜，也参加了中、英会勘滇、缅边界南段未定界，对滇西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周历

<sup>①</sup> 参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报告》，载《中央研究院档案》393—1373。

<sup>②</sup> 参见常隆庆、施怀仁、俞德浚：《四川省雷马峨眉调查记》，载《中国西部科学院特刊》，中国西部科学院雷马峨眉考察团印，1935。



傣族、拉祜族、佤族聚居地区。次年回到昆明后在云南大学任教。据此次调查资料写成《滇西边区考察记》、《旅边杂著》和《界务交涉纪要》等著作<sup>①</sup>。

在云南车里（今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傣族聚居地区生活的李佛一在当地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调查，并写成了全面介绍当地情况的《车里》一书，于1933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第十章“民俗”包括11个部分，详述了饮食、衣饰、房屋、婚姻、丧葬、生计、养育、蓄发、纹身、染齿、穿耳、天足、医药、岁时、姓名、集市等方面的情况；第六章“民族”、第九章“宗教”、第十一章“政治”等也都记述了不少傣族和周围其他民族的文化方面的资料。

彝族军官曲木藏尧自幼生活在彝族聚居地区，熟悉本民族的文化，到外地学习之后，又回到彝族聚居区生活、工作。他系统地考察了彝族的生活、风俗、社会组织、文化、物产等方面的内容，编成了《西南夷族考察记》一书，于1933年由南京拔提书店出版。

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调查还包括当时被人们视为“探险”的一些考察活动。1934年春，庄学本对四川西北、青海南部和西康北部地区的藏族和羌族进行了调查，历经艰险，前后历时六个月<sup>②</sup>。

除了上述对诸地区的各民族的文化项目进行调查之外，一些学者开始在中国进行少数民族的体质人类学调查。当时许多学者在民族学调查时，都兼顾到体质调查，把体质的调查与文化调查结合起来，以求搞清中国各民族的体质特点，发现各民

<sup>①</sup> 方国瑜：《滇西边区考察记》，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印，1~2页，1943。

<sup>②</sup> 参见庄学本：《羌戎考察记》，1~3页，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1937。

族的体质差异和相同之处。中央研究院的历次调查中，体质方面都占有重要地位，陶云逵在云南的调查就是以体质方面为主要内容的，凌纯声等人的湘西的苗族的调查、东北的赫哲族的调查都有体质调查的项目。费孝通在瑶族聚居的山区调查时，主要进行的是体质方面的测量。

除史图博、刘咸等在海南的调查中包括体质人类学方面的内容外，1932年春，由中央研究院聘请、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派遣、广州中山大学协助，北平协和医学院的许文生（Paul H. Stevenson）博士与罗香林一起到粤北进行体质人类学的调查，又在广州作人体测量。随后，许氏到海南岛，对黎族进行体质测量的调查。他所调查的民族包括福建的畲族、客家人、广东的疍民和黎族等<sup>①</sup>。

在民族学的田野工作中，许多民族学家注意到了语言材料的搜集和分析。芮逸夫在对滇、缅南段未定界诸民族进行调查时，记录了耿马地区使用的傣族语文材料，然后从语音上加以分析，并与西方传教士创制的傣字母加以比较<sup>②</sup>。

从学科起步之初就强调并进行较为广泛而深入的民族学的田野调查，为中国民族学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奠定了一个较坚实的基础，对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产生了很大影响。广泛性，首先体现在空间上，调查地域较为广泛，涉及东北、华北、华东、华南、西南诸地。调查范围的广阔是广泛性另一方面的表现，从调查所涉及的内容上看，不仅包括了物质

① 参见：a. 罗香林：《海南黎人源出越族考》，载《青年中国季刊》，“创刊号”，1939；b. 中央研究院文书处：《国立中央研究院二十年度总报告》，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印，1932。

② 参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二十九年度至三十年度工作报告》，载《中央研究院档案》393—1373。

文化、精神文化的各方面，也包括了历史发展线索的追寻、体质测量乃至考古的验证。深入性，则主要表现在所注意和探讨的问题上，许多学者在调查中提出的问题较为具体，避免了一般化、表面化的现象。田野工作，为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培养和锻炼了一批研究骨干，这些研究者不仅在欧美和国内的大学书斋中学习了西方的民族学理论，而且通过调查尝试将理论与中国各民族的实际材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只有本国学者在本土上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田野调查，民族学才可能具有自己的特点。因蔡元培等人的倡导，这些第一批从事田野调查的学者在学术实践中形成了重视田野研究的优良传统，影响了几代人，为以后中国民族学的发展提供了不断的动力。

## 第二节 中国民族学会的建立及其活动

在中国民族学研究团体建立之前，包括许多民族学家在内的社会学界，在 20 世纪 20 年代即开始组织了社会学学术团体。1922 年，余天休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社会学会，但参加者不多，出版有会刊《社会学杂志》。1928 年，孙本文、吴泽霖、吴景超等人发起、建立了东南社会学会，该会的会刊是《社会学刊》。中国社会学社于 1930 年 5 月在上海成立，并召开了第一次年会。因为许多民族学家与会，蔡元培在会上发表的讲演题目是“社会学与民族学”，他对民族学与社会学两个学科的关系作了说明，介绍了中央研究院的民族学家们已经进行的研究工作。

原东南社会学会的会刊《社会学刊》自第二卷起，改由中国社会学社编辑、孙本文任主编，成为该社的主要刊物。在中国社会学社中，有许多一身兼社会学与民族学二任的民族学家参加，通过社会学学术团体的活动，这些民族学家们相互之间也有了更多的交流。在此前后，国内也建立了其他一些研究边疆及其民族、文化的团体。清华大学于1928年建立了边疆研究会，朱希祖、罗香林均为发起人。

随着在国内开展的民族学调查和研究活动的日益频繁，面对中国浩繁的民族文化，成立有关机构、加强民族学家间的联络、实现全国民族学研究的整体协调，越来越有必要。由凌纯声、邱长康、徐益棠、孙本文、何联奎、胡鉴民、卫惠林、黄文山等人发起，1934年夏召开了中国民族学会筹备会。并致函海内外民族学家，如在上海的蔡元培、在北京的杨堃及当时在法国留学的杨成志等，请他们加入中国民族学会<sup>①</sup>。学者们经过讨论拟定了中国民族学会的简章草案，简章草案中提出中国民族学会的宗旨是“研究中国民族及其文化”。并规定了学会的五项任务：搜集民族文化的实物，调查中国民族及其文化，研究中华民族及其文化，讨论中国各民族及其文化问题，编辑刊物与丛书<sup>②</sup>。中国民族学会筹备会还拟定了一个较为简短的民族文化调查问卷，以供讨论修正。

1934年12月16日，中国民族学会在南京中央大学中山院举行成立大会，由何联奎报告筹备经过。学会共有会员33

① 中华社会科学社：《中国民族学会之发起》，载《新社会科学季刊》，第一卷，1934（2）。

② 中国民族学会：《中国民族学会简章草案》，载《新社会科学季刊》，第一卷，1934（2）。

人<sup>①</sup>，实行理监事制，推选何联奎、黄文山、孙本文、商承祖、徐益棠、胡鉴民、吴定良为理事，蔡元培、杨堃、刘国钧为监事，吴文藻、何联奎、杨成志、刘威、杨堃、吴定良、凌纯声、商承祖、黄文山为出版委员会委员。在此次会议上决定出版学会的刊物《民族学报》，但由于经费等问题，终未能如愿。

中国民族学会的成立，是中国民族学家们由各自的单兵作战自觉地向集体研究和调查过渡的努力的结果。中国民族学会成立后，云集了国内的一流专家，一些有较多学者参与的活动得以进行，民族学理论和方法的交流更方便了，会员之间的信息互通使调查研究中能够避免重复，使调查成果能够更快地为人们运用，使研究论著可以更多地面世。中国民族学会以理监事制的方式组成学会领导机构，会员不多，但均具有相当高的专业学历和取得显著的学术成就，这表明学会具有职业学术团体的特色。在学会中，并无绝对的领导人，只是在南京的学者从事学会的工作更多一些，对学会自然地产生更多的影响。

中国民族学会的成立，对于民族学学科在中国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有些学者在研究社会学史的时候，将一个国家有无全国性的专业研究学术团体作为学科成长或成熟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中国民族学会成立这件事本身，更重要的意义正是在于标志着中国民族学学科的成熟度，说明民族学在中国已经有了初步的发展，民族学在中国由学科的创建发展到学术研

<sup>①</sup> 中国民族学会最初时会员人数说法不一，徐益棠在《十年来之中国民族学会》（1944年）一文中，提及中国民族学会曾刊行会员录，并附中国民族学会章程和职员名单。但搜检资料，未得见。在《七年来之中国民族学会》（徐益棠，1942年a）一文中曾有33人之说，当依据此会员录。但不久后，他在《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徐益棠，1942年b）一文中，又改说有40余名会员。他的这种修改不知是否有依据。故仍取前说。

究气氛的初步形成。

1935年12月16日，中国民族学会在南京新街口国际饭店召开第一届年会。除全体会员出席外，到中国讲学的拉德克利夫·布朗教授到会发表题为“社会人类学最近之发展”的演讲，引起与会者的热烈讨论，在当时学术界影响颇大。以学会的形式整体地面对国外学术界领先水平的学者，反映了当时的学者们与国外的同行交流和对话的热切愿望。会后，中国民族学会会员集体加入了“中国学术团体联合会”。

1936年12月21日，中国民族学会第二届年会于南京德奥瑞同学会举行。这次会议重点讨论了人类学的有关问题和筹办《民族学报》的工作，推举徐益棠为编辑，增补了若干编委会成员，计划于次年内出版该刊第一期，但亦未能如愿。在会上，欧阳翥、吴定良、陈定閔宣读了各自的论文，其中有不少创建性的观点。其他会员宣读论文者亦“颇为踊跃，很足收‘以文会友’之效”<sup>①</sup>。

1933年，在上海由孙科等人创设的中山文化教育馆的研究范围较广，该馆民族学组由黄文山、卫惠林主持。由于经费相对充裕，于1936年开始编辑出版《民族学研究集刊》。中国民族学会全体会员担任特约撰稿人，许多会员在此刊上发表了文章，或多或少地弥补了中国民族学会未能出版学会刊物的缺憾。该刊登载了当时中国民族学的许多重要的文章，成为中国民族学早期发展史中的一份专业化的核心学术期刊。

中国民族学家们在此期间也参加了一些国际人类学、民族学的学术交流活动。除中央研究院和各院校邀请国外专家讲

<sup>①</sup> 黄文山：《中国民族学会第二届年会演辞》，载《广东日报》，“民族学刊”，1948（3）。

学、参加共同研究外，早在1931年，在英国留学的刘咸作为中国代表出席了国际人类学会。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函要求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社会科学研究所将有关人类学的出版物转交刘咸，以为学术交流之用<sup>①</sup>。在此前后，刘咸还参加了史前考古学国际学术会议。

1934年，由英国皇家人类学研究院召集，在伦敦举行第一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50余国的数百名专家参加了大会，在欧洲学习和从事研究的中国学者吴定良、杨成志、欧阳翥出席了会议，并各自提交了论文，得到了与会代表的较好评价。会上，中国学者李济等人还被推选为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会理事。

但是，由于经费的限制，出席这些国际会议的中国代表多为国外留学者。在中国民族学会成立之后，没有能够派出学会集体代表作为学术团体代表团与会，中国民族学会作为中国民族学家的学术团体在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中未能得到应有的地位，学会在当时的国际民族学界扩大影响的愿望未能实现。

### 第三节 民族学的研究机构和 民族学的教学活动

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是迄20世纪30年代中

<sup>①</sup> 中央研究院文书处：《国立中央研究院二十年度总报告》，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印，1932。

期中国最主要的民族学研究机构。其间曾有将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与历史语言研究所合并的提议，并任命傅斯年、李济兼任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正、副所长。规划中，将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民族学组与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组并入合并后的研究所第三组，但实际上未能按此办法执行<sup>①</sup>。1934年，社会科学研究所与北平社会调查所合并后，民族学、人类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划归该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第四组。中央研究院原打算聘吴定良为统计学方面的研究员，但他自欧洲返回后，加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民族学组随后改名为人类学组，由吴定良任此组的主任，从而加强了体质人类学的研究，使体质和文化并重。

各大学先后设立的社会学系、人类学系、边政学系也是重要的民族学的科研机构，同时它们还承担了民族学的主要的教学工作。社会学系虽然是以社会学的教学、科研为主，但也包含了民族学、人类学的部分内容。

华北地区的院校系统的民族学教学和研究机构集中在北京，以燕京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等校为主。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25年改为社会学与社会服务系，曾任该系教授的有步济时、许仕廉、陶孟和、朱友渔、杨开道、吴文藻、赵承信、严景耀、雷洁琼、林耀华等。抗战前出版有《社会学界》十卷，当余天休的《社会学杂志》一度停办后，该刊担负起社会学杂志的使命，成为当时中国社会学界的著名刊物之一，其中刊载的文章对西方民族学理论有较多的介绍。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建立于1926年，但没有招生和开课。

<sup>①</sup>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致中央研究院院长呈》，载《中央研究院档案》393—1373。



1928年改为社会学与人类学系。1930年增聘教授，招收新生。当时该系的建系方针是：一方面注重目前的社会问题的研究，一方面从事古代文化的探索。认为人类学的主旨即在研究古代社会。该系主任先后是陈达、潘光旦、吴泽霖（代理）。曾在该系任教授的有陈达、吴景超、潘光旦、史禄国、李景汉、吴泽霖、李树青、陈序经、陶云逵等<sup>①</sup>。清华大学文科研究院社会学及人类学部建立于1933年，其间曾培养出唯一的一名研究生，即由史禄国教授指导的费孝通<sup>②</sup>。抗战初期该系一度为西南联大历史社会学系之一部。1940年5月，又分建了社会学系。

辅仁大学于1929年建立了社会经济学系，此系学生于三年级时分社会学、经济学两组。1943年分建社会学系和经济学系。最初该系全由法、德、奥等国的民族学家任教授，以后有少数中国学者任教。曾在社会学系任教授的有雷冕、杨堃等。该校出版《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辅仁学志》两种杂志和《华裔学志专刊丛书》（*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等，刊载一些人类学、民族学方面的论文。

此外，在华北地区，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文学院于1930年设研究所，内有民俗学组，出版了《礼俗半月刊》杂志；由原北洋政府外交部俄文法政专门学校改设的国立北平大学商学院设有边政学系；中法大学孔德学院本科设有社会科学系<sup>③</sup>；山

① 参见：罗家伦《整顿校务之经过》，载《国立清华大学校刊》，1928（12）；陈达《社会学及人类学系现况》，载《清华周刊》，第四十一卷，“向导专号”，清华大学印，1936。

② 清华大学：《清华大学一览》，清华大学印，1937。

③ 李文海：《北平学术机关指南》，北平图书馆协会印，1933，88-92页、277页、310页。

东齐鲁大学设有历史社会学系，以后曾改称为社会学系。

华东地区的院校系统的民族学教学和研究工作单位主要有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沪江大学和大夏大学。

中央大学社会学系成立于1927年。系内有孙本文、黄文山、朱亦松、游嘉德、杨开道、祝世康、吴景超、龚贤明、许仕廉、胡鉴民、刘渠、胡体乾等知名教授，全系学程分为社会学理论、历史社会学、社会研究法、社会问题、社会心理学五组。在抗战前，除有关课程中的有关社会组织、社会起源、社会变迁等涉及民族学知识外，主要旨趣在社会学理论与方法，曾开展南京棚户调查、乞丐调查、游民调查等实地调查研究。

在金陵大学社会学系先后任教的，有柯象峰、徐益棠、卫惠林、孙本文、胡鉴民、马长寿、张少微、周信铭、陈文仙、薛汤铭新、史迈士等。1934年该系设置了边疆史地讲座，成为抗战前国内大学中开设民族学专门课程最多的校系之一。抗战中又于1941年在社会学系中添设边疆社会组，由徐益棠任该组主任，卫惠林、许致志、马长寿等先后担任教员。金陵大学于1930年得到美国“白镍大王”霍尔（Hall）捐资的哈佛燕京学社研究经费资助，建立中国文化研究所。该所以研究及阐明本国文化之意义、培养研究本国文化之专门人才、促进本校文学院的发展、对本国文化之学程和本校师生研究中国文化提供便利为宗旨，由徐养秋、刘乃敬、贝德士、李小缘和吴景超为执行委员会委员<sup>①</sup>。以后，金陵大学又设立了文科研究所社会学部，后改为文学院社会研究所<sup>②</sup>。

沪江大学的葛学溥、韦爱伦、金伯铭、钱振亚、金武周、

<sup>①</sup> 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近况》，载《金陵大学校刊》，1932（75）。

<sup>②</sup> 金陵大学：《私立金陵大学要览》，金陵大学印，1947。

张镜予、仇子同、张春江等曾在社会学系任教授，该系虽以培养社会学和社会工作者为主，然而也有一些学生从事民族学研究。如许烺光于1933年在沪江大学毕业后，曾在燕京大学学习，后考取庚款公费留学，赴英国师从马凌诺夫斯基学习社会人类学，以后成为国际著名的民族学家，曾担任过美国人类学学会的会长。

大夏大学社会学系是1928年建立的，吴泽霖、岑家梧、张少微、陈国钧、章复等曾在该系任教。1931年，在该系成立社会学研究室；1934年开设边疆问题讲座，聘请专家担任演讲。但该系在上海时期的调查和研究多属于社会学的课题，如进行了望亭镇的社会生活调查、上海船户的调查、太湖盆地蚕丝产销情况的调查、设置大夏公社、开创大夏民众教育实验区等。他们的民族学调查研究，是抗战时迁至贵阳以后开始得到加强的。

华东地区的光华大学、复旦大学、东吴大学也都设有社会学系。1940年，东吴大学社会学系分为社会学普通组、社会工作组、社会教育组三个组<sup>①</sup>。社会教育学院设有社会教育行政学系和社会事业行政学系，1941年春季在社会事业行政学系增设了礼俗行政组。江苏省立教育学院设有社会教育学系。中国公学（后改为中国大学）在1927年就已经建立了社会学系，1928年改为史学社会学系<sup>②</sup>。

在华南地区，主要的民族学教学和研究机构设在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内。

<sup>①</sup> 国民政府教育部：《全国公私立专科以上学校一览表》，载《教育部档案》5—2034。

<sup>②</sup> 中国公学：《中公己巳级毕业纪念刊》，中国公学印，1929。

中山大学 1931 年设立社会学系，何思敬、周谷城、胡体乾、邓初民、肖隽英、龙冠海、刘渠等曾任该系教授。该系“注重中国社会之研究，近代（社会）史的研究。其治学方法，一、二年级重基本理论之实习，三、四年级注重实际问题及专家学说之探讨”<sup>①</sup>。但在中山大学有关民族学方面的调查研究较有成绩的是该校语言历史研究所。1928 年建立的这个研究所对于推动中国民族学学科的建立曾起到了重要作用。1932 年，该所改称文史研究所，归属文学院。1935 年春，中山大学成立了研究院，该所又改为文科研究所，其中的民俗学组以杨成志、钟敬文等为主要骨干，“应用民俗学的方法，整理传说，以发现本国各时代各地方之民俗为宗旨”<sup>②</sup>。该所研究的范围分为民间文艺、音乐、民间风俗、民间信仰、民间物产、民间商品、民间工艺、民间节令、民间游戏九类。

1930 年，厦门大学文科改为文学院，社会学系与历史系分开；1934 年，两系又再次合并，称历史社会学系，内分两组。抗战爆发后，该校的历史社会学系改称历史学系，复员之后，亦再无社会学系之设。曾在厦门大学担任社会学、人类学课程讲授的有徐声金、史禄国、林惠祥、张镜予（睿）、李式金、林幽等。

岭南大学社会学系于 1927 年就已经建立，但当时仅有一名教师。以后改为社会科学系，其中包括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在该系任教的先后有包令留、伍锐麟、黄翠凤、陈序经、周信铭、岑家梧、罗致平、黄延毓、何格恩等。1932 年春，

<sup>①</sup> 中山大学文学院：《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概览》，中山大学文学院印，1933。

<sup>②</sup> 参见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国立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各组简章》，转引自梁山等著《中山大学校史》，1 版，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35。

在该系附设社会研究所，人员由本系教员及留校的学生组成，目的是为了促进及实施南中国之社会调查，对于社会研究之理论亦甚注重<sup>①</sup>。

设在福州的福建协和学院，设有历史社会学系，内有社会学科，开设人类学及人种学、民俗学等课程<sup>②</sup>。

广东省立文理学院设有社会教育学系。

广西大学 1936 年设立社会学系，由施复亮任主任，一年后改为专修科。

抗战之前，西南地区的华西协和大学和四川大学是当地的主要的民族学教学和研究机构。

四川大学 1931 年改为国立之后，虽然没有设立民族学或相关学系，但文学院课程齐全，有人类学、人种学、中国民族史、西南民族研究、中国殖边史、社会进化史等课程。法学院的政治经济系也开设边疆问题、社会学等课程。胡鉴民在抗战前就到该校担任教授。1935 年秋，该校设立西南社会科学研究处，分人文与社会科学两组，就四川省及西南边境之经济及民俗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冯汉骥、赵人隽为人文组研究指导员，研究西南地区的民族，搜罗蜀中文献，考察蜀中金石古物<sup>③</sup>。

设在重庆的四川省立教育学院，设有社会教育学系。

抗战时期，贵州大学文理学院设有社会学系。

在华中地区，社会学或民族学教学在 20 世纪前半期较为

① 参见岭南大学：《私立岭南大学概况》，岭南大学印，1934。

② 参见福建协和学院：《私立福建协和学院一览》，福建协和学院印，1934。

③ 参见四川大学校史编写组：《四川大学校史稿》，1 版，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5。

薄弱，但在武昌的华中大学文学院中也设有历史社会学系。

湖北省立教育学院设有社会教育学系。

据 1939—1941 年间统计，全国共有 16 所公立、私立大学（学院）设有社会学系。另外有两所大学设有历史社会学系，四所大学设有社会教育学系，一所大学设社会经济学系，一所学院分别设社会教育行政学系、社会事业行政学系<sup>①</sup>。

国内大学的社会学系大多数开设有关于民族学（或称为文化人类学）的课程。厦门大学历史社会学系（社会组）课程纲要中就列有社会基础、社会变迁、社会起源、社会进化、人类起源、民俗学等与民族学有关的课程<sup>②</sup>。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在拉德克利夫·布朗访华前后，开设有吴文藻讲授的社会人类学、家族制度和赵承信讲授的社区调查、比较社会学、社会学研究班等学程<sup>③</sup>。清华大学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系开设有普通人类学、社会研究法人门、家庭演化、初民社会等课程。其中的初民社会一课由史禄国讲授，以史氏亲自调查过的北方通古斯族为例讨论初民社会的简单组织，以便与其他民族作比较研究<sup>④</sup>。抗战时设立的金陵大学边疆社会组开设的课程有民族学大纲（或称民族学）、边疆地理及人文地理（或设边疆史地通论）、中国民族、西南边疆、西北边疆、东北边疆等课

① 此项统计是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编制的《全国公私立专科以上学校一览表》（载《教育部档案》5—2034 和《教育部档案》5—2035）的资料计算出来的。

② 参见厦门大学：《私立厦门大学文学院一览（民国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度）》，厦门大学印，1935。

③ 参见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燕京大学社会学及服务系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二六年度概况》，载《社会学界》，第九卷，1936。

④ 参见清华大学：《清华大学一览》，清华大学印，1937。

程<sup>①</sup>。抗战之后，类似的课程在各校更为普遍。

上述诸课程均为较为典型的民族学（文化人类学）课程，许多课程在体系上较为全面，尽管课时量并不算多，但基本上是从学科结构出发而考虑课程设置的，在课程的内容上也体现了当时世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如吴文藻的社会人类学课程为社会学系主修学生必修课程，该课程“从社区着眼，以求了解中国之边疆民族及其社会文化；附带注意部落社区与乡村社区之对比”<sup>②</sup>。具体内容包括导言与背景、文化的分析、文化的综合、文化的研究法等。

由于社会学系开设的课程中许多都是由国外引进的，一些大学，特别是教会学校，在社会学系中使用外国原版教材者较其他文科系为多。尽管外文教材多选取国外的民族学名著，有利于更直接地吸收国际学术的养分，减少了与国际学术界的差异，但这类教材一是距离中国的实际太远，二是读者面小，影响了民族学的广泛传播。因而，从一开始，一些大学教师就试图编写符合本校学生要求、适合中国实际情况、包括中国民族学资料的教材。厦门大学历史社会学系社会学科使用自编教材，1928—1929年度，就在社会学原理、社会起源、社会进化、社会调查、家庭研究等有关民族学的课程教学中，都使用该教授自编的教学大纲，并制定参考书<sup>③</sup>。林惠祥用各国有关材料编译成《文化人类学》一书，作为大学教材，1934年

① 参见金陵大学：a. 《文学院社会学系边疆社会组概况》，载《金陵大学校刊》，1943（318）；b. 金陵大学《本校边疆研究经费教育部准予增加补助》，载《金陵大学校刊》，1944（334）。

② 《社会学界》编：《燕京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服务系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度概况》，载《社会学界》，第九卷，1936。

③ 厦门大学：《厦门大学文科布告（1928—1929年）》，厦门大学印，1929。

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作者将文化人类学分为物质文化、社会组织、宗教、艺术、语言文字五部分，以包容文化人类学的各种材料，又以人类学总论作为导言，并加了文化人类学略史一篇，以说明各种重要原则及学派。

教育部自1934年起，拨出专款，在金陵大学、西北大学、云南大学、大夏大学、复旦大学等校设立了边疆的史、地的讲座。到1948年，由教育部补贴设置边疆讲座的院校仍有金陵大学、云南大学、西北大学等六所<sup>①</sup>。

在当时的民族学教学中，许多中国最早的民族学家将培养专业人才作为重点工作。除了请外国专家讲学，派学生到国外学习之外，他们曾尝试引进和创造了一些改进教学效果的措施。各高校普遍实行学分制，各种学术报告较为活跃，学生除听讲外，也参加对学术报告的讨论。燕京大学等校的社会学系，在许多高年级课程中采用讨论课程或讨论班的形式进行教学。吴文藻在牛津、剑桥等大学考察时，特别注意其导师制教育，他还请牛津大学的专家到燕京大学法学院讲课和个别指导学生；在他的倡导下，燕京大学法学院自1938年秋开始正式施行导师制。在高年级学生中选拔优秀生，参加导师制的学习。英国专家林迈可(Michael Lindsay)等到燕京大学担任导师。当时也有一些中国教师担任导师。实行导师制的专业主要是政治、经济。

在课堂学习之外，师生的社团活动也较为活跃。各校的社会学会等各种学术团体多数由社会学系的师生共同组织，许多以学生为主，教师参与指导工作。学术团体经常组织学术讨论会和讲演会，有些还出版了学术论文集、学术刊物和研究生活

<sup>①</sup> 国民政府教育部：《中华民国三十七年下半年度教育部工作计划》，教育部印，1948。



与文学方面的刊物。

当时由于各校学生人数较少，同专业的学生更少，各校学生都较为重视校际交流。在抗战期间，昆明的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常常跨校听课，成都华西坝诸教会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也跨校听课。教师同时兼多校课程的情况就更普遍了。

除了本科教育外，当时也进行了民族学方面更高人才的培养，通过研究生教育和派遣留学生两个渠道，增加了一批高级研究人才。尽管中央研究院作为全国最高研究机构，有时也招收少数研究生，但中央研究院的主要目的是“供给专门学者以精研之地，不偏重在招收研究生”，所以，“大学的研究院着重在招收大学毕业生，与以深造的机会”<sup>①</sup>，在研究生培养方面的贡献更大。20世纪前半期由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和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毕业的研究生中，许多人都成为颇具影响的学者。

各高校社会学系多数较为重视实地调查，特别是30年代以后，学生经常参加各种类型的考察。在抗战之前，虽然许多学校的实地调查侧重于社会学方面，民族学的田野调查占的比例较小，但也已经成为一些学生的自觉选择。许多教师也注意要求学生联系中国实际进行学习和调查研究。抗日战争爆发后，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在平郊村的调查研究中，由系主任赵承信领导三、四年级同学每星期下乡二至三次，由当地人作向导，逐户拜访，并编制表格，记录日记，搜集实地资料<sup>②</sup>。

<sup>①</sup> 蔡元培：《中央研究院与中央大学联合招待国民会议代表的大会欢迎词》，载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1版，北京，中华书局，1985。

<sup>②</sup>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系近十年概况》，载《燕京社会科学》，第一卷，1948。

除学校组织的集体调查研究外，也积极鼓励学生利用假期进行调查。燕京大学学生陈礼颂在校期间选修了吴文藻开设的家庭学课程，他对潮州村落社区的宗族问题产生了兴趣，“全是吴师文藻循循善诱之功，并承他介绍葛（学溥）氏一书所引起的”，吴文藻“早就知道笔者（陈礼颂）籍隶潮州澄海县，同时又素知潮州宗族色彩浓厚，故此他便极力鼓励笔者趁返乡度假之便，不妨利用机会试做一次初步的调查研究”<sup>①</sup>。

在实地调查经历中，一些学业成绩突出，特别是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较强的学生成长起来了。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人类学组的研究生王兴瑞和江应樑是中山和岭南两大学合作的海南黎苗调查的主要成员；在学生时代，费孝通、林耀华、李有义、杨庆堃等也都经历了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的实践锻炼。抗战爆发后，大批学校迁到西部之后，将民族学课堂教学和实地调查结合起来，在校学生普遍参加各种形式的田野调查，进一步完善了教学环节，增强了教学效果，使学生能够全面掌握民族学知识和调查、研究的方法。

培养中国自己的民族学家，是中国民族学得以发展的基础。有一支能够进行独立研究、有中国特色的研究队伍，才能够有中国自己的民族学。各大学的社会学系、人类学系和边政学系在培养人才方面都做出了许多努力。其中，成就最为显著的当数燕京大学和中山大学。

吴文藻认为，要实现民族学中国化，就必须有具有中国特有的研究风格的“独立的科学人才”，将很大精力花在培养民族学专业队伍上。他主张在对国外民族学的最新理论的充分理

<sup>①</sup> 参见陈礼颂：《1949年前潮州宗族村落社区的研究》，1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解和掌握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进行研究。为了使能够领悟国外民族学的最新知识，采取了请进来、派出去的办法。多次聘请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民族学家、社会学家到燕京大学讲学。除请美国芝加哥社会学派的代表人物派克和英国功能学派的创始人拉德克利夫·布朗讲学<sup>①</sup>外，1936—1937年间请美国密执安大学教授怀特（L. White）作长期讲学，以人类学及方法论为讲题。还曾计划请当时在国际人类学界已经显露头角的美国耶鲁大学人类学系人类学家萨皮尔（E. Sapir）、哈佛大学阿伦斯伯格（C. M. Arensberg）和英国伦敦大学人类学家弗思（R. Firth）等前来讲学，后因七七事变而计划中断。

吴文藻还对学习比较突出的本科生和硕士学位研究生进行重点培养。抗战爆发前他认为国内教学力量不足，于是将一些学生送出国，随当时国际著名的专家学习。如安排李安宅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人类学系跟博厄斯的弟子克娄伯（A. L. Kroeber）和罗维（R. H. Lowie）学习，后又到耶鲁大学人类学系随萨皮尔学习；派林耀华到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攻读博士学位；让费孝通先在清华大学随史禄国学习，又推荐他到英国伦敦经济学院随马凌诺夫斯基攻读博士学位；送黄迪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推荐瞿同祖、冯家升随美国著名学者魏特福学习。杨庆堃、杨懋春等人也是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后出国深造的。

吴文藻继承和发展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重视实地调查的传统，经常派学生到各地进行实地调查，如派徐雍舜到北平附近的洪县调查乡村领袖的冲突，派林耀华回福建调查莆田的宗族社会，派黄华节调查定县的礼俗和社会组织，派黄迪在清河实

<sup>①</sup> 有关情况详见本书第五章第三节。

验区调查村镇社区，派郑安伦去福建考察侨民，派李有义到山西徐沟上郭村考察社会组织，推荐陈永龄去新疆教书并进行调查，安排李有义到拉萨研究藏族社会等。通过系统的、有步骤的教学安排，再加上对中国社会、民族与文化所作的实地调查和研究，吴文藻和他的学生们构成了一个有学术特点的民族学学术梯队。

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人类学组招收和培养了一批人类学专业的研究生。早在中山大学初建语言历史研究所时，就拟招收人类学、民物学方面的研究生。但实际上，直到1932年才招收了最早的一届人类学研究生，到广州解放时为止共招收了九名，毕业七名，他们是王兴瑞、江应樑、梁钊韬、王启澍、吕燕华、曾昭璇、容观复、刘孝瑜、张寿祺。其中容观复于1949年转学到美国的德克萨斯大学人类学系研究所继续深造，张寿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接分配工作。杨成志作为人类学组主任，对这个研究队伍的建设贡献尤为显著，他曾经为研究生开设了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史前考古学等课程。黄文山开设过文化学体系，卫惠林讲工艺学和民俗学两门课程，胡肇椿讲授考古学和博物馆学，朱谦之、罗香林等也曾担任人类学组的指导教师。杨成志主要讲授的是博厄斯历史学派的内容，但是也不排斥其他学派的意见，他的许多学生受进化学派的影响较大<sup>①</sup>。

由于吴文藻、杨成志在培养民族学人才方面的突出贡献，使得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民族学的学术阵营中在华南和华北形成了两支较为整齐、在学术活动中较为活跃的队伍。这两支队伍的带头人也因此在中国民族学界中享有很高威望，得到了

<sup>①</sup> 1992年容观复先生口述，王建民记录稿，未刊。

学术界同仁的尊敬。

#### 第四节 民族文物的搜集和整理

与民族学专业建设有关的民族文物或民族学、人类学器物和本标本的搜集、整理，在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史中始终占有重要的位置。中央研究院的文物搜集和研究是较早的，他们的历次边疆民族调查都包含有搜集文物的任务。“标本之采集为民族学组重要工作之一。因标本不但可供组内职员之研究，将来搜集既多，便可成立民族学博物馆，以供外界人士之参观，而为社会教育之一助也。”<sup>①</sup> 1929年该所已经有广西的瑶族、台湾的高山族、四川的彝族的文物标本三类近200种，以后又增加了赫哲族等民族的文物标本。在该所第四组附设有民族学标本陈列室。虽因战乱而有遗失，到1948年，民族学组历次调查搜集的文物共计仍有1500余件<sup>②</sup>。

1929年，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就已经计划将在中国陆续采集的民族学标本重复物品与其他国家的民族学博物院（如德国汉堡民族学博物院）交换，以期建立一座民族学博物

<sup>①</sup> 参见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十八年度报告》，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十八年度总报告》，中央研究院印，1930。

<sup>②</sup> 参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概况》，载《中央研究院档案》393—2636。

馆。同时，还聘蔡元培留学时的同学、德国的著名民族学专家但采尔博士（Dr. Danzel）为专任研究员，并请他代为搜集非洲、大洋洲、美洲的民族及非洲、美洲古代民族的文物标本<sup>①</sup>。但采尔于1931年9月到该所工作，带来许多民族学标本，计134种，又另有图表120幅、各民族照片28幅，陈列出四橱展品<sup>②</sup>。民族学组改归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后，民族学陈列室的标本移交历史语言研究所。

厦门大学是在建设中国民族学博物馆方面贡献最大的单位之一，其最主要的领导者当数林惠祥。早年，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曾经搜集多种文物，存于生物学院古物陈列室。国学研究院停办以后，各种古物划归文科管理。1930年，厦门大学曾委托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派往台湾考察高山族文化的特派员林惠祥代采高山族文物数十种，以后在南洋及国内陆续搜集人类学及民间风俗品多种。1933年秋，古物陈列室改名为文化陈列所，英译名则为民族学博物馆（Ethnological Museum），由郑德坤教授负责。藏品中的第二部为人类学部，内分“台湾番（高山）族”的文物标本、其他（南洋、西藏）和民俗三部，除残品外共有276件<sup>③</sup>。1934年，林惠祥和新加坡督学陈育崧发起筹办厦门人类学陈列所，供厦大历史社会系特别应用，并提供其他院系参考。当时有武器、服饰、艺术品、宗教品、器具、舟车模型、住所模型、史前遗物和图表九类，除图

① 参见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十八年度报告》，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十八年度总报告》，中央研究院印，1930。

② 参见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二十年度报告》，载《国立中央研究院二十年度总报告》，中央研究院印，1932。

③ 参见厦门大学：《文学院概况》，载《厦大周刊》，第十三卷，1934（19）。

表外有标本 214 种 300 余件。1936 年 6 月，该馆曾与厦大文化陈列所合作为厦大历史学会举办展览会<sup>①</sup>。日本侵华时，林惠祥避难南洋，仍多方搜集文物。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冒着生命危险，保护所收藏的人类学标本。1947 年 11 月，林惠祥重回厦门大学主办人类学标本展览会，展品包括史前遗物、历史时代古物和民族学标本<sup>②</sup>。翌年，林惠祥和庄为玘等厦门大学历史系师生在南安县发现诸多史前遗物和历史文物，如石铤、古砖、陶片、石刻、石雕等<sup>③</sup>。正是由于林惠祥等人对民族学博物馆建设的贡献，如今在厦门大学才得以保留下一所国内最大规模的人类博物馆。

1931 年，吴泽霖在大夏大学开辟了社会学研究室，“专事搜集各种实际材料及调查图表，以供同学之研究”<sup>④</sup>。其中即有图腾模型及原始民族用具。1937 年 4 月，他代表中国社会学社参加国民政府行政院主持的京滇公路周览团，沿途了解边疆民族的实际情况，同时在皖、赣、湘、黔、滇、川等省搜集各种文物，并拍摄风光习俗照片百余幅，在回沪后，举办了一个公开展览<sup>⑤</sup>。到贵阳后，吴泽霖和他的同事在进行民族学调查的同时，也着力于各民族文物的搜集，到 1942 年，共征集

① 参见厦门大学：《文化陈列所概况》，载《厦大校刊》，第一卷，1937（12）。

② 参见厦门大学：《本校历史系举办人类学标本展览会》，载《厦大校刊》，第三卷，1947（12）。

③ 参见星光日报记者：《厦大泉州访古团在南安县发现史前遗物》，载《星光日报》，1948—08—08。

④ 参见大夏大学：《社会学研究室消息》，载《大夏周报》，第九卷，1933（20）。

⑤ 参见大夏大学：《展览京滇公路周览文物》，载《大夏周报》，第十三卷，1937（20）。

了苗族等民族的文物 1 000 余件。1941 年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苗夷文物陈列室”。1941—1942 年初，曾在贵阳举办了三次民族文物展览<sup>①</sup>。费孝通高度评价了吴泽霖对建设民族博物馆的贡献，认为“吴泽霖先生一生中作出卓越贡献的专业是我国少数民族博物馆事业”，“少数民族的文物能在博物馆中取得应有的地位，据我所知，是从吴泽霖先生开始的”，“他到哪儿，民博事业也就到哪儿”<sup>②</sup>。吴泽霖于 1941 年到昆明西南联大任教，他在云南组织了一批人到各地进行调查，并征集民族文物，在清华大学驻昆明办事处公开展览。以后，这批文物被带到清华大学人类学系，存放于该系文物陈列室。吴泽霖还说服了清华大学校长，以重金收购了抗战胜利后从台湾运回的高山族文物。

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也是搜集民族文物颇有成绩的单位。自 1919 年该校博物馆建立后，即注意民族学资料的搜集。1932 年，该校在原博物部的基础之上成立博物馆，由葛维汉担任馆长。此后即加强了对中国西部古物及边疆各民族器物的搜集。至 1936 年，该馆已搜集了 3 400 多件藏族、苗族、羌族、彝族等民族的文物，参观者每年平均约有 8 000 人。1941 年郑德坤继任馆长，改良馆内陈列，确定以研究边疆问题为中心，筹备成立研究室，以后又聘请冯汉骥、闻宥（闻在宥）等共商馆务。该馆历来重视在民族文物方面的搜集、整理和研究，藏品益加丰富。在该博物馆中有古物艺术品、边民文物和西藏标本三类藏品共三万余件。边民文物以苗族、羌族、彝族

① 参见陈国钧：《大夏大学社会研究工作部工作述要》，载吴泽霖、陈国钧等著《贵州苗夷社会研究》，贵阳，文通书局，1942。

② 费孝通：《在人生的天平上（代序）》，载吴泽霖著《美国人对黑人犹太人和东方人的态度》，1 版，1～6 页，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



等民族的文物最为丰富，包括日常用具、武器、乐器、宗教器物、民族文字文献等诸多种类，且多为精品，仅苗族挑花工艺品就有 800 多件。还有西南的其他民族和国外的其他民族的部分文物。西藏标本有喇嘛教的器物和藏族人民的日常生活用品、乐器、酒器、装饰品等，是当时搜集西藏文物最多的单位。华西大学边疆研究所等研究机构依托该博物馆进行西南民族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sup>①</sup>。

岭南大学博物馆早在 1929 年就已经分出人类学器物一类，至 30 年代，分为自然博物、人类方物、古物美术三部，其中人类方物部收集 18 类，藏品已达 580 件，包括东南亚各国、美洲印第安人、非洲、秘鲁、朝鲜等地的文物和西藏、两广及各省的文物和工艺品<sup>②</sup>。

1922 年 2 月，广州市在越秀山一带举行展览会，其中古物馆陈列有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考古学会收藏的彝文经典八册，民俗馆有自中山大学和岭南大学借来的各种民族学文物标本，还有专门搜集到的蛋民风俗物品等。中山大学文史研究所也由杨成志等人从云南的彝族聚居地区和广西的瑶族聚居的山区搜集到了许多民族学标本<sup>③</sup>。

南开大学文学院边疆人文研究室在 1942—1943 年间，曾在云南的红河流域和澜沧江流域调查时搜集了傣族的贝叶经、服饰等，只是由于战乱，又没有专门的保存机构，除少数贝叶

① 参见华西协和大学校史编委会：《华西医科大学校史（1910—1985 年）》，1 版，43 页、80 页、162 页、163 页，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

② 参见岭南大学：《私立岭南大学概况》，岭南大学印，1934。

③ 参见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文史学界消息》，载《国立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月刊》，第一卷，1933（2）。

经外，其余文物遗失殆尽<sup>①</sup>。

抗日战争后期，云南省民政厅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制定了“征集边疆文物办法”。此“办法”规定宜征集的文物范围较广，包括：汉文的图书、刊物、报纸、画册、照片、地图和少数民族文字的经典、报纸、字典、史籍、故事等印刷品；各少数民族的衣饰类：衣服、靴、鞋、筒裙、帽、包头巾、羊毛披毡（有的民族称察耳窝）、腰带、背心、披肩及其他饰物、首饰（耳环、手镯、戒指、银钮等）、特殊饰物（藤圈、海贝、缨络）等；用具及工艺品类：猎具（弓、弩、刀、矛等）、农具（如木制的锄、犁等）、食具（如木碗、木盘、杓、竹编食盒等）、乐具（葫芦笙、口琴、象脚鼓、大钹、喇叭等）、工艺品（刺绣、织剪、羊毛制品、竹木制品）等其他少数民族自制或特殊的用品；宗教用品类：（佛像及其图腾代表、宗教绘画、献神装饰品（佛伞、佛幡、佛幔及其他祭神用品等）、其他特殊宗教品（如铜鼓、孔明灯、赎佛用品和各种材料制成的狮、象等）。另有物产标本和古物、金石拓片等。并规定所有征集到的文物都要填写统一的类卡，写明汉名、当地人所用名、采集地、采集时间、所使用或制造的民族、采集人与捐赠人等项，以便进行整理。

吴定良到浙江大学之后，积极搜集有关民族学方面的文物。1948年12月，浙江大学人类学系曾举行了台湾高山族文物展览，展品分别为丁惠康、庄学本的私人藏品，其中一部分由丁氏捐赠该系<sup>②</sup>。是年秋，该系还建立了标本陈列室，分为

<sup>①</sup> 1995年黎国彬口述，王建民记录，未刊。

<sup>②</sup> 参见浙江大学：《人类学系举行台湾高山族文物展览》，载《国立中山大学日刊》“复刊号”，1948（93）。

人类学和民族学两个部门，民族学部藏有高山族、苗族、仡佬族、布依族、彝族等民族的服饰、器具 2 000 多件，还有其他国内外民族的标本等<sup>①</sup>。

另外，一些高等院校也设有各种陈列室，其中也有部分民族学实物资料。如金陵大学徐益棠等人也搜集了藏族、彝族、瑶族、羌族等民族的文物数百种。暨南大学海外文化事业部 1937 年曾计划建立一个南洋博物室，并开始极力搜集各种南洋标本，其中包括新几内亚人的武器、用具、服饰等和越南等地华侨的文物<sup>②</sup>。

国民政府教育部曾经有筹备设立边疆文物馆之议，曾经拟定了筹备纲要，组织了筹备委员会，征集了文物，并在 1941 年 12 月假中央图书馆举办了为期五天的边疆文物展览<sup>③</sup>。一些民族学家曾多次呼吁建立国立边疆文化教育馆，其中计划建立的陈列部“至少应具有外国、各省市所设立之地方博物馆及法国民族学博物馆之雏形”，以期担负进行语言实验、提供研究资料 and 开展民众教育等功能<sup>④</sup>。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了国立边疆文化教育馆，也曾设法搜集边疆文物。

① 参见竺可桢：《拟成立人类学研究所呈》，载《浙江教育档案》531—569。

② 参见暨南大学：《海外事业部标本目录》，载《暨南校刊》，1937（213）。

③ 参见国民政府教育部蒙藏教育司：《边疆教育概况》，教育部蒙藏教育司印，1943。

④ 参见徐益棠：《试拟国立边地文化教育馆组织人纲》，载《边政公论》，第一卷，1942（5、6）。

## 第五节 民族学的调查方法与全国 风俗调查的设计筹备

随着民族学研究的发展，在调查方法和手段上人们有了更多的追求。除许多学者在各自的调查中注重方法的改进之外，也有人开始思考在更大范围内实行大规模的民族学调查。

凌纯声曾留学于法国巴黎大学，师从莫斯等学者学习人类学和民族学，1929年获博士学位，当年回国后即担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由于他在法国接受了法国学者的系统训练，特别是受讲究不厌其烦的细致调查的影响，且在调查中考虑到较多文化方面的描述，因而除进行调查实践外，对民族学的调查从理论到参考提纲也有更多的考虑。1934年，他根据五次实地调查的经验，并参考了国外的有关著作，编写了专题论文《民族学实地调查方法》（1936年发表）。该文反映了他对民族学田野调查的认识。他认为：“作游记式的民族调查工作是很容易的，然要彻底明了土人的习俗和思想并能详细而精密记载调查的结果，则非注意方法不可。”他在文中对考察涉及的原则、方法及应当注意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认为：“低级文化的民族具体方面的语言和思想常常是很发达的，而关于抽象方面的名词便很稀少”；“半开化的民族对于各事物的分类，和我们所习惯的大不相同；……他们对于宇宙间事物

的排列范畴是和我们不一致的”。因此，他主张“假使问题的范围有发生别解的可能，我们应当用土人的名词”；“不可忽视那土人自愿述说的话”，“假使他所说的是很晦涩而不易了解则尤妙，这支路可以领你到意见完全新鲜而未曾想到的事情，而你的本路仅能引到一部分已经明了而可预测的地点”。尽管他并没有提出主位和客位的概念，但从行文的论述中，可见对于主位研究角度有一定程度的认识。

报道人和翻译者在调查中的作用受到凌纯声的注意。他指出：“假使这翻译人是你所考察的土人之一，其中的危险是：他常会用他的意见来替代那被问者所答的话”；“假使他是别族的人，其中的危险是：他常会用他自己的文化的日光来传达一切，而不能字字准确了。”

凌纯声强调调查提纲的重要性，特别指出：“实地调查时无论有没有经验，调查的问题表格必需携带……初次赴实地调查比较稳健些还是多依据问题表格，后来实地调查经验增加，尽可增损活用。”<sup>①</sup>

通过数年对各地不同类型的各种文化的多次调查，凌纯声在调查中逐渐积累和修正了调查问题提纲。他编写的《民族调查表格》于1935年由中央研究院印行。该表格分23类，内容广泛，共计842个问题。以后，又将此稿发表于《民族学研究集刊》第一辑。《民族调查表格》包括较为全面的关于民族文化的各方面问题，反映了作者对民族文化的研究、中国民族学的研究总体计划的基本看法，是中国民族学家们在理论与方法上进行实践和总结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当时民族学的田野调查的准备阶段拟定调查提纲时中文资料的缺乏。《民族

<sup>①</sup> 凌纯声：《民族学实地调查方法》，载《民族学研究集刊》，第一辑，1936。

调查表格》是学习法国民族学派的研究方法，并加上了作者体会的民族学调查提纲，基本上具备了作为研究者参考的民族学调查提纲通常所应有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完备性。

这个民族学问题调查提纲的基本特点，是力图求全。23类中有地理与统计、住处与设备、饮食、装饰与发饰、人工改造身体、衣服、武器、狩猎、渔业、畜牧、农业、嗜好品、玩具、游戏运动、音乐、交通器具、贸易、钱之代替品、度量衡、技术、政治情形、司法及社会情形、婚姻、妇女地位、小孩、生与死、宗教祭祀及神话、图腾、医药、时间、计算、天文、历史计数及算数等。除上述题目外，对其他方面的如民族人口等问题，也有考虑。然而，为了追求全面，在不同类间的重复、过于繁琐、偏于猎奇之处亦不鲜见。重复之例，如“216，箭之制法，有羽毛否”与“221，详细说明箭尾羽毛，或他种定向方式”大致相同；过于繁琐之例，如“167，有将小儿之鼻或头颅因美观起见，或他种原因改造或压扁之风俗否”、“168，其所用之方法，系采用积极抑消极之手段”，然而，后面仍然有九个问题从各种角度不厌其烦地提及头颅改造问题；“124，阴毛及腋下毛如何处置之”等则是偏于猎奇的代表，且难以得到调查结果。

几年之后，柯象峰在讨论民族学研究方法时，也对调查提纲颇为注重，他叙述了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出版的《人类学札记及询问要览》、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的《文化资料大纲》和马凌诺夫斯基的《文化论》中的主要调查项目或表格，并提出以上各家和威斯勒、凌纯声等人的调查项目中均有可以参考之处。为了适用于调查中国边疆诸民族，虽然不应当有对于学术研究的限制，但为了统筹全局，以资比较，更应当综合名家所提示，及中国学者的实际调查之经验，更应当拟定一个统一的通

用的研究项目表<sup>①</sup>。

1937年国民政府内政部组织了全国风俗简易调查。这次调查以充实我国社会科学之内容、供给我国社会政策法规之参考、完成我国民俗调查之初步工作为目的。凌纯声、卫惠林、徐益棠、柯象峰、孙本文等民族学家参加筹划，凌纯声、卫惠林、徐益棠还担任了内政部礼俗司聘请的专家组成的全国风俗普查委员会委员。

调查分为三步，即准备期、征求意见期和调查与整理期，前两期各为六个月，调查计划用时一年，整理需六个月至一年，整个计划初定三年完成。在准备期，首先假定文化区域。因为我国幅员辽阔，普查不易，于是选样调查，以求简易，本着科学方法规定各区域的代表区域。同时编订调查手册、制订调查表格、汇编调查人员名册。调查表格分为详细和简单两种，前者用于委托学术机关调查，后者分发各地方政府和中小学及社会教育机关调查使用。由专家学者负策划、设计之责，学界人士任实地调查之劳，通力合作。调查计划的设计，突破了以往国内民族学调查中的研究者个人考察的局限，试图以较大规模的系统调查来搜集全面的风俗资料，以利于专家的进一步深入研究。除民俗调查项目外，也兼及社会调查，对于风俗变迁和初民风俗等也加以注意。

全国风俗调查问题表格分别由凌纯声、卫惠林、徐益棠负责起草，最后由卫惠林整理统一。调查项目包括生活习惯、社会组织、人生礼俗、岁时风俗、职业制度、宗教迷信、神话故事和道德观念与制裁。该调查问题表格也力求完备，仅生活习

<sup>①</sup> 参见柯象峰：《中国边疆研究计划与方法之商榷》，载《边政公论》，第一卷，1941（1）。

惯类，就包括饮食、居住、旅行、卫生与疗养、游戏与娱乐六个部分，共 129 个问题。调查问题表格拟出初稿后，征求各方面意见，完善定稿。然后将拟定调查人员训练班的章程及课程，招集全国各县负责办理民众教育的人员到南京，进行知识及技术上的训练，以期协助调查及整理工作。其后才是实地调查，调查后再由专家进行整理。

由于日本侵华，这次设计颇为精细的调查未能按原计划进行。卫惠林带着他撰写的那部分未修改完毕的调查问题，转移到西部，在战乱中完成了部分整理工作。凌纯声和徐益棠两人起草的文稿则没有带出南京。卫惠林负责起草的“生活习惯”部分于 1944 年在成都出版的《中国民族学会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得以载人。不过，我们可以由这次活动的设计与筹划中，看到中国民族学发展中的一些想法。调查拟定者试图通过广泛调查，更多地了解中国各民族的风俗，取得更多、更全面的资料，以充实以往较为短缺的研究内容。由于参加调查的人员较多、规模较大，而且打算经过培训，在专业学者的指导之下进行调查，无疑将有利于学术知识的普及。全国风俗简易调查是中国民族学发展的产物，调查的规划反映了中国民族学家试图将民族学进一步推广、拓展民族学的研究范围并寻求学术应用的意愿。然而，由于原定的计划未能全面开展，在 20 世纪前半期中国很少组织较大的集体研究的情况下，这种试图利用调查表的普及调查弥补缺少大规模民族学调查之缺憾的设想，却终无验证的机会了。



## 第七章

###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民族学的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是 20 世纪前半期中国民族学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这种进展特别表现在广泛而深入的田野工作的进行，在研究队伍、研究成果的质量和数量等方面都有了可喜的变化。

#### 第一节 民族学的研究机构和 人员向西部的转移

抗战开始后，原来集中在东部地区的民族学研究机构和各

大学向西部地区转移。抗战期间，中国的大部分民族学研究机构内迁至西南地区。研究机构分布格局的变化必然对中国民族学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民族学家们较为集中的城市依次是昆明、重庆、成都、贵阳等。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于1938年秋迁至昆明北郊的龙泉镇，次年恢复工作。该所的人类学组在昆明的工作，对于该处成为抗战时期的民族学研究基地产生了重要作用。1940年8月，又奉令向四川转移，到年底才全部到达南溪县的李庄，至次年1月，全部恢复了工作，并使李庄也逐渐成为抗战时期的重要的民族学研究基地之一。人类学组在抗战时编印出版了《人类学集刊》杂志。

昆明以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为主要研究机关。

清华、北大、南开先成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4月，迁到昆明，组建了西南联合大学。文科初设历史社会学系；1940年夏，分为历史学系和社会学系，社会学系是以原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为中心组成，改隶法商学院，是重要的民族学、社会学研究机构。清华大学研究院于1944年12月恢复社会学研究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包括有人类学部分，该所招收的部分民族学方面的研究生聘请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凌纯声等为导师，让学生到李庄受教。西南联大的其他系也开设了与民族学有关的课程。

南开大学迁到昆明后，成为西南联大的一部分。由于处于西南边疆地区，1942年该校计划以边疆人文作为研究范围，开展实地调查，推进边疆的教育工作。恰好此时云南省打算修筑石屏到佛海的铁路，通过缪云台的帮助，得到石佛铁路建设经费的资助，成立了边疆人文研究室，由陶云逵担任研究室主任，该室研究人员有邢庆兰（公畹）、高华年、黎国彬、黎宗

献、赖才澄<sup>①</sup>。该研究室的主要实地研究计划包括：社区人口调查和主要群体及各种杂居群体之分布及其人口状况，物产及自然环境与社会人文环境的调查，主要群体的文化概况（包括亲族组织、社会团结型式、政治制度、经济与技术方式、法律机构、教育制度、宗教与语言、衣食住用等物质生活），主要群体与社区内少数群体及区外邻近的他语群体的社会关系、他语群体对主要群体在生活等各方面之影响。同时，边疆人文研究室还进行了边疆教育的专门调查与研究，其中涉及了教育的制度、内容、人们对于教育的反应、改进教育的可能策略与途径等<sup>②</sup>。抗战期间，该室出版有油印的杂志《边疆人文》三卷共18期和《语言人类学专刊》，刊登本室人员的研究成果和外约的稿件。

云南大学的民族学研究工作是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帮助下发展起来的，是当时中国民族学界的一支新军。1938年秋，吴文藻到昆明，在云南大学建立社会学系。1939年，在洛克非勒基金会资助下，吴文藻代表燕京大学在云南大学建立了云南大学—燕京大学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sup>③</sup>。1940年昆明遭日本飞机轰炸，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迁到昆明附近的呈贡，住在一个三层楼的魁星阁。吴文藻1940年到重庆任职后，由费孝通接任站长。先后在该站工作且为专职的有张之毅、田汝康、谷苞、史国衡、王康等，兼职研究者有林耀华、李有义、许烺光、瞿同祖、胡庆钧、张宗颖等。1943—1944年费孝通赴

① 1995年黎国彬讲述，王建民记录稿，未刊。

② 参见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南开大学文学院边疆人文研究室研究计划与工作步骤》，载《边疆人文》，第四卷，1947（合刊）。

③ 费孝通等人的回忆中又称之为社会学研究室，后同。

美期间，许烺光曾代理站长。云南大学还建立了方国瑜等参加的西南文化研究室，并出版有“国立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丛书”。

抗日战争时期，云南省政府曾经邀请在云南和邻近省份工作的著名学者进行学术演讲，其中也包括一些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潘光旦讲“抗战后的民族健康”、吴文藻讲“社会行政设计与社会行政”、费孝通讲“中国乡村工业之特质及其前途”、李景汉讲“社会调查与社会建设”、李树青讲“社会之筛”、许烺光讲“变戏法与人生观”。事后，由云南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将讲演稿汇编成册，于1944年刊印。

重庆以中央大学为中心，中央大学于1938年迁到重庆。1944年中央大学边政学系设立，设蒙古族、维吾尔族、西藏文史三个组，除开设一般的人类学、民族学和语言学课程外，主要探讨中国边疆各民族的历史、文化和语言。中山文化教育馆、乡村建设学院等单位也在战时迁到重庆。同时，还有一批从政的民族学家战时在重庆任职，如黄文山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工作，吴景超在经济部，吴文藻在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等，凌纯声则在抗战后期到国民政府教育部任职。

成都战前就没有华西协和大学，内有边疆学会的组织。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大学于1938年2月迁到成都，齐鲁大学医学院也迁到这里。燕京大学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于1942年夏迁至成都。华西坝是成都的民族学研究中心，甚至被有些人视为当时中国民族学的中心之一。抗战时期，中国民族学会曾委托在成都的会员处理日常事务，燕京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和华西协和大学五所教会大学均在原华西协和大学的校址上课。所以，在蓉会员实际上也都集中在华西坝，因而，华西坝就被视为当然的民族学基地。当时，这

里出版的关于民族和边疆的期刊杂志最多，居住在此处的民族学家最集中，学术活动最活跃。金陵大学社会学系边疆社会教研室的徐益棠等编印了《边疆研究通讯》，于1942年1月创刊，逢双月出版。此外还出版了署名由中国民族学会（成都）编辑的《西南边疆》、《边疆研究周刊》等杂志。燕京大学1942年迁到成都后，最初由华西协和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李安宅兼理系务。1943年以后，由林耀华担任系主任。关瑞梧、周励秋、廖泰初、徐益棠、徐雍舜等都在成都燕京大学分校任教<sup>①</sup>。

李安宅于1941年到华西协和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授，他创建了华西边疆文化研究所，并组织出版了《中国边疆》杂志。于式玉、玉文华等先后到该所工作。这个研究所以“研究华西边疆，并造就是项服务及教学人才，以谋华西边疆之改进为宗旨”<sup>②</sup>。分为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两组，曾打算在松潘、理县、茂汶以北以西设立工作站。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建立于1940年秋，由闻宥担任主任，刘咸、颜间、韩儒林、杨汉先等为研究员。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39年迁到四川后继续工作，先后由顾颉刚、钱穆、吴金鼎主持。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由李小缘主持，继续在蓉工作，编辑有《边疆研究论丛》杂志。1941年为了更好地聚合力量，华西大学与齐鲁大学、金陵大学于同年合组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包括中国文学、中国历史和语言、中国艺术和边疆问题，出版《中国文化研究所

<sup>①</sup> 参见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系近十年概况》，载《燕京社会科学》，第一卷，1948。

<sup>②</sup> 华西边疆文化研究所：《华西边疆文化研究所章程草案》，载《华西大学档案》，719页。

集刊》和《中国文化研究汇刊》(*Bulletin of Chinese Studies*)<sup>①</sup>。燕京大学迁蓉后，自1943年起也参加了这个研究所的工作。

四川大学在抗战时曾一度迁往峨眉，该校的社会科学研究处人文组继续进行西南民族研究等工作。抗战后期，该校迁回成都，加强了与其他民族学研究较为活跃的院校的合作。

贵阳则有大夏大学为主要研究机构。大夏大学由上海迁至贵阳后，社会学系仍由吴泽霖教授主持，于1938年春建立社会经济调查室，隶属于文学院，亦由吴泽霖主持。一年后，为促进工作效能、充实研究内容和设备，将该室改名为社会研究部，“从事进行有系统之调查与研究，以冀促成贵州社会建设之事业”。“特别着重黔省境内苗夷生活之实地调查工作”。抗战期间在贵州的调查研究活动十分活跃。他们编辑了以《贵州晨报》副刊出版的《社会旬刊》，每旬出版，共出40期，后因日本空袭、报社被毁而停刊。继而又假《贵州日报》出版《社会研究》半月刊，出55期之后，又转到《时事导报》出版。他们还将有关论文编成《民族学论文集》第一辑和《贵州苗夷社会研究》两书，公开出版。

其他大学也有一部分内迁到西部地区或华南山区。广州中山大学于1938年迁至云南的澄江，1940年又转移到广东的坪石。岭南大学抗战期间先迁到香港，以后又先后迁往广东的曲江、梅县。抗战时期厦门大学迁到闽西长汀，暨南大学迁到福建建阳，武汉大学迁至四川乐山，武昌华中大学迁至云南，复旦大学迁到重庆北碚。西北大学迁到陕西城固，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也迁至城固，并与西北大学等校合组西北联大；1944年

<sup>①</sup> 参见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文化研究所草拟计划》，载《华西大学档案》，719页。

该校建立边政学系，由王文萱教授担任系主任，杨兆钧、郑安伦任副教授。该系成立了边政学会，并举办“边政问题十讲”等讲座，讲题有“新疆十四个民族”、“新疆中苏国界问题”、“边疆之婚姻”、“拉卜楞——西北的一个宗教中心”等，出版有《边疆文化》杂志<sup>①</sup>。

日军的入侵使大批教学研究机构被迫迁到西部地区，客观上使得民族学在中国的分布地域上大大延伸了。以往的民族学研究的最好田野工作基地所在地没有专门的民族学研究机构缺陷得到了弥补，为中国民族学的一个新高潮的到来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中国民族学会的团体活动虽然在抗战期间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由于西部地区成为后方，全国对边疆问题更加重视，国民党中央在边疆施政纲要中提出：“设置边政研究机关，敦请专家，搜集资料，研究计划边疆建设问题，以贡献政府参考，并以提倡边疆建设之兴趣”<sup>②</sup>。经过不长时间的筹备，1941年9月成立了隶属于蒙藏委员会的中国边政学会，由吴忠信信任理事长，其中有一些民族学家参加，吴文藻为理事兼研究主任，徐益棠为候补理事，以后递补为理事<sup>③</sup>。

此外，抗战时成立于重庆的中国边疆问题研究会，也将对

① 参见西北大学校史编写组：《西北大学校史稿》，1版，127~128页，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

② 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主席团：《关于加强国内各民族及宗族间之融洽团结以达成抗战胜利建国成功目的之施政纲要》，载《边政公论》，第一卷，1941（1）。

③ 参见边政公论社：《中国边政学会成立》，载《边政公论》，第一卷，1941（3、4期合刊）。

边疆的实际状况之调查作为其工作范围的第一项内容<sup>①</sup>。这类团体还有设在重庆的中国边疆学会等。虽然这些团体与官方联系较为密切，但他们也直接组织了一些有关民族学的学术调查和研究的活功，如1942年边政学会拟定了研究西藏问题、出版边政丛书等项计划，并邀请在重庆的民族学专家吴泽霖、吴景超、柯象峰、李景汉等人座谈，讨论边疆研究等问题<sup>②</sup>。同时，边政学会还为各专门机构的民族学调查研究提供了许多方便，出版有《边政公论》杂志（最初由蒙藏委员会编辑发行）；该刊是抗日战争时期重要的民族学刊物，所以台湾重新影印此杂志时，以《中国边疆民族学杂志》之名出版。蒙藏委员会还编辑出版有《边疆通讯》、《蒙藏月报》等刊物。中国边疆学会总会在重庆出版了《中国边疆》杂志，该会的陕西分会分别在西安和榆林出版了《边疆月刊》和《边疆周刊》，四川分会出版有《边疆周刊》。这些学术团体这些方面的工作，对民族学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发展颇有裨益。

① 参见中国边疆问题研究会：《本会工作范围》，载《会务通讯》，中国边疆问题研究会印，1945—10—01。

② 参见《边政公论》社编：《中国边政学会召开第二次理监事会议》，载《边政公论》，第一卷，1942（11、12期合刊）。



## 第二节 抗战时期对西北的民族学的调查研究

在抗日战争时期，因为东南地区沦陷，西部地区以往未被人们重视的边疆地区成为后方。人们普遍感受到外来侵略的威胁和边疆地区的重要，掌权者们对边疆民族聚居地区的重视程度也增加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 1941 年向国民党八中全会提交了“请设置边疆语文系与西北、西南边疆文化研究所，培植筹边人才，而利边政实施案”<sup>①</sup>。中央研究院据此有了在西康雅安（今属四川）筹建边疆文化研究所的计划<sup>②</sup>，并拟请李方桂担任筹备主任。但中央研究院方面后来考虑到人力和物力困难、边疆文化研究涉及面广、所长人选未能及时确定等原因提出应慎重考虑之言，政府意向也在其后产生了一些变化，而未能实施<sup>③</sup>。云南著名人士李根源也向蒋介石建议，因建设边疆任务迫切，请拨款在昆明设立西南边疆文化研究机关<sup>④</sup>。但从

①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请设置边疆语文系与西北西南边疆文化研究所培植筹边人才而利边政实施案》，载《中央研究院档案》393—10（系档案序号。前序号为档案总目号，后序号为案卷号。后同）。

② 参见朱家骅：《致蒋介石呈文》，载《中央研究院档案》393—310。

③ 参见中央研究院：《致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处公函》，载《中央研究院档案》393—10。

④ 参见李根源：《条陈建设边疆之迫切请拨款在昆明设立西南边疆文化研究机关呈》，载《中央研究院档案》393—10。

宏观上来看，民族学的田野调查比较以往有了更好的外界条件，更易得到有关当局的批准和支持。

从学者自身来看，许多民族学家集中在西部地区，使他们在地理距离上更接近了西部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调查和研究更为方便。许多民族学家和社会学家看到在边疆地区生活的少数民族之间语言不通，社会制度、社会组织殊异，风俗习惯差异颇大，于是产生强烈的调查研究兴趣。同时，以往对西部地区的民族群体和文化较精确的调查数量少，且大多数质量不高，有些关于少数民族的介绍和叙述客观性不足，可供研究的空白点较多。许多过去以社会学等学科为主要研究领域的学者，在这时也转向了有关民族学的调查研究。因而，在这一时期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出现了空前活跃的局面。在西部地区，以往民族学家很少涉足的偏僻山寨和牧区都有了民族学家的身影。他们不仅考察民族文化的变迁，对中国的民族现实问题也有了更多的注意和调查研究。这些事实说明抗战时期的中国民族学在广度上较过去又有了进一步的拓展。

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学家们更接近田野工作基地，有更多的调查机会，由于民族学家们普遍重视实地调查，这个时期的重要研究成果大部分是田野调查报告或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研究论著。在生活艰苦、战争威胁，甚至没有安定的写作条件的困难境况下，他们以满腔热忱投入了民族学的研究工作，也产生了一批有价值的论著。同时，也因为占有了更丰富的研究资源，许多学者在西方学习的理论有了更多的在中国进行验证或修正的实证材料，研究也因此有了深化的基础。抗战时期及其稍后根据抗战时期的田野考察整理而成的一批著作更集中地表现了中国民族学在深度上的进步。

李安宅于1938年接受陶孟和、顾颉刚的建议，根据燕京

大学与甘肃科学教育馆在前一年商定的合作计划，到甘肃从事藏族文化的促进工作和社会人类学的实地调查。他与夫人于式玉绕道上海、经香港和云、贵、川、陕到达兰州，又转至拉卜楞地区。于式玉在当地义务办拉卜楞女子小学，同时学习藏语文，李安宅则对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之一的拉卜楞寺进行民族学田野调查，研究藏传佛教。于式玉也协助李先生进行调查，他们的调查为期长达三年，是中国民族学田野调查中时间最长的一次。李安宅注重实地调查，在撰写调查报告和论文时主要依据调查材料，其次才检阅典籍。李安宅在燕京大学学习、教书和在美国学习时就对宗教、人类学有极大的兴趣，他曾经研习了国外的有关研究著作，这次田野调查正是将学习过的理论用于田野的机会。接受过理论熏陶的民族学家以田野调查作为获取材料的第一选择成为这一时期民族学家们普遍的行动，当时的许多民族学家也采用了类似的调查研究方法。

在拉卜楞寺进行调查、研究的学者，还包括清华大学的毕业生黄明信、玉文华等人。黄氏在1941年之后仍留在拉卜楞寺，并成为一位喇嘛，以便作为参加者而更为清楚地研究喇嘛教的宗教——经济——政治功能<sup>①</sup>。

1941年4月，甘肃拉卜楞巡回施教队实验组以拉卜楞地区的寺庙、家庭、机关等为对象进行调查，但全部完成的只有机关调查。参加此次调查的俞湘文女士在此后将个人调查加以整理，出版有《西北游牧藏区之社会调查》一书。

1944年，由杨兆钧率领西北大学边疆考察团，到青海的循化和甘肃的拉卜楞寺调查，为期两个月，以该两处分别作为

<sup>①</sup> 参见华西边疆文化研究所：《华西边疆文化研究所工作报告》，载《华西大学档案》，161页。

伊斯兰教文化、语言调查区和佛教文化、语言、习俗调查区，调查取得了可喜成果<sup>①</sup>。

人文地理学家李式金，在抗战时期担任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甘肃科学馆副研究员和西北大学、东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教职，从事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和教学。他曾经多次到甘肃、青海、新疆等地进行地理考察和民族调查，搜集了大量的民族风俗材料，并写出了许多关于边疆民族的介绍资料，刊登在各地的报刊上。

中央大学地理学系的师生在胡焕庸、丁骞、戈定邦、丁实存等人带领下，在抗战期间受国民政府行政院水利委员会的委托，考察了西北水利、移垦问题，重点调查甘肃、新疆等地的地理、气候、水利资源等，也进行了新疆的民族调查。事后发表了许多著作，丁实存还整理出了《新疆书目》。

吴文藻于1943年6月至是年底，参加了中央设计局组织、由西北监察使罗家伦率领的西北建设考察团，负责以新疆的民族问题为主的西北民族问题调查。由于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的出版，要求以中国只有国族没有民族，即中国不存在各少数民族的基调写作调查报告，吴先生对这种观点持有异议，调查报告未能完成。

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经济学组的助理研究员张之毅<sup>②</sup>，于1942年9月至次年初到新疆调查经济，调查了新疆与印度的贸易、维吾尔族的纺织和丝织业的发展状况、南疆绿洲的农业经济等，主要考察地区为库车、喀什、和阗、莎车、伊

<sup>①</sup> 参见西北大学校史编写组：《西北大学校史稿》，1版，127~128页，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

<sup>②</sup> 此人是经济学家，与同期的云南大学实地调查工作站张之毅并非一人。

犁、哈密等地，在归途中又考察了甘肃的水利、畜牧<sup>①</sup>，事后著有《新疆之经济》、《亚洲的枢纽》等。

在吴文藻先生的推荐下，1942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陈永龄到新疆学院任教。他原打算对新疆的各民族进行田野调查，但由于盛世才的限制未能如愿；1944年，又身陷囹圄，调查更不可能。

蒙藏委员会调查室自1933年就陆续发表了一些对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调查报告，抗战期间又先后组织进行了对甘肃、青海和内蒙古等西部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考察。1933—1942年间，由蒙藏委员会刊印的关于上述地区的调查资料有《乌兰查布盟各族调查报告书》（1933年）、《马鬃山调查报告》（1938年）、《伊克昭盟左翼三旗调查报告》（1941年）、《伊克昭盟右翼四旗调查报告》、《青海玉树、囊谦、称多三县调查报告书》（1941年）、《祁连山北麓调查报告》（1942年）、《果洛调查报告》（1942年）、《玉树二十五族调查报告》（1942年）等。这些调查报告以服务于上述地区和民族的管理为目的，基本上是资料的简单汇集，没有更多的分析，但对有关民族情况的资料积累亦有益处。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由政府官员或有关机构所作的西北各民族调查报告先后发表。如：1941年重庆正中书局出版了30年代由参谋本部派遣调查过青海、西藏地区的高长柱撰写的《边疆问题论文集》；次年，甘肃省银行经济研究室刊印了王志文编著的《甘肃省西南部边区考察记》，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葛赤峰的《河曲藏区采风记》。

中国共产党在进行长征的过程中和转移到西北地区后，由

<sup>①</sup> 张之毅：《致朱骝先、叶企孙函》，载《中央研究院档案》393—2125。

于实地的体验，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的民族问题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开始联系中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实际，进行调查研究。在抗日战争时期，延安的民族问题研究是围绕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开展的，表现了很强的目的性。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于1940年先后发表了《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和《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提出了争取回族、蒙古族共同参加抗战的具体纲领和政策。为了更好地进行研究，在延安专门成立了民族问题研究会，先后开展了与中国共产党抗战根据地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回回民族问题和蒙古族问题的研究。李维汉、贾拓夫、刘春和牙含章等人研究回回民族问题，编写成《回回民族问题》一书，于1941年由延安解放社出版。《蒙古民族问题》的编写工作始于1940年，由刘春执笔，经过两年的研究，完成初稿。由于战争的关系，于1946年才由内蒙古出版社出版。这两部著作更为详尽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回回民族问题和蒙古民族问题的看法，在写作过程中，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而另外一部关于民族问题的研究著作《蒙古社会经济》虽完成了书稿，却在战争中遗失，未能与读者见面。

除了基本观点之外，上述论著在研究步骤、研究方法、研究题目的选择和队伍的组织上，与当时的学院派民族学也有很大不同。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这些工作作为中国共产党研究和认识民族问题的传统中的重要部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大陆民族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 第三节 抗战时期对西南和华南的民族学田野调查

对云南省各民族的调查，在中国民族学界虽然开展得比较早，但由于云南的民族众多、交通不便，调查的深度和广度都有待于提高。而四川在抗战之前虽有学者对四川的少数民族进行民族学的调查研究，其范围较云南则更小。抗战前很少有人对贵州进行民族学实地调查，基本上属于调查盲区。抗战时期，由于研究者云集西南，对西南地区的民族学调查在过去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有了更大的进步。对西南民族调查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一是专业学术研究机构及其派出的学者进行的调查，二是由政府和有关社会团体组织的考察团，三是有关部门的官员或受专门派遣、或在从政之余进行的调查访问，四是西迁的院校学生利用暑期进行的边疆服务和调查工作。

1941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合作组成了川康民族考察团，由凌纯声任团长，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员芮逸夫和中央博物馆筹备处专员马长寿为专员，另有技术员和团员各一人。此次川康民族文化调查，旨在调查各民族之经济、生活状况、政治、社会情形、宗教、语文等项，研究各民族的婚丧制度、生活习惯及与文化有关的各种问题，并搜集了有关民族文物的标本与用物；调查区域为四川的西北及西康的东北，包括理番、靖化、懋功、丹巴、康定等县及梭

摩、卓克基、党坝、绰斯甲、巴底、巴望等上司地；调查对象包括羌族、彝族、藏族等民族<sup>①</sup>。马长寿根据调查资料写了《钵教源流》、《嘉戎民族社会史》等论文。

马长寿先后两次深入大、小凉山地区，调查记录了彝族的语言、社会阶级、物质文化、宗教信仰、生活习惯等各方面的情况，搜集了各种彝族文物，写成了数十万字的《凉山僜夷考察报告》。虽然当时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公开发表，但由于记录较早、详细完整、记述直观，至今仍具有科学价值。他还以自己的调查结果发表了《凉山僜夷的宗谱》等著作和论文。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芮逸夫于1942年12月至次年5月对川南与黔滇交界地区的苗族支系白苗、花苗<sup>②</sup>等族群进行调查，调查以苗族的原始文化特征及其同化过程与现状为重点。事后又请苗族同胞到研究所补充了苗族语言和婚丧礼俗方面的资料<sup>③</sup>。

陶云逵和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的其他研究人员在1942年对云南的新平、元江一带的语言、宗教、巫术、市集、地理环境等进行了专项调查。次年，又到红河上游的上述两县和峨山等地调查语言、文字、物产等内容。1945年，该室研究人员青年语言学家高华年调查了路南地区的语言。该室学者

① 参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a. 《历史语言研究所二十九年度至三十年度报告》，载《中央研究院档案》393—1373；b. 《历史语言研究所三十年三月至三十一年二月工作报告》，载《中央研究院档案》393—1373；c. 《历史语言研究所三十一年度工作报告》，载《中央研究院档案》393—1373。

② “白苗”、“花苗”系他称，后同。

③ 参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a. 《历史语言研究所三十一年度工作报告》，载《中央研究院档案》393—1373；b.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三十二年度工作报告》，载《中央研究院档案》393—1373。



的调查对象包括布依族、哈尼族、傣族、彝族、苗族、汉族等民族<sup>①</sup>。

岑家梧于 1938 年得到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资助，到云南东北的嵩明的苗族聚居区调查，随后到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所协助陈序经进行西南各民族的研究。

云南大学魁阁研究室抗战时采取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的原则，每个研究人员都有自己的专题，到选定的社区去进行实地调查，然后组织集体讨论，最后撰写研究论文。1939 年，费孝通和他的助手在云南禄丰县大北厂村进行实地调查，《禄村农田》即这项调查的结果。费孝通又指导他的学生张之毅对易门县的一个村庄的手工业进行调查，写成《易村手工业》。1940 到 1941 年间，张之毅又到玉溪县县城附近的一个农村调查农业和商业，写成《玉村的农业与商业》。40 多年以后，上述三部著作合编为《云南三村》<sup>②</sup> 出版。谷苞两次到呈贡的化城镇做长期调查，1942 年写成《传统的乡村行政制度》。该室的研究成果还有田汝康的《摆夷的摆》（又作《芒市边民的摆》）、《内地女工》，史国衡的《昆厂劳工》、《个旧矿工》等。1941 年 7 月至次年 9 月，许烺光对大理进行了 14 个月的调查，事后写成论文《滇西的巫术和科学》，以后又完成了他的代表作《在祖先的荫蔽下》<sup>③</sup>。李有义研究了云南的汉族、彝族杂居区

① 参见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边疆人文研究室调查工作表》，载《边疆人文》，第四卷（合刊），1947。

② 参见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1 版，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

③ 此书原文为英文，书名为 *Under the Ancestor's Shadow: Kinship, Personality and Social Mobility in China*（《在祖先的荫蔽下》），有人译为《祖荫下》。参见 Hsu, I. K. Francis（许烺光）：*Under the Ancestor's Shadow: Kinship, Personality and Social Mobility in China*（《在祖先的荫蔽下》），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8。

的民族关系。胡庆钧于 1944 年到云南大学工作后，也倾向于功能学派，他研究了云南呈贡的地方基层权力结构，以后陆续发表了一些论文<sup>①</sup>。其他成员也都有各自研究的专门题目。费孝通和他的研究伙伴的调查及研究是中国功能学派十分有意义的实践，他们的集体研究方法促使研究成果更多、更快、更好地得到展现，研究涉及的课题也更为多样化，表现了广度和深度两方面的进步。

1938 年暑期，金陵大学社会学系的柯象峰、徐益棠在西康建省委员会的资助下，对甘孜、炉霍、道孚、泰定、康定、汉源、荣经、雅安等县进行为期两月余的调查，对西康的社会经济、物产、文化和民族生活情形进行了调查，并拟定了方案以便研究边政者参考。1939 年 11 月，柯象峰还曾带领本校社会学系的学生到峨边县对彝族的社会生活进行了调查，为期一个月，对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组织等作了调查，并亲自观察了其婚丧祭礼和度岁习俗<sup>②</sup>。以后，徐益棠、柯象峰等人又参加了四川省边区施教团的调查工作。

李安宅与华西大学边疆文化研究所在 1944 年到川康藏区进行调查，李安宅对西康南北两路进行的调查时间长达半年。1945 年，李安宅考察了西藏德格社区的藏族的宗教、语言等。1943 年 1 月至 3 月，任职于华西大学的于式玉、蒋旨昂到四川西部的汶川、黑水、理县等地调查。

冯汉骥于 1937 年回国，执教于四川大学历史系，任教授。翌年暑假，只身往岷江上游的松潘、理番（后改为理县）、茂

<sup>①</sup> 1995 年胡庆钧口述，王建民记录稿，未刊。

<sup>②</sup> 参见金陵大学文学院：《五年来之金陵大学文学院》，载南京大学高教研究所校史编写组编《金陵大学校史资料集》，1 版，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

汶等地考察羌族社会，历时三个月，探讨西南古代民族与北方草原民族的联系。1939年，他又出任教育部川康科学考察团社会科学组组长，对西康地区的民族作了调查分类。

1938年冬，任乃强曾经赴康定、泸定等藏族、彝族、汉族等民族聚居和杂居的地区进行调查，考察各地的古迹、市街、村落等，撰有《泸定导游》<sup>①</sup>，记载考察经过。1943年，任乃强被聘为华西大学教授兼边疆研究所研究员，翌年随华西大学考察团第三次赴当时的西康省北部调查，着重进行寺庙和上司研究，调查完毕后，发表了《德格上司世谱》、《喇嘛教与西康政治》等文。

燕京大学成都分校的教授林耀华，于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学成回国后，于1943年暑期率燕京大学边区考察团，与胡良珍等到大、小凉山彝族聚居地区考察。他们以小凉山的乌角、哨上一带为社区研究的样本，进行语言、物质文化、社会组织、亲属关系、经济制度、宗教等方面的考察和体质测量<sup>②</sup>。以后又到大凉山考察，写成《凉山夷家》。1944年夏，林耀华乘暑假“赴西康北部，往返三千余里，前后费时两个半月”，调查康北藏族；调查地区为康定、折多塘、道孚、炉霍、甘孜，以甘孜以北的绒擦沟为比较深入的考察区域；曾亲自登门调查50户藏族家庭，对康北藏族的物质文化、社会组织、宗教生活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察和研究，事后发表了《康北藏民的社会状况》，连载于《流星》月刊第一至五期<sup>③</sup>。总结这次调查的著作《康北藏民》也在不久之后写成，惜未能刊印。

① 任乃强：《泸定导游》，分期连载在《康导月刊》，第二卷，1939—1940（2—9）。

② 参见林耀华：《凉山夷家》，121—122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

③ 参见林耀华：《康北藏民的社会状况》，载《流星》，第一卷，1945（1—5）。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接受美国罗氏基金会及哈佛燕京学社的专款，委托林耀华调查川、康间的少数民族。1945年夏，林耀华又带领他的研究生、兼职助教陈永龄，对川、康北部交界地区的嘉戎（今为藏族的一个支系）进行调查。这次调查行程两千余里，其重点地区为理县北部的梭磨、卓克基、松冈、党坝四土司地区和理县以西的九子、上孟、下孟、甘坡、杂谷五屯地。这次调查的报告整理后题为《川康北界的嘉戎土司》公开发表<sup>①</sup>。以后又写成专著《四土嘉戎》。陈永龄据此次调查资料写成了硕士学位论文《理县嘉戎土司制度下的社会》<sup>②</sup>。

大夏大学的教授吴泽霖、陈国钧、张少微等在抗战前期曾经对贵州境内的民族进行多次调查。1939年2月，大夏大学组织了“西南边区考察团”。是年春，受内政部委托，经过初步调查后，派员分别赴安顺、定番、炉山（今凯里）等处实地调查，历时八个月，根据部定调查要点，将调查结果编成《安顺县苗夷调查报告书》、《炉山县苗夷调查报告书》、《定番县苗夷调查报告书》三种呈报，每种约20万字，内容翔实。1939年初，贵州省教育厅民俗研究会委托该部搜集各县的苗族、彝族等民族民俗资料，经过前后半年的分赴各地搜集资料、汇齐后缴送民俗研究会。1940年春，贵州省政府组织边远农村工作宣传团，大夏社会研究部受贵州省民政厅的委托，调查各县的苗族、彝族等社会状况，派出两名助理研究员随团从东路和西路分别赴地处边远的苗族、彝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调查，为期五个月，将报告呈送民政厅。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还进行了

① 林耀华：《川康北界的嘉戎土司》，载《边政公论》，第六卷，1947（2）。

② 陈永龄：《理县嘉戎土司制度下的社会》，燕京大学硕士论文，北平，燕京大学印，1947。

社会学方面的调查，如贵阳城区劳工概况调查、贵阳二四灾情调查等，“同时于学理上之研究，亦未敢忽略”<sup>①</sup>。

1940年，岑家梧在吴泽霖离校后，担任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主任，他和陈国钧等继续对贵州境内的各民族进行调查。其间，岑家梧曾到黔东南荔波的水族聚居区作实地调查。

中山大学的民族学家们，在抗战期间也进行了一些有关民族学方面的调查。在云南澄江时，他们利用处于边疆少数民族中的便利条件，研究院文科研究所的师生经常结队到附近的少数民族地区搜集当地的语言、歌谣、风俗习惯的材料；曾以半年时间对大凉山夷（彝）民进行调查，并整理资料出版。当由云南向广东转移时，他们又于1940年组织暑期学术考察团，沿途考察滇、黔、桂、湘、粤五省边区各地的文史、教育等情况<sup>②</sup>。1941—1942年间，文科研究所师生多次赴粤北考察瑶族的体质、文化、语言。该研究所还曾到广西蒙山、修仁等地调查瑶族的文化和生活状况<sup>③</sup>。1943年11月，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利用国民政府教育部拨出的边胞民俗调查专款，到郴县棉花垅调查，对当地的瑶族等民族的语言、历史、传说、宗教仪式、社会、政治组织、经济生活及婚姻制度等都作了初步考察，所获材料颇丰<sup>④</sup>。1940年夏，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迁回广东坪石后，江应樑留在西南；并于1941年在顾颉刚协助下，

① 参见陈国钧：《大夏大学社会研究工作部工作述要》，载吴泽霖、陈国钧等《贵州苗夷社会研究》，1版，贵阳，文通书局，1942。

② 参见梁山等：《中山大学校史》，1版，上海，68页、69页、102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

③ 同②。

④ 参见中山大学：《社会学系边胞民俗考察团郴县归来》，载《国立中山大学日报》，“坪石版”，八四一号，1943-11-19。

筹得经费，到四川的马边、雷波和云南的彝族聚居区进行调查，回到昆明后，写成《凉山夷族的奴隶制度》<sup>①</sup>。

岭南大学社会研究所在日军侵占广东之前也进行过一些民族学调查。1938年夏，由外籍教师霍真（R.F. Fortune）带领部分学生到连县一带调查瑶族的生活。调查报告发表于《岭南科学杂志》第十八卷第三、四期。该研究所对海南岛的黎族和苗族的调查迄1938年秋尚未完全结束<sup>②</sup>。

以上各次学术考察的主要调查区是云南、四川（包括当时另外设省的西康）和贵州三省，亦旁及桂、湘、粤等省。由于是由训练有素的专家设计和主持调查，研究者多为专业研究人员或有关专业大学生，在学术研究上来说，不是简单的和抽象的理论推衍，而是基于具体实际资料的分析 and 描述，质量较以前有所提高，多数研究成果引起了民族学界的普遍关注。

在这一时期，民族学家对各民族的文化都进行了许多调查，并在调查的基础上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如对彝族的调查研究来看，有一些研究心得问世，其中以林耀华的《凉山夷家》、陶云逵的《大寨黑夷之宗教与图腾制》、徐益棠的《雷波小凉山之罗民》等著作最为著名。这些报告以各自不同的观点组织和分析材料，林氏以家族和社会组织为中心，关联到与家族有关的其他方面的生活，注重功能分析；陶氏强调姓氏、族源与崇拜物的关系；徐氏则注意对文化各方面的描写，兼及功能分析。各有特色的成果正是对实地考察总结分析的结晶。

正是这些较为深入的田野工作，为民族学在中国进一步形成特点提供了基本支点，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关于民族学

<sup>①</sup> 参见江应樑：载《江应樑民族研究文集》，1版，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

<sup>②</sup> 参见岭南大学：《学术消息》，载《岭南大学校报》，“康乐再版号”，1948(70)。

中国化的重新思考。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田野调查和研究的实践中，中国较早时期的一些少数民族的民族学家开始成长起来。如苗族学者杨汉先在贵阳大夏大学、成都华西协和大学任教期间，发表了关于苗族和西南地区各民族的文化与发展史的论文多篇。回族学者杨兆钧受到民族学的影响，开始从事西北各民族的研究。

1938年，赈济委员会约请几所大学的学者组织滇西考察团，目的在于调查滇西的民族、地理、物产，拟在此建立一个移民区，其中有李景汉、江应樑等民族学、社会学家参加。丰富多彩的民族生活习俗吸引了学者们的注意力，在综合考察报告中，民族学方面的内容占大部分篇幅。同年冬天，云南省政府组织人员调查普洱、思茅及迤南一带傣族聚居地区的社会状况；事后，调查者之一的姚荷生写成了《水摆夷风土记》，记载了当地的傣族、哈尼族、拉祜族、佤族等民族的风俗，但存在曲解和滥发议论之处。

教育部在1939年组织了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团长郭莲峰，另有七名团员，分为教育、社会、自然三组。到昆明后分为两队，迤西队考察滇缅边境的腾冲、南坎一带，然后经贵阳抵桂林；迤南队沿滇越路至蒙自、石屏、河口，到安南、劳开等地考察，然后经马关、文山、富宁、百色抵桂林。两队汇合后，再往瑶族聚居的山区考察，足迹几遍西南，前后历时八个月，整理出数十万言的报告<sup>①</sup>。

1939年，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组织川、康科学考察团，其中有社会组，方壮猷为该组专家，包括社会、历史、考古、

<sup>①</sup> 参见国民政府教育部蒙藏教育司：《边疆教育概况》，教育部蒙藏教育司印，1943。

教育。拟分为三期进行。第一期以嘉定为中心，考察雷波、马边、屏山、峨边、西昌、盐边一带，而后，沿公路考察雅安、洪雅、天全、泸定、康定，时间为一个半月至两个月；第二期以康定为中心，考察康定以西、以南及西北各地，以两个月至两个半月为期；第三期考察松潘、理番、茂懋、武平、灌县，时间是一个半月至两个月<sup>①</sup>。因“粮食缺乏，物价奇昂”，预算“不敷甚钜”，实际进行仅三个月<sup>②</sup>。

四川边区施教团是四川省政府于1940年夏组织的，柯象峰、徐益棠担任正副团长，率张云波等二十余人，深入雷波、马边、屏山、峨边等县，除进行医疗、宣传外，对于当地的社会状况、风俗民情、古迹名胜、经济物产等作了调查。徐益棠专注于小凉山彝族的民族学考察，张云波兴趣也在彝族的社会组织和文化等方面。他们的考察研究成果汇成《雷马屏峨纪略》，翌年7月由四川省政府教育厅出版<sup>③</sup>。

1944年，因雷波的彝族、汉族发生冲突，当地驻军在派出军队的同时，也组织了边区文化教育考察团随军前往，由方壮猷主其事。方氏的调查除了解少数民族的一般情况外，尤其注意凉山的彝族系谱的研究<sup>④</sup>。

蒙藏委员会调查室在抗战时期对西南地区的调查涉及四川西部、西藏东部、云南省等，根据调查先后发表了《宁属洛苏

① 参见管理中庚庚款董事会科学考察团：《管理中庚庚款董事会科学考察团简章》，管理中庚庚款董事会印，1937。

② 参见方壮猷：《凉山罗族系谱》，载《边政公论》，第四卷，1945（9、10、11、12合刊）。

③ 参见四川边区施教团：《雷马屏峨纪略》，四川省政府教育厅印，1941。

④ 参见方壮猷：《凉山罗族系谱》，载《边政公论》，第四卷，1945（9、10、11、12合刊）。



调查报告》(1941年)、《昌都调查报告》(1942年)、《丽德大道调查报告》(1944年)、《中甸调查报告》(1945年)等成果。

当时,一些机构还组织了一些名为旅行团的考察活动。1941年国民政府行政院曾组织了康昌(今四川西部至西藏东部地区)旅行团和青康(今四川西部至青海)旅行团。

由政府机构或其他团体组织的考察活动以政治目的为主,侧重于处理少数民族事务中的各种问题。如行政院组织的康昌旅行团以“考察民生状况、促进经济建设为宗旨,主要任务在考察宁属各地富源,俾作开发之计划”;青康旅行团的“任务为考察青康之富源及政情”<sup>①</sup>。而对民族学所重视的民族文化的各方面的考察,除个别专家之外,一般较为简略,而且多就事论事,记录所见所闻,在文化记录方面不够全面系统,很少进行文化分析、研究。

梁瓯第于1939年由“管理中庚庚款董事会”派遣,考察四川、西康社会及教育。当年10月至西昌,“冒险涉足川康滇边境大小凉山区域,经昭觉而至雷波,历时月余”,与彝族同胞同居同处。出山以后,他撰写了《川康边民之社会及其教育》,约20万字,交管理中庚庚款董事会印行,以后又写了若干论文和《我怎样通过大小凉山》一书<sup>②</sup>。

滇、缅铁路工程局的秘书陈碧笙对已设计好的铁路沿线进行了实地考察,并研究了历史上的滇、缅关系,著成了《边政论丛》第一集,于1940年由战国策书社在昆明出版。

毛筠如曾筹建国民党中央军校成都分校夷生班,并在该班任教,以后又在凉山地区担任行政督察专员。他在1935—1942

<sup>①</sup> 参见边政公论社:《边疆考察团出发》,载《边政公论》,第一卷,1941(2)。

<sup>②</sup> 参见梁瓯第:《我怎样通过大小凉山》,贵阳,文通书局,1944。

年间曾在雷波、马边、屏山、峨边等地进行宣抚工作，他注意观察和记录，先后编著和出版了《马边纪实》、《雷马屏峨纪略》、《雷马屏峨夷务鸟瞰》（与康兴壁合著）、《大小凉山之夷族》等<sup>①</sup>。

担任军政职务的彝族土司岭光电，根据所了解的凉山彝族的各方面的情形，著有《俾情述论》，收入了作者 1938—1942 年间撰写的 22 篇文章，介绍了凉山彝族聚居区的人文地理、彝族历史与文化等，对认识彝族文化的若干内容和彝族地区的改革发展步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sup>②</sup>。早年进行过青海藏族的考察的庄学本在抗战时担任西康省政府参议，继续对西部地区民族的考察，又写成《西康夷族考察报告》，于 1941 年出版。

这些官员的考察以如何处理少数民族问题为宗旨，根据考察，提出了一些管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建议。也有一些看法值得从事学术研究者的注意。如梁瓯第在谈及凉山考察的收获和教训时指出：研究应与应用相适应，学术即是应用，在“抗战建国”的时代，不需要学究式的研究，要求学者和社会合作，把研究各民族的成果用之于开发各民族的各种资源，这样才有价值，才不浪费<sup>③</sup>。

教育部于 1941 年组织了第一次大学生暑期边疆服务团，由边疆教育会秘书王文萱任团长，有中央、金陵、齐鲁、华西协和、云南、武汉、四川等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江苏医学院、西康技艺专科学校等校的教员 10 人、学生 47 人参加。

① 参见陈炳光：《〈大小凉山之夷族〉序》，载毛筠如《大小凉山之夷族》，四川省教育厅印，1947。

② 参见岭光电：《俾情述论》，1 版，成都，开明书店，1943。

③ 参见梁瓯第：《我怎样通过大小凉山》，贵阳，文通书局，1944。

调查分为两队，一为川西队，历时两个月，行程1300余公里，赴川西黑水、杂谷河流域进行实地调查。另一队为西康队，以越嶲、冕宁为中心，进行考察。同时，教育部蒙藏教育司主持对四川西部地区的考察，派人会同四川巡回施教队赴松潘，出黄胜关至草地调查。其调查以边疆文化为第一项内容，出版十余万字的《川西调查记》<sup>①</sup>。

当时在西北、西南的大学都有许多学生考察、旅行、服务活动，如仅在1941年，除上述教育部出面组织的边疆服务团外，还有中山大学在毕业生中选拔学行优良者数人，到康藏云南等边区服务，从事边疆语言文字、民俗、经济等方面的工作；西南联大组织川康科学考察团，考察滇西、西昌、大小凉山等地森林、矿产、居民俗尚等<sup>②</sup>。

1941年夏，西南联大的教授曾昭抡带领黎国彬等十名各系的学生组成的川康科学考察团，由西康步行入川，到彝族聚居地区的中心昭觉之后，分为三路。一路横越大凉山绝顶黄茅岭到雷波，取道屏山至宜宾；另两路返回西昌，途经越嶲至雅安。学生们沿途结合所学专业进行考察，并了解沿途的各少数民族的社会、文化情形。此次考察共用时整100天。

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在抗战期间组织了学生暑期服务团等社会调查组织。自1940年起，每年夏季组织大学生暑期边疆服务团，主要考察地区为川西等地。内容包括特别研究和巡回服务等项目。1942年的服务团由教授4人、团员32人组成，来

<sup>①</sup> 参见国民政府教育部蒙藏教育司：a.《边疆教育概况》，教育部蒙藏教育司印，1943；b.《边政公论》社：《边疆考察团出发》，载《边政公论》，第一卷，1941（2）。

<sup>②</sup> 参见边政公论社：《边疆考察团出发》，载《边政公论》，第一卷，1941（2）。

自华西、四川、金陵、齐鲁、中央、金陵女子、燕京等大学和华西神学院。华西协和大学的教授葛维汉一向对西南地区的民族之研究有浓厚兴趣，1941年加入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担任义务研究员，进行羌族、藏族等民族的调查研究<sup>①</sup>。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的张伯怀主任也到贵州惠水、黄平两县苗族地区进行调查<sup>②</sup>。

上述的后两类考察多数不是专门研究学者策划和主持的，在调查资料的整理和分析上的程度参差不齐，部分内容只是一般情况的陈述，但也为研究民族学的提供了部分重要资料，丰富了民族学研究资源。退一步说，这些调查引起了更多的人对民族学的兴趣，不少人都来作民族学工作，是民族学发展中十分难得的机遇，为扩大民族学的影响、吸引社会对民族学研究的注意、普及民族学知识，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在抗战期间，也有一些外国的人类学家到中国的西南地区进行调查。如德国的人类学家布克莱尔（Inez de Beaulair）1940年来华，曾在贵州等省对苗族、仡佬族进行过田野调查。他调查过的地区包括贵州的安顺、镇宁、郎岱和云南省。回国后写成了关于贵州的仡佬族与贵州、云南、海南岛苗族的研究论著。又如美国的植物学家、探险家约瑟夫·洛克，在20年代至40年代，长期在云南丽江等地的纳西族中生活，广泛搜集东巴文经书，著有《中国西南的古纳西王国》等著作和文章。

<sup>①</sup> 参见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总部三十一年大事记》，载《边疆服务》，“创刊号”，1943。

<sup>②</sup> 参见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边疆服务消息》，载《边疆服务》，第一卷，1943（2），22—23页。

#### 第四节 民族语言学家和体质人类学家 对民族学研究的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一批民族语言学家也到了西南地区工作，他们用大量的时间进行民族语言学的调查研究。李方桂、罗常培、马学良、闻宥、张琨、傅懋勳、邢公畹、高华年、袁家骅等将西南诸省视为语言学的黄金地，尽量加以发掘。他们在研究中注意到民族语言研究与民族学的结合，涉猎了民族学问题，将民族学的理论与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结合起来。一方面从民族学理论出发，研究民族语言问题；一方面由民族语言材料入手，探究民族学问题。民族学理论的引入，帮助民族语言学家更好地去认识语言发展变化的社会文化因素，使民族语言的研究领域拓宽了；民族语言学的研究又为民族学问题的解决在理论和事实两方面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早在中国民族学学科建立初期，民族学家就进行了包括民族语言在内的文化整体的考察。同时，一批专门从事语言研究的专家也开始进行语言学的调查与研究。美国语言人类学家萨皮尔（E. Sapir, 1884—1939年）的学生、中国非汉语研究的创始人李方桂 20 年代末留学回国后，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研究少数民族语言。30 年代初期，他就曾调查广西的壮族语言和瑶族语言；抗战爆发后，他又进行了贵州的侗族、水族语言和云南的壮族语言、傣族语言的研究。赵元任在

抗战之前就已进行了瑶族聚居区的语言文学的实地考察。

北京大学迁到云南之后，加入西南联大。该校语言学教授罗常培将自己的研究领域由汉语研究发展到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先后进行了傣族语言和傈僳族、纳西族、独龙族、怒族、景颇族、白族、苗族等多种西南的民族的语言调查，发表了《贡山俅语初探》、《茶山歌》等语言学调查研究成果。张琨在40年代对四川、贵州一带的苗族、瑶族、藏族等民族语言进行了调查，为他以后在此方面的语言学研究搜集了大量的资料。闻宥对羌语音系、嘉戎藏语语法等项专门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并发表了一些论文。傅懋勤对纳西族、羌族、彝族等民族的语言进行了调查、研究。

民族语言学家对于民族学调查和研究的贡献，还表现在通过民族语言学家的调查，为民族学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很有说服力的参证资料。如李方桂在《龙山上语》中发表的语言材料，不仅有故事和山歌，还有讲婚俗和葬俗的材料各一篇；李氏的学生邢庆兰（公畹）在关于云南罗平县境内的台语的调查中，有亲属制度、生活习俗等方面的宝贵材料；罗常培的弟子马学良1944年到云南去研究彝族语言，在当地搜集了2000多册彝文经典，种类有祭经、占卜、律历、谱谍、伦理、古诗歌、历史、神话等<sup>①</sup>。由民族语言学专家从事的这些资料搜集工作，由于语言记录和翻译准确，而强化了其价值。

一些民族语言学家还利用在调查民族语言时搜集的大量资料，直接参与了民族学方面的专题研究。自1942年起，罗常培在研究语言学的同时，更多地注意将语言学与民族学结合进行研究，先后发表了《从语言上论云南民族的分类》、《从客家

<sup>①</sup> 马学良：《边疆语文研究概况》，载《文讯》，第八卷，1948（6）。

迁徙的踪迹论客赣方言的关系》、《论藏缅甸族的父子连名制》、《再论藏缅甸族的父子连名制》和《三论藏缅甸族的父子连名制》等与民族学有更多关系的文章。他注意到利用语言资料考虑民族分类，从语源看文化遗迹，从造词心理看民族文化，考察借字和文化接触的关系，由地名推论民族迁徙踪迹，通过姓氏别号分析民族来源和宗教信仰，进行亲属称谓和婚姻制度的研究，一些文章甚至基本上通篇都是以语言人类学家的面目讨论文化人类学问题，与民族学家直接对话<sup>①</sup>。他不仅注意语言学与民族学的结合，而且注意到民族学理论的发展，避免简单的附会。他在论述亲属称谓和婚姻制度的关系时，依据西方学者的观点，对摩尔根古典进化论将两者之间简单武断地加以联系的做法提出批评。在引证独龙族亲属称谓材料之后，他指出：“民族中的亲属称谓颇可作为研究初民社会里婚姻制度和家庭制度的佐证，不过，应用它的时候，得要仔细照顾到其他文化因素，以免陷于武断、谬误的推论。”<sup>②</sup>

闻宥在抗日战争期间发表了许多关于西南的各民族的语言、文字和文化的论文，涉及羌族语言、彝族语言、嘉戎的藏语言、彝族文字、白族语言、西夏族语言、纳西族文字及字喃、西南地区古代民族史等方面，也对西南的各民族的语言分类发表了意见。他对民家<sup>③</sup>的地名进行了分析研究，并说明其意义，发表了《民家地名的初步分析》一文。他还著有《么些象形文之初步研究》一文，旁征博引中外材料，分析纳西族的东巴文字，总结其特点。

<sup>①</sup> 参见罗常培：《语言与文化》，1版，北京，语文出版社，1989。

<sup>②</sup> 罗常培：《语言与文化》，1版，87页，北京，语文出版社，1989。

<sup>③</sup> 白族一支系，“民家”系他称，后同。

马学良在云南研究彝族的文字期间，除了搜集彝族的祭经和其他经典之外，以其中的作斋经和作祭经作为主要研究课题进行探讨，他的研究没有就经典本身研究经典，而是注意到了作斋和作祭的礼俗，对斋场、祭场情况和重要名物的位置绘图说明，并较为详细地记录了作斋的全过程<sup>①</sup>。

高华年在《黑彝语中汉语借词研究》中研究了汉语借词和汉文化在当地彝族中传播的关系，从语言借词的分析说明文化的接触和民族的关系<sup>②</sup>。以后，他又进一步发挥，写成《论汉语介词与汉文化的传播——一个傣族实地调查的统计和研究》。

民族语言学家的上述研究，由于他们在语言学上的造诣，回答了时常被民族学家有意或无意忽略的一些重要问题，丰富了研究的内容，成为中国民族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特别是他们将语言视为整个社会文化体系中的一部分，探讨语言和其他文化现象之间的彼此关联和相互影响，更清晰地展现了民族文化的全貌，对各种文化要素之间的关系从语言角度进行了阐述，在民族学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民族学家和其他从事西部地区少数民族聚居区实地调查的学者，在调查中注意搜集各民族的民间文学资料，有些甚至将此作为实地研究的主要工作之一，并将这些资料的整理和刊布作为研究的重要成果。中国民族学家意识到，歌谣是研究民族学的宝贵资料，“因它多自民族群众的口中唱出，也就是民族个性的真实表现，而且反映民族的过去或现在社会的一切人情

<sup>①</sup> 参见马学良：a.《傣文作祭献药供牲经译注》，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二本，1948；b.《傣文作斋经译注》，载《中国科学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四本，1949。

<sup>②</sup> 参见高华年：《黑彝语中汉语借词研究》，载《语言人类学专刊》（乙集），第二种，1943。



道德、生活形态、风俗习惯、制度文化等”<sup>①</sup>。陈国钧在专门研究贵州少数民族的过程中，因为每次作调查附带搜集歌谣“是件轻而易举并有意义的事，而且材料积累到相当多时，也不必花多大的整理工夫，就可以编成书”，将经几年搜集所得的布依族、苗族、侗族、水族等民族的1000首歌谣编成《贵州苗夷歌谣》<sup>②</sup>。陈志良广泛搜集资料，大部分得自广西省立特种教育师资训练所（后改为广西省立桂岭师范学校），有的借抄于歌本，有的录之于口头，有的予以翻译而成，1940年编成《广西特种民族歌谣》，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为对歌谣概况研究的理论部分；下篇是歌谣之部，收入约3000首歌谣<sup>③</sup>。

中央研究院对于体质人类学的专项研究，将中国的各民族体质的调查研究作为主要内容。在民族学组改为人类学组后，由于吴定良主持该组工作，开始更多地注意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抗战开始后至1944年4月，该组的体质人类学研究与民族学的关系较为密切的研究课题有：“中国人颅骨研究”、“丁文江遗著整理（中华民族体质之研究）”、“殷墟颅骨研究”、“各族下颚骨颞孔位置比较”、“罗罗体质分析”、“中国人跗骨与跗骨之比较”、“中国人发旋之统计”、“云南头骨研究”、“贵州苗夷血液型研究”、“因族体质分类”、“摆夷体质研究”、“昆明人锁骨之研究”等。该组对于贵州苗族、彝族、仡佬族、布依族、汉族等民族的调查，是将体质调查、测量和民族文化调

① 参见陈国钧：《贵州苗夷歌谣》，贵阳，文通书局，1942。

② 同①。

③ 参见陈志良：《广西特种民族歌谣》，“说月月刊丛书”，第十种，广西桂林中央银行分行印，1942。

查结合在一起进行的，研究题目是“贵州苗夷体质与文化之调查”。吴定良、吴汝康及张洪夔等人于1941年8月开始，到是年年底，调查了安顺、镇宁、普定、织金、贵阳、龙里、平坝等县的60多个村寨，调查的民族和族群有“青苗、坝苗、水苗、补陇苗、仲家、龙家、打牙仡佬与披袍仡佬等”。该组在调查中得到体质测量材料2000余份、指纹与血型材料1000余份及民族文化和人口统计资料。1942年，吴定良又和技术佐理张洪夔到贵州的大定（今大方）、毕节、威宁、纳雍等地，再次调查苗族支系中的大花苗、小花苗及彝族的不同支系等族群的文化与体质<sup>①</sup>。

1944年4月1日，中央研究院成立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由吴定良担任主任。因为一些成员曾参加过原民族学组及人类学组的工作，对于民族学的研究有一定的认识和见解。同时，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该组对各民族进行体质人类学研究较为重视，推动了民族学研究范围的开拓。该所的研究范围包括边疆各民族之源流与支派的问题、种族心理的各项研究、种族生命统计的各项研究等15项。出版有三种刊物。《人类学集刊》（年刊），专门刊登短篇研究文章，用英语发表；《人类学志》（为不定期刊物）专载专题长篇研究，也用英语发表；《人类学年报》（年刊），专门刊载实用的短篇研究文章，并介绍各国人类学知识、技术与消息，用中文发表<sup>②</sup>。他们研究的课题

① 参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a.《致总办事处呈》，载《中央研究院档案》393—323；b.《历史语言研究所二十九年度至三十年度报告》，载《中央研究院档案》393—1373；c.《历史语言研究所三十一年度工作报告》，载《中央研究院档案》393—1373。

② 参见中央研究院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计划书》，载《中央研究院档案》393—2505。

许多都与民族学有较多联系，其中有：“安顺坝苗之体质”、“西黔小花苗之体质”、“西黔水西苗之体质”、“贵州仡佬之体质”、“贵州仲家之体质”、“贵州侏侏体质调查报告”、“粟粟之体质”、“华族血型之分析”等，部分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杂志上发表。

此外，当时在西南地区的其他一些大学和科研机构也进行了少数民族体质人类学的测量。其中一些测量是民族学家在民族学的综合调查时进行的。林耀华在凉山进行彝族调查时，曾有体质测量一项，但因当时统计考核不便，未列入《凉山夷家》一书中，林耀华曾打算就体质问题另作一篇专门论文<sup>①</sup>。马长寿等人对川康民族调查时也包括体质测量的内容。还有一些从事医学等专业的学者也在抗日战争期间作过西部少数民族的体质测量。如1943年暑期，同济大学医学院教授方超带领两名学生到雷波测量彝族的体质<sup>②</sup>。德国人类学家布克莱尔也在贵州调查时测量了安顺地区的仡佬族的体质。

以上研究采取体质人类学的科学数据采集和现代统计分析手段，并依托于对各民族体质的身体测量，试图通过这些研究，对各民族的体质特征、体质与民族分类之间的联系等问题能够有更准确而科学的认识。即用现代科学方法搜集的体质人类学多项指数来说明民族分类的体质人类学的根据、民族的起源，甚至解释文化与体质的关系。希望由此可以更好地分析各民族的来源、民族群体间的相互关系、民族发展的道路和前途等问题，拓展和深化了对各民族的研究。

<sup>①</sup> 参见林耀华：《凉山夷家》，1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

<sup>②</sup> 参见林耀华：《凉山夷家》，121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

## 第五节 沦陷区的民族学调查和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在沦陷区也依然保留了少数民族学或相关学科的研究机关，如留在上海的沪江大学、东吴大学、光华大学和留在北平的辅仁大学等，燕京大学在抗战初期也留在北平。日伪在沦陷区也办了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为其侵略和统治服务，较有代表性的是建国大学和北京大学。

建国大学是日本侵略者为了统治中国东北及其他地区而在长春设立的大学，于1937年成立。该校大学学业分前、后两期，各修业三年。该校内还设有研究院，从事包括民族学在内的各项研究。该校后期的基础学科课程“国家学”一项中包括民族学课程；在专门学科之一的政治学科“厚生政治论科目”中包括“家族政策论”、“文化政策论”等课程；在专门学科之三中有“国民文化论科目”项，其中包括“满蒙文化、日本文化、支那及西域文化、印度及西亚细亚文化和古代、中世及近世西洋文化”等课程<sup>①</sup>。

日伪占领华北后，原北京大学和其他学校组成了北京大学。在该校开设有人类学和社会学等课程。

中国学者在沦陷区内的研究受到日本统治者的限制，各种集会和讲演都受到日本宪兵的严密监视。日本侵略者也试图驱使民族学家为他们的统治服务。日本人在太平洋战争后占领了

<sup>①</sup> 参见建国大学：《建国大学章程》，载《建国大学要览》，建国大学印，1940。

燕京大学。在燕大校园内，他们设立了一个中日合作的华北总合调查研究所。1943年在该所内附设了一个“习俗委员会”，由周作人担任委员长，常惠、江绍原、傅艺子等人参与这个委员会的工作，但是，他们并没有什么成果发表。

留在沦陷区的多数中国教师“处敌嫉视压迫之下，惟恃有不屈不挠精神，努力奋斗，以完成建国储才之使命”<sup>①</sup>。当时沦陷区的为数不多的民族学家为了躲避日本人的限制和利用，同时也不具备进行实地调查的条件，只能将注意力放在对中国古史中所载的民族学资料的研究上。中法汉学研究所成立于1941年10月间，由驻汪伪政权法国大使戈思默（H. Cosme）主持，以中法大学礼堂院为所址，进行了民俗资料的搜集与整理。杨堃在燕京大学西迁后，到该所工作，除在中法汉学研究所主编《民俗季刊》创刊号之外，在这时开始他关于中国古代五祀考的研究，并完成了他这项研究的第一部分——灶神的研究。中法汉学研究所于1944年出版了《汉学》杂志第一辑，发表了杨堃的《灶神考》、张尔田的《论中国文化及其宗教道德》、孙楷第的《傀儡戏考》等论文。

史禄国在抗战时期也留在北京，曾写出了《关于中国的民族学研究》等论文，1939年在北京病逝。

燕京大学在太平洋战争发生前，仍留在北京。1938年，吴文藻南下后，杨堃承担了初民社会、当代社会学学说和社区研究、人类学等课程。七七事变之后，该校社会学系另选前八家村为实验村，被称为平郊村，在杨堃等教师指导下，采取民族学调查方法，从亲身的体验与观察中，取得实际的材料。该系学生的毕业论文以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和实验村的社会生

<sup>①</sup> 陈垣：《致北平市教育局长函》，载《北京教育档案》4—1—978。

活考察为主<sup>①</sup>。

辅仁大学抗战时期留在北京。该校于1940年成立了东方人类学博物馆 (Museum of Oriental Ethnology, 应译为东方民族学博物馆), 在馆长叶德礼 (Matthias Eder) 博士的领导下, 继续进行包括民族学、民俗学等学科在内的研究, 主要研究对象为“远东各民族及其相互关系”<sup>②</sup>。1933年由中、德两国学术界人士建立的中德学会设在辅仁大学附近, 在北京的德国汉学家经常参加该校的活动。中德学会也参与了中法汉学研究所的《汉学》杂志的编写工作。在辅仁大学博物馆内工作的学者除德国人外, 还有许道龄、赵卫邦等。1942年, 该馆出版了《民俗学志》(Folklore Studies, 或译为《民俗研究》) 杂志创刊号, 为献给著名的德奥民族学家史密特的纪念专号。此刊用英、法、德文出版, 在抗战期间先后出版三期, 成为当时沦陷区除日本人控制的御用刊物之外最重要的民族学杂志。在《民俗学志》中先后发表了史禄国的《关于中国民族学研究》、赵卫邦的《扶乩的起源和发展》、陈祥春的《作驱邪符》、乌音特·哈依斯罕的《昭乌达盟蒙古人的定居及其文化变迁》和《蒙古的巫人及降神术者》等民族学论文。同时, 辅仁大学编辑的《辅仁学志》和以西文发表汉学论文、书评、消息的《华裔学志》等杂志继续出版。辅仁大学在抗战时开始招收人类学方面的研究生。1944年, 辅仁大学文科研究所增设了人类学部, 专门培养人类学专业语言、宗教等方面的研究生。

日本侵华时期, 一些日本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到中国的东北地区和华北、海南岛、台湾等地进行教学和实地调查研究。

<sup>①</sup> 参见杨堃:《我国民俗学运动史略》, 载《民族学研究集刊》, 第六辑, 1948。

<sup>②</sup> 参见哈佛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学术团体消息》, 载《燕京学报》, 1946(30)。

大山彦一 (Hikoichi Oyama, 1900—1965年) 于 1935—1945 年间在建国大学任社会学和人类学教授, 除讲授有关课程外, 并在中国的东北进行家庭和亲属结构、萨满教及满族宗教习惯等方面的调查研究<sup>①</sup>。岛田正郎 (Shimada Masao, 1915—) 于 1940 年任伪满洲国文教部嘱托 (官职), 在东北、内蒙古一带从事中国少数民族法的资料调查。秋叶隆 (Takashi Akiba, 1908—1954 年) 受马凌诺夫斯基的影响较大, 对中国的满族和蒙古族文化进行了周密的个案研究<sup>②</sup>。小野忍 (Ono Shinobu, 1906—) 在满铁调查部就曾从事中国北方的伊斯兰教研究, 1943 年到日本民族研究所任职后, 又到内蒙古等地进行伊斯兰教徒状况的调查。江上波夫 (Egami Namio, 1905—) 自抗战前和抗战中受日本外务省、学术振兴会等机构的派遣, 多次在中国的北方进行考察, 除历史古迹外, 也涉及中国北方的文化现状等情况。

在日本占领中国的东北期间, 满铁调查部于 1932 年整编后称“经济调查所”, 该机构和日伪其他机关为了搜集情报, 集中了一批日籍汉学家在其中工作。民族学家马渊东一 (Mabuchi Toichi 1909—)、小野忍和民俗学家旗田巍 (Hatada Takashi, 1908—) 等都曾任满铁部调查员, 他们对中国的东北、内蒙、华北和其他地区进行了一些调查活动, 其中也包括一部分民族学资料。由民族学家进行的调查工作开始于抗战之前, 如 1937 年日本驻赤峰领事馆曾出版《赤峰事情》, 其中专

① 参见 Bernsdoef, W. uad Knospe, H (联邦德国) 威·伯恩斯多夫、霍·克诺斯普主编, 王蓉芬等译:《国际社会学家辞典·上卷》, 1 版, 469 页,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7。

② 参见 Bernsdoef, W. uad Knospe, H (联邦德国) 威·伯恩斯多夫、霍·克诺斯普主编, 王蓉芬等译:《国际社会学家辞典·上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7。

辟居民和风俗人情两章，其他章节也有关于当地的民众政治、经济、生活、文化、习俗等记载。

日本占领者在台北帝国大学开设“土俗人种学”课程，同时还有人类学等课程。1940年之前，马渊东一担任台北帝国大学土俗人种学研究嘱托，从事台湾的高山族研究，在当地进行民族学调查。1943年他又回到台湾，在台北帝国大学担任南方研究所助教。这些日本学者当时的工作目的带有十分强烈的军国主义色彩，他们将中国的各民族作为落后的民族加以研究，并探求统治这些民族的方略。日本社会学家冈田谦（Yuzuru Okada, 1906—1969年）于1939—1941年间在台北帝国大学任讲师，对台湾的高山族部落的社会状况进行了一系列考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他还和尾高邦雄一起赴海南岛考察黎族的社会组织<sup>①</sup>。

1908年，日本在其侵占的台湾建立了省博物馆，开始收藏有关人类学的文物标本。1915年迁址后，有关人类学的文物标本达1900余件。经过森丑之助、移川子之藏、伊能嘉矩等人先后在高山族地区的搜集及收购、赠送，到1939年，该馆收藏的文物中仅高山族文物就达到3074件。其中以衣饰为最宝贵部分，该馆的衣饰标本可以代表高山族固有物质文化的精华。台湾省立博物馆同时也出版了不少有关民族学、人类学的论著。1933年，由台北帝国大学教授和该馆人员组成的“博物馆学会”出版双月刊杂志《科学之台湾》，至1943年停刊，前后共出版11卷，其中刊登的民族学论文有：移川子之

<sup>①</sup> 参见 Bernsdoet, W. and Knospe, H. (联邦德国) 威·伯恩斯多夫、霍·克诺斯普主编，王蓉芬等译：《国际社会学家辞典·上卷》，1版，45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藏的《土俗博物馆陈列型式二种》，小川尚义的《邹族的传说故事》，冈田谦的《邹族和星》，堀川安市的《台湾的番人和鸟》、《关于南洋的树皮制衣服》、《布依族之历板》，宫本延人的《恒春地方的高砂族》、《峇厘岛之雕刻》、《原始人的居住》，藤泽佈的《以高砂族为被验者之心理学实验之情况》，新井英夫的《关于平埔番之木雕》，石板庄作的《凯达加兰之番歌》，安倍明义的《岸里大社》，山田金治的《泰雅族的造酒用植物》，饭沼龙远的《台湾之迷信——童乩》，须藤利一的《关于结绳》等<sup>①</sup>。

1938年2月，日军占领海南岛之后，台北帝国大学的金关丈夫、浅井惠伦、奥田彗、野口尔吉、藤原彰夫和冈田谦，日本外务省的高桥晴贞，东京大学的尾高邦雄、牧野巽，满铁部的天野无之助，大东亚省的大塚令三，司法省的安平正吉、坂塚敏夫，海南岛海军特务部的屋井镇雄、内个崎虔三郎等学者先后考察了海南岛的汉族、黎族和疍民<sup>②</sup>。台北帝国大学还曾组织了海南岛科学考察团。该校教授金关丈夫的著作《海南岛民俗片断》（1943年正式出版，书名为《胡人的影子》）是根据他在1940年12月至次年1月间对海南岛实地考察的见闻写成的，记述了海南岛北部的汉人如何殓殓、拾骨、纳骨、吉葬及墓、椁、棺的形制，文中还介绍了三亚港的疍家和三亚街的回民的人口、来源、宗教、风俗和民族关系<sup>③</sup>。他还著有

① 参见陈奇禄：《台湾的博物馆和人类学的发达》，载陈奇禄著《民族与文化》，1版，台北，黎明书局，1981。

② 参见平野义太郎：《〈海南岛民族志〉日译本序》，载史图博《海南岛民族志》（日文版），东京，宙傍书房，1943。

③ 参见金关丈夫：《海南岛民俗片断》，载《黎族研究资料选译》，第一辑，中国科学院广东民族研究所印，1963。

《海南岛黎族的人类学调查》，这是对乐东县重合盆地的黎族居民进行实地调查的结果。他对当地美孚黎、侬黎和歧黎的语言、发式、文身、服饰、工艺、来源、家族构成、婚姻关系等进行了简略的描述，并对上述群体较为全面地进行了体质人类学测量<sup>①</sup>。

日本学者在此时的调查研究目的均较为明确，即为侵略中国领土服务。许多调查的直接结果就是为占领军和日本政府提供制定政策的咨询报告，在资料中也不乏曲解、有意贬低的内容。但是由于有较强的经济力量支持，日本学者又善于进行较为细致的资料搜集和整理工作，他们的许多成果为我们进行抗战时期曾为沦陷区的这些地方的民族学研究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宝贵资料。我们应当从其资料积累方面分析抗战时期沦陷区的民族学的调查与研究工作的影响。

---

<sup>①</sup> 参见金关丈夫：《海南岛黎族的人类学调查》，载《黎族研究资料选译》，第一辑，中国科学院广东民族研究所印，1963。

## 第八章

### 民族学中国化的问题

在中国民族学的发展过程中，如何将西方移植来的理论与方法运用于中国的社会与文化的实际研究，并在研究实践中探索中国民族学发展的道路，始终是学科发展的一个中心问题。

#### 第一节 综合诸学派思想的思考与实践

在较早阶段，许多学者在西方留学或接受西方学术思想影响之后，借鉴西方的民族学理论，试图将西方的民族学理论应用于中国，以求中国学科水平的发展。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组和当时中国的许多有关研究机构在最初开展工作时都试图直接以

西方理论为指导，研究中国的实地材料。如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费孝通、林耀华、杨庆堃、廖泰初等听了派克讲学之后，就开始商量用人类学的实地调查方法去研究中国的社会。

引用和模仿西方的理论是中国民族学发展的初期的特点。人们在初接触国外的学术理论之时，尚没有条件和能力加以比较分析，同时由于介绍不足，缺乏比较，可能对某一种理论在没有太多分析时表现得较为迷恋，因此早期的这种借鉴是借用型的。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最早引进西方学术的部分人满足于不同于原有话语系统的新鲜说法有关。当时，部分人对传统感到不满，在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印刷品的影响下，甚至出现了对新话语的崇拜。总的来看，民族学在当时基本上是属于一种舶来品。

有一些人接受国外的学术理论后，受影响较大。他们甚至追随当时少数人提出的西化论，在民族学学术发展上主张全盘西化。陈序经对胡适和梁漱溟的西化理论进行了批判，但提出的是更进一步的全盘西化论。陈氏的西化理论建立在文化整体论的基础之上。他主张西方文化是一个整体，一种文化中的各文化单位都有连带及密切的关系，是分开不得的，要格外努力地去采纳西洋的文化，诚心诚意地全盘接受它，对西方文化要不加分析地将精华和糟粕一起引进。他认为试图将一种文化的整体加以分割是行不通的。按照他的观点，对西方民族学等有关文化的理论也应当尽力地去采纳、去接受。但是如何去接受西方的多种理论呢？陈序经并没有能够提出有说服力的意见。事实上在引进西方民族学的理论过程中，本身就有一个选择的过程。诸多的西方民族学流派在中国都有传播，陈序经本人实际上也是部分地接受了西方的思想和文化。他的全盘西化论正是受美国历史学派影响颇深的表现。

梁启超在 1925 年就著文提倡学问独立，即发明新原则和应用已发明之原则以研究前人未曾研究之现象；无论所发明、所研究者为大为小，只要是对全人类知识有所贡献，其学问皆有价值；并认为所谓学问独立需要经过若干时期始能完成<sup>①</sup>。以后，梁启超又将他的理论进一步发展，提出：“原理虽无国界，资料确有分别，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哪种学问，都有它独立的资料，为其他国家其他民族所无。根据某种学科已经发明的原则，证以本国从新搜集的材料；或者令原则的正确程度加增，或者必要时加以修正，甚至完全改造。”<sup>②</sup>

梁氏的这种想法固然有简单化的问题，但在受传统文化熏陶的中国学者中颇有代表性。他本人在实现所谓学问独立的实践中，并没有如他所说的那样做出引人注目的成就，但他设计的应用、验证、修正，甚至完全改造的学问独立之路，却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对国外理论有初步的了解之后所作的必然选择。虽然中国当时已经沦为半殖民地，但学者们和许多国人一样，期望保住泱泱大国的地位，希望在国际上有自己的独立的学术位置。

实现独立学问的办法之一，就是综合的方法和取向。即以中国人所擅长的综合的办法，将各种理论的长处加以分析，取自己认为合理者为己所用。但单纯的借鉴未能取得学者们预想的结果。其后，更多学者开始在实践中将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治学理论和方法与西方当代的民族学理论结合起来，取各种学术思想之长，为我所用。

<sup>①</sup> 参见梁启超：《学问独立与清华第二期之事业》，载《清华周刊》，1925（350）。

<sup>②</sup> 梁启超：《社会学在中国方面的几个重要问题研究举例》，载《社会学界》，第一卷，1927。

综合是中国学者有特点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中庸、持中，不赞成偏激的态度，注意对传统内容的保持。但是同时又具有相当大的宽容性，能够将各种外来文化的内容包容在中国固有的文化体系之中。中国知识界自五四运动以来关于东、西方文化问题的思考，对中国知识分子有很大的影响。一方面，受到传统文化的浸润，他们中的多数人希望保持中国的传统文化，在研究中保持一些具有民族特点的内容；另一方面，由于接受了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因此他们也不愿墨守成规，试图用现代的学术理论和方法分析、研究当代的实际问题。这样综合的思维方式就成为中国学术界、特别是社会科学界许多学者不谋而合的想法。

民族学在中国的发展也与西方一些国家有很大的不同。由于学术发展的积累，欧美的民族学家中出现了一些世界性的民族学学派的领袖或代表人物。他们为了确立各自学派的地位，尽力说明自己与他人的不同之处，甚至以这些代表人物为核心，组成某种学派的利益团体。在学派的更替过程中，有些学派在新的学派出现之后，往往境遇凄惨，处于人人诛之的位置。西方的民族学传入中国的过程中，虽然在不同时期各学派的影响程度略有不同，但却不是一个学派在中国学术界走下坡路而另一学派才引进来。换言之，各学派在传入中国的时间上的间隔不像西方那样大，有些学派几乎是同时被介绍到中国。这样就有可能将各派理论加以比较，以我用的标准，取其所长，容易实现诸学派理论和方法的综合。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分不清西方各派学术观点的差别，或对差别理解不透，无法作出学派的选择。同时，当时部分知识分子具有某种程度的殖民地思想，崇拜和迷信西方学术理论，不愿意对西方理论加以批判。这就使西方民族学学派传入中国后界限相对模糊了。

综合的想法在许多学者中颇有市场。一些“中国化学派”的学者受其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进而提出自己的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而倾向于“中国历史学派”的部分学者的综合取向则反映在一些更具体的方面。

林惠祥在 1931 年的著文中指出，社会进化论、传播论、循环论都不可从，但也都可从。“因为三说都各有其好处和坏处，而其性质表面上虽似乎相排斥，其实却不相妨碍。我们可以取进化、传播和循环合为一炉，融合一处，而不见穿凿的痕迹。这融合而成的新说，或者可以称为‘新进化论’，因为进化的事实较多。”一方面，他倾向于进化论，同时，他又用传播理论和历史学派等观点，对西方民族学的古典进化论提出批评。他认为旧进化论的错处在于太绝对、太谨严，应当改变旧进化论偏重独立发明的态度，因为进化的历程是各民族的独立发明和相互的传播。进步是有进有退的，就一时代、一民族言之，或者有退步，就全人类全历史言之，却进多于退，其所以会进便由于传播。在进化中有渐变，也有如同革命这样的急变。更应排斥一线进化的主张，应承认各民族的历史是循各种不同的途径。旧进化论所划定的细别阶段不合于事实。他认为，最多只能保留野蛮、半开化、文明三大阶段，其标准都应有相对性，而不能太谨严。应当分别民族的兴衰与文化的兴衰，一个民族衰亡，其他民族却兴起了；一种文化离开衰落的民族却被新兴的民族吸收去，依然留存，或发扬光大。就文化本身而论，各部分虽然也有兴衰循环，但正因为这种循环递进而使文化的全体得以进化。同时，林惠祥对于历史学派也作了分析，认为这个学派提出了一种研究人类社会的方法，但不曾

提出建设性的假说<sup>①</sup>。

岑家梧对遗俗的研究，是他在对国外有关理论进行分析和比较后进行的。他认为，历史学派和功能学派是否定习俗的，他主张习俗的存在是不能抹煞的。同时，他又认为旧进化论学者视习俗为全无功能的废物一概加以否定是错误的。遗俗是前一时代的残留，然而它的功能未必完全消失，有些还转形变质，换上了一套新功能，在现代文化中有着特殊作用<sup>②</sup>。

在讨论中国边疆艺术时，岑家梧对中外的各种学说的有关理论和研究进行了分析，认为艺术是构成原始文化的重要因素之一，与其他文化要素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于原始社会生活中有极重要的功能；对于边疆的各民族之间，或边疆与中原之间的艺术的传播关系，应当作比较研究，考其发源与传播的途径，由此明了整个中国艺术的渊源；中原与边疆的民族之间，自古已经接触，文化上发生过传播关系，彼此的艺术，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所以采用中国边疆的艺术说明古代中国的艺术，是无可非议的<sup>③</sup>。

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进行广东北江瑶族调查研究时，研究者本着进行“社区研究”的愿望，“想把人类文化或社会现象当作动力的或功能的比较研究，推出其过程或趋势”，但在研究中又参考了进化学派、传播学派和历史学派等各种理论<sup>④</sup>。

将各种西方学术思想进行综合的一些想法和做法，尽管有许多不完善之处，但对以后的中国民族学发展中更多特色的形

<sup>①</sup> 参见林惠祥：《社会进化？退化？》，载《厦大周刊》，第十卷，1931（25）。

<sup>②</sup> 参见岑家梧：《遗俗论》，载《广东日报》，1949-03-04。

<sup>③</sup> 参见岑家梧：《中国边疆艺术之探究》，载《边政公论》，第六卷，1947（3）。

<sup>④</sup> 参见杨成志：《广东北江瑶人的文化现象与体质型》，载《民俗》，“复刊号”，第一卷，1937（3）。



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综合中，学者们的认识程度有很大差异，一些学者只是将这种想法加以实践，采取综合取向，进行个人的研究，以求更准确而全面地回答和解释问题。他们的这类研究作为后继者积累了更多的资料，提供了更多的回答不同问题的理论解释模式。另外，一部分学者则在这种综合的想法或实践中，加以更多的思考，将综合取向提高到民族学在中国发展的总环境中，将此作为民族学中国化的主张中的重要方面。

## 第二节 民族学与现实问题研究

民族学本身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许多民族学家，如摩尔根、博厄斯、马凌诺夫斯基、拉德克利夫·布朗等都是田野调查开创其事业的。20 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民族学家逐渐将视点转移到当代社会，为解决当代社会中的现实问题而进行更多的探讨。一些中国留学生在国外学习民族学、社会学时，就已经注意到了实地调查和现实问题的研究。吴泽霖于 1927 年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撰写的博士论文《美国人对黑人犹太人和东方人的态度》，就已注意到了美国存在种族问题，以大量的调查问卷及有关数据的统计分析说明美国种族问题的严重性，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建议。费孝通等人在国外的博士论文都是根据中国当时的农村情况的第一手调查资料撰写的。中国民族学界也在最初偏重民族学与历史研

究的结合及学科理论方面的探讨之后，越来越多地注意到了现实问题，就中国民族学界的实际情形，其重点在于中国少数民族的现实问题。

蔡元培认为民族学不仅为理论的学科，而且也是应用的科学，民族学的研究不仅与学术有关，而且与实际政治如边政边教的推行、民族文化水准的提高等都有关系。他的主张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赞同。

中国民族学界出现对现实问题的普遍关注的情形，有着学术和政治等方面的原因。在学术上，许多民族学家不满足于书本知识的探求。他们认为，书本上记载的东西是他人的描述，而不是社会的实际。民族学、社会学工作者注重实地考察，直接与现实社会发生密切的接触，与调查对象们打成一片，了解文化的全貌和社会的真相，同时也就会发现调查对象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同时，他们盼望将自己的学问与现实联系起来，使学问价值得到实现，试图以自己的学识更好地效力于祖国。他们不仅考虑学科本身的建设、发展问题，也对于怎样把学科专业知识用于国家建设和边防有一些想法。吴文藻、费孝通等燕京大学的师生试图以社会人类学的方法和功能学派的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的各种社区；沪江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大学等教会学校和大夏大学等校的社会学系建立了进行社会服务和公众教育的公社和试验区等；各校的社会学系的课程中也都有和应用有关的课程。上述举动出发点各有不同，但都是把自己的知识与社会实践结合的具体举措。虽然难以直接解决已经发生的实际问题，但他们提出了解决问题的途径，以求得对于问题的正确认识，是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可贵尝试。

在政治上，随着南京国民政府在全国的统治地位确立，开始考虑到对全国各个地区的统治。然而，即使抛开地方割据势

力的影响，由于边疆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居民复杂、语言文字殊异、风俗礼教不同、交通闭塞及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情形与内地有较大差别，政令的推行往往难以畅通，中央政府对全国许多地区无法直接行使管理。为达到扩展中央政府影响力的政治目标，了解边疆民族情况就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的迫切需要。能够不加任何训练就承担起此类调查、研究任务的民族学家们在解决这些问题，特别是边疆特殊的民族问题方面，必然有较多建树。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研究方针最初是“努力于史学的、语言学的、民族学的一切资料之有规律的搜集，而纯为求知作研究也”，“故所事研究多不涉及应用”<sup>①</sup>。然而，民族学组的调查和研究却不仅是纯学术的，如凌纯声、芮逸夫参加的中、英会勘滇、缅南段界务，对当时滇、缅边界南段未定界内之民族的调查研究，为《中央政府公务统计方案纲目》人口类国族纲所作的国族体质之分类和对于西南、东北各地民族的调查等，在政治上对边疆的开发和建设都具有现实意义。

在学术调查研究的同时，许多民族学家也致力于对广大民众和青年学生介绍现实存在的民族问题的严重性，介绍国内各民族及其文化的情况，唤起人们对民族问题的注意。1930年5月，林惠祥被推举为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演讲员，参加在中央广播电台的轮流演讲。1930年，凌纯声于4月4日作了“最近侵入西藏之尼泊尔民族”为题的演讲，林惠祥于6月

<sup>①</sup>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二十九年度至三十年度报告》，载《中央研究院档案》393—1373（系档案序号。前序号为档案总目号，后序号为案卷号。后同）。

12日作了“台湾番族调查报告之撮要”的演讲<sup>①</sup>。金陵大学文学院在成都期间曾经应成都广播电台之邀，每两周作一次“抗战建国”的系统演讲，其中包括社会学系的教授，演讲有关中国和世界问题<sup>②</sup>。

许多民族学家都在大学中进行过关于民族问题的讲演。林惠祥在厦门大学时曾经多次对学生演讲，题目有“史前人类及其文化”、“文化与环境”、“错认雷公当祖宗”等。凌纯声在中央大学讲演了“民族学与现代文化”、“黔湘苗疆调查记”<sup>③</sup>。抗战胜利后，杨庆堃在岭南大学演讲了“近十五年来美国社会变迁的观察”<sup>④</sup>。在通俗刊物上，民族学家们发表介绍民族知识的文章就更为普遍。这些较为通俗的民族知识的介绍，不仅有利于民族学知识的普及，也对加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除了通过田野调查资料说明各民族文化的成就之外，一些民族学家也著文呼吁改变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对少数民族的轻视和偏见，力主改善民族间相互隔阂和敌视的关系。江应樑在研究广东北江的瑶族时指出：“今日之中华民族，绝对不是以一般所谓之汉民族可以概括一切的，也不是如一般所谓之汉满蒙回藏五族可以概括一切的，把汉族看作主人翁来代表中华民族是绝大的错误，把中华民族分为汉满蒙回藏五族更是绝大的荒

① 参见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十九年度工作报告》，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九年度总报告》，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印，1931。

② 参见金陵大学：《私立金陵大学要览》，金陵大学印，1947。

③ 参见中央大学：a.《民族学与现代文化》，载《国立中央大学日刊》，1932（873）；b.《演讲消息》，载《国立中央大学日刊》，1933（1110）。

④ 参见岭南大学：《学术消息》，载《岭南大学校报》，“康乐再版号”，1948（70）。

唐；……今日之中华民族，实是整个的，同一的，而无所分歧的。能对于中国领土中全部民族的各个分子均有一个彻底的明了认识，方能说得到了解我们自己，方能说复兴中华民族之道。”<sup>①</sup>许多民族学家努力通过对中国各民族及其文化的研究，将学术探讨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联系起来。在这个意义上说，许多学者所从事的民族学研究实践正是为现实服务的努力的一方面。

1937年进行筹划的全国风俗简易调查，也可以视为与现实有关的研究。这项调查的目的之一是供给政府制定社会政策法规之参考。调查的筹划者认为，当时“亟须巩固社会组织，建设心理国防，故对于民众教育、礼俗改良、新生活运动、经济建设运动等，均特加注意，此种社会政策之施行，其成效如何，胥视所订法令是否适合社会实际情形以为断。惟欲求法令适合社会实情，自有待于全国各地实际材料之搜集，以资参证。……今日民众教育之推行及礼制服制等草案之拟订亦需此种实际材料，更有进者，民族复兴以民族团结为前提，如何破除民族间之隔阂，以沟通民族文化，自亦当以民族研究为基础工作，而民俗调查为不可缓也”<sup>②</sup>。

抗日战争爆发后，过去的边疆广袤之地，成为抗战的后方和基地。要有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从而在人力和物力上支援前线，提供充足的兵源，保证为前方提供各种军需物品，维护支持战争的后方交通补给线的畅通，都要求对这些地区有更多的了解和关注。帝国主义的侵略再一次向人们提醒了建设和保卫边疆的重要性，怎样调动各民族的民众积极参与抗战、在

<sup>①</sup> 江应樑：《广东瑶人之今昔观》，载《民俗》，第一卷，1937（3）。

<sup>②</sup> 国民政府内政部：《举办全国民俗简易调查方法》，载《内政部档案》5—11295。

各民族的民众中树立国家民族观念、培养适应需要的建设人才，都需要进行调查研究。这样，对于现实问题的研究更加紧迫、更为重要了。

抗日战争时期，部分民族学家努力建设一门新的关于边疆政治的专门学问——“边政学”。按吴文藻先生的说法就是“研究关于边疆民族政治思想、事实、制度，及行政”，使中国的人类学研究在理论及实践上同时并进，以边政学为根据，来奠定新边政的基础，进而辅助新边政的推行。在中国，人类学的应用在于边政、边教、边民福利事业，以及边疆文化变迁的研究<sup>①</sup>。正如梁钊韬所说，“我们现在不应再把人类学的研究视为纯理论的学问，对于实用的边政设施，似应就功能的观念，予人类学与政治学贯通起来，换句话说，就是纳入人类学的理论于实践的道路上。这么一来，边政的科学理论的确立，可使边疆政策有所依据，边疆政治得以改进，而执行边政的人，对于不同文化的边民亦可有所借鉴。”<sup>②</sup>边政学的提出，是中国民族学家试图将民族学应用到实际的政治建设中的尝试，民族学不再被看作纯理论的学问，把民族学理论与实践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了。

为了促进边政学的研究，在专家学者的促进和国民政府的支持下，成立了边政学会，在中央政治学校中特设了边政专修班，蒙藏委员会开设了蒙藏政治训练班，西北大学建立了边政学系；中央大学中专门设立边胞社会民俗学组，以后又建立边政学系；一些大学也开设了边政学课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1942年初撰写的《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一年度工作

<sup>①</sup> 参见吴文藻：《边政学发凡》，载《边政公论》，第一卷，1942（5、6）。

<sup>②</sup> 梁钊韬：《边政业务演习的理论和实施》，载《边政公论》，第三卷，1944（12）。

报告》中，还以“纯为求知作研究”标榜，说“所事研究不涉应用”，并认为“国家之研究院从事其工作，恐舍此无正准也。”<sup>①</sup>但五个月之后，在该所《一九四一年十月至一九四二年五月的工作报告》中，就易言为：“语言及人类学两组所作之边疆调查，不仅有关学术，在政治上当亦有所助益也。”<sup>②</sup>这种研究宗旨的变化说明了民族学在中国日益接近现实的发展趋势。

虽然有种种限制和障碍，但在边疆建设中民族学家作出了许多贡献，许多民族学家和社会学家参加了边政学会、中国边疆学会、蒙藏委员会等边疆建设机构的筹建工作，一些民族学家在抗日战争时参加了政府边疆建设部门的工作。吴文藻任重庆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参事、蒙藏委员会顾问、边政学会常务理事；吴景超 1935 年到国民政府行政院任职，1937 年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翁文灏的秘书，并主编《新经济》周刊；张镜予先后任职于经济部和国家总动员会议，负责统计工作；陈国钧 1943 年任中央民众教育馆民俗馆主任、国民政府教育部边疆教育督导专员；杨成志担任广东省边政指导委员会研究主任委员；梁钊韬任该会研究员兼省干训团边疆班教官，协助战时边疆政教设计与指导训练；江应樑曾任云南省边政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兼车里县县长，对抗战时期的云南边政和边疆建设工作有较多指导。

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在抗战期间成立云南边疆服务设计委

<sup>①</sup>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二十九年度至三十年度报告》，载《中央研究院档案》393—1373。

<sup>②</sup>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三十一年度工作报告》，载《中央研究院档案》393—1373。

员会，以云南省教育厅长为主席，西南联大教授陶云逵任副主席。

由于民族学家参加各地的边疆建设工作，民族学家们所着力宣传的各民族平等、尊重各民族风俗习惯等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人们的认识，有利于抗战宣传组织工作的顺利开展。许多民族学及相关专业的学生也积极投入了边疆服务和边疆建设的工作中。

江应樑主持云南省民政厅所辖的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的工作期间，编著了《边疆行政人员手册》，除介绍云南的边疆区域的基本情况外，用较大篇幅论述了革新边疆新政的基本要点。他当时主张在边疆地区的治理中应采取针对现实的特殊办法，应以合理的方法求得物产开发与人民开化，开发边疆须从政治着手并与经济文化一起展开，以求达到“边疆内域化”的目的。他初步认识到当时边疆政治腐败的情况的严重性：“官吏为代表政府之机体。政府虽有爱民之心，而官吏们所为皆害民之事，则边民对于官吏既无好感，对政府自必无尊崇服从之信心。政府在边区既不能建立威信，则每一政令之出，人民皆等闲视之，边地行政何来推动之希望。”<sup>①</sup>他认为政府应在诚、信、实三字上体会并力行，才可能在边疆各民族中建立起政府的威信。他还认为，那种以为“边民愚顽，非以威镇之不足以制服”的看法是片面和错误的，主张采取提高边民的文化水准、改进生活方式、保存固有美德和提倡夷、汉通婚等措施“开化边民”。其中，固然可以见到大汉族主义的痕迹，但亦能看到的的确是学者们在当时的情境中的冷静思考。此外，江应樑

<sup>①</sup> 江应樑：《边疆行政人员手册》，云南省民政厅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刊印，1944-04。



还以亲身的田野调查所得，提出“大小凉山开发方案”。他提议由川、滇、康三省合组“凉山建设委员会”，并提出平等对待边疆地区的各少数民族同胞、开发边疆地区的经济非掠夺边疆地区的人民的财富、提高边疆地区的生活和文化水平的开发原则<sup>①</sup>。在此前后，他还参与草拟了《腾龙边区开发方案》、《思茅沿边开发方案》等方案。

抗日战争期间，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一些边胞服务站，为所在地区的各民族群众提供医药卫生、国民教育等方面的服务，同时进行抗战宣传工作、调查边疆社会状况、联络边地土司、收集边疆文物。1942年7月，隶属于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的云南第一边胞服务站在丽江地区建立，由西南联大社会学系毕业生张征（正）东任站长，工作至1946年结束。云南第二边胞服务站设在墨江，由大夏大学政治系毕业生丁兆兴任主任<sup>②</sup>。一些民族学家参加了边胞服务站的指导和具体工作。如吴泽霖指导在边胞服务站的学生时，对于工作目的、工作项目、工作方法都有细致考虑和精心指导。1943年夏，他还亲自到站了解工作情况，又在同时进行当地民族情况的调查。江应樑也参加了对边胞服务站的指导。边胞服务站的工作人员对于所在地区的民族情况也经常进行考察、研究，以便更多地了解和熟悉边疆民族。他们的一些调查研究成果也在有关刊物上发表，为更好地处理边疆民族的实际问题，提供了第一

<sup>①</sup> 参见江应樑：《大小凉山开发方案》，云南省民政厅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刊印，1944。

<sup>②</sup> 参见全国基督教总会边疆服务部：《边疆服务消息》，载《边疆服务》，第一卷，1943（2）。

手资料<sup>①</sup>。

抗战时期关于提高国民民族素质的研究，是20世纪前半期中国民族学关于现实问题研究的另一方面。1943年7月13日，蒋介石致电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要求以科学方法对民族素质作多方面研究。承担该研究任务的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动植物研究所、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中国地理研究所、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国民政府卫生署等单位。研究题目共包括生物基础、营养环境、文化环境、地理环境四方面<sup>②</sup>。提高民族素质的研究，就生物基础方面是体质人类学的基本任务，在文化环境方面的研究是文化人类学的一大课题。以吴定良为首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组承担了体质人类学方面的研究，他们将生物遗传、血缘与人才的关系、望族家谱之分析和人类选种之方法这四个有关题目分为细类，在短期内进行规模较小的调查，并撰写和发表了一些专门论文。他们认为自然的及文化的环境在短期中与遗传不发生影响，但毕竟是人类或民族改进之重要因素。历史语言研究所史学组则同时进行文化比较研究，以探索中国国民性格问题，并讨论其如何影响于人种选择<sup>③</sup>。欧阳翥、吴定良、洪式间等还参加了民族体质改进研究会的研究和讨论。西南联大的潘光旦教授等也对研究民族素质改进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民族学家对民族教育和边疆教育给予了较多的重视和研究，一些民族学家直接参与了当时的边疆教育的建设工作，将

① 参见张正东：《遵循吴师教诲致力民族研究》，载赵培中主编《吴泽霖执教60周年暨90寿辰纪念文集》，1版，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

② 蒋介石：《致朱骝先电》，载《中央研究院档案》393—2124。

③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致总办事处函》，载《中央研究院档案》393—2124。

民族学的学科知识用于民族教育的创建和改进。李安宅在抗战时曾担任教育部视导员。由于川、甘、康、青四省交界地区彼此不相系属，政令推行不易，情况缺乏，他于1941年对四川、西康、甘肃三省边境地区的民族教育进行视导。他考察的项目有边疆教育行政、边疆学校教育、边疆社会教育、寺院教育及其他可以在教育设施方面有参考价值的民族与文化情况等。他对视导地区教育提出了许多意见，事后写出了专门的报告书，提交教育部和四川省教育厅研究改进。其中，包括对短期小学和寺院所设小学的督导改进、教育行政人员应辞去兼职、制定小学教员领薪办法、提高教师待遇、注意国语注音符号的推行、复制地方文献、补助地方小学、增加少数民族学生等<sup>①</sup>。

凌纯声、吴文藻等民族学家抗战时期也参与了边疆文化教育的工作，凌纯声还担任了国民政府教育部边疆教育司司长。由国民政府成立的边疆教育委员会有凌纯声、吴文藻、刘锡藩等民族学家。该委员会曾经制定了《边远区域教育视导员暂行规则及劝学暂行办法》、《边地教育视导应特别注意事项》等文件，同时部署和领导了边疆教育考察、边疆教育调查研究等工作。在历次边疆教育会议中，他们曾先后提出了许多关于边疆教育发展的提案，如“如何推进边地国民教育案”、“如何推进边疆教育研究工作方案”、“编辑边疆学校教材及读物案”、“如何优待边疆教育人员案”、“推进宗教教育案”等。在边疆教育委员会的各类提案中，也以关于边疆调查研究及人才训练类数量居多<sup>②</sup>。

<sup>①</sup> 参见李安宅：《视察川甘边疆教育要点》，载《教育部档案》5—12401。

<sup>②</sup> 参见国民政府教育部蒙藏教育司：《边疆教育概况》，教育部蒙藏教育司印，1943。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和殖民主义体系开始瓦解，中国民族学界也进一步认识到民族学应用的意义。许多学者著文阐述了在中国发展应用民族学（人类学）的主张。凌纯声的《中国边政改革刍议》、黄文山的《综论殖民地制度及其战后废止的方案》、吴泽霖的《边疆问题的一种看法》、马长寿的《人类学在我国边政上的应用》和《少数民族问题》、卫惠林的《战后世界民族问题及其解决原则》和《论世界文化与民族关系之前途》、丁骥的《边政更张的一种看法》、杨希枚《边疆行政与应用人类学》等文相继发表，讨论当时中国和世界的民族问题，并从理论上阐述发展应用民族学的迫切性。杨希枚希望政府当局和人类学家促进应用人类学的研究，他认为，在当时的中国，“今日边政的改善，已是人类学界所共鉴而不可或缓的事实；而它的改善复需要人类学的辅导。所以今后的人类学界，不仅趋向综合的研究，更应趋于实际问题的研究，始能担负新的任务。”<sup>①</sup> 这种意见代表了当时民族学家的普遍看法。

民族学家对解决边疆民族问题的途径进行了探讨，并结合学科理论重新认识。马长寿提出：重新估定民族文化价值应当应用进步的、民主的、适应的、理性的、轻重的和多数的原则，并主张在这种估定的基础上，建设边疆应当通过边疆武力的国防化、边疆政治的民族化、边疆经济的现代化、边疆语文的国语化、边疆官吏的专业化等途径来实现<sup>②</sup>。这种认识比边政学初创时已经深化了许多。

<sup>①</sup> 杨希枚：《边疆行政与应用人类学》，载《边政公论》，第七卷，1948（3）。

<sup>②</sup> 参见马长寿：《人类学在我国边政上的应用》，载《边政公论》，第六卷，1947（3）。

随着中国的民族学家对边疆的少数民族问题的认识不断加深，他们在分析、研究具体问题时，也试图上升到理论方面加以归纳。杨成志在谈到抗战胜利后中国出现的蒙古族、苗族、彝族和新疆的各民族问题时，认为这些问题的发生是少数民族问题的尖锐化，是当时中国边疆问题的结核病症。他指出，这些问题的产生是在当时国际上被压迫的弱小民族民主运动发展的时代潮流推动下，边疆与内地的教育、文化、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产物，国民政府所提出的“国内一切民族平等”的政策未见实现和边政设施建设缺乏，又加剧了民族问题的严重性。并认为，民族问题关系着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若无妥善的办法应付，或许会引起领土和国际纠纷的问题<sup>①</sup>。

当时，对于现实问题的研究不可能离开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影响，甚至时常处于其直接控制之下。我们不能一提起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民族学与现实结合的研究，就扣“御用”或“为国民党反动统治服务”的帽子来简单评论，而应当根据这些研究的目的、出发点、主观愿望、客观效果来全面地、综合地作出分析和评价。与现实结合可能会直接有利于政治统治。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重视边政是为了巩固在边疆地区的统治，但在客观上有利于加强各民族的互相了解、加强各民族的向心力，有利于共同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渗透。应该说，以上我们列举的多数事项对于国家的统一、边疆的建设是有好处的，对于各民族的发展和进步也是有益的，或者是利大于弊。

从学术发展上考虑，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促使学者们更多地考虑理论假说的合理性，更主动地寻求将自己所学的知识与实际结合，将此看作应用民族学的田野实习，从而促进了民族学

<sup>①</sup> 参见杨成志：《民族问题的透视》，载《边政公论》，第六卷，1947（1）。

的理论研究与中国社会现实的结合。同时，由于许多学者具备了较为扎实的民族学理论基础，在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中，能够用当时社会一般认识所没有具备的民族学理论来分析现实问题。在现实问题的分析和研究中并没有失去民族学家的分析、研究特点。

当然，由于当时的政府是建立在少数集团的利益和需要之上的，不可能为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有更多的考虑。当政治需要时，做出一些姿态，当边疆民族的现实问题的解决和统治集团的各种利益发生冲突时，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只能是纸上谈兵，民族学家们的努力和心血即付之东流。同时，由于时代的限制，理论方法的欠缺，特别是没有科学的方法论和世界观，民族学家的现实问题研究有可能本身就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弊病，对于现实问题的认识难达真正准确，甚至有一些大民族主义的影响，使他们的研究难以真正为解决现实问题服务。

### 第三节 民族学中国化的探索

部分台湾学者认为，在 20 世纪前半期，民族学与史学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主从关系，只是供给原料的关系，民族学家大半是史学的附庸，只是供给材料，而民族学家“甚至于没想建立一个学问的体系，或者有他自己对人类文化的看法。这种

关系维持相当长的时间没有改变”<sup>①</sup>。直到1949年中央研究院迁台和台湾大学创立考古人类学系后，这种关系才慢慢改变过来。

中国民族学到底有没有创建自己的独立体系的想法和做法呢？回答是肯定的。自20世纪30年代起，一些学者就不满足于对于西方民族学的简单移植，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发展中国的民族学学科体系的设想。蔡元培先生在创建中国民族学的过程中，在《说民族学》等著作中，就提出了发展中国民族学的设想，并且派遣学者赴各地进行调查，试图建立中国的民族学体系。

以后，这种想法又被一些处于学术前沿的民族学家发展为民族学中国化的主张。所谓“中国化”，首先是在西方的民族学的学术思想介绍和引进到中国来的前提下进行的，是把本来非中国的东西中国化，而不是中国自己化自己。中国化是以吸收外来哲学与文化为前提的，正是外来哲学与文化传入中国，才带来中国化的问题。同时，舶来的学术理论和方法如果不用用于中国的实践，就不可能得到长期的流传。社会科学只有结合本国情况，才有意义和价值。只有少数几位学者熟悉民族学知识，社会上多数人不知道民族学有何用处，民族学就没有太大的价值，就不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因而西方的民族学理论和方法要在中国生存下去，就必然依赖于中国化。当民族学在中国得到初步发展之后，中国的民族学界提出的民族学中国化的主张是符合学术发展的规律、顺应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从民族学中国化的主张、发展的过程，可以看到中国的民族学家们对于学术发展的认识不断深化的演进。由简单的采用

<sup>①</sup> 李亦园：《人类学与现代社会》，200页，台北，水牛图书出版公司，1984。

西方理论解释中国材料起步，发展到综合西方的各派学说和方法构成了中国 20 世纪前半期的民族学，再到汇合中国化运动的潮流，提出更有系统的中国化主张。

民族学中国化的发展过程，也是中国学术界由中体西用→晚清国粹派→全盘西化论→中国本位文化论→中国化运动的发展轨迹在民族学界的表现。

中国民族学的产生和发展与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进行中西文化交流是分不开的。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 20 世纪前半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同时，他们又受到国外学术思想的影响。如前文所述，中国民族学家的综合主张正是这种东、西文化结合的观念的产物。民族学中国化的提出，也同样与这种观念有相承的关系。这是与整个中国的社会科学学术界相一致的。此外，中国民族学又具有特殊性，因为民族学本身是一门重视田野工作、强调实地调查的科学，比较其他的社会科学学科来说，中国化的呼声就更强烈，学者们对此问题的思考更多，中国化的意见和看法也更加多样化。

在民族学的发展过程中，学者们对于西方的民族学理论和方法，也面临着是全盘接受、不加分析地应用，还是用分析的态度、综合的方法加以吸收采纳的抉择。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各自的见解。

概括来看，在 20 世纪前半期，建设中国民族学体系或者实现民族学中国化可以说有三种设想：第一种是利用外国民族学的方法，择其善者，根据中国的实际，综合而成中国化的民族学；第二种是以经过比较择出国外的某一学派的民族学理论为张本，实现民族学中国化；第三种是强调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主张吸收国外民族学理论合理之处，建立本质上与欧美不



同的中国民族学。

1930年，孙本文在中国社会学社的第一次年会上演讲时提出了建设一种中国化的社会学的主张。他认为，“如能采用欧美社会学之方法，根据欧美社会学家精密有效的学理，整理中国固有的社会思想和社会制度，并依据全国社会实际状况，综合而成有系统有组织的中国化的社会学，此诚今后之急务。”他认为在中国社会学的建设时期，应当依据有系统的计划，努力切实进行。首先，要有系统的介绍世界名著及欧美的重要学说及方法，统一译名，编辑社会学词典，编纂大学社会学教本及参考用书；其次，整理中国固有的社会学史料；第三是实地研究中国社会之特性。这样就可以实现上述目标。同时，他还提出应当进行实际问题研究、开展各大学的分工合作、集中全国的人才、训练大学高材生等来实施发展中国社会学的任务<sup>①</sup>。

孙本文认为，在理论上必须对国外的学科理论进行全面的研究和综合的汲取，再根据中国的现实加以检验与修改，由是取得思想上的独立。中国社会学体系的基本观点是社会整体、结合、有机和演进。研究任何社会现象、社会问题，都要从整个社会来观察，不应有所偏废。社会又是人与人的结合，必须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行为。个人与社会是密不可分的，是有机的整体。社会的本质是发展的、变动的，任何社会现象在其各自的历史进程中都必然会有发展变化。他在理论上秉承美国文化社会学派的见解，又进一步发挥，把社会学扩展到民族学的领域，将自原始至现代的人类社会都纳入其研究范围，突破了西方社会学只研究现代民族，民族学只研究原始民族的传

<sup>①</sup> 参见孙本文：《中国社会学之过去现在及未来》，燕京大学抄本（年代不详）。

统。在方法上，他也主张不能完全照搬国外，应当各取所长。

孙本文自谓他不是文化学派，也不是心理学派，而是综合学派，是系统社会学<sup>①</sup>。但由于他提倡文化社会学，认为“文化社会学可说就是应用人类学上的方法、观点与材料，以研究现代社会现象的学问。简单的说，亦可谓文化社会学只是文化人类学的扩充，由初民社会的研究扩展而为现代社会的研究。”<sup>②</sup>同时，在孙氏所开社会学基本用书目录中也列有“民族学”一项。所以，他的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对于民族学中国化也有重要的意义。

在孙氏的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中，包括建设中国本位文化的意见。他提出：首先，“为了要明了过去历史的背景，须注意历史给予我们的固有文化，因此必须对于中国文化加以全盘的研究”。其次，“要保持中国的民族精神，并求有所发扬光大”。第三，“应注意中国目前社会的实际需要”<sup>③</sup>。但他不仅没有拿出对这些实际问题的研究成果，而且也没有进行过更多的理论探讨。他虽然也提出要在中国进行实地研究，但在总体上来看，他的社会学中国化的理论探索是想要在书本上建立起宏大的体系，他本人也偏重于理论建设，但又没有组织起实地研究的力量，其社会学中国化的理论缺乏具体实践相辅，尽管详备，却只能成为空中楼阁。同时，在理论上正如他的代表作《社会学原理》一样，是综合美国当时各家的教科书而成，

① 参见陈定阔：《孙本文》，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编《中国社会学年鉴（1979年—1989年）》，1版，334～336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

② 参见孙本文：《近代社会学发展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

③ 参见孙本文：《建设本位文化的标准》，载马芳若编《中国文化建设讨论集》，57～59页，经纬书局，1935。

其中仅仅是采用了少量的当时可得的中国历史及统计资料加以引证，基本上可以被视为“土包装的洋货”。从体系的构成上看，基本上是一种多元论的产物。

他的这种中国化的主张是在以西方民族学理论在中国进行实地调查与研究的学术背景下提出的，是在过去部分中国学者主张综合的认识基础上进行认真思考的结果，反映了人们对西方学术思想认识的深化。当时，有许多中国民族学家与孙本文的这种综合国外的民族学理论和方法、进行中国民族学建设的想法不谋而合。

黄文山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民族学中国化的主张，但在对中国的民族学的建设问题上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在30年代时提出，为了使固有文化与西洋文化调适和交流，为了加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必须以民族学家的文化理论为根据，而文化理论的产生又要以事实为根据，所以中国民族学最重要的工作在于对全国各民族作有计划的实地调查，而对于各文化区的实地材料尤其需要作有系统和详尽的搜集。“要以学术公开之态度，存比较推求之虚心；在方法上，撷取西洋近数十年来进化派、历史派、功用派方法学之菁英，而去其糟粕；在资料上，参考欧美、日本无数民族调查之成绩与先例，以为解释及整理我国民族文化之张本；在综合上自应对于中国民族文化之性质、功用、法则，全盘加以说明”<sup>①</sup>。

20世纪20年代，黄文山回国后就试图扩大学科的范围，在社会学和民族学之外，另创建文化学。1932年，他为中央大学社会学系的三年级学生开设了为期一年的“文化社会学”课程。1940年春，黄文山由美国回国，“伏处重庆北碚，著

<sup>①</sup> 黄文山：《民族学与中国民族研究》，载《民族学研究集刊》，第一辑，1936。

《文化学体系》一书”，到抗战胜利时，著成 60 万字。战后，将其中之一章《文化学及其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作为由陈序经主持的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丛书之一独立出版。在该书自序中，黄文山指出：创建文化学“其最大的急务，似不在搜集资料，而在把既存资料，予以类化，及作合理的逻辑排列，进一步把文化学建立成体系的科学。这样的一种概推的科学，应具有一套参考的原则，一种动力的因果方法”<sup>①</sup>。虽然人们对黄氏的“文化学”褒贬不一，批评者认为，他的文化学体系基本上是一种纯理论的构拟，把理论上的排列和组合作为学术发展的最迫切任务。但应当说黄氏的文化学建设也是在学术体系和理论上力争创新的努力之一，应当被视为借鉴国外民族学学说促进中国民族学发展的成果。

李济也主张：“要研究人类学，中、西名词和中、西观念都要融会贯通。因此不论是西洋玩意儿，还是中国固有文化，只要与研究论题有关，都得采用。进一步说，只要与研究论题有关，不论哪种资料，哪种学科，都可以毫无顾忌地拿来使用。”<sup>②</sup> 类似的见解对后来的人们有较大的影响，而且也同今天国际学术界普遍提出综合取向的潮流相合。

费孝通在美国丹佛接受应用人类学学会马凌诺夫斯基奖的大会上讲话时指出，早在 30 年代，中国就有一批青年“开始认识到必须对我们所生存在其中的中国社会有清楚的理解，因而要求摸索出一条科学地研究中国社会的道路”。“要学到一些能改造社会、为人民服务的知识的青年人不能满足于当时学校

<sup>①</sup> 黄文山：《文化学及其在科学体系中的位置》，7~8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82。

<sup>②</sup> 张光直：《人类学派的古史学家——李济先生》，载《历史月刊》，1988（9）。

里、社会里、课堂上所传授的有关中国社会的书本知识。他们中间有一些人跑出了书斋，甚至抛开了书本，走入农村、城镇等社区去观察和体验现实的社会生活。社会生活本身归根到底是一切社会知识的来源，这一认识开动了当时的一些青年人的脑筋，开展了当时被称作“社区调查”的这项通过实地调查和体验来了解中国社会的学术活动”<sup>①</sup>。这些活动是在实践上进行中国化的学术研究的大胆举措。在此时期，以燕京大学师生为主的这些学者，与孙本文等人所提倡的中国化主张有所不同的是，他们以个人认为可以在中国有实际作用的国外民族学的最新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的实际，对理论加以实践的检验，也就是说十分重视实践对于民族学中国化的作用，使得民族学中国化不再是纸上谈兵，而真正开始投入具体的运作。

到了30年代末4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在将马克思主义用于中国实际、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的实践结合方面有了更深刻的体会，中国社会科学家也对过去的学术活动进行了反思，在不同的社会科学领域提出了中国化的主张，部分民族学家也再次发出了民族学中国化的呼声。

吴文藻为在中国建立“比较社会学”的基础，1940年开始主编《社会学丛刊》，在该丛刊的总序中，提出借鉴功能学派的观点和方法，实现包括民族学在内的社会学中国化的思想。他宣布，“我们的立场是：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证验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必须理论和事实糅和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而后现实的社会学才能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上，又必须有了本此眼光训练出来的独立的科学人材，来进行独立

<sup>①</sup> 费孝通：《迈向人民的人类学》，载辛格尔顿著、蒋琦译《应用人类学》，1版，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

的科学研究，社会学才算彻底的中国化。”<sup>①</sup>也就是以吴氏所认为的“社会人类学中最先进亦是现今学术界最有力的”功能学派的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并把它用于中国的实地研究。通过实地研究，检验和修改理论，然后再得出一种新的能植根于中国的民族学理论。与此同时，组建一支独立的民族学研究队伍，使他们能够在经过中国的实地调查、检验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工作。在此前后，他积极着手进行民族学中国化的创建工作，如布置学生们到各地进行田野调查工作、亲自主编《社会学丛刊》<sup>②</sup>等。《社会学丛刊》乙集共收入五部著作，其中三部是汉族社区的调查报告，有费孝通的《禄村农田》、张子（之）毅的《易村手工业》、史国衡的《昆厂劳工》。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的调查报告有两部，即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和林耀华的《凉山夷家》。这些实地调查报告对吴文藻民族学中国化的主张增加了更强有力的支持。

吴文藻的民族学中国化的主张选取功能学派理论作为理论依托的张本，是在反复比较国外各种学说的基础上作出的，并非对于某一学派由于师承关系而产生的特殊偏好。当时，功能学派反映了国际学术界对于学术研究的方法和理论的最新认识，同时，功能学派重视民族学与社会联系，强调实际应用性，正与以经世致用为学术调查和研究宗旨的学者们的意愿相契合。

① 吴文藻：《〈社会学丛刊〉总序》，载《凉山夷家》，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

② 《社会学丛刊》原计划分为甲、乙、丙、丁四集出版，后来实际上只出版了甲、乙两集。甲集为社会学、人类学理论及方法论，包括马凌诺夫斯基的《文化论》、张东荪的《知识与文化》、弗思（原译裴司）的《人文类型》和费孝通的《生育制度》四部。乙集主要是调查报告，包括了原定的乙集《乡镇社区实地调查报告》和原定的丙集《边疆社区实地调查报告》两集的内容。

吴文藻主张，应当应用类似自然科学上的方法——即比较法，对于各地现存的社区，作系统而精审的观察，进行社区、文化、制度的比较研究。研究应有系统性，应有规划。按照他所说，要对于社会与社区、文化与文明、组织与制度、结构与功能，以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等普通社会学基本学理，分别加以介绍和发挥。同时，注意特殊社会学的研究，以使普通社会学有根基。既研究文化的功能方面，又探讨团体的制度方面；既从事历史上的社会制度的专题研究，又作当代社会变迁的研究。更将努力推进本着理论而进行的实地调查工作，作为建立“社会学中国化”的基础。应当要求的是理论与事实的完全契合，一方面给理论以健全的基础，一方面给事实以科学的结构。这种“专刊社会学”发达之后，“比较社会学”才有立足之地。这种民族学中国化的思想并非对功能学派的照搬，而以主张在中国实际中检验、修正和发展理论为其重要特色。他的主张比过去的空谈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并有在田野调查、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等方面推行的一套实际措施作为实现民族学中国化的保证，反映了对学术问题更加深刻而具体的思索。

岑家梧在40年代初提出，因为国情不同，中国所需要的民族学与欧美殖民地式的民族学应当有本质的区别。需要建立一种中国民族学，在观点、方法和内容上都与西方的民族学有别，成为中国自己的独立的民族学。他认为，中国文化的唯一出路是综合。折衷是这要一些那要一些，结果变成不中不西；综合则不同，它是要把自己固有的文化发扬，同时又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精华，灌注新的血液，二者经过有机的综合，中

国文化才能达到更高的境地<sup>①</sup>。他的关于中国民族学的建设的看法，正是这种中国文化观的产物。

他认为：首先，从观点上讲，西方民族学的研究有很多不适用于中国，如人种不平等说、低文化总是为高文化所消灭和征服的理论、中国文化西来说等都是错误的，我们不仅不能采用，而且应予驳斥。

其次，就方法上讲，西方民族学是殖民制度的产物，采用比较法是为了猎奇，处处求异，达到他们统治殖民地的目的。中国民族学的背景是：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的文化是集合各族文化形成的，整个中华民族是由不同文化融合而成的统一体。采用比较法不是为了猎奇，而是在各民族的文化中求同，指出中华民族文化的统一性和不可分割性。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也包括了体质人类学方法、比较法、传播论方法、历史研究法等。岑先生认为，应当详细测量各民族的体质特征，这样不但可以据此以决定各民族的系统分类，同时更可阐明各民族过去的体质上相互混血而构成今日中华民族的事实。应当对各民族的文化区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划定各民族的文化区域，认识各民族的文化特质，进而研究各民族的文化互相传播、同化的现象，说明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过程。必须对各民族的历史进行深刻的研究，用历史的事实说明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重要的一员，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

再次，就内容上说，首先求出中华民族文化的统一性，还要从文化的进化和传播的观点来指出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变化过程是趋向同一，凝结为一个中华民族的整体。

---

<sup>①</sup> 参见岑家梧：《西南边疆民族艺术研究之意义》，载《贲善》，半月刊，第一卷，1941（4）。



同时，也应该根据文化区的观点来指出各区域文化的特殊性，明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

最后，根据文化辐合交替的观点，指出中华民族发展的趋势。汇合各区域文化的精华，使整个中华民族更加充实和壮大，使将来的中华民族文化达到多样统一的尽善尽美的境界。如何使中华民族达到这种境地，是中国民族学应从事研究的课题，也就是建立中国民族学的最高目的<sup>①</sup>。

由于岑家梧所接受的民族学的训练背景的限制及在学术信息获取方面的局限，在对西方民族学的批判中略显对于当时国外最新学术理论、特别是功能学派和文化历史学派的理论与方法吸收不足。然而，岑先生对西方殖民主义的民族学的批判和对中国民族学特点的分析颇有见地，没有因袭国外学者的一般见解，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综合西方学者的民族学理论，根据中国的国情，来建设中国的民族学的道路。这种意见的提出，正是中国学者在对中国的现实考察分析之后，吸收西方学术研究的具体方法，又力求摆脱西方学术理论和方法的束缚的结果。

马长寿也提倡建立中国的人类学或民族学。他认为，中国边疆有异于列强殖民地的性质，综合概括起来有下列特点：一、中国边疆并非中国的殖民地，中国只有边疆，没有殖民地；二、中国人移民，与列强以资本为手段、武力为后盾的殖民运动相异，中国移民所至之处，只有事业的组合，而无政治的力量；三、中国是列强的一个变形的殖民地或“次殖民地”；四、中国的边疆问题是内政问题，而不是民族问题；五、中国

<sup>①</sup> 参见岑家梧：《中国民族与中国民族学》，载《南方杂志》，第一卷，1946（3、4期合刊）。

的边疆早已解决了各民族间的接触问题和各种文化间的接近问题，中国的各民族早已经接触，中国的各种文化早已经接近。另外，人类学是一种既为自然科学又为人文科学的综合学问。他在自然科学中与生物学最接近，与纯理的数学及无地域性的理化科学不同，有建立为中国科学的可能。文化原有普遍文化模式与特殊文化模式之分，社会亦有共同社会与社区社团之分，心理亦有人类通性与人类个性之分。前一种是人类可共同的，后一种是因地因时而异的。中国的人类学，固然不能放弃人类所共同的一方面，但尤应注重中国人独有的一方面。同时，他认为一方面要修正应用人类学，另一方面要将一些人类学原则，如文化相对论、文化动力论、多元文化主义等在中国加以应用，以求适合中国边政的特殊情况<sup>①</sup>。

这种意见与岑家梧的看法有一些类似之处，说明了中国边疆的特点要求人们及早建立中国的人类学，但强调了中国的文化、社会与心理的个性，作为建设中国的人类学或民族学的基本理由，亦提出寻求应用人类学原则的意见。他的见解较岑氏的观点在中国特点方面的认识上略显简单，但视野更广阔一些。特别是已经注意到从社会科学的性质上去认识中国化的可能性，将讨论引至更深层次。这种意见对今天我们认识中国民族学的发展规律也有现实意义。

同时，民族学中国化的主张本身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孙本文关于社会学中国化的思想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有了新的发展，在《当代中国社会学》一书中，他进一步发挥和完善了他的意见。他提出，在理论社会学方面，建立中国化的

<sup>①</sup> 参见马长寿：《人类学在我国边政上的应用》，载《边政公论》，第六卷，1947（3）。

社会学，重要工作有三：整理中国固有的社会史料，实地研究中国社会的特性，系统编辑社会学的基本用书。他还对每一方面的工作进行了具体的阐述。孙氏在中国化问题上的工作任务的重要性的不同认识，是认识深化的结果。他认识到，必须从多方面对现实社会作详尽精密的调查与研究，才能彻底了解我国社会的本质。因而，在发展之后的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中，他明确提出了要建设一种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应用社会学，详细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加紧探讨中国社会事业于社会行政，切实研究中国社会的建设方案。此外，又把社会学人才的训练，作为中国理论和应用社会学建立之外的第三项任务<sup>①</sup>。

同样，吴文藻提出的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也由于费孝通、林耀华等人的努力，在40年代后期不仅翻译了国外名著，也发表了许多有关中国的田野调查的著作，还进行了一些类型概括的尝试。

民族学中国化，是中国民族学从对西方学术理论的简单引进和接受照搬向全面地分析西方民族学的理论并将理论的精华用于中国实际的进步。当时的中国化观点，恰恰是那些曾经系统地学习过西方民族学理论的学者提出的，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甚至还是西方民族学学术领袖的得意弟子，他们较为系统地掌握了学科理论和方法。因而，他们提出的民族学中国化，是在掌握西方民族学理论的基础上，摆脱西方学术之争，将理论用于经过广泛调查了解的中国各民族文化实际的产物，是在对西方理论在理解的基础上加以思考的结果。这种结合已经不完全是纯粹的舶来品，不是单纯地把西方的理论用适当的中国的传统概念加以解释，不是仅仅专注于西方理论的系统介绍，

<sup>①</sup> 参见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284~286页，南京，胜利出版公司，1946。

不是繁琐地罗列中国的事实，而是力图用西方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的文化，并进一步解释其中的特殊现象。他们不满足于引进和介绍，而是力图以本土资料进行研究，在本土发展中国自己的民族学。

当然，由于社会总体环境的制约，这些学者本身所具有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同时又受到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无法对中国的民族和文化的实际进行有组织地、系统地调查和研究，因而，民族学中国化在刚刚起步之时就中断了，所提出的任务当时实际上没有去充分完成的主、客观条件和环境。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他们十分有意义的奠基工作，他们在民族学中国化问题上的讨论和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对此后建设现代中国民族学具有重要意义。

## 第九章

###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民族学

中国民族学在抗日战争时期经历了高潮之后，在局势变动的新形势下，它又面临着新的选择，客观形势令其走上了一条曲折之路。

#### 第一节 对于调查成果的整理和总结

抗日战争胜利后，自1945年下半年开始，原来暂时迁到西部和山区的教学、研究机构陆续复员，迁回原在城市。许多学者的民族学研究著作在战前已经写就，或基本完成，因为战事延误了出版；当生活安定下来之后，他们便将这一批著作出

版。同时还有部分学者将在西部所作的调查加以更细致的整理，或从理论上进行总结，著成文字，陆续出版。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于1946年10月至是年12月迁回南京，该所研究人员在复员后一年内发表的论著达1000余万字<sup>①</sup>。凌纯声、芮逸夫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是抗战前的实地调查报告，1941年已经排版，因上海沦陷，未能印行；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上海）作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第18册出版。此书是20世纪前半期中国民族志中较有成就的一种。在此报告中，不仅有丰富的资料，而且表现出了方法的多元化，运用了历史、地理、考古、工艺美术、宗教、语言诸种学科的方法，并将之融于一体，既有精细入微的描写，亦不乏有见地的分析，比较《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在材料分析方面更深入一些。

费孝通从抗战后期就开始了以往的调查、研究成果的整理工作。1943—1944年访问美国时，他将云南的禄村、易村、玉村的调查报告写成英文著作《被土地束缚的中国》（*Earthbound China*），1945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来收入英国基根·保罗（Kegan Paul）书局的“国际社会学丛书”。

抗战胜利后，费孝通对以往的调查、研究的成果进行总结，试图以类型化的概括来说明和分析社会结构，其研究偏重于通论性质，《生育制度》、《乡土中国》、《乡土重建》、《皇权与绅权》等著作正是这类探讨的结果。他在研究中也依然坚持用功能主义的观点来进行分析。他的《生育制度》中更多地表

---

<sup>①</sup> 参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概况》，载《中央研究院档案》393—2636（系档案序号，前序号为档案总目号，后序号为案卷号，后同）。

现了英国的功能主义的影响。在《生育制度》一书中，他用功能学派的观点分析了生育制度所引起的活动体系，指出生育制度是建立在人类需要种族绵延的文化迫力基础之上的，是作者用社会人类学的方法研究某一制度的尝试。《乡土中国》则是社区的比较研究，与以往的调查报告的性质不同，不是对具体社会的描写，而是从具体社会里提炼出来一些概念，进而阐述中国文化的特征。

在这一时期，费孝通也开始注意到了以往的功能学派在研究中运用历史资料方面的缺陷。在实地研究工作被迫停止，回到清华大学后，他曾想藉此转变一个研究的方向，与吴晗、袁方等人组织了讨论班，讨论中国社会结构问题，并开设社会结构课程，“想借朋友们和同学们的督促，让自己多读一点中国历史，而且希望能和实地研究的材料联串起来。纠正那些认为功能学派轻视历史的说法”<sup>①</sup>。以后，这项研究的成果汇成《皇权与绅权》出版。

林耀华于1944年写成的《凉山夷家》，作为《社会学丛刊》乙集第五种于1947年出版。当时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的鸟居龙藏认为：该书“实将罗罗社会学上之事实完全网罗无遗，据此书则读者对罗罗之民族、社会、文化等，宛如身临其境，故余推荐其为近年来之佳著也”<sup>②</sup>。抗战时期他的另一实地调查报告《川康北界的嘉戎土司》也于同年发表。前一著作中，主要是围绕彝族社会最有规模的组织形式——氏族展开的，对历史方面考虑不多；在对四川西部的藏族土司的研究过程中，虽然在文中作者并没有大量引用史料原文，却注意到了

<sup>①</sup> 费孝通等：《皇权与绅权》，174页，上海，观察社，1948。

<sup>②</sup> 鸟居龙藏：《〈凉山夷家〉书评》，载《燕京社会科学》，第一卷，1948。

当地土司的历史沿革，将历史发展与现实的社会关系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说明其动态变化，表现了作者对历时性研究认识的变化和加强<sup>①</sup>。林耀华的第三部专著《四土嘉戎》，也是在整理抗战后期的考察成果的基础上写成的。

曾在“魁阁”工作的田汝康的著作《芒市边民的摆》，列为《社会学丛刊》乙集第四种出版。在该书中，作者介绍了国外人类学对宗教的研究，运用迪尔凯姆和马凌诺夫斯基关于宗教与巫术的理论，对傣族的“摆”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摆”在傣族社会中的人格和社会的完整上的贡献是其主要功能<sup>②</sup>。

抗战胜利后发表的关于彝族地区的调查报告还有曾昭抡的《大凉山夷区考察记》和任映苍的《大小凉山罗族通考》等，但或以彝族文化的描述为主，或偏重于社会组织的现状与演变的阐述，在理论上建树不多。

王兴瑞的《海南岛黎人调查报告》和《海南岛之苗人》，是作者到海南岛的黎族、苗族聚居地区实地调查后，于1937年在广州撰写的。后因为广州沦陷，原定的出版计划被迫取消。1939年，前者曾被列入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丛书，交上海开明书店，在战后得以出版。战后王兴瑞的主要精力放在行政方面，并无更多研究，但因“开发海南岛”的呼声再起，1948年，《海南岛之苗人》由珠海大学出版，总算了却了他多年的心愿。同时，他也将海南岛的实地调查的资料加以整理，发表了一些关于海南岛的苗族、黎族的研究论文。在研究中，他依然采用了进化学派与历史学派结合的方法，如在《海

<sup>①</sup> 参见林耀华：《川康北界的嘉戎土司》，载《流星》，第一卷，1947（1、5）。

<sup>②</sup> 参见田汝康《芒市边民的摆》，重庆，商务印书馆，1946。



南岛苗人之社会组织》<sup>①</sup>一文中，他对社会进化阶段和土地及财产所有制仍保持了较多的兴趣，并认为私有财产制度在海南岛的苗族中虽然存在，但由于资本累积的机会非常有限，贫富差别不十分显著，社会阶级对立的现象几乎看不见<sup>②</sup>。

江应樑根据 1937—1946 年在云南进行的田野调查，撰写了关于傣族文化等方面的若干著作。《摆夷的生活文化》完成于 1948 年夏，《摆夷的经济生活》终笔于 1949 年初。这些著作是作者对傣族十余年系统研究的成果，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后一本著作中，他用进化论的观点分析了傣族社会的发展，认为“西南民族的生活大体是保有原始形态的，换言之，即多数尚未脱离半开化的阶段，惟有摆夷（傣族）则不论从经济制度或社会组织、文化发展上看，他们确已走到了离开野蛮而步入文明的阶段中”<sup>③</sup>。同时，也依照进化论的观点，对傣族社会中的经济制度和阶级对立进行了分析。他的研究文集《西南边疆民族论丛》则于 1948 年由珠海大学印行。

岑家梧关于西南民族研究的论文集《西南民族文化论丛》，1949 年底编就，后由岭南大学社会经济研究所印行。他的另一专门以民族学、社会学的观点研究艺术的文集《中国艺术论集》，亦于同年出版。

抗战胜利之后，其他一些学者也在着手整理以往的调查研究成果，如李有义根据他在西藏的实地调查资料，写出了关于西藏的若干篇论文。马学良根据在西南调查的材料，先后整理发表了《傛文祭经的种类述要》、《傛族巫师的“呗毫”和“天

① 本文实为《海南岛之苗人》的一节。

② 参见王兴瑞：《海南岛苗人之社会组织》，载《边政公论》，第六卷，1947（2）。

③ 江应樑：《摆夷的经济生活》，92 页，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印，1950。

书”》、《从傛僛民族名称中所见的图腾制度》、《僛民的祭礼研究》、《傛族的招魂和放蛊》、《傛文作祭献药供牲经译注》、《傛文作斋经译注》等一批文章。陈永龄以随林耀华在四川西部的藏族地区调查的资料为基础，在充实史料渊源之后，写成了硕士学位论文《理县嘉戎土司制度下的社会》<sup>①</sup>。

中国边疆学会酝酿数年的《中国边疆学会丛书》终于在1946年开始出版。积极参与该会活动的马鹤天，长期致力于西北和内蒙古等地的民族的考察和研究，1936—1938年间，先后到甘肃的拉卜楞、青海的玉树、西藏的拉休寺及甘孜、四川的西部等地考察，将前三个地区的考察成果编为《甘青藏边区考察记》，作为《中国边疆学会丛书》之一刊印。

除了整理抗战期间的田野调查结果之外，一些学者也重视民族学的基础研究，包括学科的基本理论、学科史等，并认真思索，在这些方面表达了中国学者自己的见解。戴裔焯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研究民族学史，探讨西方民族学的理论与方法的发展和变化，对当时各学派均有较为客观的分析。经过比较，他认为“民族学上各个学派的理论各有所长，同时亦各有所短，截长补短，正可臻于至善”。他批评国外民族学各学派“好立异以为高，为求自异于众，对于己派之长，夸耀渲染，不遗余力；对于别派之短，指摘抨击，亦不遗余力；反之，对于己之短与人之长，都抹杀过去了。这是民族学上各个学派最缺陷的地方”。戴裔焯主张对各学派应当“博取众长，一炉共治，成为综合的新进化论”<sup>②</sup>。他的研究著作《僚族研究》、

<sup>①</sup> 参见陈永龄：《理县嘉戎土司制度下的社会》，燕京大学硕士论文，燕京大学印，1947。

<sup>②</sup> 戴裔焯：《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的递演》，载《民族学研究集刊》，第五辑，1946。

《干栏——西南中国原始住宅的研究》对此进行了实践。

人们也注意到了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如1948年出版的《燕京社会科学》第一卷刊登了书评，分别介绍露丝·本尼迪克特的《种族与种族主义》(*Race and Racism*, 1943)、博萨德(James H. S. Bossard)的《家庭情境》(*Family Situation*, 1943)、尼姆克夫(Meyer F. Nimkoff)的《婚姻与家庭》(*Marriage and the Family*, 1947)，还有拉尔夫·林顿(Ralph Linton)的《人的研究》(*The Study of Man*, 1936)、《人格的文化背景》(*The Cultural Background of Personality*, 1947)、《人学的世界危机》(*The Science of Man in the World Crisis*, 1945)和克拉克洪的《纳瓦霍人》(*The Navaho*, 1947)等，并进行了评论<sup>①</sup>。

凌纯声的学生、曾经受功能学派影响较大并在魁阁研究室工作过的胡庆钧，在评价《湘西苗族调查报告》时，引证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中提出的观点，说明功能学派的好处是能究根问底，但“过于细致地分析一件文化事实，可能会主观地走了样，反不如单纯地描写来得客观，这是功能派所遭到的另一困难。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要看到描写与分析并重的折衷观点出现”<sup>②</sup>。

<sup>①</sup> 参见《燕京社会科学》，第一卷，书评部分，燕京大学印，1948。

<sup>②</sup> 胡庆钧：《〈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书评》，载《边政公论》，第七卷，1948(3)。

## 第二节 处于动荡局势中的民族学的发展

抗日战争胜利后，许多中国民族学家们并没有因为环境的改变、局势的变化而放松对于学术的追求，他们试图继续发展中国的民族学。

抗战期间，虽然民族学的调查研究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但因战争期间各方协调不便，中国民族学会的工作难以正常进行。1941—1943年间，何联奎、徐益棠、凌纯声、卫惠林、胡鉴民、黄文山等几次试图组织召开中国民族学会年会，均因经费困难、交通不便等原因未能落实。会员只能通过当时在西南出版的《西南边疆》、《民族学研究集刊》、《人类学刊》、《民俗》、《边政公论》等刊物相互联系。1941年秋，将中国民族学会会址移至成都，在金陵大学临时校址设通讯处，由徐益棠担任书记。1942年，中国民族学会十余名会员在成都聚会，决定维持理监事会，由在成都的理事负责日常工作，并继续努力创办民族学会刊物《民族学报》，但因经费短少、物价奇涨，终成画饼，而且实际上也没有以学会名义开展活动。只是在1944年中国民族学会成立十周年时，由徐益棠、马长寿等人在成都代表中国民族学会出版了一册《中国民族学会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在这一论文集中，收进了一些质量上乘的对中国民族学发展有重要影响的论文，如论述民族分类的《中国国族的支派及其分布》（芮逸夫）、论述学科地位和发展的《现代的

人类学》(林耀华)等<sup>①</sup>。

1948年4月12日,中国民族学会在南京国立边疆文化教育馆召开了第三届年会。出席会议的有何联奎、凌纯声、徐益棠、卫惠林、孙本文、商承祖、吴定良、芮逸夫、马长寿等60余人,学会会员比抗战前有所增加。与会者公推黄文山为主席,致开会辞。大会讨论了发展民族学、人类学和文化学等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学会工作计划,如由何联奎筹备出版中国民族学会年报,与国立编译馆商议合作编辑民族学(人类学)名词及民族学辞典,编印由本会会员编著或选译最新名著的人类科学或民族学丛书,选派代表赴比利时参加“第三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或将本会会务情况及学科发展概况写成论文寄交大会宣读<sup>②</sup>。在会上,会员们又提出了制定中国民族分类系统图、绘制中国民族分布地图、设置图书资料中心与学术交流中心、筹办自由讲学性质的民族学院、举办定期连续性的学术讲演和定期的学术讨论会等计划。年会决定仍维持理监事制,选举了新的理事和监事。

在抗战胜利之后,一些民族学家认为,个人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20世纪的学术研究,必须建立在分工合作、集体研究的基础上;中国边疆文化之研究,对发展中的民族学的理论和方法,必能有重要贡献;中国边疆建设与世界民族问题之解决,必有赖于中国民族学的成绩。中国民族学会南京总会在第三届年会上提出了《建议集体研究计划推进中国民族学运动草案》,本着学术分科、区域分工和建立边疆区域学术研究中心

<sup>①</sup> 参见中国民族学会(成都):《中国民族学会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国民族学会(成都)印,1944。

<sup>②</sup> 参见黄文山:《中国民族学会第三届年会演辞》,载《广东日报》,“民族学刊”,第三期,1948-05-31。

的必要，对中国民族学的发展提出了更为具体的建议：建议政府在西北、西南建立包括民族学在内的学术研究中心，建议教育部令接近边疆的各大学注重民族学课程和边疆文化研究，建议教育部颁布边疆省份大学与内地大学教授定期互调制度，建议中央研究院、国立编译馆、国立边疆文化教育馆设置长驻边疆地区的研究人员等<sup>①</sup>。

中国民族学会的各地分会在抗战后进行了许多活动，以重振中国民族学。其中，西南分会尤为活跃。该分会是1936年成立的，战后设于中山大学人类学部，以研究民族学、人类学及其他有关科学为宗旨。1948年5月，他们在中山大学历史研究所人类学组举行了1947年度（即第一次）年会，与会者30余人，杨成志、梁仲谋、龙庆忠、岑家梧、刘节、罗香林、郑师许、王兴瑞、戴裔煊、董家遵、江应樑等发表论文十余篇。会议选举杨成志、黄文山、罗香林、郑师许、岑家梧、江应樑、林惠祥、王兴瑞等15人为理事，张廷修、刘介、罗致平等7人为监事，黄文山、杨成志、岑家梧3人为南京总会理事，林惠祥为总会监事。决议在当年暑期组织台湾文化考察团，并出版年会专刊<sup>②</sup>。

为了使知识界更明了会员们的研究工作，引起更多的人对民族学的兴趣，会议决定出版一个名为《民族学刊》的周刊，以作为在出版困难的情形中的会员公开讨论、共同发表研究成果的园地，由郑师许、岑家梧、江应樑主编，在《广东日报》

<sup>①</sup> 参见中国民族学会：《建议集体研究计划推进中国民族学运动草案》，载《广东日报》，“民族学刊”，第四期，1948-06-07。

<sup>②</sup> 参见中山大学：《中国民族学会西南分会年会》，载《国立中山大学校刊》，第十二期，1948-06-05。

上定期刊出<sup>①</sup>。该刊自1948年5月17日到1949年3月25日，每周出版一期，共出版45期。从该刊登载的文章中，可以看出，该分会的研究重点在当时所说的“西南”（即自福建、台湾、两广以至云、贵等省）地区。在该刊上撰稿者有杨成志、卫惠林、罗香林、郑师许、岑仲勉、黄文山、陈序经、岑家梧、戴裔煊、王兴瑞、江应樑、梁钊韬、董家遵、顾铁符、刘节、龙非了、熊振宗、韩振华、刘耀荃等，当时在广东的民族学家几乎均在此列。

中国社会学学会（社）也在抗战胜利后开展了一些活动，其中亦包括民族学的内容。1947年、1948年两年，中国社会学学会（社）华北分会先后在北京召开了第八届、第九届年会华北区会议。在第九届年会上，费孝通先后作了题为《文化论和人类学》、《二十年来中国之社区研究》的发言<sup>②</sup>。在中国社会学（社）的刊物《社会学刊》上，先后发表了《人类学上所理解的环境势力》（吴泽霖）、《论“民族社会”的性质》（马长寿）等民族学方面的论文。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民族学组在未迁回南京前，继续在李庄进行研究工作。石钟（石钟健）于1945年到该组担任助理员，从事白族历史的研究。次年夏季，由芮逸夫、石钟两人在邻近李庄的四川南部的兴文、珙县和筠连等地进行了为期近两月的悬棺葬调查，并取下六具悬棺，收集了丰富的资料。回到李庄后，石钟结合文献，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关于生活在夔道的西南古代民族“夔”人与川南悬棺葬关系较为密切

① 参见中国民族学会西南分会：《民族学刊发刊词》，载《广东日报》，“民族学刊”，第一期，1948-05-17。

② 参见丁元竹：《费孝通学历与著作提要》，载《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附录》，105页，北京大学印，1991。

的见解<sup>①</sup>。该组助理研究员胡庆钧则进行苗族的收继婚制的研究，因1945年11月请假离所，停薪留职，最后未能完成<sup>②</sup>。

中央研究院体质人类学筹备处，计划在抗战胜利后大量扩充仪器设备，并增设华族体质研究室、边疆民族体质研究工作站和优生实验区<sup>③</sup>。然而由于该处停办，这些计划均未实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国外的民族学有了发展和许多变化。许多中国学者注意到了学术界的新变化，并力求赶上国际学术界的前进步伐。

黄文山在中国民族学会第三届年会上讲演时，谈到国外学术界的发展。认为“民族学或人类学的科学基础日益坚固，方法越趋正确，范围愈加扩大”。在研究范围上已经以“人类关系”为其整个研究对象，在方法上采取了量度现象的计算方法，研究人类关系或个人间的互动的函数关联特征。民族学，特别是人类学，已经被部分学者视为研究人的科学的综合科学。因此，民族学、人类学科学的范围应当有所扩大<sup>④</sup>。本着这种认识，黄文山战后继续创建文化学的努力，他与当时在美国提出文化学的著名人类学家怀特通信往来，“往还无虚日”，互相启发和补充，取长补短，使理论更为完善。1949年7月，他还应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系的邀请，赴美国讲文化学课程，并与在该校任教的怀特商讨组织国际文化学学会的问题，

① 参见石钟健：《四川悬棺葬》，载中国民族学会编《民族学研究》，第四辑，1982。

② 参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三十四年度工作报告》，载《中央研究院档案》393—1373。

③ 参见杨希枚：《中央研究院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概况报告表》，载《中央研究院档案》393—2505。

④ 参见黄文山：《中国民族学会第三届年会演辞》，载《广东日报》，“民族学刊”，第三期，1948-05-31。



同时应纽约各大学之邀请，演讲世界文化的改造问题<sup>①</sup>。

由于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战时的发展，人类学在学术体系中的位置更为重要。于是在抗战胜利之后，国民政府教育部先后批准暨南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和浙江大学建立人类学系，以培养更多的边疆建设的专门人才。

暨南大学人类学系是1947年夏建立的，成为战后第一个设立的人类学系。该系归属于理学院，由刘咸任系主任兼理学院院长。任职于浙江大学的吴定良曾兼任该系教授。这个系还设立了民俗文物标本陈列馆，搜集民族学文物。

浙江大学的人类学教学和研究，是由吴定良一手策划和积极推进的。1946年秋，中央研究院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撤消后，吴定良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邀，任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开设普通人类学和统计学等课程。1947年春，史地研究所增设人类学组，吴定良任组长。是年秋，浙江大学人类学系创立，由吴定良担任系主任。次年1月，由该系师生和其他系爱好人类学的师生成立人类学会；成立大会之与会者达70余人，由吴定良等11人担任干事。吴定良等还开设了普通人类学、民族学、体质人类学等课程，由各系学生选修<sup>②</sup>。1949年初，尽管一贯支持人类学发展的当时的浙江大学的校长竺可桢认为“时局不佳，经费困难，此时不应谋扩充”<sup>③</sup>，但吴定良还是通过努力，创建了浙江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先后在浙江大学人类学系任教的除吴定良外，还有由英国学习归来的田汝康以及张宗汉、金祖同等。

① 参见中山大学：《黄文山陈宪章两教授赴美讲学》，载《国立中山大学校刊》，第二十五期，1949-07-31。

② 参见浙江大学：《三十七学年度考试科目》，载《浙江大学档案》53-1-3813。

③ 参见竺可桢：《拟成立人类学研究所呈》，载《浙江大学档案》53-1-569。

该系在成立后，先后筹备进行了“处州和浙闽边界畚民生活与体质调查”、“台湾高山族之原始文化”、“婆罗洲土著之人类学研究”和“浙东成人体质之研究”、“杭州儿童体质发育之程序”、“近代华族颅骨之研究”、“浙省人血型之研究”等课题的调查研究<sup>①</sup>。吴定良还承担了中国教育学会杭州分会的有关课题。他研究的问题是：边疆教育之设施应如何力谋与当地的交通、卫生事业相配合，以资联系而增效率<sup>②</sup>。浙江大学人类学系还编辑了《中国人类学刊》和《人类学志》两种刊物，并争取经费，得到商务印书馆承印《人类学集刊》的承诺。

该系注重研究和搜集各种人类学原始资料。在1948年底曾举办了台湾高山族的文物展览，展品有500多件，大部分为丁惠康、庄学本两人的收藏品。同时还陈列了各地的史前猿人模型、浙江史前石器及殷墟甲骨等<sup>③</sup>。当时，该系还建立了标本陈列馆，分人类学和民族学两部，计各种标本模型4000余件<sup>④</sup>。这些标本有部分是从中央研究院运来的，也有一些是以后陆续采集的，还有一些是从南京、上海其他学术机构借来的标本。由于有以往研究的积累，同时在研究队伍中有体质人类学专家，在调查的项目上显然比过去有所拓宽。在该校史地研究所的1937年的人类学研究中，主要是浙江畚民的体质与文化调查一项，调查内容分畚民之来源与迁徙情形、

① 参见浙江大学：《人类学系举行台湾高山族文物展览》，载《国立浙江大学日刊》，“复刊第九十二号”，1948-12-24。

② 参见中国教育学会杭州分会：《第四次全国教育会议教育问题草案》，载《浙江教育档案》53—2—25。

③ 参见浙江大学：《人类学系工作积极进行》，载《国立浙江大学日刊》，“复刊新四十一号”，1948-10-01。

④ 参见竺可桢：《拟成立人类学研究所呈》，载《浙江大学档案》531—569。

畚民之地理分布、畚民之物质与社会生活、畚民之精神生活、畚民之生理与心理等<sup>①</sup>。

1949年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杭州之后，浙江大学人类学系提出改制问题，申明该系教育目的为造就人类学的高级研究人员、训练边疆地区的工作人员、培植各城市博物馆与陈列馆的技术人员、训练有关实用之体质检验人员。在教学方针上重应用，与社会发生密切联系，偏重技术，注重中国材料。同时，对课程进行了调整，删去优生学，增设了中国边疆民族、边疆语言、博物馆学以及标本制作与鉴定法等课程。计划增聘闻宥、吴汝康、马秀权等到系任教<sup>②</sup>。

清华大学人类学系于1947年设立，隶属于文学院，由吴泽霖任系主任，胡庆钧先后任教员、讲师，李有义在不久后到该系，先后担任讲师、副教授。该系“注重研究东方缅甸等民族文化及其语言”<sup>③</sup>。课程一半以上与法学院的社会学系相同，另有普通人类学、语言学、地质构造、古生物学、边疆区域地理等。该系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关系较为密切，教师经常在两系讲课<sup>④</sup>。在吴泽霖的努力奔波之下，1948年人类学系与社会学系、哲学系、建筑学系合办了文物陈列室，搜集了古铜器、陶器及西南少数民族的衣饰等文物。吴泽霖说服清华大学校长，以重金收购了从台湾运回大陆的一批高山族文物。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是在数十年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和教学

① 参见吴定良：《浙大史地研究所人类学研究计划》，载《浙江大学档案》53—1—239。

② 参见浙江大学：《人类学系议决改制》，载《国立浙江大学日刊》，“复刊新一五号”，1949—06—03。

③ 梅始琦：《本校复员后院系充实计划草案》，载《清华大学昆明办事处档案》。

④ 1995年胡庆钧先生口述，王建民记录稿，未刊。

的积累基础上建立的。1927年，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中就设有民俗组和人类学组。改设文科研究所后，又在历史研究部内设人类学部，一些研究生选习人类学科目，1936年开始招收人类学专业研究生。1947年，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历史学部下设人类学组，次年改组为历史研究所人类学部。在该校有杨成志等一批民族学家、人类学家任职，在科学研究、边疆教育、边政设计等方面成果显著；同时，在教学、出版、设备方面也具备一定的条件。因此，1948年3月，中山大学文学院教授、历史学研究所人类学组主任杨成志提出《国立中山大学设立人类学系建议书》<sup>①</sup>。经过酝酿，人类学系于是年秋建立，除人类学组原任教师外，增聘卫惠林、戴裔焯、梁钊韬为该系教授。

中山大学建立人类学系的目的在于介绍世界各国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健全我国人类学的基础，使之能够与国际人类学并进；搜集我国各种资料，进行实证比较研究；根据体质人类学测量的结果，促进民众健康；探讨我国各民族文化的特性与变迁及对科学理论上的贡献；研究聚居边疆民族的现状与文化；研究华侨发展史；观察人类关系，增加人类相互合作；主张人权尊严、民族平等、种族合作，促进世界大同之理想<sup>②</sup>。事实上当时的时局已经不可能全面实现上述各种目的，但建立人类学系的举动使民族学的研究阵营和领域进一步扩大，适应了国际学术界的新进展。努力在中国建设人类学，将民族学和体质人类学结合起来研究，以人类学促进民族学成为当时一些

<sup>①</sup> 参见杨成志：《国立中山大学设立人类学系建议书》，载《广东日报》，“民族学刊”，第十二期，1948-08-02。

<sup>②</sup> 同<sup>①</sup>。

学者试图重振民族学研究的途径之一。

1949年1月2日，以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为主，建立了中山大学人类学会，有会员数十人，制订了会章，由选出的干事负责学会的工作<sup>①</sup>。该系组织了若干学术演讲，如请余天休讲“中国秘密会社”，请周信铭讲“社会心理学中与人类学有关的问题”等<sup>②</sup>。还聘请了美国的社会人类学家、芝加哥大学的社会科学院院长雷德斐尔德（Robert Redfield，当时又译为勒德菲尔德，汉名瑞德斐，1897—1958年）在进行中美文化交流之考察之际，作学术演讲，讲题为“芝加哥大学的改制与社会科学研究”<sup>③</sup>。

辅仁大学于1948年建立人类学系，开始招收人类学专业的学生。同时，该校人类学研究所继续招收研究生，培养人类学方面的硕士。雷冕、季羨林、贺登峰（A. Grootaers）、赵卫邦、施格莱、蔡斯克等人担任教师，为研究生开设的课程有民族学、语言学、宗教学、宗教史、民族史等。他们曾到华北一些地方进行调查，如对华北秘密宗教的调查、对宣化宗教庙宇和语言方言分布的调查等<sup>④</sup>。

中国政府收回台湾之后，在原台湾帝国大学任教于“土俗人种学研究室”的一些日本学者留在台北，宫本延人讲授台湾高山族民族志，金关丈夫讲授体质人类学等课程。一些中国大

① 参见中山大学：《中山大学人类学会成立人会纪实》，载《广东日报》，“民族学刊”，第三十四期，1949-01-14。

② 参见中山大学：《研究学术风气浓厚，各学会请教授专家讲演》，载《国立中山大学校刊》，第十九期，1949-01-05。

③ 参见中山大学：《美国社会人类学家勒德非尔德博士莅校演讲》，载《国立中山大学校刊》，第二十期，1949-02-05。

④ 1995年王辅世先生口述，王建民记录稿，未刊。

陆的人类学家迁到台湾之后，于1949年秋建立了台湾大学文学院考古人类学系，李济担任该系主任。在该系建立前，是年7月，以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陈绍馨为团长，李济、董作宾等为团员，组成调查团，到台中县调查瑞岩高山族泰雅人体质与文化，开始了收复台湾后中国学者对台湾的调查与研究活动。这些活动对日后的台湾人类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各大学的社会学系、边政学系复员之后，也致力于学术研究的恢复和调查工作的重新开展。1947年有六所大学继续开设边疆讲座，共有九个边疆文化团体获得国民政府教育部的研究补助。该项补助给予指定专题的研究，每年要考核成绩，核发补助费<sup>①</sup>。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回到北京后，潘光旦任该系主任，费孝通、吴景超也到该系工作，再加上原西南联大的社会学系的其他教师，一时颇具声势，开设了社会变迁、人文区位学、社会文化等与人类学有关的新课程。

燕京大学迁回北京后，其社会学系积极安排调整有关课程，除原有课程外，将中国边疆民族学课程改为民族志和边疆社区，增加家族与社会、人格与文化、人类社会比较研究等课程。迁回北京后，该系的学生日渐增加，更多的同学、尤其是女生就读该系。该系平郊村的田野调查工作也重新恢复<sup>②</sup>。美国学者雷德斐尔德1948年曾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学。因为当时中国时局的关系，未能到更多的大学演讲，不过他曾应邀

<sup>①</sup> 参见国民政府教育部：《中华民国三十七年下半年度教育部工作计划》，国民政府教育部印，1948。

<sup>②</sup> 参见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系近十年概况》，载《燕京社会科学》第一卷，1948。

到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授课，并住在清华园。

中央大学边政学系迁回南京后，继续培养有关蒙古族、维吾尔族和西藏文史三组学生。教授有韩儒林、卫惠林、董同龢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凌纯声、芮逸夫为兼职教授。开设有边政制度、边疆民族史、民族学调查方法、民族志、语言学和少数民族语言等课程。1948年秋冬，中央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部分教师南迁，继续留在南京的中央大学边政学系主任韩儒林聘请徐益棠、马长寿、马学良到该系任教<sup>①</sup>。

1948年，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恢复工作，所长由伍锐麟担任。该所的研究重点转向对西南经济的研究。当年夏天，由岑家梧主持调查广州伊斯兰教徒的社会，认为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均与其宗教制度有密切联系，并以其经济合作制度解释广州的穆斯林以寺院为中心构成的特殊社会组织的形成原因。调查之后，岑家梧著有《广州回教社会调查》，作为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专刊甲集第四种于1949年5月出版。该所还制定了有关西南经济等方面的研究和调查计划，同时，陆续出版该所专刊甲、乙两种，其中有《南洋与中国》（陈序经著）、《三水蛋民调查》（伍锐麟著）、《干栏——西南中国原始住宅的研究》（戴裔煊著）、《摆夷的经济生活》（江应樑著）、《西南经济文化论丛》（江应樑著）、《文化学及其在科学体系中的位置》（黄文山著）、《中国收继婚姻之史的研究》（董家遵著）等著作<sup>②</sup>。

<sup>①</sup> 参见石兴邦：《深切怀念马松龄老师》，载王宗维、周伟洲编《马长寿纪念文集——纪念马长寿先生诞辰85周年逝世20周年》，1版，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

<sup>②</sup> 参见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概况》，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印，1949。

杨庆堃于1948年到岭南大学社会学系任教，代理陈序经的系主任职务。他着手进行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改进课程内容，将最新近的知识加入，以配合中国社会建设的需要；二是积极开展社会实地的调查，减少书本知识与社会的距离。他们对该校周围的七个村子进行了人类学与社会学结合的初步考察，并在鹭江村建立了研究站，以作为该系的实地研究的基地<sup>①</sup>。

1947年秋，岑家梧等因为公立大学收入微薄、政治上受约束，创办了私立珠海大学。岑家梧兼任法学院代院长，并聘请董家遵、江应樑、王兴瑞等任该校教授。江应樑兼任社会学系主任。他们创办了《珠海学报》，刊载一些有价值的民族学著作<sup>②</sup>。该刊第一集刊登有岑家梧的《古代社会阶段论》、戴裔煊的《中国文化由来之理论与实践》、江应樑的《凉山彝族的社会组织》、陈跃云的《家庭组织与功用》、董家遵的《从〈诗经〉中看古代图腾制》、王兴瑞的《历代治黎政策检讨》等。同时，他们还打算出版《珠海丛书》。

国立边疆文化教育馆的筹备工作自1945年开始，并且自这一年起出版《中央边报》。边疆文化教育馆在筹备过程中所做的工作有搜购图书、研究资料和边疆文物、采买和充实少数民族文字印刷设备。凌纯声出任该馆馆长。该馆也进行了边疆文化与教育情况的调查研究工作。该馆在1946年对村寨教育实验区之一的贵州榕江县车江乡进行了社区调查。该馆编纂了

<sup>①</sup> 参见杨庆堃：《社会学系半年来的实地工作方针》，载《岭南大学校报》，“康乐再版号”，第一〇五期，1949-11-16。

<sup>②</sup> 参见冯夹仪：《岑家梧传略》，载《岑家梧民族研究文集》，1版，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



梁瓯第的《车寨社区调查》即是这项调查的结果。在调查中，除了解社区的一般情况外，侧重于当地侗族的风俗与侗族、汉族之间的关系进行调查与分析<sup>①</sup>。

抗日战争胜利后，西南和西北地区部分地保持了抗战时期的民族学研究和教学的传统，成为我国新的民族学研究区域。西南地区以昆明和成都为两个中心。由于西南地区具有较好的民族学的田野调查资源，这里的部分民族学家克服种种困难，继续进行实地田野工作。

杨堃于1947年到云南大学担任社会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到昆明后不久就开始民族学的实地调查工作。由刘尧汉助教作助手，在昆明附近彝族聚居的大麦雨、小麦雨村建立工作站。以后，因为治安问题，在校方干涉下，停止了这项工作。

江应樑于1948年应云南大学聘请，担任社会学系教授。除教课外，他曾经到滇南的沙甸一带的回族聚居的乡村进行考察，此后根据这次田野工作写成了《滇南沙甸回族农村调查》。此前，抗战胜利之初，江应樑任云南车里县县长期间，于1945年夏至1946年春在车里及邻近的勐海、勐遮各村寨进行了田野调查<sup>②</sup>。

在西南地区工作的一些学者也继续进行田野调查工作。陈宗祥在抗战胜利后，在四川西部的马边县担任边民生活指导工作，对当地的社会组织、宗教等问题进行调查，先后发表了《西康栗粟水田民族之图腾制度》、《傜的宗教》、《凉山伊族系谱补》等论文。

美国学者米凯（P. M. Mickey）于1946年到贵州的贵定一

<sup>①</sup> 参见梁瓯第：《车寨社区调查》，载《边政公论》，第六卷，1947（4）。

<sup>②</sup> 参见江应樑：《江应樑民族研究文集》，1版，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

带对苗族进行民族学调查，著有调查报告《贵州的海坝苗》。1948—1949年间她又第二次到贵州的龙里地区开展田野工作。

1948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的施坚雅（C. William Skinner, 1925—）到四川考察集市贸易。他注意到集市的特殊作用，认为通过集市可以了解中国社会。到1949年底，在四川偏僻乡村调查的施坚雅还不知道解放军已经入川。1950年初，他被作为帝国主义分子赶出大陆<sup>①</sup>。

此时，西北地区的民族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分别由西北大学和兰州大学承担。1947年，经教育部批准，原属西北大学文学院的边政学系改属该校的法商学院，在原维吾尔文、藏文两组基础上增设蒙古文组，造就畅晓上述诸族文字的专门人才。黄文弼任该系主任，谢再善、马宏道、杨兆钧、阎锐、朱懿绳等在系中执教。注重奖励少数民族青年报考，着力培养边疆的建设人才，教学和研究以西北少数民族为重点，实际上包括了以西北少数民族为特定研究对象的政治学、民族学、地理学、历史学、语言学、宗教学等诸学科，成为西北大学最有特色的系。系内设边政研究室，搜集整理关于西北边疆问题的图书、文物，刊印调查报告，翻译民族学著作，编辑少数民族文字工具书（如杨兆钧主编的《维汉字典》和谢再善主编的《蒙汉辞典》）。同时，该系以“到边疆实地去”为口号，每年暑假都要组织四年级的学生赴边疆实习。1947年6月，十几位师生到甘肃、青海考察边疆的政治、宗教、语言和风俗人情等，历时三月有余。1948年夏，有21位学生在谢再善等教师的带领下，到新疆进行了长达四个多月的调查，行程两万里。考察内容包

<sup>①</sup> 参见施传刚：《美国的中国人人类学研究》，在国家教委第二期社会文化人类学研讨班上的报告，1997-01。

括历史文化遗址、社会制度、社会组织、民族关系、经济生活、风俗习惯、宗教礼仪等方面<sup>①</sup>。

谷苞于1944年秋到兰州大学任教，讲授民族学和社会学课程。1946年曾用半年多的时间，对洮河和白龙江上游的藏族聚居的农村和牧区进行社会调查。根据调查资料撰写了《卓尼的土司制度》、《朱扎七期的总承制度》等30余篇文章。1948年暑假至秋季，他又和西北师院、兰州大学的几位师生到甘肃的山丹、秦安、会宁的三个汉族聚居的自然村进行了为期三个多月的实地调查。发表了题为《会宁县韩家集调查》的调查报告，并在《河西农村的崩溃》、《河西——农民的地狱》等文章中，揭露了当时当地农民生活的困苦状况<sup>②</sup>。

### 第三节 20世纪前半期中国民族学的结局

抗日战争胜利后，外部客观形势对民族学的发展影响颇大。中国民族学家们为发展民族学、人类学所作的上述诸方面的努力面临着种种阻碍，他们所取得的成绩来之不易。但是，在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民族学的发展还是走上了萧条的结局。从国内的宏观局势来说，抗战时期在国内的政治、经济、

<sup>①</sup> 参见西北大学校史编写组：《西北大学校史稿》，1版，216页、217页，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

<sup>②</sup> 参见谷苞：《民族研究文集》，1版，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

文化各方面显得地位非常重要的边疆民族问题，已经不被社会上的多数人视为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尖锐问题，民族学家的提倡和呼吁难以得到更多的支持。国内的大形势限制了民族学的发展。

抗战胜利后，民族学的专家队伍有了很大的变动，大批学者纷纷东迁、回到东部大城市，因此造成民族学研究在人才资源上的分配不平衡局面。同时，战后许多方面的重建需要大批人才，民族学家中的一些人担任了政府职务，又使一批研究人才在此阶段无暇从事专门的学术工作，仅能够整理一些以前的研究成果付梓出版。吴文藻任中国驻日本代表团政治外交组公使衔组长和出席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顾问，虽也注意将整个日本作为一个大的社会现场来考察，力求如实地反映客观情况，但基本上暂时脱离了学术研究。凌纯声自抗战后期即主要服务于政界，战后主持边疆文化教育馆的工作，在学术研究上的大量时间被占用了。在广东，担任政府职位的民族学家更多，如黄文山、罗香林任广东省政府委员，郑师许任省参议员、中山大学训导长，王兴瑞任广州广雅中学校长、国民党广州市党部执行委员等。

国内政治局势的动荡不定，对学术发展的影响更大。国民党在抗战胜利之后不久，即发动了全面内战，加重了国统区民众的负担，造成民不聊生的局面。许多以经世致用为治学准则的学者积极从事民主运动，另外一些平常较少过问政治的学者也改变以往的态度，投身于运动之中。国民党对于参加民主运动的师生进行了种种迫害，使一些学者完全丧失了学术研究的基本条件。1946年，费孝通因发表民主言论，被特务盯梢，在闻一多、李公朴被暗杀之后，被迫到美国驻昆明领事馆避难，不久离开昆明。他原有的在云南继续从事实地调查的希望

从而落空。

经济形势也每况愈下，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物价飞涨，1947年间上涨达数万倍乃至十几万倍。在大学和研究机构中供职的教职员工的生活日益艰难，薪金远不足以维持一家数口人的最低生活，许多学者时刻为生活问题所苦恼，为衣食奔波，不能潜心去钻研学术。同时，政府拨给研究机构的经费也随着通货膨胀的加剧而日显拮据，日常维持费都时常人不敷出，更拿不出经费进行田野工作。

有关民族学研究机构东迁之后，大多数集中在东部大城市。然而，中国民族学的研究基地主要在西部地区，因难以得到足够的考察经费，再要去西部进行实地调查较为困难；尽管有进行实地调查的愿望，但缺乏实现的条件。同时，由于战争影响、局势动荡，道路交通时常阻塞，也给调查带来不便。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在回到天津之后，除了出版铅印的《边疆人文》第四卷和发表了一些根据原调查资料整理的论文之外，基本上停止了活动。原有的人员一部分参加了历史系的教学工作，另一部分加盟中文系。除了完成抗战时期的调查资料的整理工作外，基本上没有新的调查研究<sup>①</sup>。

一些民族学家在前一时期的学术实践中意识到西部地区对于中国的民族学、特别是当时定位的以少数民族文化作为主要对象的民族学研究的重要性，希望在抗战胜利后建立西部学术中心，以作为发展民族学等学科的学术研究基地。他们著文指出，应当在西部地区建立边疆大学，给予充分的政治与经济力量的支持，使之成为学术研究、文化教育运动、培植边疆的建设人才的中心，从而推动边疆的文化、教育运动。但国民党政

<sup>①</sup> 1995年黎国彬先生口述、王建民记录稿，未刊。

府并无心操持民族学等学术研究，注意力根本不在发展学术方面，缺乏资金投入。正如卫惠林批评的那样，“充分表明政府之没有正确的边疆政策，一切开发建设之口号只是徒托空言”<sup>①</sup>。令民族学家们的愿望难以实现。

部分民族学家在抗战胜利后对民族学与应用问题发表了许多见解，以求解决当时日趋尖锐的边疆民族问题。然而，因为这时的政府忙于发动内战，不关心、也无暇关心祖国边疆的前途，学者们的努力同样没有结果。

试图以办人类学系来带动民族学的发展或者以人类学取代民族学的想法也没有得到预想的结果。几所大学的人类学系因为创办时间短、国内时局不稳、对于人类学的宣传不够，报考学生人数有限，甚至可以用门可罗雀来形容。如浙江大学人类学系1947年仅在杭州录取了一名学生<sup>②</sup>。1948年录取来自福建的一名研究生，是年人类学系注册的学生只有二名<sup>③</sup>。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杭州后，加上新学年招生，该系学生数才上升到五名<sup>④</sup>。清华大学人类学系建立后，也“仅有一名学生，师生三人，号称一系。仅开出一门本系课程，实际开学时间仅一年半，以后又并入社会学系”<sup>⑤</sup>。辅仁大学人类学系则

① 卫惠林：《论边疆学术与边疆大学设置问题》，载《边政公论》，第七卷，1948（3）。

② 参见浙江大学：《本校增设人类学系》，载《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第一六二期”，1947-08-15。

③ 参见浙江大学：《三十七年度京闽两区新生揭晓》，载《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新二十二号”，1948-09-09。

④ 参见浙江大学：《招生委员会消息》，载《国立浙江大学日刊》，“复刊新一四一四号”，1949-05-09；又，《三十八年度录取新生》，载《国立浙江大学日刊》，“复刊新一八〇号”，1949-09-08。

⑤ 编写组：《清华大学校史稿》，1版，44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在 1949 年下半年并入社会学系。同时，因为资金短缺，使人类学系困难重重，短期内无法具备较好的办学条件，不能进行设备仪器的更新和补充，难以组织实地调查，不易罗致人才。和其他学者的努力一样，这些学者的举措依旧不能改变中国民族学在 20 世纪上半期的最后几年陷入口渐萧条的境地。

当国民党政府节节败退，将一些机构陆续迁到台湾时，一批民族学家也随同中央研究院、边疆文化教育馆、中山文化教育馆等与政府有关的研究机构迁到台北。这次转移又中断了这些学者正在进行的民族学研究。这不仅是部分人力资源的转移，也带走了一些研究资料。虽然在不久之后，其中一些学者在台湾又开始了新的努力，发展中国的民族学，但这次转移却造成了中国大陆的部分民族学研究机构工作的完全终止。

各种条件的变化使中国民族学家的学术救国的希望最后破灭，中国民族学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的结局是形势和时局的产物，是客观环境作用的必然结果。中国民族学家在形势变化面前作出不同的选择，除了上述随国民党退走台湾者外，一部分民族学家与中国共产党或其他左派力量接触，寻找民族学的新出路；一部分脱离国内的动荡局面，摆脱国民党的羁绊，到国外访问或学习；更多的人则静观中国局势的变化，在对现实失去信心的同时，寄托着对未来的满怀希望和憧憬。一些社会科学家相信，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能够在新政府领导下为国家作出贡献<sup>①</sup>。

---

<sup>①</sup> 参见大卫·阿古什 (R. David Arkush) 著，董天民译：《费孝通传》(*Fei Xiaotong and Sociology in Revolutionary China*)，1 版，北京，时事出版社，1985。

## 第十章

### 20 世纪前半期中国民族学的特点及问题

20 世纪前半期，经过中国民族学家的不懈努力，中国的民族学从无到有，从依附到独立，从引进到形成具有某些特点的中国学术倾向，并着力从事中国民族学体系的建设，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在此过程中，民族学在中国形成了哪些特点，有哪些值得我们今天从事民族学研究的人借鉴和思考的经验和教训，对后来中国民族学的发展产生了如何的影响呢？我们在以上各章节中，或用史料文本说明，或对文本进行概括分析及建构，已经部分地回答了这些问题。为了使这些观点更为鲜明，并更集中地阐述我们的意见，在前书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认识，再作归纳，以为全书的总结。



## 第一节 20 世纪前半期中国民族学的特点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古代一向有“礼失而求诸于野”之说，将边疆地区族群的文化看作是中原古习的残余，认为中国的各民族的文化是相互联系或承接的整体，少数民族和汉族是一脉相传的，而非异己的或隔阂的。这种认识与西方传统的族群关系见解大相径庭，而且民族歧视的意味要少得多。

同时，近代以来中国成为西方列强掠夺的目标，中国在鸦片战争后所遭受的屈辱史，中国学者的个人经历，使中国民族学家对于文化相对论的观点更容易产生共鸣。中国第一代民族学家吴泽霖在他的幼年时代，“从教科书上读到了当时世界列强如何凭武力侵占我们的领土，甚至企图瓜分我们的国家”，“亲眼看到一些殖民主义分子在我们国土上肆无忌惮地蔑视和侮辱我们的同胞”<sup>①</sup>。这类经历必然对学者们日后的学术思想的形成发生影响。同时，国人反对帝国主义民族压迫的呼声日益高涨，北伐胜利后，国民政府在国内各族平等方面也曾经提出过一些主张。20 世纪前半期，民族学在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出现后，在如此情景互动的过程中，中国民族学家对民族间相互地位的见解也必然有新的变化和补充。

<sup>①</sup> 吴泽霖：《〈吴泽霖民族研究文集〉自序》，载《吴泽霖民族研究文集》，1 版，4 页，北京，民族出版社，1991。

在 20 世纪前半期，中国民族学家在从事中国民族研究时，注意到了当时中国所处的半殖民地的地位，许多学者提出要注重各民族的平等，为中国各民族的团结与合作服务。尽管在实际研究中同样受到对少数民族定位“野蛮人”的影响，又有中国中原文化、古代文化中心的影子，仍然未能完全杜绝民族歧视和偏见，但绝大多数学者能以历史的观点看问题。一方面许多学者能够自觉地意识到民族平等，不仅承认民族文化的相对性，而且主张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上发展中国各民族的文化；另一方面，从整体而论，无论是将当时的民族学研究著作与中国古代及近代著作比较，还是和当时的西方民族学家的研究对比，中国民族学家在民族平等问题上的认识都是较为正确的，比较前人和当时多数的外国人的认识更进了一步。

自 20 世纪前半期开始，中国民族学就有一个在国际学术界十分鲜明的特点，即重视历史资料的运用。中国历代有关历史的研究著作不胜枚举；历史资料的丰富是举世无匹的，这些古代民族志资料提供了历时性研究的广泛资源；而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因为历史短暂，所留下的文献资料贫乏，只好依赖于共时性的调查研究。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认为，对中国及其周围民族之研究，“须采用中国独特之方法，即一方面为古代文献，一方面为实地研究，若此非中国学者，殆属不可能”。西方学者当时较少有关于中国研究的重要论文的发表，“盖因彼等不能读中国文献，而无法利用此项资料故也”<sup>①</sup>。中国知识分子一向重视史学，在研究中重视文献，甚至以旁征博引、精慎考据为上佳治学之道。将史学与民族学结合，早在民族学在中国发展的萌芽时期就已经有许多学者在付诸实践。中

<sup>①</sup> 鸟居龙藏：《〈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书评》，载《燕京社会科学》，第一卷，1948。

国的历史学对民族学的影响较大，许多中国民族学家都经过了较好的历史学训练，把史学功底视为民族学家必备的素质，他们能够熟练地运用史学的方法研究古代的民族志资料。这样，在注重田野调查的学科传统之上，逐渐形成了兼重历史文献，并以历史文献和实地调查资料相印证的特点。

在 20 世纪前半期，许多中国民族学家都注意到将民族学和历史学结合，把历时性研究和共时性研究融于一体，进行了纵、横结合的历史民族学的实践。通过历史发展线索的探索，可以更好地把握现实中研究对象的一些基本特点的形成过程，从另一个角度解释民族文化，更客观地说明民族文化的特征，展示民族文化的全貌。许多中国民族学家同时也是出色的民族史学家，他们的一些著作在中国民族学史的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与此同时，民族学家参与各民族历史的研究，也给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方法和观点，促进了民族历史的研究。中国民族史的研究，自始至终都与民族学家的影响和贡献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早的一些民族史研究专家中，许多就是 20 世纪前半期著名的民族学家，或接受过民族学的系统训练。如马长寿、冯家升、林惠祥、岑家梧、李有义、江应樑、梁钊韬、谷苞、陈永龄、胡庆钧、宋蜀华等，都曾在以后的民族史研究中有较大影响。林耀华、杨堃等一些民族学家，将历史学和民族学结合起来，进行原始社会史的研究，并做出了引人注目的成绩。这种重视历史资料的传统，又通过老一辈学者影响到中国后来的民族学工作者，成为现代中国民族学学术发展的特点之一。

同时，在 20 世纪前半期的中国的民族学调查与研究中，人们也注意到了民族学与其他学科的结合与联系。体质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经济学、法律学、宗教学等学科的研究

方法，在民族学研究中均有采用。这些方法的使用，扩大了民族学的研究范围，增加了民族学研究的角度，对民族文化的解释和民族的起源、分布及演变历史的追溯都颇有裨益。中国民族学兼容并蓄的传统、与兄弟学科密切合作的经验，对以后的民族学发展中博采众长、在跨学科研究中相互吸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 第二节 20世纪前半期中国 民族学发展的经验

重视田野调查，是20世纪前半期中国民族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出现之后形成的学科规范之一，并成为中国民族学家长期实践的最宝贵经验。在中国民族学得以发展的时代，书斋民族学的时代早已终结。当时，许多中国民族学家明确地认识到学科的发展“全赖实地研究者之努力，过去纸上谈兵的安乐椅上的人类学家已在落伍之列。实地研究已成新人类学之一重要特质，即理论与研究必须打成一片而不可分离”<sup>①</sup>。中央研究院的民族学组、民物学与人类学组，自建立的当年就派出几个小组进行实地调查。更多的学者在二三十年代读书时，就认真思考过怎样进行实地研究的问题。凌纯声等民族学家认为民族

<sup>①</sup> 陈永龄：《理县嘉戎土司制度下的社会》，燕京大学硕士论文。

学可以分为记述的民族学和比较的民族学两种，在中国发展民族学就必须从前者开始，于是他们将早期的研究活动的大部分时间用于田野调查。在调查中，许多学者以细致、全面著称，从调查提纲的拟定到调查的实施，均尽力按照当时的国际民族学界的规范进行。随着法国民族学派的精细调查的方法和以后的参与观察方法的介绍，在田野工作的实践中，一些中国民族学家开始尝试更深入地浸润在各民族的民众的生活之中，部分学者不顾自然环境、社会动荡、文化隔阂等各方面的困难，甚至冒着生命危险，用了较多的时间去从事田野调查，乃至去学习调查对象的语言、生活方式。中国民族学家们以不懈的努力形成了重视实践的传统，即使在最困难的时期也坚持了田野调查工作，经过不断的积累，为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各民族的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使得学者与研究对象的距离并不遥远，学者们有可能获得较为正确的认识。中国民族学家们的实践说明，除了时间的延长可能会加深参与的程度、纠正研究者的偏差之外，民族学家在本土文化或与自身文化有一定相似性的文化之中，如果能够既借助自观的体验，又从他观的角度加以分析与思考，可能会作出更符合实际、更说明内在联系的解释。通过自观与他观相结合的调查与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主观臆测和偏见。有些学者在分析时指出，为了避免外来调查者身份的影响，可以“选择训练本地方的人负担调查的任务”，在当时“最好是本地的小学教师，因为他们对于本地方种种的情形已经是知道的比较周详；他们和小学生家庭接近的机会很多；他们自己又是有职业的人，待遇可以比较的低；而且他们又有相当的智识，如果再给以调查方法的训

练，……是一种事半功倍的办法”<sup>①</sup>。不过，也有人认为，“调查员由本地人充任好还是外来的好却是一个疑而未决的问题，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缺点。”<sup>②</sup>表现了在主、客位问题上更进一步的思考。

更能够在实际中恰当地运用主位和客位两种分析观察问题的方法，必须有良好的训练作为基础。否则很难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甚至会因为本位文化的强烈影响，掩饰本位文化不愿意承认的事实，并由于本位文化的观念蒙蔽，看不到观察和分析的盲点，把太多的事物视为当然，将奇怪的行为看成是平凡而不值得一谈的事<sup>③</sup>。

在田野工作中，许多人注意到了具体问题的调查与描述，在著述中注意采用西方学术界运用较多的资料整理的方法，注意到文化的各个方面和文化的整体，观察和较为准确地报告所见到的种种现象，调查结果具有较强的规范性和通用性。一些较为杰出的民族志至今仍是较好的民族志范本，在研究中依然具有参考价值。

在20世纪前半期，中国民族学家在研究中学习 and 吸收国外的研究经验方面较为成功。一些学者在反对全盘照抄西方学说的同时，对于各自认为可以在中国应用的国外民族学学说吸收较快。如功能学派理论在中国的传播，美国历史学派的见解

① 叶钟裕：《居住调查法：对于廖泰初〈居住调查法〉的商榷》，载《社会研究》，1935（118）。

② 廖泰初：《从定县的经验说到农村社会调查的缺乏和补救的方法》，载《社会研究》，1935（103）。

③ 关于自观和他观的评论，参见 Keessing, R. M. (R. M. 基辛) 著，甘华鸣等译：《Cultural Anthropology: A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文化·社会·个人》），1版，602-606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得到许多学者的赞同，文化学的提出在中国也有知音。同时，中国的民族学界保持了与国际民族学、人类学界的学术交流。许多学者能够将西方的民族学的最新理论与中国的民族学的研究实践相结合。许多学者程度不同地采纳了辩证法、整体论、进化论、唯物论、文化相对论等各种较有见地的理论认识，用来分析中国的民族文化。如在对中国的乡土重建的研究中，中国学者提出了农村工业化、工业下乡等措施，成为农村工业化道路的重要想法。对此不仅解剖了特点，而且提出了未来发展的道路，是对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思索。验证今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发展，更能说明其意义的重大。

20世纪前半期，在中国民族学的发展过程中，许多学者在研究中强调综合取向，跳出了西方学术界固有的学派派别的圈子，没有片面地突出或标榜某一学派、有意贬低其他学派。出现了中国式的民族学的三大学派——中国功能学派、中国文化学派和中国历史学派。多数偏向于其中某一学派的学者，并没有像国外不同学派的学者那样，去攻击其他学派，说明其他学派的短处。反之，还在许多场合，表现出对其他学派的兴趣，肯定其他学派的长处。这种学风对中国民族学更全面的发展提供了可能的空间。

正是由于中国的民族学在当时具有自己的特点，在国际学术界中才能够占有一席之地。一些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获得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马凌诺夫斯基在评价费孝通对中国农村的研究时认为，《江村经济》“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成果。如果说人贵有自知之明的话，那么，一个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人类学当然是最艰巨的，同样，这也是一个实地调查工作者的最珍贵的成就”。因此，它“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马凌

诺夫斯基还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吴文藻和他的学生们“已独立自发地组织起一场对文化变迁和应用人类学的真正问题进行学术上的攻关。这一学术进攻表达了我（马氏）梦寐以求的愿望”。他预言“费博士的书和他同行的贡献，将成为他们可能完成的精雕细琢的镶嵌品中的一件件珍品”<sup>①</sup>。英国人类学家弗思在评论林耀华所著的《金翼》一书时指出，“读者早已希望能看到中国学者的这类著作，他们作为身临其境的参与者从童年起就熟悉自己叙述的场景，而且精通现代社会科学方法，本书就是这样的一部著作。”他认为，《金翼》“提供了一套作为论据的事实，它将有助于摧毁任何残存的中国人在社会事务中麻木不仁、不可理解的神话”<sup>②</sup>。李安宅对美洲印第安祖尼人的研究也引起了美国学术界的注意，至今仍被当作重要的实例，说明美国的白人人类学家对印第安文化认识的偏差<sup>③</sup>。

在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民族学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在学术概念、规范上的一致性，中国民族学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较多，许多著作用西文发表，更多地受到国际学术界的注意。《江村经济》、《金翼》、《凉山夷家》等许多著作至今依然经常为欧美研究中国的学者们所引用。中国学者的研究能够面向世界，使中国化的内容也成为世界化的东西。

① 参见 Malinowski, B. K. (马凌诺夫斯基): 《〈中国农民的生活〉序》，载《江村经济》，中文1版，1~6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

② 参见 Firth, Raymond (R. 弗思): 《〈金翼〉导言》，载《金翼》，中文1版，4~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③ 参见 Keesing, R. M. (R. M. 基辛) 著，甘华鸣等译: *Cultural Anthropology: A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 (《文化·社会·个人》)，1版，603~604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 第三节 20 世纪前半期中国民族学 发展中的几个问题

在 20 世纪前半期，中国的民族学研究中，由于各种势力对马克思主义的诋毁，同时许多有成就的学者在西方接受民族学的教育与训练，而对马克思主义难以正确地加以认识，再加上各种压力的影响，在一些民族学家的研究中由于各自的偏好，往往较为看重文化的某种特质或以学者个人见解所确定的“文化的整体”，没有能够完整地认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表现出对经济基础、经济生产活动不够重视的现象。

在当时中国民族学家中民族平等的认识成为主流，但亦有一些不够完善之处。传入中国的西方民族学对中国的少数民族是以“野蛮人”作为对象定位的，这种学术影响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心主义有一定的契合。中国的传统文化将中原的周边民族视为炎黄支派的支派，将边疆地区看作蛮荒之地，甚至一些君临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也要尽力论证其正统地位。少数学者依然存在蔑视少数民族的认识；个别入认为汉族文化先进，少数民族文化落后，主张以汉族同化少数民族；部分学者不能摆脱大民族主义的阴影，接受了当时较为普遍的对于中国民族问题的传统认识，即中国汉族与少数民族是同源而异流的支族；还有一些人受到蒋介石等人关于中国国族和宗族主张的影响，认

为中国只有宗、支之异，没有民族之别，在研究中以种种形式表现出大民族主义的倾向。

民族学的田野调查，是建构理论的基础，工作的目的是为了验证特定的假设，通过田野工作可以检验、增强或修改已有的理论框架。正是民族学的田野调查活动，使人们不断纠正以往的理论上的失误或错误，对人类社会作出更接近实际的、更有说服力的解释。理论的发展反过来又要求人们进行更多、更深入的田野调查，以进一步发展和建立理论。但是，在20世纪前半期，对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学者们把握也有不同，许多人没有能够进行正确的理解。在研究中往往出现两种倾向，一是关注中国各民族文化的各方面的实际调查，但不愿意进行更多的理论分析和归纳；在许多调查报告中，我们看到了十分具体而细致的描述，却缺少理论总结，使报告的一些部分显得较为臃肿和累赘。一是注重理论框架的设计，强调理论体系的构筑，而忽视和看不起田野调查；在中国文化学派的一些学者的著作中，我们能够阅读到较为精彩的学理分析和论述，但缺少中国的实际材料的支持。这两种倾向，均是将理论和实践对立起来的作法。

除了上述两种倾向之外，20世纪前半期，中国的许多学者看重分析问题的具体方法，在学科理论高度或总体的方法论上把握则较为欠缺。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到理论的完整的理论发展的模式没有能够更多地展现，这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在客观上，中国的民族学起步较晚，许多学者因局势动荡，未能着手进行后一步的工作。在主观上，许多民族学家在哲学思想、理论修养方面存在知识结构的欠缺环节，难以进一步深化和提高。有的学者就事论事，忽视理论分析，而根据表面现象作简单推论；有的学者对民族学的理论不了解，根本不

可能利用这些理论去研究问题；有的学者借用国外民族学的某一学派的理论，但没有注意对其理论的思索；更多的学者注意了国外理论的借鉴，却没有把它用在中国调查所得的资料中去修正理论。因此，在20世纪前半期，许多中国民族学家尽管进行了许多有成效的工作，但没有处理好民族学的田野调查和理论归纳总结的关系，许多研究成果在当时还可能有一些影响，却无法使之长久地保持或进一步扩大。当然，这种现象是中国民族学发展不充分的产物。但其结果是不能够把研究成果应用到学科理论推进的高度上，影响了民族学的理论在中国的发展，民族学中国化也就难以真正实现。

在田野工作中，参与的程度是值得注意的。多数中国学者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多数学者一样，并没有真正进入调查对象的社会与个人生活的内部，调查往往长则数月，短仅十数天，在一个调查点上停留的时间更为有限。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调查者的参与程度。同时，作者的身份也限制了他与调查对象间的沟通，调查者往往被视为政府官员或来自大城市的学者，与研究对象有一定的距离，从而妨碍了调查者收集资料。如凌纯声等人到湘西调查时，当地一些人认为：“此次中央派委员数人遄赴湘西调查苗乡风土人情，在中央之意，多半以为汉苗之间言语不通，习惯不同，全行禁止，诸多不便。派员调查，以为移风易俗化异为同之张本”<sup>①</sup>。因而他们对调查者了解传统文化的工作过程大为不满。当时的研究者甚至已经看到，中国的广大民众“饱受乱世之害，无时不存着戒备的心思，穿一件光鲜点的衣服已经够使他们惊异，何况是一个外来

<sup>①</sup> 石青阳：《致蔡元培函》，载《中央研究院档案》393—280（系档案序号，前序号为档案总目号，后序号为案卷号，后同）。

的人，甚或说不同的方言，衣食起居都和他們有点异样；结果自然是怀疑，……一切应答的话都跟着换了一种口调，这种情形是常常遇到的”<sup>①</sup>。当然，这个时候绝大多数学者并不能够清楚地认识到阶级、阶层的差异带来的问题。

在调查过程中，即使沟通已经建立起来，双方沟通的目的也并不一致，直接影响沟通效果。这样，即使在所谓较深浸润的调查中的资料的可靠性也存在着一定的疑问。参与程度和实际效果不仅是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民族学的调查研究实践提出的疑问，也是今天发展中国民族学所应当解决的。同样，也是国际民族学或人类学界长期以来并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

同时，从民族学的研究和教学的具体环节来看，也有一些弊端和问题。在20世纪前半期，由于学科发展不充分，在教学中，虽然有了一些有关系、科和课程的设置，开展了民族学的教学工作，但从总体上说，教学活动也遇到许多障碍，甚至连课堂教学也经常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难以持续。民族学队伍的阵容较小，师资参差不齐，对教学方法的把握也人各有异，这些在教学效果上必然反映出来。

---

<sup>①</sup> 廖泰初：《从定县的经验说到农村社会调查的缺乏和补救的方法》，载《社会研究》，1935（103）。

#### 第四节 早期中国民族学对以后 学术发展的影响

在学术上兼容各种观点，尤其是进化论的学术思想在中国民族学界有一席之地，对于日后的中国大陆的民族学工作者接受马克思主义观点，以新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的民族学问题，均有直接的影响。一些专家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就写出了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民族学问题的文章，如杨堃的《试论恩格斯关于劳动创造人类的学说》、林耀华的《从猿到人的研究》、林惠祥的《从猿到人——劳动创造世界》等一批论著都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不久发表的。许多学者在 20 世纪前半期并没有以进化论为主要理论体系，但是，中国学者没有像西方学者那样在提倡或赞同某一学派的同时，去贬低其他学派；同时，中国传统史学的积累和西方现代学术思想传入中国初期的宣传，也更容易使人们相信人类社会的确经历了进化和发展的进程。因此，即使以前未曾公开表示对进化论的兴趣，学者们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学说的过程中，总是比较容易通过的。而且他们中的多数人还能够很快转变，更进一步地用这种理论去研究和解释问题。

部分学者对于如何解决实际问题有更多的考虑，这种面向社会和民族问题的实际的想法和作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学者们经过思想改造，在自我重新定位之后，立即与中

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工作结合起来，为解决民族工作中的实际问题而东奔西走，有人还参与了当时一些工作的策划和筹备。

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民族学家在专业上训练较为全面，一般都有较为系统的研究所需知识，并掌握田野工作的基本方法，因而一些人在大学读书期间还作为学生时就能发表较有见解的论文，就能独立地进行各民族文化的调查研究。有些还学习了国内外的硕士或博士学位课程，掌握了更多的知识，了解了世界民族学的各种流派的理论，并运用中国的实际材料进行研究。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已经建立起一支训练有素的民族学的调查、研究队伍。许多民族学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不需要更多的训练，在经历了思想改造之后，立即投入了民族识别、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等较大规模的需要运用学科专业知识的工作中，并做出了可观的成绩。

中国共产党在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的民族工作中的民族团结、民族平等的思想以及调查研究工作的方法，积累了中国共产党进行民族工作的经验，对此后中国民族学的发展更有直接的影响。50年代，中国民族学界较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工作都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工作的传统。

20世纪前半期，中国民族学界在田野工作和理论分析方面积累了许多可以为后人参考的材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吸收了其中的许多内容，如关于中国各民族的分类、中国各民族的形成和文化的发展历程、各民族的文化描述等，均对后来的学者颇有启发。有些老一代学者继续发展和改造了自己已经作出的研究，使之成为中国民族学新的重要成果。部分到台湾的学者以在大陆的研究经验领导了50年代开始的台湾的民族学工作，将他们在大陆的传统带到了台湾，建立了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培养出了台湾本土的第一代人类学家，继

而开展了田野调查。

当时的关于民族学中国化的讨论，对以后在此问题上的思考颇有启发。民族学中国化或本土化到底走哪条路，在世纪末的今天，海峡两岸的人类学、民族学家们的思索依然基本上没有离开当年人们所谈论的三条道路，即在民族学中国化过程中是综合，是选择国外某一理论流派，还是有更多的独创性。这些选择，是 20 世纪前半期的中国民族学家们，在民族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面对时代提出的问题进行认真思考的结果。几十年后的今天，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必然要向我们再次提出这样的疑问。如何更好地回答民族学中国化的问题，回答中国民族学发展中的其他许多问题，除了创造性地发挥之外，也应当总结前人的经验，以求更全面地认识和解答。我们相信，在此基础上，现代的中国新一代的民族学家由于所处的历史条件不同，比起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学者们，新的探索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来说都将会升华到更高层次。

## 附录一

### 主要参考文献

本书引用和参考了以下所列作者的著作和论文，因涉及数量较大，为节省篇幅及方便查阅起见，特将主要书目参照国际惯例集中列出，以备查考。为便利使用，谨做如下说明：

1. 翻译书目的排列顺序是：①作者，②出版年代，③书名或论文篇目名，④译者名，⑤出版社或刊载杂志名及卷、期。

2. 中、外文专著书目的排列顺序是：①作者，②出版年代，③书名，④出版社。

3. 中、外文论文或文章的排列顺序是：①作者，②出版年代，③刊载此篇论文的杂志或报刊名，④卷数、期数及报纸的出版时间，⑤刊载页数（由于本文资料搜集有年，部分论文刊载页数未能注明）。

4. 档案文献的排列顺序是：①作者，②文件写作或刊印年代，③文件名，④档案序号总目号，⑤案卷号，⑥档案收藏



处 (仅在首次出现时注出)。

5. 所有书目在本表中的先后顺序按外文字母顺序和中文汉语拼音音序依次排列, 引用同一年中同一作者发表的若干篇论文时, 分别用英文字母区别, 以免混淆。

**Arensberg, Conrad M. & Solon T. Kimball** (C. M. 阿伦斯伯格、S.T. 金布尔): 1961, *Family and Community in Ireland*, (《爱尔兰的家庭与社区》), Gloucester, Mass. Pater Smith., P. 307—316.

**Arkush, R. David** (大卫·阿古什): 1985, 《费孝通传》(*Fei Xiaotong and Sociolog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董天民译, 时事出版社。

**Bernsdoef, W. uad Knospe, H** (威·伯恩斯多夫、霍·克诺斯普): 1987, 《国际社会学家辞典·上卷》, 王蓉芬等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Boas, F.** (费兰茨·波亚士): 1945, 《人类学与现代生活》, 杨成志译述, 商务印书馆。

**Chapple, Elinor D.** (E. D. 查普尔): 1942, *Principles of Anthropology*, (《人类学原理》), H. Holt and company.

**Digle** (丁格尔): 1915, 《丁格尔步行中国记》, 陈曾谷译, 商务印书馆。

**Firth, Raymond** (R. 弗思): 1947, 《〈金翼〉导言》, 载《金翼》(中文版), 第4~8页,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9。

**Golomshtok, Eugene** (E. 果洛姆什托克): 1934, 《苏俄人类学的进展》, 马铃薯(长寿)译, 载《新社会科学季刊》, 第一卷, 第2期, 215~243页。

**Guldin, G.E.** (顾定国): 1987, *Anthropology i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Winds of Change*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类学: 变迁之风》), *Social Reserch*, Vol.54.

1990, *Anthropology in China: Defining the Discipline*,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4, *The Saga of Anthropology in China: From Malinowski to Moscow to Mao* (《中国人类学的史乘: 从马凌诺夫斯基到莫斯科到毛》), Armonk, NY: M. E. Sharpe.

**Kardiner, A. and Preble, E.** (A. 卡尔迪纳、E. 普里勃): 1991, *They Studied Man* (《他们研究了人》), 孙恺祥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Keesing, R.M.** (R.M. 基辛): 1988, *Cultural Anthropology: A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 (《文化·社会·个人》), 甘华鸣等译, 辽宁人民出版社。

**Leach, E.** (E. 利奇): 1982, *Social Anthropology* (《社会人类学》), Fortana Paperbacks.

**Malinowski, B.K.** (马凌诺夫斯基): 1939, 《〈中国农民的生活〉序》, 载《江村经济》(中文版), 1~6页,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6。

**Murphy, Robert F.** (罗伯特·F. 墨菲): 1991, *Cultural and Social Anthropology: An Overture* (《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 王卓君等译, 商务印书馆。

**Radcliffe - Brown, A.D** (拉德克利夫·布朗): 1936, 《对于中国乡村生活社会学调查的建议》, 吴文藻译, 载《社会学界》, 第九卷, 79~88页。

**Rossi, A.S.** (A.S. 罗西): 1985, 《中国人类学的研究与发展》, 载《人类学研究》, “试刊号”, 150~164页, 厦门大学人类学系印。

- Shirokogoroff, S.M.** (史禄国): 1923, *Anthropology of Northern China* (《中国北方人类学》), Extra Vol. II,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Shanghai.
- 1925, *Anthropology of Eastern China and Kwangtung Province* (《华东和广东人类学》), 上海商务印书馆。
- Silverman, Sydel** (西德尔·西尔弗曼): Edited, 1981, *Totems and Teachers: Perspectives on the History of Anthropology* (《图腾与教师: 人类学历史的透视》),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Stern, B.J.** (B.J. 斯特恩): 1931, *Lewis Henry Morgan: Social Evolutionist*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 社会进化论者》),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Titiev, M.** (M. 蒂提也夫): 1954, *The Science of Man*, New York, Henry Holt .
- Thoresen, Timothy H.H.** (蒂莫西·H.H. 托雷森): Edited, 1975, *Toward a Science of Man: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Anthropology* (《走向人的科学: 人类学史论文集》), Mouton & Co.
- Tokapeb, C.A.** (C.A. 托卡列夫): 1983, 《外国民族学史》, 汤正芳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Vermeulen, Han F. & Roldan, Arturo Alvarez** (H.F. 弗穆伦、A.A. 罗尔丹): Edited, 1995, *Fieldwork and Footnotes: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Anthropology* (《田野工作与脚注》), Routledge.
- 包智明**: 1994, 《论比较社会学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博士学位论文, 北京大学 1994 年印。修订后易名为《比较社会学》, 知识出版社, 1995。
- 北洋政府教育部**: 1913a, 《大学规程》, 载《教育杂志》, 第五

卷，第一号。

1913b, 《法政专门学校规程》，载《中华教育界》，民国2年3月号，法令37~38页。

1913c, 《高等师范学校课程标准》，载《中华教育界》，民国2年5月号，法令61~75页。

**边政公论社**：1941a, 《边疆考察团出发》，载《边政公论》，第二卷，第2期，85~86页。

1941b, 《中国边政学会成立》，载《边政公论》，第一卷，第3、4期合刊，221页。

1942, 《中国边政学会召开第二次理监事会议》，载《边政公论》，第一卷，第11、12期合刊，126页。

**蔡和森**：1924, 《社会进化史》，上海，民智书局，现收入《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

**蔡元培**：1919, 《传略（上）》，载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318~333页，中华书局，1984。

1921a, 《何谓文化》，原载《北京大学日刊》，第806号，现收入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4。

1921b, 《美术的进化》，原载《北京大学日刊》，第807号，现收入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4。

1926a, 《中国古代之交通》，原载《南洋大学三十周年纪念文集》，现收入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5。

1926b, 《说民族学》，载《一般》，第一卷，第12期。

1930, 《社会学与民族学——在中国社会学社成立会演说词》，原载《社会学刊》，第一卷，第4期。现收入高

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5卷，422~425页，中华书局，1988。

1931，《中央研究院与中央大学联合招待国民会议代表的大会欢迎词》，载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8。

1935，《民族学上之进化观》，原载《新社会科学季刊》，第一卷，第4期；现收入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6卷，455~459页，中华书局，1988。

**岑家梧**：1940，《西南种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载《青年中国季刊》，第一卷，第4期，233~239页。

1941，《西南边疆民族艺术研究之意义》，载《责善》，半月刊，第二卷，第3期。

1944a，《贵州宗族研究述略》，载《边政公论》，第三卷，第2期，33~37页。

1944b，《贵州边民研究之过去与现在》，载《大夏周报》，第十九卷，第7、8期合刊。

1944c，《中国图腾制度及其研究史略》，载《中国民族学会十周年纪念文集》，24~31页，中国民族学会（成都）印。

1946，《中国民族与中国民族学》，载《南方杂志》，第一卷，第3、4期合刊。现载《岑家梧民族研究文集》，237~241页。

1947，《中国边疆艺术之探究》，载《边政公论》，第六卷，第3期，第55~64页；又载《中国艺术论集》，考古学社，1949。

1949，《遗俗论》，载《广州日报》，“民族学刊”，第42期，1949-02-25。

- 1992,《岑家梧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
- 常隆庆、施怀仁、俞德浚:1935,《四川省雷马峨眉屏调查记》,载《中国西部科学院特刊》,中国西部科学院雷马峨眉屏考察团印。
- 陈炳光:1947,《〈大小凉山之夷族〉序》,载《大小凉山之夷族》,四川省政府建设厅印。
- 陈 达:1936,《社会学及人类学系现况》,载《清华周刊》,第四十一卷,“向导专号”,清华大学印。
- 陈定阔:1989,《孙本文》,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编:《中国社会学年鉴(1979—1989)》,334~336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陈国钧:1942a,《大夏大学社会研究工作部工作述要》,载吴泽霖、陈国钧等《贵州苗夷社会研究》,贵阳,文通书局。  
1942b,《贵州苗夷歌谣》,贵阳,文通书局。  
1977,《文化人类学》,台北,三民书局。
- 陈国强:1991,《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年来的人类学(1981—1990)》,载陈国强林加煌主编《当代人类学》,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陈国强:1992,《建设中国人类学》,载陈国强等著《建设中国人类学》,1~16页,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陈礼颂:1995,《1949年前潮州宗族村落社区的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 陈其南:1975,《光复后高山族的社会人类学研究》,载《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40期,19~37页。  
1985,《四十年来台湾人类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载《中国论坛》,二十一卷,第1期,72~79页。
- 陈奇禄:1981a,《台湾的博物馆和人类学的发达》,载陈奇禄

著《民族与文化》，95~113页，台北，黎明书局。

1981b，《中国民族学研究的回顾和前瞻》，载陈奇禄著《民族与文化》，115~131页，台北，黎明书局。

**陈映璜**：1918，《人类学》（北京大学丛书之四），商务印书馆。

**陈垣**：1946，《致北平市教育局长函》，载《北京教育档案》4—1—978，藏北京市档案馆。

**陈永龄**：1947，《理县嘉戎土司制度下的社会》，燕京大学硕士论文，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又更名为《四川理县嘉戎土司制度下的社会》，载陈永龄《民族学浅论文集》，312~438页，台北，弘毅出版社，1995。

1989，《民族学在中国的实践》，美国华盛顿大学。

**陈永龄、王晓义**：1981，《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民族学》，载中国民族学研究会编《民族学研究》，第一辑，261~299页，民族出版社。

**陈志良**：1942，《广西特种民族歌谣》，“说月月刊丛书”，第十种，中央银行广西桂林分行印。

**陈中民**：1985，《1950年后中国大陆人类学的概况》，载《中国论坛》，21卷，第1期，80~86页。

**大夏大学**：1933，《社会学研究室消息》，载《大夏周报》，第九卷，第20期，1933-03-27。

1937，《展览京滇公路周览文物》，载《大夏周报》，第十三卷，第20期，1937-06-16。

**戴裔煊**：1943，《鲍亚士及其学说述略》，载《民族学研究集刊》，第3期，10~119页。

1946，《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的递演》，载《民族学研究集刊》，第5期，119~153页。

**邓实**：1903，《鸡鸣山风雨楼独立书·实业独立》，载《政艺

通报》，第二十五号，1903。

丁元竹：1991a，《费孝通社会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刊印。

1991b，《费孝通学历与著作提要》，《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附录，北京大学刊印。

方国瑜：1943，《滇西边区考察记》（“西南研究丛书”之一），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印。

方壮猷：1945，《凉山罗族系谱》，载《边政公论》，第四卷，第9、10、11、12期合刊，1~20页。

费孝通：1980，《迈向人民的人类学》，载辛格尔顿著《应用人类学》，蒋琦译，92~105页，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3，《学历简述》，载《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三辑，225~232页，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6，《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中文版），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8，《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

1992，《在人生的天平上（代序）》，载吴泽霖著《美国人对黑人犹太人和东方人的态度》，1~6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93a，《略谈中国的社会学》，载《高等教育研究》，1993年，第四期。

1993b，《人的研究在中国——一个人的经历》，载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编《东亚社会研究》，10~1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c，《再谈人的研究在中国》，载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编《东亚社会研究》，161~16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 1994,《关于人类学在中国》,载《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2期。
- 费孝通等:1948,《皇权与绅权》,上海,观察社。
- 费孝通、林耀华:1957,《中国民族学当前的任务》,民族出版社。
- 费孝通、张之毅:1990,《云南三村》,天津人民出版社。
- 冯汉骥:1941,《由中国亲属名词上所见之中国古代婚姻制》,载《齐鲁学报》,第1期,齐鲁大学刊印。又载《冯汉骥考古学论文集》,190~202页,文物出版社,1985。
- 1985,《冯汉骥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 冯来仪:1992,《岑家梧传略》,载《岑家梧民族研究文集》,第429~438页,民族出版社。
- 福建协和学院:1934,《私立福建协和学院一览》,福建协和学院印。
- 高华年:1943,《黑彝语中汉语借词研究》,载《语言人类学专刊》(乙集),第二种。
- 谷苞:1991,《民族研究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
- 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科学考察团:1937,《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科学考察团简章》,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印,载《浙江教育档案》53—1—1015,藏浙江省档案馆。
- 郭沫若,1930,《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联合书店。
- 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主席团:1941,《关于加强国内各民族及宗族之间融洽团结以达成抗战胜利建国成功目的之施政纲要》,载《边政公论》,第一卷,第1期,136~137页。
-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1941,《请设置边疆语文系与西北、西南边疆文化研究所培植筹边人才而利边政实施案》,载《中央研究院档案》393—10,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国民政府教育部：**1948，《中华民国三十七年下半年度教育部工作计划》，国民政府教育部印。

**教育部蒙藏教育司：**1943，《边疆教育概况》，教育部蒙藏教育司印。

**韩明谟：**1993，《潘光旦先生生平》，“第二届潘光旦纪念讲座”印。

**何联奎：**1960，《蔡元培先生对于民族学之贡献》，载《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9期，1~50页。部分刊于《民族学研究集刊》，第三辑（1943）和第五辑（1946）；并收入《民族文化研究》（1951），著者自印。

**侯哲安：**1984，《中国民族学的发展》，载《贵州文史丛刊》，1984年，第2期。

**胡起望：**1981，《蔡元培和民族学》，载中国民族学研究会编《民族学研究》，第一辑，251~260页，民族出版社。

1994，《严谨治学勤奋求索——深切怀念潘光旦教授》，载《民族教育研究》，1994（2），87~92页。

**胡庆钧：**1948，《〈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书评》，载《边政公论》，第七卷，第3期，61~63页。

1995，《胡庆钧先生访问记》，王建民记录稿，未刊。

**胡适：**1956，《丁文江传》，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海南出版社，1993。

**华西边疆文化研究所：**1941，《华西边疆文化研究所章程草案》，载《华西大学档案》719，藏四川省档案馆。

**华西边疆文化研究所：**1942，《华西边疆文化研究所工作报告》，载《华西大学档案》161。

**华西边疆研究所董事会：**1942，《华西边疆研究所缘起》，载《中国边疆》，第一卷，第2期，9~10页。

- 华西协和大学校史编委会：1990，《华西医科大学校史（1910—1985）》，四川教育出版社。
- 黄美真、石振华、张云：1984，《上海大学史料》，“中国近代思想史料丛书”，复旦大学出版社。
- 黄淑娉：1991，《中国人类学源流探溯》，载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编《梁钊韬与人类学》，87~111页，中山大学出版社。
- 黄文山：1936，《民族学与中国民族研究》，载《民族学研究集刊》，第一辑，1~26页。
- 1937，《民族学研究上的一般的原则与方法》，载《青年中国学刊》，第一卷，第2期。
- 1946，《综论殖民地制度及其战后废止的方案》，载《民族学研究集刊》，第五辑，1~23页。
- 1948，《中国民族学会第三届年会演辞》，载《广东日报》，“民族学刊”，第3期，1948-05-31。
- 1982，《文化学及其在科学体系中的位置》，台北，商务印书馆。
- 黄应贵：1983，《光复以来台湾地区人类学的发展》，载《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55期，105~146页。
- 黄宗实、郑文贞：1987，《厦门大学校史资料》，第一辑，厦门大学校史编委会，厦门大学出版社。
- 暨南大学：1937，《海外事业部标本名录》，载《暨南校刊》，第213期，1937-06-14。
- 翦伯赞：1949，《历史哲学教程》，新中国书局。
- 建国大学：1940，《建国大学章程》，载《建国大学要览》，建国大学1941年印，转引自武强主编《东北沦陷十四年教育史料》，第一辑。
- 江应樑：1937，《广东瑶人之今昔观》，载《民俗》，第一卷，

第3期。

1950,《摆夷的经济生活》,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

1981,《民族学在云南》,载中国民族学研究会编《民族学研究》,第一辑,236~250页,民族出版社。

1983,《人类学的起源及其在我国的发展》,载《云南社会科学》,1983(3)。

1992a,《江应樑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

1992b,《自传》,载《江应樑民族研究文集》,559~562页,民族出版社。

蒋介石:1943,《致朱骝先电》,载《中央研究院档案》393~21240。

金关丈夫:1941,《海南岛民俗片断》,载《黎族研究资料选译》,第一辑,中国科学院广东民族研究所编印,1963年。

1942,《海南岛黎族的人类学调查》,载《黎族研究资料选译》,第一辑,中国科学院广东民族研究所印,1963。

金陵大学:1922,《金陵大学同学录》,金陵大学刊印。

1932,《中国文化研究所近况》,载《金陵大学校刊》,第七十五号,1932-12-05。

1943,《文学院社会学系边疆社会组概况》,载《金陵大学校刊》,第318期,1943-03-15。

1944,《本校边疆研究经费教育部准予增加补助》,载《金陵大学校刊》,第334期,1944-03-15。

1947,《私立金陵大学要览》,金陵大学刊印。

金陵大学文学院:1943,《五年来之金陵大学文学院》,载南京大学高教研究室校史编写组编《金陵大学史料集》,第161~172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

- 金天明、龙平平：1986，《论吴文藻的“民族学中国化”学术思想》，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6（2）。
- 京师学务局：1912，《京师学务局通俗教育筹办草案》，载《北京教育档案》4—1—61，藏北京档案馆。
- 康有为：1895，《答朱蓉先生书》，载《康有为全集》，第一集。
- 柯象峰：1941，《中国边疆研究计划与方法之商榷》，载《边政公论》，第一卷，第1期，47~57页。
- 黎国彬：1995，《黎国彬先生访问记》，王建民记录稿，尚未刊。
- 李安民：1992，《论人类学研究的“中国化”》；载陈国强等著《建设中国人类学》，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
- 李安宅（Li, An Che）：1931，《祖尼：一些观察与疑问》（*Zuni: Some Observations and Queries*）；载《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第三十九卷，62~76页。
- 1935，《人类学与中国文化》（《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译本序），载《社会研究》，第一一四期，507~510页。
- 1941，《视察川甘边疆教育要点》，载《教育部档案》5—12401，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 李光谟：1994a，《李济与清华》，清华大学出版社。
- 1994b，《李济先生学术活动年表》，载李光谟编《李济与清华》，219~226页，清华大学出版社。
- 1994c，《李济先生学行记略》（未定稿），作者自印。
- 李 济：1941，《民族学发展之前途与比较法应用之限制》，载《社会科学学报》，第一卷，57~68页。
- 李建东：1995，《〈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困境与前景〉及其在大陆的回应综述》，载《西北民族研究》，1995（2）。
- 李景汉：1940，《边疆社会调查研究应行注意之点》，载《边政

公论》，第一卷，第1期，58~68页。

**李绍明、冯敏：**1993，《马长寿先生对中国西南民族研究的贡献》，载王宗维、周伟洲编《马长寿纪念文集——纪念马长寿教授诞辰85周年逝世20周年》，36~55页，西北大学出版社。

**李文椅：**1933，《北平学术机关指南》，北平图书馆协会。

**李亦园：**1970，《凌纯声先生对于中国民族学之贡献》，载《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29期，1~10页。

1975，《凌纯声先生与中国民族学》，载《中华文化复兴月刊》，第八卷，第2期，17~23页。

1981，《中国的民族、社会与文化——芮逸夫教授的学术成就与贡献》，载《食货》，第十一卷，第7期，295~304页。

1984，《人类学与现代社会》“水牛大学丛书之五十二”，水牛图书出版事业有限公司，增订版。

**李膺扬：**1929，《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社会科学名著译丛”），新生活书店。

**李有义：**1980，《我国民族学的回顾与展望》，载《民族研究》，1980（1）。

**梁启超：**1899，《文野三界之别》，原载《清议报》，第二十七册。又载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94~9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1901，《南海康先生传》，载《清议报》，第一百册。又载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华书局，1992。

1902a，《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载《新民丛报》，第一号。又载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269~27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1902b, 《史学之界说》, 载《新民丛报》, 第三号。又载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 283~287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1920, 《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 载《时事新报》, 1920-03-25。又载林志钧编《饮冰室合集》, 第五册, 第二十三卷, 中华书局, 1932。

1925, 《学问独立与清华第二期之事业》, 载《清华周刊》, 第350期, 1925-09-11。

1927, 《社会学在中国方面的几个重要问题研究举例》, 载《社会学界》, 第一卷。

**梁瓖第**: 1944, 《我怎样通过大小凉山》, “边疆问题丛书”, 文通书局。

1947, 《车寨社区调查》, 载《边政公论》, 第六卷, 第4期, 45~49页。

**梁山、李坚、张克谟**: 1983, 《中山大学校史》, 上海教育出版社。

**梁漱溟**: 1920,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商务印书馆, 1935。

**梁钊韬**: 1944, 《边政业务演习的理论和实施》, 载《边政公论》, 第三卷, 第12期, 10~18页。

1994, 《梁钊韬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文集》, 民族出版社。

**廖泰初**: 1935, 《从定县的经验说到农村社会调查的缺乏和补救的方法》, 载《社会研究》, 第103期, 419~422页。

**林惠祥**: 1930, 《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 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刊印。

1931, 《社会进化? 退化?》, 载《厦大周刊》, 第十卷, 第25期, 第261期, 1931-05-30。

1991, 《文化人类学》, 商务印书馆, 1版, 1934; 2版, 1991-02。

**林耀华**: 1935, 《从人类学的观点考察中国近代社会》, 载《社会研究》, 第108期。

1936, 《从人类学的观点考察中国宗族乡村》, 载《社会学界》, 第九卷, 125~1142页。

1943, 《边疆研究的途径》, 载《边政公论》, 第二卷, 第1、2期合刊, 15~27页。

1945, 《康北藏民的社会状况》, 载《流星》, 第一卷, 第1—5期。又载林耀华著《民族学研究》, 356~386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1947a, 《川康北界的嘉戎土司》, 载《边政公论》, 第六卷, 第2期, 33~44页。

1947b, 《凉山夷家》,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85, 《民族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英文书名 *The Golden Wing: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Chinese Familism*), 庄孔韶、林宗诚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台湾译本书名为《金翅》。

1990, 《民族学通论》,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林耀华、庄孔韶**: 1984, 《中国的民族学: 回顾与展望》, 载《社会科学战线》, 1984(6)。

**林耀华、陈永龄、王庆仁**: 1990, 《吴文藻传略》, 载《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 337~349页, 民族出版社。

**林振鏞**: 1930, 《〈蛮族社会之犯罪与风俗〉译余赘语》, 载马凌诺夫斯基著、林振鏞译《蛮族社会之犯罪与风俗》, 2~3页, 上海华通书局。



- 凌纯声：1932，《民族学与现代文化》，载《国立中央大学日刊》，第八七三号，1932-12-21。
- 1936，《民族学实地调查方法》，载《民族学研究集刊》，第一辑，45~75页。
- 1938，《唐代云南的乌蛮与白蛮考》，载《人类学集刊》，第一卷，第1期，57~86页。
- 凌纯声、芮逸夫：1947，《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商务印书馆。
- 岭南大学：1932，《社会研究所沙南调查结束》，载《私立岭南大学校报周刊》，第六卷，第5期，1932-11-15。
- 1934，《私立岭南大学概况》，岭南大学印行。
- 1937，《桂北科学考察团消息》，载《岭南大学校报》，第九卷，第26期，1937-06-15。
- 1948，《学术消息》，载《岭南大学校报》“康乐再版号”，第70期，1948-01-10。
- 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1949，《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概况》，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刊印。
- 刘介：1940，《广西氏族研究述略》，载《建设研究月刊》，第三卷，第5期。
- 刘咸：1935，《海南岛黎人刻木为信之研究》，载《科学》，第十九卷，第2期。
- 1936，《海南黎人文身之研究》，载《民族学研究集刊》，第一辑，197~233页。
- 1940a，《海南岛黎人口琴之研究》，载《民族学研究集刊》，第二辑，201~211页。
- 1940b，《海南岛黎族起源之初步探讨》，载《西南研究》，第1期，1~24页。
- 1941，《亚洲狗祖传说考》，载《华西文化研究所集

刊》，第一卷。

1942，《海南岛黎人面具考》，载《华西文化研究所集刊》，第二卷。

刘孝瑜：1992，《试论中国文化人类学的发展趋势》，载陈国强等著《建设中国人类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龙平平：1985，《从必然到自由的探索——中国民族学发展过程的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学院印。

1986，《中国民族学早期情况概述》，载和龚、张山主编《思想战线》，1986（5）。

1988，《旧中国民族学的理论流派》，载《中国民族历史与文化》，101~207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吕光天：1984，《三十五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发展》，载《民族研究动态》，1984（3）。

吕振羽：1934，《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北平，人文书店。

罗常培：1989，《语言与文化》，北京，语文出版社。

罗家伦：1928，《整理校务之经过及计划》，载《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12期，1928-11-23。

罗香林：1932，《海南岛黎人源出越族考》，载《青年中国季刊》，“创刊号”，317~331页。

1933，《民族与民族的研究》，载《国立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月刊》，第一卷，第1期，39~61页。

罗致平：1946，《战时中国人类学》，载《社会学讯》，第1期。

马长寿：1947a，《论统一与同化》，载《边政公论》，第六卷，第2期，9~11页。

1947b，《人类学在我国边政上的应用》，载《边政公论》，第六卷，第3期，24—28页。

马启成、白振声主编：1995，《民族学与民族文化发展研究：

庆祝林耀华教授从教六十二周年纪念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马学良**：1948a，《边疆语文研究概况》，载《文讯》，第八卷，第6期。

1948b，《傩文作祭献药供牲经译注》，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二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印。

1949，《傩文作斋经译注》，载《中国科学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四本，中国科学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印。

1992，《马学良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

**马无忌**：1947，《甘肃夏河藏民调查记》，贵阳，文通书局。

**毛筠如**：1947，《大小凉山之夷族》，四川省政府建设厅印。

**梅贻琦**：1945，《本校复原后院系充实计划草案》，载《清华大学昆明办事处档案》，藏清华大学档案馆。

**孟宪范**：1989，《中国民族学十年发展评述》，载《中国社会科学》，1989（2）。

**民俗编者**：1937，《私立岭南大学西南社会调查所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海南岛黎苗考察团组织经过》，载《民俗》，第一卷，第3期。

**闽学会**：1904，《图书介绍》，载鸟居龙藏著、林楷青译《人种志》，闽学会刊印。

**南开大学**：1923，《分科概略与各科课程》，载《天津南开大学一览》，南开大学刊行。

1924，《南大文科学生生活的鸟瞰》，载《南大周刊》“学生生活号”，第5期，1924-05-20。

**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1947a，《南开大学文学院边疆人文研究室研究计划与工作步骤》，载《边疆人文》，第四卷，

合刊。

1947b, 《边疆人文研究室调查工作表》, 载《边疆人文》, 第四卷, 合刊。

南京大学高教研究所校史编写组: 1989, 《金陵大学史料集》, 南京大学出版社。

内政部: 1937, 《举办全国民俗简易调查办法》, 载《内政部档案》5—11295, 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鸟居龙藏: 1903, 《人种志》, 林楷青译, 闽学会刊印。

1948a, 《〈凉山夷家〉书评》, 载《燕京社会科学》, 第一卷, 175~176页。

1948b, 《〈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书评》, 载《燕京社会科学》, 第一卷, 180~184页。

欧潮泉: 1983, 《解放前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在中国的传播》, 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1983(2)。又载欧潮泉著《民族学探索》, 54~62页,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庞新民: 1930, 《〈广东北江瑶山杂记〉自序》, 载《两广瑶山调查》, 广州中山大学印, 1934。

1931, 《〈广西瑶山杂记〉序》, 载《两广瑶山调查》, 广州中山大学印, 1934。

平野义太郎: 1943, 《〈海南岛民族志〉日译本序》, 载《海南岛民族志》, 东京, 宙傍书房, 1943。又载《海南岛民族志》(“黎族研究资料选译第四辑上册”), 中国科学院广东民族研究所编印, 1964。

乔健: 1986, 《从西方人类学的演变说到中国学术的发展》, 载《云南社会科学》, 1986(1)。

1987, 《拉德克利夫·布朗在中国》, 载《中国人类学学会通讯》, 第129期, 1987-05-01。

1994a, 《中国人类学的发展: 个人的一些见解》, 周旭芳译, 载《民族译丛》, 1994 (2)。

1994b, 《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困境与前景》(香港人类学讲座教授就职演讲讲辞), 香港中文大学打印。

清华大学: 1937, 《清华大学一览》, 清华大学刊印。

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 1987, 《清华大学大学校史稿》, 中华书局。

秋浦: 1984, 《民族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 载《民族研究》, 1984 (5)。

任乃强: 1939—1940, 《泸定导游》, 连载《康导月刊》, 第二卷, 第2—9期。

1990, 《任乃强民族研究文集》, 民族出版社。

任国荣: 1928, 《瑶山两月视察记》, 载《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 第四集, 第46、47期合刊。

容观复: 1992, 《容观复先生访问记》, 王建民记录稿, 未刊。

芮逸夫: 1948, 《中国亲属称谓制的演变及其与家族组织的相关性》, 载《民族学研究集刊》, 第六辑, 23~31页。

1949, 《苗族释亲》, 载《中国科学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第十四本。

1971, 《民族学在中国》, 载芮逸夫著《中国民族及其文化论稿》, 台北艺文出版社。

四川大学校史编写组: 1985, 《四川大学校史稿》, 四川大学出版社。

四川省政府边区施教团: 1941, 《雷马屏峨纪略》, 四川省政府教育厅印行。

绍孟: 1928, 《编者的话》, 载《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西南民族研究专号”), 第三集, 第35、36期

合刊，1928-07-04。

**商承祖**：1936，《民族生活的进化因素》，载《民族学研究集刊》，第1期，91~100页。

**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分署**：1904，《告示》，载乌居龙藏原著、林楷青译《人种志》附页，闽学会1904刊印。

**社会学界编著**：1933，《燕京大学社会学面面观》，载《社会学界》，第七卷，339~345页。

1934，《燕京大学社会学及服务学系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度概况》，载《社会学界》，第八卷，307~310页。

1936，《燕京大学社会学及服务学系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度概况》，载《社会学界》，第九卷，323~341页。

**施正一**：1992，《广义民族学》，光明日报出版社。

**石磊、许嘉明、瞿海源**：1984，《卫惠林先生对社会人类学的贡献》，载《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54期。

**石青阳**：1933，《致蔡元培函》，载《中央研究院档案》393—280。

**石兴邦**：1993，《深切怀念马松龄老师》，载三宗维、周伟洲编《马长寿纪念文集——纪念马长寿先生诞辰85周年逝世20周年》，5~21页，西北大学出版社。

**石钟健**：1982，《四川悬棺葬》，载中国民族学研究会编《民族学研究》，第四辑，100~118页，民族出版社。

**实藤惠秀**：1983，《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等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史图博、李化民**：1932，《浙江景宁敕木山畲民调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专刊，第六号，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

研究所刊印。

**舒新城**：1926，《近代中国留学史》（原版1926年）；上海，文化出版社，影印本，1989。

**孙本文**：1927，《社会学上之文化论》，北京，朴社。

1930，《中国社会学之过去现在及未来》（中国社会学社第一次年会演词），燕京大学抄本。

1935，《建设本位文化的标准》，载马芳若编《中国文化建设讨论集》，57~59页，经纬书局。

1947，《近代社会学发展史》，学生之友社主编，商务印书馆。

1948，《当代中国社会学》，胜利出版公司。

**唐美君**：1976，《人类学在中国》，载《人类与文化》，第七卷，9页，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会印。

**陶云逵**：1941，《云南土著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载《边政公论》，第一卷，第5、6期合刊，64~76页。

1942，《云南摆夷族在历史上及现代与政府之关系》，载《边政公论》，第一卷，第9、10期合刊，9~16页。

1944，《社会文化之性质及其研究方法》，载《边政公论》，第三卷，第9期，13~17页。

1946，《云南碧罗雪山之栗栗族》，载《体质人类学集刊外编》，第一号，中央研究院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印。

1949，《车里摆夷之生命环》，载“边疆研究论丛”，1945—1948年，1~71页。

**田汝康**：1946，《芒市边民的摆》，重庆商务印书馆。

**田晓岫**：1994，《在文化人类学领域勤奋开拓的杨成志教授》，载《民族教育研究》，1994（2）。

- 王辅世：1995，《王辅世先生访问记》，王建民记录稿，未刊。
- 王国维：1906，《对大学教育的意见》，载《教育世界》丙午（1906年），第2、3期。
- 王建民：1994a，《回顾学科发展看民族学研究现实问题的意义》，载宋蜀华主编《民族学与现代化》，45~59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1994b，《吴泽霖民族学思想和学术生涯》，载《民族教育研究》，1994（2），93~96页。
- 1995，《20世纪前半期中国的民族学教学活动述略》，载马启成、白振声主编《民族学与民族文化发展研究》，396~40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王康主编：1992，《社会学史》，人民出版社。
- 王树枏：1902，《欧洲族类源流略》，中卫县署刊印。
- 王兴瑞：1934，《琼崖黎人社会概观》，载《琼农》，第九、第十、第十一号。
- 1947，《海南岛苗人之社会组织》，载《边政公论》，第六卷，第2期。
- 卫惠林：1936，《民族学的对象及其关联的问题》，载《民族学研究集刊》，第1期，27~44页，中山文化教育馆印。
- 1943，《中国古代图腾制度论证》，载《民族学研究集刊》，第3期，54~60页。
- 1948，《论边疆学术与边疆大学设置问题》，载《边政公论》，第七卷，第3期，19~21页。
- 吴传钧：1944，《近百年来外人考察我国边陲述要》，载《边政公论》，第三卷，第5期，50~56页；第三卷，第6期，51~57页。
- 吴定良：1944，《边区人类学调查法》，载《民族学研究集刊》，



第4期，6~20页。

1947，《浙大史地研究所人类学研究计划》，载《浙江大学档案》53—1—239，藏浙江省档案馆。

**吴金鼎**：1931，《山东人体质之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刊印。

**吴文藻**：1932，《文化人类学》，载孙寒冰主编《社会科学大纲》，上海，黎明书局。

1932—1933年，《现代法国社会学》，载《社会学刊》，第三卷，第2期；第四卷，第2期。

1933a，《季史亭的社会学说》，载《社会学刊》，第四卷，第1期。

1933b，《〈派克社会学论文集〉序》，载《派克社会学论文集》，1页，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刊印。

1934，《德国的系统社会学派》，载《社会学界》，第八卷，271~283页。

1935a，《现代社区实地研究的意义和功用》，载《社会研究》，第67期。

1935b，《西方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载《社会研究》，第81期。

1935c，《冯维氏的经验社会学派社会学》，载《社会研究》，第86期。

1935d，《中国社区研究的西洋影响与国内近状》，载《社会研究》，第101、102期合刊，416~421页。

1935e，《功能派社会人类学的由来和现状》，载《社会研究》，第111、112期合刊。全文大致与1936c同。

1936a，《社区的意义与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载《社会学刊》，第五卷，第1期。

1936b,《布朗教授的思想背景与其在学术上的贡献》,载《社会学界》,第九卷,1~42页。

1936c,《功能派社会人类学的由来与现状》,载《民族学研究集刊》,第一辑,123~144页。

1938,《文化表格说明》,载《社会学界》,第十卷,207~248页。

1940,《〈社会学丛刊〉总序》,载《凉山彝家》,商务印书馆,1947。

1942,《边政学发凡》,载《边政公论》,第一卷,第5、6期合刊,1~11页。

1990,《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

吴泽霖:1991,《吴泽霖民族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

吴泽霖、陈国钧:1942,《贵州苗夷社会研究》(“苗夷研究丛刊之二”),贵阳,文通书局。

伍锐麟:1948,《三水蛋民调查》,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刊印。

西北大学校史编写组:1987,《西北大学校史稿》,西北大学出版社。

厦门大学:1929,《厦门大学文科布告(1928—1929年)》,厦门大学刊印。

1934,《文学院概况》,载《厦大质刊》,第十三卷,第19期,1934-04-06。

1935,《私立厦门大学文学院一览》(民国24至25年),厦门大学刊印。

1937,《文化陈列所概况》,载《厦大校刊》,第一卷,第12期,1937-04-06。

- 1947, 《本校历史学系举办人类学标本展览会》, 载《厦大校刊》, 第三卷, 第2期, 1947-11-30。
-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社: 1927, 《启事》, 载《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 第一卷, 第2、3期。
- 辛树帜: 1928, 《编者的话》, 载《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瑶山调查专号”第四集, 第46、47合刊, 1928-09-19。
- 星光日报: 1948, 《厦大泉州访古团在南安县发现史前遗物》, 载《星光日报》, 1948-08-08。
- 徐平: 1993, 《费孝通民族思想述略》, 载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编《东亚社会研究》, 314~323页,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徐益棠: 1937, 《广西象平间瑶民的经济生活》, 载《地理学报》, 第四卷。
- 1938, 《广西象平间瑶民之生死习俗》, 载《金陵学报》, 第八卷, 第2期。
- 1940, 《广西象平间瑶民之房屋》, 载《金陵学报》, 第十卷。
- 1941a, 《广西象平间瑶民之法律》, 载《边政公论》, 第一卷, 第1期, 69~74页。
- 1941b, 《中国民族学发达史略》, 载《斯文半月刊》, 第二卷, 第3期。
- 1941c, 《广西象平间瑶民之占卜符咒与禁忌》, 载《中国文化研究汇刊》, 第二卷, 403~420页。
- 1942a, 《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 载《边政公论》, 第一卷, 第5、6期合刊, 51~63页。
- 1942b, 《试拟国立边地文化教育馆组织大纲》, 载

《边政公论》，第一卷，第5、6期合刊。

1942c, 《广西象平间瑶民之宗教及其宗教的文献》，载《边疆研究论丛》，1941，56~69页。

1944, 《十年来之中国民族学会》，载《中国民族学会十周年纪念论文集》，1~2页，中国民族学会（成都）印。

1945, 《广西象平间瑶民之饮食》，载《边疆研究论丛》，1942—1945年，97~102页。

1946, 《中国民族学之发展》，载《民族学研究集刊》，第5期，158~160页。

许烺光 (Francis L.K. Hsu): 1948, *Under the Ancestors' Shadow: Kinship, Personality and Social Mobility in China* (汉译《在祖先的荫蔽下》或《祖荫下》),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Another Edition in 1971,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严复: 1903, 《译〈社会通论〉自序》，载《社会通论》，商务印书馆，1904。

1913, 《天演进化论》，载《平报》，1913-04-12至1913-05-02。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 1948, 《社会学系近十年概况》，载《燕京社会科学》，第一卷。

燕京哈佛学社北平办事处: 1946, 《辅仁大学战争期间出版品》，载《燕京学报》，第三十期，340~342页。

杨成志: 1930a, 《单骑调查西南民族述略》，载《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十集，第118期，14~19页。

1930b, 《云南民族调查报告》，载《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十一集，第129、132期合刊，1930-05-21。

1934, 《我对于云南民族罗罗族研究的计划》，载《禹

贡半月刊》，第一卷，第4期，24~29页。

1937，《广东北江瑶人的文化现象与体质型》，载《民俗》，“复刊号”，第一卷，第3期，1~36页。

1945，《〈人类学与现代生活〉译序》，载弗兰茨·波亚士著《人类学与现代生活》，1~3页，商务印书馆。

1947，《民族问题的透视》，载《边政公论》，第六卷，第1期。

1948，《国立中山大学设立人类学系建议书》，载《广东日报》，“民族学刊”，第12期，1948-08-02。

1989，《杨成志民俗学译述与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1，《我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载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编《梁钊韬与人类学》，135~139页，中山大学出版社。

**杨堃**：1932，《中国社会学之派别及趋势》，载《鞭策周刊》，第一卷，第3、4期。又载《杨堃民族研究文集》，5~18页，民族出版社，1991。

1938，《莫斯教授的社会学学说与方法论》，载《社会学界》，第十卷，259~331页。

1943，《中国近三十年来之出版界》，载《国立华北编译馆馆刊》，第二卷，第7期。

1948，《我国民俗学运动史略》，载《民族学研究集刊》，第六辑，92~102页。

1983，《民族与民族学》，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4，《民族学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杨堃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

**杨懋春** (Martin C. Yang): 1948, *A Chinese Village: Taitou, Shantung Province* (《一个中国的乡村——山东省台头

- 村)), London: Kegan Paul. Another Edition in 1945.
- 杨庆堃:** 1949, 《社会学系半年来的实地工作方针》, 载《岭南大学校报》, “康乐再版号”, 1949 (105)。
- 杨庭硕、罗康隆、潘盛之:** 1992, 《民族文化与生境》, 贵州人民出版社。
- 杨希枚:** 1945, 《中央研究院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各处概况报告表》, 载《中央研究院档案》393~2505。
- 1947, 《边疆行政与应用人类学》, 载《边政公论》, 第七卷, 第3期, 57~63页。
- 叶钟裕:** 1935, 《居住调查法: 对于廖泰初〈居住调查法〉的商榷》, 载《社会研究》, 第118期, 539~540页。
- 俞湘文:** 1947, 《西北游牧藏区之社会调查》, 上海, 商务印书馆。
- 愈兄:** 1940, 《论我国研究西南民族之今昔及其将来展望》, 载《社会研究》, 第12期。
- 张光直:** 1988, 《人类学派的古史学家——李济先生》, 载《历史月刊》, 第9期。又载李光谟编《李济与清华》, 195~201页,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4。
- 张海洋:** 1988, 《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的南北特色》, 载和羹、张山主编《中国民族历史与文化》, 208~219页,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 张少微:** 1941, 《研究边疆社会之内容方法及步骤》, 载《边政公论》, 第一卷, 第3、4期合刊, 32~47页。
- 1946, 《民族学体系发凡》, 载《民族学研究集刊》, 第5期, 153~156页。
- 张寿祺:** 1991, 《中国早期的人类学与中山大学对于人类学的贡献》, 载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编《梁钊韬与人类学》, 112

~134页, 中山大学出版社。

张正东: 1988, 《遵循吴师教诲致力民族研究》, 载赵培中主编《吴泽霖执教60周年暨90寿辰纪念文集》, 105~110页,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张之洞: 1898, 《会通第十三》, 载《劝学篇》, 两湖书院刊印。

张之毅: 1942, 《致朱骝先、叶企孙函》, 载《中央研究院档案》393—2125。

张仲实: 1939, 《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世界学术名著译丛), 生活书店。

章太炎: 1904, 《序种姓》, 原载《馗书》, 现载朱维铮、姜义华编注《章太炎选集》, 194~263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赵承信: 1936, 《社会调查与社区研究》, 载《社会学界》, 第九卷, 151~211页。

赵培中: 1988, 《吴泽霖执教60周年暨90寿辰纪念文集》,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浙江大学: 1947, 《本校增设人类学系》, 载《国立浙江大学校刊》, “复刊号”, 第162期, 1947-08-15。

1948a, 《三十七年度京闽两区新生揭晓》, 载《国立浙江大学日刊》, “复刊新二十二号”, 1948-09-09。

1948b, 《人类学系工作积极进行》, 载《国立浙江大学日刊》, “复刊新四十一号”, 1948-10-01。

1948c, 《人类学系举行台湾高山族文物展览》, 载《国立浙江大学日刊》, “复刊新九十三号”, 1948-12-24。

1949a, 《三十七学年度考试科目》, 载《浙江大学档案》53—1—3813, 藏浙江省档案馆。

1949b, 《招生委员会消息》, 载《国立浙江大学日刊》, “复刊新一四一号”, 1949-05-09。

1949c, 《人类学系议决改制》, 载《国立浙江大学日刊》, “复刊新一五二号”, 1949-06-03。

1949d, 《三十八年度录取新生》, 载《国立浙江大学日刊》, “复刊新一八〇号”, 1949-09-08。

**郑伯奇**: 1939, 《苏联的民族政策及其成果》, 载《中苏文化十月革命二十二周年纪念特刊》。

**郑师许**: 1943, 《中国民俗学发展史》, 载《民俗》, 第二卷, 第1、2期合刊。

**周光大**: 1992, 《民族学概论》, 广西民族出版社。

**周国兵**: 1990, 《定县社会概况调查》, 载袁方主编《社会学百科词典》, 106页,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周星、胡鸿保**: 1994, 《中国民族学的构成与特征》, 载《宁夏社会科学》, 1994(2)。

**中国边疆问题研究会**: 1945, 《本会工作范围》, 载《会务通讯》, 中国边疆问题研究会印, 1945-10-01。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民族》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 1986,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中国教育学会杭州分会**: 1948, 《第四次全国教育会议教育问题草案》, 载《浙江教育档案》53—2—25, 藏浙江省档案馆。

**中国民族学会**: 1934, 《中国民族学会简章草案》, 载《新社会科学季刊》, 第一卷, 第2期, 276~277页。

1948, 《建议集体研究计划推进中国民族学运动草案》, 载《广东日报》, “民族学刊”, 第4期, 1948-06-



07, 4 版。

**中国民族学会（成都）**：1944，《中国民族学会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国民族学会（成都）印。

**中国民族学会西南分会**：1948，《民族学刊发刊词》，载《广东日报》，1948-05-17，4版，“民族学刊”，第1期。

**中国文化研究所**：1941，《中国文化研究所草拟计划》，载《华西大学档案》719，藏四川省档案馆。

**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1943a，《总部三十一年大事记》，载《边疆服务》，“创刊号”，20~24页。

1943b，《边疆服务消息》，载《边疆服务》，第一卷，第2期，22~23页。

**中华社会科学社**：1934，《中国民族学会之发起》，载《新社会科学季刊》，第一卷，第2期，276页。

**中山大学**：1943，《社会学系边胞民俗考察团郴县归来》，载《国立中山大学日报》，“坪石版八四一号”，1943-11-19。

1948，《中国民族学会西南分会年会》，载《国立中山大学校刊》，1948（12）。

1949a，《中山大学人类学会成立大会纪实》，载《广东日报》，1949-01-14，“民族学刊”，第34期。

1949b，《研究学术风气浓厚，各学会请教授专家讲演》，载《国立中山大学校刊》，第19期，1949-01-05。

1949c，《美国社会人类学家勒德菲尔德博士莅校演讲》，载《国立中山大学校刊》，第20期，1949-02-05。

1949d，《黄文山陈宪章两教授赴美讲学》，载《国立中山大学校刊》，第25期，1949-07-31。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1991，《梁钊韬与人类学》，中山大学出版

社。

**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1935，《国立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各组简章》，转引自梁山等著《中山大学校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

1937，《广东北江瑶人调查报告》，载《民俗》，第一卷，第3期，1937-06-30。

**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1933，《文史学界消息》，载《国立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月刊》，第一卷，第2期，67~81页。

**中山大学文学院：**1933，《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概览》，中山大学文学院刊印。

**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1927，《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招生简章（民国十六年度）》，载《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年报》，第六集，第62、63、64期合刊，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印，1929-01-16。

1928，《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招生简章（民国十七年度）》，载《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年报》，第六集，第62、63、64期合刊，中山大学语言研究所印，1929-01-16。

1929，《本所大事记》，载《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年报》，第六集，第62、63、64期合刊，1929-01-16。

**中央大学：**1932，《民族学与现代文化》，载《国立中央大学日刊》，第八七三号，中央大学印，1932-12-21。

1933，《演讲消息》，载《国立中央大学日刊》，第一一〇号，1933-12-19。

**中央研究院：**1934，《中央研究院致外交部公函》，《中央研究

院档案》393—6，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1942，《致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处公函》，载《中央研究院档案》393—10。

**中央研究院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1944，《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计划书》，载《中央研究院档案》393—2505。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29a，《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章程》，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总报告》，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刊印。

1929b，《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七年度报告》，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总报告》。

1933，《历史语言研究所致中央研究院院长呈》，载《中央研究院档案》393—1486。

1937，《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报告》，载《中央研究院档案》393—1373。

1941，《致总办事处呈》，载《中央研究院档案》393—323。

1942a，《历史语言研究所29年度至30年度报告》，载《中央研究院档案》393—1373。

1942b，《历史语言研究所31年度工作报告》，载《中央研究院档案》393—1373。

1943，《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32年度工作检讨报告》，载《中央研究院档案》393—1373。

1944，《历史语言研究所致总办事处函》，载《中央研究院档案》393—2124。

1946，《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三十四年度工作报告》，载《中央研究院档案》393—1373。

1948，《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概况》，载

《中央研究院档案》393—2636。

**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29，《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十七年度报告》，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总报告》。

1930，《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十八年度报告》，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十八年度总报告》。

1930，《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十八年度总报告》，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刊印。

1931，《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十九年度工作报告》，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九年度总报告》。

1932，《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二十年度工作报告》，载《国立中央研究院二十年度总报告》。

1933，《社会科学研究所致文书处签》，载《中央研究院档案》393—280。

1934，《社会科学研究所致文书处签》，载《中央研究院档案》393—279。

**中央研究院文书处：**1929，《国立中央研究院筹备经过及组织》，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总报告》。

1932，《国立中央研究院二十年度总报告》，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刊印。

1934，《国立中央研究院二十二年度总报告》，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刊印。

1935，《国立中央研究院二十三年度总报告》，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刊印。

1936，《国立中央研究院二十四年度总报告》，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刊印。

**钟敬文：**1927，《惠阳拳仔山苗民的调查》，载《国立第一中山

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一集，第6期。

朱家骅：1941，《致蒋介石呈文》，载《中央研究院档案》393—10。

竺可桢：1948a，《竺可桢日记》，1948年写成；后已出版，人民出版社，1984。

1948b，《拟成立人类学研究所呈》，载《浙江大学档案》531—569。

庄孔韶等：1995，《人类学民族学面向未来——北京部分博士、博士候选人关于本学科发展座谈纪要》，载《人类学记事》，第一期，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印，1995-05。

庄学本：1937，《羌戎考察记》，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庄英章：1988，《谈人类学家的台湾汉人社会研究》，载张炎宪编《历史文化与台湾》，台北，台湾风物杂志社。

## 附录二

### 主要参考期刊目录

本目录所列，为本书所引的主要中文期刊。格式为：刊物名称，编印、出版单位。依汉语拼音音序排列如下：

《北京大学日刊》，北京大学。

《边疆服务》，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

《边疆人文》，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

《边疆研究论丛》，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边政公论》，边政公论社。

《大夏周报》，大夏大学。

《广东日报》，广东日报社。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编辑部。

《国立华北编译馆馆刊》，华北编译馆。

《国立清华大学校刊》，清华大学。

《国立中山大学日刊》，中山大学。

- 《国立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月刊》，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
- 《国立中山大学校刊》，中山大学。
- 《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年报》，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
- 《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
- 《国立中央大学日刊》，中央大学。
- 《建设研究月刊》，广西建设研究会。
- 《金陵学报》，金陵大学。
- 《科学》，中国科学社。
- 《岭南大学校报》，岭南大学。
- 《民俗》，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
- 《民族教育研究》，中央民族大学民族教育编辑部。
- 《民族学研究集刊》，中山文化教育馆。
- 《民族研究》，民族研究编辑部。
- 《南大周刊》，南开大学。
- 《青年中国季刊》，青年中国季刊社。
- 《清华周刊》，清华大学。
- 《人类学集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 《人类学纪事》，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等。
- 《人类学研究》，厦门大学人类学系。
- 《社会科学季刊》，社会科学季刊编辑部。
- 《社会科学学报》，云南大学社会经济研究所。
- 《社会学刊》，中国社会学社。
- 《社会学界》，燕京大学社会学系。
- 《社会学讯》，广州中国社会学社广东分社。

《社会研究》（《贵州日报》副刊），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

《社会研究》（天津益世报副刊），燕京大学社会学系。

《私立岭南大学校报周刊》，岭南大学。

《体质人类学集刊外编》，中央研究院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

《西南边疆》，中国民族学会西南边疆研究社（成都）。

《西南研究》，西南学会。

《文讯》，文通书局。

《中国边疆》，中国边疆学会。

《中国科学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中国科学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中国人类学会通讯》，中国人类学会。

《中国文化研究汇刊》，金陵、华西、齐鲁、燕京四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中央研究院语言历史研究所。

《燕京学报》，燕京哈佛学社。

《燕京社会科学》，燕京大学法学院。

《禹贡半月刊》，禹贡学会。

《语言人类学专刊》（乙集），南开大学文科研究所边疆人文研究室。

《厦大周刊》，厦门大学。

《新社会科学季刊》，中华社会科学社。



## 附录三

### 20世纪前半期中国 民族学家学术简历

本书的正文中，为了论述方便，没有介绍中国民族学家的学术简历情况。特加此附录，以备查考。谨说明如下：

1. 所列人物以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民族学家为主，也有部分本书论述中涉及的对民族学有影响的其他专家\*。在此附录中，没有将外国学者列入。由于资料和作者能力有限，一些本应收录的人物和应说明的事项因无从查考而未录入，敬请见谅。

2. 所录人物的民族族称，除特别注明者外均为汉族。

3. 所有人名均按照汉语拼音音序排列。

#### 岑家梧（1912—1966年）

海南澄迈县人。于1931年考取中山大学的社会学系，1934—1937年到日本东京大学和帝国大学研究人类学。抗日战

争爆发后回国。先在昆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1939年起，历任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主任、教授。先后任职于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中山大学、岭南大学、珠海大学。历任中南民族学院教授、岭南大学副教务长、广东民族学院筹备委员会副主任、中南民族学院副院长等职。长期从事民族学的教学与研究，在艺术史、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史前史等方面的研究成就较多。曾先后到云南、四川、贵州、广东等地进行田野调查。著有《史前史概论》、《史前艺术史》、《图腾艺术史》、《西南民族文化论丛》、《中国艺术论集》、《中国原始社会史稿》等。

### 陈国钧（1915— ）

字孝怀。浙江诸暨人。上海大学毕业，以后又赴荷兰社会研究院学习。1938—1943年间，在大夏大学任助教、讲师、社会研究部副主任、主任。此后先后任中央民众教育馆民俗馆主

\* 这个附录，主要是根据有关著作和对其中一些民族学家的访问记录整理而成的。由于每位学者的生平涉及许多资料，无法一一注出。除笔者亲自访问所作的笔记、部分学者寄来的个人简历、本书参考文献所列资料外，其他参考资料有：包尔汉等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雷洁琼等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中外名人研究中心编的《中华文化名人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版），中外名人研究中心编的《中国当代名人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陈国强主编的《简明文化人类学词典》（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的《湖北省志·人物志稿》（第二卷，“人物传·教育科技”），《湖北省志·人物志稿》（第三卷，“人物志·教育科技”），《湖北省志·人物志稿》（第四卷，“人物录·教育科技”），广东省图书馆、广东珠海市政协编的《广东现代人物词典》（广东科技出版社1992年版），何本方主编的《中华民族史知识词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2年版），熊钝生主编的《中华民国当代名人录》（台湾中华书局1979年版）等。

任、教育部边疆教育督导专员、浙江浦江县县长、庆元县县长、台湾莲花中学校长、台湾省立行政专科学校社会行政科教授、台湾省立法商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台湾政治大学边政学系教授、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劳工研究委员、大陆救灾总会研究发展委员等。著有《贵州苗夷社会研究》(合著)、《贵州苗夷歌谣》、《内蒙风土人物》、《内蒙八旗社会概况》、《畚民研究》、《兰屿雅美族》、《东台山地民族》、《台湾土著婚丧制度》、《台湾土著社会研究》、《荷兰社会研究》、《文化人类学》等。

### 陈序经 (1903—1967年)

广东文昌人。幼年侨居东南亚。1925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后入美国伊利诺大学并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岭南大学、南开大学、西南联大教授,先后任西南联大法商学院院长、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南开大学教务长、岭南大学校长、中山大学副校长、南开大学副校长、暨南大学校长、全国政协委员等。长期从事社会学的教学与研究,重视实地的调查研究,并与东南亚各国的华侨有广泛联系,致力促进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文化交流。著有《中国文化的出路》、《文化学概观》、《登民的研究》、《南洋与中国》、《社会学的起源》等。

### 陈映璜 (1887—?)

字仲驥,湖北黄陂人。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曾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和中国大学教授、哲学教育系主任及北京大学讲师、北平女子师范大学讲师等。是最早在中国讲台上讲授人类学课程的学者之一。他所讲授的人类学课程以体质人类学为主,介绍了当时日本和西方对人类学的一般认识。著有《人类学》,是中国最早的人类学大学教本。

### 陈永龄 (1918— )

江苏淮阴人。1947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院，获硕士学位。先后在新疆学院、燕京大学、中央民族学院、加拿大里贾纳大学任教员、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访问教授。曾兼任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副主任、民族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民族史学会顾问、北京社会学会副会长、国际影视人类学会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编委兼分科副主编、《当代中国·民族卷》编委、《影视人类学》杂志副主笔等。致力于中国民族学史、民族学、民族史等领域的研究，对中国民族学史、西北民族研究致力尤多，兼及北美印第安人的研究。论著有《民族学浅论文集》、《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民族学》（合著）、《论中国民族学在新时期面临的新课题》、《中国少数民族》（副主编）、《民族词典》（主编）、《我国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等。

### 戴裔煊 (1918— )

广东阳江人。1929年就读于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1942年毕业于中山大学研究院，获硕士学位。先后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广东省立法商学院、中山大学等处任研究员、教授，兼任广东省历史学会、民族学会、中国百越民族史学会、中国希腊罗马史学会顾问等。早年专治民族学史，并对南方少数民族文化进行研究。曾协助黄文山编辑《民族学书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主要从事中、西交通史、澳门史和经济史等方面的研究。著有《鲍亚士及其学说述略》、《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的递演》、《宋代钞盐制度》、《西方民族学史》、《〈明史·佛朗机传〉签正》、《僚族研究》、《干栏——西南中国原始住宅的研

究》、《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等。

### 方国瑜（1903—1983年）

字瑞臣。云南丽江纳西族自治县人。纳西族。1924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预科。1933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毕业。历任北京师范大学研究院编辑员、洛阳师范学校教师、北平私立民国大学国文系教授，先后任云南大学文史系教授、主任和文法学院院长及云南通志馆编审、审定、续修等。1949年后任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所副所长。一生从事云南地方史和西南民族史的研究，曾经多次到云南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从事实地调查，尤精于地方文献考据和研究。著有《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纳西象形文字谱》、《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彝族史稿》、《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滇西边区考察记》、《旅边杂著》等。

### 方壮猷（1902—1970年）

原名彰修。湖南湘潭人。1923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转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1929年赴日本帝国大学留学。回国后在北平、南京等地大学任讲师。后又赴法国师从汉学家伯希和研究东方民族史。1936年归国。历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代理文学院院长、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处处长、中南图书馆馆长、湖北省文化局局长、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长期研究文学史和宋辽金元史，著作侧重考释。在民族史研究中，注意考古学、民族学资料的运用。早年参加对西南地区彝族等少数民族的实地调查。著有《凉山罗族系谱》、《宝书考》、《契丹民族考》、《楚墓通讯集》（主编）、《匈奴王号考》、《鲜卑语言

考》、《鞞鞞起源考》、《东胡民族考》、《中国史学概要》等。

### 费孝通 (1910— )

江苏吴江人。早年就读于燕京大学、清华大学。1935年，赴广西大瑶山从事人体测量和社会调查，出版《花蓝瑶社会组织》。后留学英国伦敦经济学院。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在云南大学、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大学等校任教授。所著《江村经济》，第一次将人类学方法用于研究中国现代农村。50年代后，先后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名誉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顾问、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法制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席等职。曾获国际性的应用人类学会1980年度马凌诺夫斯基名誉奖、英国皇家人类学会1981年度赫胥黎奖章，1982年被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选为荣誉院士。为重建中国社会学、摸索中国城市化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于江村和云南三村的研究推动了中国人类学的发展。著有《禄村农田》、《初访美国》、《生育制度》、《乡土中国》等。并译出马凌诺夫斯基的《文化论》、梅岳的《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等。

### 冯汉骥 (1899—1977年)

字伯良，湖北宜昌人。1919年入武昌文华大学文科兼图书馆科，1923年毕业后任厦门大学图书馆襄理、主任。1931年赴美国留学，入哈佛大学研究院人类学系。后转入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人类学系，1936年获人类学哲学博士。次年回国。先后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四川省博物馆筹备主任、华西大

学社会学系教授、西南博物院副院长、四川博物馆馆长兼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研究室主任。曾对四川西部的羌族、藏族等进行实地调查。主持发掘前蜀王建墓及四川其他墓葬、考古遗址，并对成都平原进行了考古调查。发现资阳人头骨化石。对中国的民族史、文化史、工艺美术史、建筑史、音乐史等均有研究。著有《中国亲属制》、《由中国亲属名词上所见之中国古代婚姻制》、《倮倮之历史起源》、《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等。

### 冯家升（1904—1970年）

山西孝义人。满族。1927年入燕京大学，1934年获硕士学位。毕业后先后执教于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东北大学，曾与顾颉刚合办《禹贡》刊物。1937年赴美深造，曾任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历史研究室研究员。1947年归国后，历任北平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教授、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辽史、中国科技史、维吾尔族史和中国少数民族古文字学等专业研究，精于考证。《中国社会史——辽》（英文，合著）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了中国的古代社会，颇具借鉴意义。早年所著《辽代源流与辽史初校》，开创了从校勘入手全面研究《辽史》的工作。主编有《维吾尔族史料简编》（合著），此为研究维吾尔族史的著名资料图书，并开创了对回鹘文和突厥文的研究。另，著有《中国火药的发明和西传》等，译有《东胡民族考》。

### 傅懋勳（1911—1988年）

字慈嘉。山东聊城人。193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随后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先后任华中大学、华西协和大学的讲师、副教授、教授、华中大学中文系主任。1948年赴英国

留学，1950年获剑桥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民族研究所的研究员，历任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学院兼职教授，先后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组组长、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副所长、民族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顾问、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北京市语言学会副会长、《民族语文》杂志主编等职。主要从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和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对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调查、研究尤多。著有《维西麽些语研究》、《丽江麽些象形文〈古事记〉研究》、《纳西族象形文字〈白蝙蝠取经记〉研究》、《永宁纳西族的母系家庭和亲属称谓制》等。

### 高华年（1919— ）

福建南平人。1940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4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获硕士学位。先后任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南开大学、岭南大学、中山大学等校讲师、副教授、研究员、教授，历任中山大学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室主任、语言学研究室主任、对外汉语培训中心主任、中国汉语对外教学学会顾问、广东语言学会顾问、广东省语文学会副会长等职。主要研究语言理论、中国少数民族方言、汉语方言和东南亚语言。抗日战争时期曾对西南地区的彝族等少数民族的语言与文化进行调查研究。著有《彝语语法研究》、《广州方言研究》、《语言学概论》、《纳苏语中汉语借词研究》等。

### 谷 苞（1916— ）

甘肃兰州人。194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先后在



清华大学、云南大学、燕京大学、兰州大学、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研究室、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新疆社会科学院等处任助教、讲师、副教授、研究员、兼职教授等，并历任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民族研究所所长、新疆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国民族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和中亚文化协会顾问等。曾在云南、甘肃、新疆进行社会调查。早年从事社会学的研究，后重点研究民族学方面的问题，关注新疆民族历史的研究。著有《论中华民族的共同性》、《新疆维吾尔族族源新探》、《新疆历史人物》（主编）等。

#### 胡鉴民（1896—1966年）

江苏宜兴人。1922年秋入法国斯太斯堡大学攻读社会学，获硕士学位。1931年春回国。历任中央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四川大学教育系教授、四川大学文学院代理院长、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历史系主任、金陵大学文科研究所教授。致力于社会学的教学及研究，对于四川、浙江等地各民族的文化与社会曾进行了多次田野调查。主要论文有《中国社会的分析》、《羌族之信仰与习为》、《羌民的经济活动型式》、《苗人的家庭与婚姻习俗琐记》等。

#### 胡庆钧（1918— ）

号静之，笔名胡海等。湖南宁乡人。1944年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人类学硕士毕业。此后先后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云南大学、清华大学人类学系和社会学系、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讲师、副研究员、研究员等职。先后任中国民族学学会顾问、中国社会学会和中国人类学会理事、中国世界古代史

研究会顾问等。长期致力于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尤精于西南地区的彝族、苗族等民族的研究。著有《明清彝族社会史论丛》、《中国农村社会阶层的分化》、《川南叙永苗民人口调查》、《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形态》等。

### 黄文山（1895—1982年）

广州人。192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赴美留学，1927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回国后先后任国立劳动大学、中央大学、建设大学教授，曾任中央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中山文化教育馆研究部主任、建设大学校长、广东法商学院院长、立法院委员、广东省政府委员等。1951年后，历任社会研究新学院和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洛杉矶中国文化学院院长、洛杉矶泛美华人出版社社长、台湾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长期致力于社会学、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积极介绍美国的社会学的文化学派，倡导并努力从事建立中国文化学体系的工作。著有《文化学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文化学体系》、《论当代的文化》等。

### 贾拓夫（1912—1967年）

陕西神木人。早年参加革命工作，曾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中共陕西省委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负责人、中共中央调查研究局第四分局局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主要从事民族理论的研究及民族政策的制订等方面的工作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工作，特别是早年在延安主持进行的回回民族问题的研究、蒙古民族问题的研究，对中国共产党早期民族理论的提出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在延安主持建立了蒙古文化促进会、陕甘宁边区回民救国协会和回民文

化促进会。著有《回回民族问题提纲》、《蒙古民族问题提纲》等。

### 翦伯赞 (1898—1968年)

湖南桃源人，维吾尔族。1919年毕业于武昌商专，后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经济。20年代后期开始潜心研究历史。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和副校长、中央民族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委员、民族历史研究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缅友协副会长、教育部历史教材编审组组长等职。长于中国古代历史研究，对维吾尔等民族的历史研究亦有心得。参与筹建中国史学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研究的发 展作出了卓越贡献。著有《最近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历史哲学教程》、《中国史纲》，主编《中苏半月刊》、《中苏文华》、《大学月刊》以及《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历代各族传记汇编》、《中外历史年表》、《中国史论集》等。

### 江应樑 (1909—1988年)

广西贺县人。1932年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历史社会学系。曾任暨南大学附中教员和南洋文化事业部编辑。1936年入广州中山大学研究院。此后，在中山大学、东方语文专科学校、珠海大学、云南大学等校任教，先后任云南大学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所所长，中国人类学会、中国民族学会、中国社会学会顾问、中国民族研究学会理事。长期致力于中国南方、特别是中国西南民族学和民族史的研究，对云南的傣族等民族聚居地区的田野调查尤为深入。在对 中国西南各民族的研究中，将历史学、民族学和考古学资料结合，互相印证。著有《西南边

疆民族论丛》、《傣族史》、《中国民族史》等。

### 柯象峰（1900—1983年）

安徽贵池人。金陵大学毕业，1927年赴法国留学，在巴黎大学、里昂大学学习社会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在金陵大学任教，曾任社会学系教授、系主任等。长期从事社会学的教学与研究，尤其注重社会问题的研究。抗战时期曾对西南地区的彝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进行调查。著有《现代人口问题》、《社会救济》、《中国贫穷问题》和《西康社会之鸟瞰》等。

### 梁钊韬（1916—1987年）

广东顺德人。早年就读于厦门大学、中山大学。1941年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民族学专业毕业，获硕士学位。先后任华西大学博物馆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民族学部主任。历任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历史系副教授、教授。曾任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主任、中山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社会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民族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会长、中国人类学会主席团成员、国际当代人类学学会会员等。长期从事人类学的研究和教学，尤注重民族考古学和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1981年倡议复办了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民族学专业人才。著有《中国民族学概论》（合著）、《中国古代巫术——宗教的起源和发展》，并发表《马坝人发现地址的调查及人类头骨化石的初步现察》等数十篇论文。

### 李安宅（1900—1985年）

河北迁安人。早年就读于齐鲁大学、燕京大学。1934年

至1936年，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和耶鲁大学人类学研究院进行学习和研究。曾任燕京大学助教、讲师。1938年赴甘肃科学教育馆工作，并在拉卜楞藏族聚居区进行调查研究。1941年起，先后在华西大学、美国耶鲁大学、西南民族学院、四川师范学院等校任教授、客座教授，兼任华西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西南民族学院副教务长及民族政策研究室主任、四川师范学院副教务长等职。长于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的理论研究，他对美国印第安祖尼母系社会的研究，以一个中国学者的视角对美国学者的观点提出有力的质疑，对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的发展产生了影响，对藏族的宗教的实地研究成果也引起国际学术界注意。主要著作有《藏族宗教之实地研究》、《祖尼：母系社会研究》、《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美学》等，译有《两性社会学》、《巫术宗教科学与神话》、《知识社会学》等。

### 李方桂（1902—1987年）

山西昔阳人。1924年赴美国留学，先后获密歇根大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20年代末回国，历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中央研究院院士、夏威夷大学荣誉教授等。是中国非汉语言研究的开创人和奠基者，对中国壮侗语族的许多语言和方言进行了开创性的调查，其中也涉及民族文化的其他方面。著有《比较台语手册》、《龙州土语》、《莫话纪略》、《切韵的来源》、《上古音研究》等。

### 李 济（1896—1979年）

湖北钟祥人。1918年毕业于清华学校，赴美国留学，学习心理学、社会学等课程。后入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以《中国民族的形成》著作，获人类学博士学位。1923年回国。先

后担任天津南开大学、北京清华大学的教授，曾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研究教授、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中央研究院评议员、中国代表团驻日顾问、中央研究院院士，历任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教授、系主任和台湾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东亚学术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等。1938年，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曾授以其名誉会员称号。曾主持过河南安阳殷墟、山东城子崖等遗址的考古发掘。晚年在台湾致力于发展中国的人类学学科。计发表专著和论文共123种(篇)。主要著作有《安阳》、《中国民族的形成》等。

### 李景汉 (1894—1986年)

北京通州人。早年毕业于协和学院，1917年赴美国留学，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社会学及社会调查方法，获硕士学位。1924年回国，曾任北平社会调查所干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社会调查部主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师、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实验区调查部主任、清华大学国情研究所调查组主任、西南联合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辅仁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历任清华大学、辅仁大学、北京财经学院、北京经济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长期从事社会学调查与研究、教学，对社会学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在中国的应用作出了有益的尝试。他主持了定县的社区调查，对中国北方农村社区的研究有重要影响。也对云南等地少数民族社区进行过调查。著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北京人力车夫现状的调查》、《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实地调查方法》等。

### 李维汉 (1896—1984年)

湖南长沙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参与组织新民

学会，后赴法国勤工俭学。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等。1938年主持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系统地调查、研究民族问题，主持编写了《回回民族问题提纲》、《蒙古问题提纲》等。参与领导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工作。主持起草了《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主持制定了政务院《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和《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代表中央人民政府达成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提出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中应采取和平改革的方针，提出了社会主义民族问题及民族工作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主要著作有《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中国各少数民族和民族关系》、《中国民主革命中的民族问题》、《中国各民族解放的道路》、《中国共产党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关于民族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在全国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纪要》、《西藏民族解放的道路》等。

### 林惠祥（1901—1958年）

福建晋江人。1926年毕业于厦门大学社会学系。后考进菲律宾大学研究院，1928年获人类学硕士学位。曾任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组特约编辑员，先后任厦门大学教授、历史社会学系主任、历史系主任、人类博物馆馆长、南洋研究所副所长等。毕生致力于人类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从事东南亚和中国东南地区的考古发掘、人类学文物的搜集整理和少数民族调查研究，是中国对台湾省高山族最早进行调查、研究的学者，创办了厦门市人类博物馆筹备处和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主要著

作有《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文化人类学》、《中国民族史》、《民俗学》、《世界人种志》、《苏门答腊民族志》、《婆罗洲民族志》、《神话论》等。

### 林耀华 (1910— )

笔名述真、志贡。福建古田人。1935年毕业于北平燕京大学，获硕士学位。1937年赴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深造，获哲学博士学位。1941年回国后，曾任云南大学、燕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北京大学、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兼职教授、研究员及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历任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藏族研究室主任、历史系副主任、民族研究所所长、民族学系主任，先后任民族文化宫顾问、国家民委委员，中国社会学会、中国民族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人类学学会主席团成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法学评议组成员、《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委会副主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编委兼分科主编、英文《当代人类学》杂志通讯编辑、美国传记研究所国际顾问等职。长期从事民族学、社会学研究，曾深入福建汉族聚居的乡村和彝族、藏族、达斡尔族等许多少数民族聚居区进行实地调查，并发表了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主要著作有《金翼》（伦敦英文版与中译本）、《凉山彝家》（中、英文版）、《凉山彝家的巨变》、《民族学研究》、《原始社会史》（主编）、《民族学通论》（主编）等。

### 凌纯声 (1902—1981年)

字民复。苏州武进人。曾在中央大学学习，后入法国巴黎大学深造，并获博士学位。历任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等所的研究员、所长，曾任中央大学、台湾大学教授和中央研究院



评议员、院士。毕生致力于中国的民族学研究，并深入各民族聚居区实地调查，对东北的赫哲族和湘西的苗族的田野工作及其作品被誉为早期的中国民族学工作的圭臬。曾在中国古代南方民族文化、与东南亚民族文化的渊源关系以及中国古代民族文化与太平洋区域民族文化的传播关系的研究方面有所建树，对中国民族学研究的发展具有相当的影响。主要著作有《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畬民图腾文化的研究》等。

#### 刘 咸 (1902—1990年)

字重熙，笔名观化、汉士等。江西都昌人。1925年毕业于东南大学生物系，后留校任助教及清华大学讲师。1928年赴英国，入牛津大学人类学研究院，获硕士学位。回国后曾任山东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上海中国科学社编辑部部长兼明复图书馆馆长、上海临时大学教务长和暨南大学人类学系主任、理学院院长及复旦大学的生物系、社会学系、人类学系教授兼人类学系主任，历任英国皇家人类学学会会员、巴黎国际人类学院院士、《中国动物学杂志》主编、上海自然博物馆学术顾问等。早在1931年就作为中国代表出席了国际人类学会，在推动中国人类学的早期发展方面做出了较大的贡献。早年对海南岛的田野考察是中国人类学家较著名的早期田野工作之一。著有《动物学小史》、《印度科学》、《从猿到人发展史》、《猴与猿》、《赫胥黎传》、《猿猴学》、《世界民族语言手册》、《人类学史》等。

#### 吕振羽 (1900—1980年)

名柳岗。湖南武冈人。早年参加北伐战争，加入中国共产

党，从事抗日活动。历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委员、大连大学校长、东北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兼东北人民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委员、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民族历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等。精于中国历史研究，特别关注中国民族史的研究，依据历史资料，较早对中国民族发展问题做出历史唯物主义的探索，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和发展以及民族史的研究作出了贡献。主要著作有《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商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国政治思想史》、《简明中国通史》、《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中国民族简史》、《史学研究论文集》、《史论集》、《吕振羽史论选集》、《中国历史讲稿》等。

### 罗常培 (1899—1958 年)

字莘田，号恬庵，笔名贾尹耕。北京宛平人。满族。191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随后到该校哲学系学习两年，并到天津、北京中学教书。1924年起，先后任西北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文科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后改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委员、《中国语文》杂志主编等职。对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特别是在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方面作出了开创性的工作。对汉语音韵和汉语方言的研究方面亦有成绩。著有《语言与文化》、《厦门音系》、《临川音系》、《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唐五代西北方言》、《罗常培语言学论文选集》等。

### 罗致平 (1911— )

又名叔于田、鹿湖春。原籍广东龙川，生于英属北婆罗洲（今马来西亚）。早年就读于广州河南白鹤洞协和神科大学、岭南大学神学院。1935年赴日本东京立教大学大学院攻读西洋史学史。回国后，先后在香港沙田宗教研、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广东省法商学院、珠海大学、文化学院、中南民族学院、国家民委参事室、中央民族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等处任教授、参事、研究员，并任中国世界民族研究会顾问、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民族史研究会顾问等。研究领域广阔，涉及民族学、宗教学、民俗学、社会学等学科。著译有《中亚突厥史十二讲》、《民俗学史略》、《社会主义民族学的产生和发展》等。

### 马长寿 (1907—1971年)

字松龄。山西晋阳人。毕业于中央大学社会学系。历任东北大学、金陵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教授和中央博物馆筹备处专员。曾赴四川大凉山、川西及川西北的彝族、藏族、羌族等民族聚居地区进行实地考察。1955年任西北大学教授，并筹备西北民族史研究室。长期研究中国古代北方和西南地区民族史，对突厥、匈奴、乌桓、鲜卑、吐蕃等民族的历史研究尤深。主要著作有《突厥人与突厥汗国》、《北狄与匈奴》、《乌桓与鲜卑》、《南诏国内的部族组成与奴隶制》、《氐与羌》等。

### 马学良 (1913— )

字蜀原。山东荣成人。193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并任西南联合大学助教。1939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

1941年毕业。曾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历任中央大学、东方语言专科学校、北京大学副教授、教授。1952年后，到中央民族学院任教授，并先后任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主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长期从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与教学，并进行古代汉语与汉藏语系语言的比较研究，尤精于对于彝族语言、彝族文字及其文化的调查研究。著有《撒尼彝语语法》、《撒尼彝语研究》、《保文作斋经译注》、《保文作祭献药牺牲经译注》等。

### 潘光旦（1899—1967年）

别名仲昂。上海宝山人。1922年毕业于清华留美预备班，随后赴美国留学，在纽约汉普夏州达茂大学学习生物学，获学士学位；后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动物学、古生物学、遗传学，获硕士学位。1929年回国，曾任吴淞政治大学教务长、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国公学大学部社会学院院长，历任清华大学教授、教务长、社会学系主任和西南联合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系主任，先后任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教授、中东南研究室主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研究领域广泛，尤其重视优生学的研究。在50年代，在土家族的民族认定过程中，以史料与田野调查结合的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著有《中国之家庭问题》、《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人文史观》、《优生原理》、《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等，译有《性心理学》、《人类的由来》等。

### 任乃强（1894—1989年）

字筱庄。四川南充人。1932年毕业于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后返川协助张澜创办南充中学，并创办了《实业半月刊》。后在重庆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等校任教授，历任西康通志馆筹备主任、康藏研究社理事长、中国民族史学会顾问等。首先发掘整理藏族史诗《格萨尔传》，并介绍给学术界。长期致力于民族史的研究，多次到西南各地，特别是四川和西康（今四川西部及西藏东部）地区进行实地调查。著有《四川史地》、《西康图经》、《康藏史地大纲》、《吐蕃音义考》、《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等。

### 芮逸夫（1898—1994年）

江苏溧阳人。东南大学外文系修业。1930年起先后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的助理员和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组的助理员、副研究员、编纂、研究员，曾任中央大学边政系教授、国民政府立法委员等。1948年去台，次年春兼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同年考古人类学系成立，改专任教授，兼任中央研究院人类学组主任。以后历任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教授、研究主任和台湾文化大学民族与华侨研究所教授。曾先后在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人类学系、耶鲁大学人类学系、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印第安那大学人类学系进行访问研究或担任客座教授。长期从事民族学研究，研究涉及民族学的理论和各民族的文化，对中国古代的亲属制度、中华民族的构成等课题有较多研究。著有《中国民族文化及其论稿》、《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合著）、《川南雅雀苗的婚丧礼俗》、《人类学辞典》（主编）、《苗蛮图集》等。

### 商承祖 (1900—1975年)

广东番禺人。192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德文系。先后任东南大学讲师、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的专任编辑员。后赴德国学习，同时在德国汉堡大学中国语言文化系任教，1934年获德国汉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任中央大学教授、国立编译馆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南京大学教授、外文系主任、外国文学教研室主任。参与了“中国民族学”学科建立初期的调查、研究工作，对广西凌云的瑶族的调查是中国民族学界较早的调查之一。后来主要从事德国语言和文字研究。著有《广西凌云瑶人调查报告》（合著）、《中国“巫”史研究》（德文）、《德国文学史》等，有《双影人》、《怠工者》等译作。

### 史国衡 (1912—1995年)

湖北随州人。193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随即入云南大学和燕京大学合办的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从事调查、研究，并任云南大学讲师。1945年作为访问学者到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和社会学系进行研究。1948年回国，先后任清华大学副教授、教授、总务长。1960年任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以后兼任北京人口学会理事、中国社会学会理事等职。主要从事社会学的教学与研究。在云南大学工作期间，对云南的城镇工厂和矿山进行实地调查、研究。著有《个旧锡业矿工生活》、《昆厂劳工》等。

### 孙本文 (1892—1979年)

字时哲。江苏吴江人。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21年赴美国留学，获伊利诺大学硕士学位。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及

纽约大学师从吉丁斯、奥格本、麦孤独等，专攻社会学，获博士学位。其后又到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选读有关课程，师从社会心理学家 E·范黎庶和派克教授。回国后，先后任中央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东南社会学会常务委员、《社会学刊》总编、中国社会学理事会理事等。院、系调整后，任南京大学教授、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理事、南京市经济学会理事及副会长等。1927年，他的第一部社会学著作《社会学上之文化论》出版，将美国社会学的文化学派介绍到中国，并提倡建立中国的文化学研究体系，积极倡导和实践“社会学中国化”。30年代主编有《社会学大纲》，为当时最主要的社会学教材，也是中国社会学篇幅最巨的著作。所著《当代中国社会学》，对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社会学发展的过程、现状和研究水平进行了全面的评价。另著有《社会学原理》、《现代中国社会问题》、《近代社会学发展史》等。

#### 陶云逵（1904—1944年）

江苏武进人。早年就学于南开大学。1927年赴德国柏林大学、汉堡大学研读人类学、遗传学、民族学，获博士学位。归国后，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任编辑员、教授，并担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边疆人文》杂志主编。在云南等地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田野调查，师承德奥民族学传播学派，但主张综合，用“文化历史”观点研究西南的各民族。代表作《西南部族之鸡骨卜》，对鸡骨卜的分布及其历史记载作了详尽研究，认为它属于非汉语民族文化产品。其著作多为西南民族的调查报告，主要有《云南碧罗雪山之栗栗族》、《车里摆夷之生命环》等。

### 田汝康 (1916— )

云南昆明人。1935年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哲学心理学系。此后在云南燕京社会学研究站任研究助理。受到功能学派的较大影响，其间进行了对云南傣族的田野调查。1945年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获哲学博士学位。1950年起，先后任浙江大学和复旦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美国人文中心访问院士，曾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参与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的重建工作。1978年以后先后到英国、澳大利亚、美国进行学术访问或讲学。长于对宗教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注意对宗教的功能分析。1952年以后主要从事历史学研究。著有《摆夷的摆》、《沙捞越华侨研究》、《滇缅边境傣（泰）族宗教仪式研究》、《男性的忧愤与女性的贞操——明清时代中国比较伦理研究》、《传教士与中国少数民族》等。

### 王兴瑞 (1912—1977年)

广东乐会（今属海南琼海）人。1938年毕业于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人类学部，获硕士学位。曾任中山大学、上海大夏大学、广州珠海大学教授，历任国民党中央党部专门委员、广州市参议员、广东省广雅中学校长、国民党广州市党部执委等。长期致力于历史学和民族学的研究，对海南岛地区的文化和黎族、苗族等民族尤有研究，多次赴海南对黎族、苗族进行考察。曾协助国民党元老邹鲁写作《中国国民党史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被捕入狱。1956年获释后执教于广州雷州师范学校。著有《中国农业技术发展史》、《中国现代革命史》、《海南岛黎人调查报告》、《洗夫人与冯氏家族》等。



### 卫惠林 (1904— )

学名安仁，字惠林，以字行。山西阳城人。1917年赴日留学，以后又到法国攻读人类学。1930年回国，曾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助理研究员，历任中央大学、四川省乡村教育学院社会学副教授和中山文化教育馆研究部民族学专任研究员，先后任金陵大学、复旦大学、中央大学教授。为中国民族学会创办人之一，并任《民族学研究集刊》副主编。1949年赴台湾。先在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纂台湾省通志稿，后任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教授、中央研究院民族学所研究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等。早期偏重于国外文化人类学理论的介绍，并从事汉族与少数民族风俗的研究。以后研究台湾土著民族，尤以对中国民族的分类和亲属结构的研究而著称。主要著作有《四川酆都宗教风俗调查》、《台湾风土志土俗志》(合著)、《兰屿雅美族的社会组织》、《台湾土著各族近年人口增加与聚落移动》、《社会人类学》等。

### 闻宥 (1901—1985年)

字在宥。江苏松江(今属上海)人。早年在上海申报馆任职，后历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和中央大学、山东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四川大学、中央民族学院、西南民族学院教授，曾任华西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博物馆馆长，先后任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法国远东博古学院通讯院士等职。擅长诗词、书法，对字喃、彝族文字、壮族语言、羌族语言、纳西族文字、四川汉画像砖、铜鼓等均有开创性的研究，对西南民族文化亦有研究。著有《论字喃之组织及其与汉字之关涉》、《读彝文丛刻——兼论彝文之起源》、《古铜鼓图录》等。

### 吴定良（1894—1969年）

江苏金坛人。早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6年入英国伦敦大学，先后获生物统计学与人类学博士学位。后在生物测量与优生学实验馆工作。1934年回国，任北京大学统计学教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组主任、中央研究院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主任等。在江苏、贵州、四川、浙江等地进行了人类体质实地测量。1946年以后，任浙江大学教授、人类学系主任和上海复旦大学生物系人类学教授、教研室主任等。他在早期对中国各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体质测量的大量资料为研究中国民族起源与构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贵州的苗族等民族的体质报告为其中的代表性作品，在中国体质人类学的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在统计学方面亦有较深造诣。所搜集的大量脚型资料和面骨测量、体骨测量等数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制鞋工业和制造防毒面具、防护衣等提供了依据。著有《贵州坝苗及华南其他少数民族的体质》、《古代人复原像》、《中国猿人眉间凸度的比较研究》、《下颌骨颞孔的类型和演化》等。

### 吴金鼎（1901—1948年）

字禹铭。山东安邱人。齐鲁大学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师从李济，学习考古学和人类学。以后又到英国伦敦大学留学，并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任齐鲁大学教授、训导长、文学院院长、国学研究所主任、图书馆主任等。曾从事山东人的体质调查等体质人类学的调查测量，是龙山文化的发现人。著有《山东人体质之研究》、《中国史前的陶器》等。

### 吴汝康（1916— ）

江苏武进人。毕业于中央大学生物系，后在中央研究院历

史语言研究所、贵州大学任职。1946年赴美国留学，获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博士学位。1949年回国，曾任浙江大学教授，历任大连医学院解剖系主任、教授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兼任中国解剖学会副理事长、理事长、名誉理事长和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人类学学报》主编等职。先后被授予美国俄亥俄州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人类学研究所荣誉学术会员称号，又当选为国际人类学和民族学协会荣誉会员。主要从事古人类学研究，对蓝田人、北京猿人、马坝人、丁村人、柳江人、资阳人和巨猿等作了较系统的研究，主编有《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综合研究》，著有《巨猿下颌骨和牙齿化石》、《资阳人》、《人类发展史》、《人体解剖学》（合著）、《人体解剖图谱》（合著）等。

### 吴文藻（1901—1985年）

江苏江阴人。早年就学于北京清华学堂，1923年赴美留学，先后在达特默思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社会学和人类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29年回国，在燕京大学任讲师、教授、社会学系主任、法学院院长等。曾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后任中国驻日本代表团公使衔政治外交组组长等。1950年回国，先后任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和中国社会学学会、民族学会、人类学会顾问，历任全国政协第六届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委等职。长期从事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教学与科研。在大量介绍西方学术思想的同时，积极提倡社会学和民族学的中国化，并为之做了大量的工作。提倡特区研究，强调实地调查，注重培养后学。著有《见于英国舆论与行动中的中国鸦片问题》、《文化表格说明》、《现代社区研究的意义和功用》、《社会制度的性质与范围》、《边政学发凡》。1959年曾主

持《辞海》民族类词目的释文工作。还译有《不要再有战争》、《六次危机》、《世界史纲》等。

### 吴泽霖 (1898—1990年)

江苏常熟人。早年考入清华大学堂。1922年留学美国。先后在威斯康星大学、密苏里大学、俄亥俄州大学获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1928年回国。先后在大夏大学、暨南大学、西南联大、清华大学、西南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南开大学、中南民族学院任教授、研究员；担任或兼任大夏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昆明译员训练班副主任，清华大学人类学系主任、教务长，西南民族学院民族博物馆馆长和中国社会学会、民族研究会、人类学会、民俗学会等学术团体顾问及湖南省社会学学会名誉会长等。主要致力于社会学、民族学的研究，在社会学理论、贵州等地少数民族的研究、民族关系和种族关系等方面的研究中，有独到见解。为中国民族学博物馆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曾参与东南社会学社和中国社会学会的筹建工作。著有《美国人对黑人犹太人和东方人的态度》、《社会学及社会问题》、《现代种族》、《社会约制》、《贵州苗夷社会调查》(合著)等。

### 徐声金 (生卒年月不详)

字瑞江，又作瑞缸。美国阿海可惠斯黎安大学经济学兼政治学学士、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硕士及博士。1922年到厦门大学预科任社会学兼史学教授、预科主任。以后任厦门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社会学系主任、历史社会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在厦门大学长期从事社会学教学与研究。抗日战争胜利后去菲律宾大学任教，并担任其他职务。著有《中国家庭制

度》(英文)、《中国家庭》(英文)等。

### 徐益棠 (1896—?)

1925年毕业于东南大学教育系。1933年法国巴黎大学民族学院研究院毕业。曾先后任东南大学、金陵大学教授,在金陵大学开设中国边疆问题讲座,以后参与组建该校社会学系边疆民族组。抗日战争前曾对广西象平一带的瑶族进行调查。曾参与筹备中国民族学会,并担任中国民族学会理事。抗日战争期间在成都华西坝金陵大学开展民族学的研究工作,组织在蓉的理事主持中国民族学学会的工作。著有《云南三大民族》(法文)和《中国民族学之发展》、《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等重要论文。

### 许烺光 (1909—1996年)

辽宁庄河人。1933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社会学系,曾在上海从事国际救援活动,1934—1936年在北京协和医院做社会工作。1937年赴英国学习,师从马凌诺夫斯基,1940年获伦敦大学文化人类学博士学位。1941年回国后,担任云南大学副教授、教授,并在云南大学与燕京大学合办的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室(魁阁)工作,1943—1944年间曾担任该站代理站长。1944年赴美国任哥伦比亚大学讲师,并随林顿研究心理人类学。以后担任康奈尔大学、伊利诺斯州西北大学、旧金山大学等校的副教授、教授和伊利诺斯西北大学人类学系主任,1977—1978年担任美国人类学协会主席。主要田野工作地区是中国的中、北部和西、南部及美国夏威夷华裔居住区、印度、日本等地。长期从事人类学的教学与研究,尤其在心理人类学和大型社会比较研究方面影响更大,首先提出“心理人类学”

的概念。著有《中国南部家庭的功能》、《祖荫下：中国的亲属关系、个性和社会流动性》、《宗族种姓俱乐部》、《美国人和中国人：两种生活方式的比较》、《美国人和中国人：伟大文明的目标和实现》等。

### 许仕廉（1896—？）

湖南湘潭人。毕业于美国爱渥华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24年回国后，曾任武昌匡立师范大学、燕京大学教授，历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社会学杂志》编辑，还曾任中国社会学社副理事、理事，先后任南京工业调查所专员、北平社会局顾问、《美国社会学和社会研究杂志》特别编辑、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导师、外交部参事、条约委员会委员、伦敦及意大利人口问题研究委员会驻华通讯员等职。抗日战争前夕赴美国定居。从事社会学的教学与研究，尤重视人口等问题研究。主持创办了《社会学界》杂志和燕京大学清河实验区。著有《清河：一个社会学分析》（英文版）、《人口论纲要》、《中国人口问题》等。

### 严 复（1854—1921年）

原名宗光，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侯官（今闽侯）人。福州船政学堂第一届毕业生。1877年赴英国学习海军，关心社会制度和社会政治学说。1879年回国后，先任北洋水师总教习、总办，后历任京师大学堂编译局总办、学部名词馆总纂、资政院议员、中国国学会副会长、复旦公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等职。积极将西方的社会学、民族学思想介绍到中国，宣传进化论观点。译有《天演论》、《群学肄言》、《社会通论》等重要著作。著有《严几道诗文抄》等。

### 言心哲 (1898—1984年)

别名荣彰。湖南湘潭人。1921年赴美国留学，先后就读于加州阿尔托中学、太平洋学院、南加州大学，主要专业为社会学 and 经济学，获文科硕士学位。1928年起，曾任燕京大学讲师和中央大学讲师、副教授，先后任中山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历任复旦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特约研究员等职。长期致力于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侧重于社会工作、社会服务等领域。也参与组织了一些田野调查。著有《社会调查大纲》、《农村社会学概论》、《中国乡村人口之分布》、《现代社会事业》等。

### 杨成志 (1902—1991年)

广东海丰人。1923—1927年就学于岭南大学。1927年任中山大学助教。1928年受中山大学和中央研究院指派与史禄国教授夫妇及容肇祖同赴云南调查，深入滇、川交界的彝族聚居区，进行了中国最早的民族学的田野考察。返校后不久，由中山大学派往法国留学，获人类学院高等文凭和巴黎大学民族学博士学位。1934年参加在伦敦举办的首届国际人类学民族科学大会，并宣读了论文。以后历任中山大学教授及其研究院秘书长、文科研究所所长、人类学部主任、人类学系主任和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教授兼文物室主任等职。他的论著在国外的民族学和人类学界有一定影响，对中国民族学的研究以及对人才的培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主要著作有《云南民族调查报告》、《罗罗族巫师及其经典》、《罗罗太上消灾经对译》、《广东人民与文化》、《人类科学论集》、《广东北江瑶人调查报告》、《人类学与现代生活》、《海南岛苗黎调查》等，曾参加《中国

少数民族分布简图》、《中国少数民族文字简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旧有政制概况》及《瑶族简史简志》的编写工作。早年主编《民俗季刊》和“民族学刊”（《广东日报》副刊）。

### 杨开道（1899—1981年）

号道之，湖南新化人。早年就读于沪江大学预科部、南京高等师范，1923年毕业于东南大学，1924年赴美国留学。先后在依阿华农工学院、密歇根农工学院学习，获社会学博士学位。1927年回国后，先后任复旦大学、大夏大学、厦门大学、燕京大学、中央大学、武汉大学教授，曾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法学院院长，历任武汉大学农学院院长、华中农学院院长、湖北省图书馆馆长等职。长期从事农村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并参与了对中国农村的田野调查。著有“社会学丛书”、《社会学大纲》、《农村社会学》、《农村社会》（合著）、《中国乡约制度》等。

### 杨堃（1901— ）

又名杨象乾、杨赤民。河北大名人。1921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就读于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巴黎大学，获理科硕士和文科博士学位。1931年回国，先后任河北大学、中法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讲师、副教授，曾任朝阳大学、华北大学、云南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教授、研究员和北平中法汉学研究所研究员，历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和中国民族学会、中国社会学会、中国人类学会、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顾问及中国民俗学学会副理事长等职。早年曾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民族学学会，并任《民族学研究集刊》特约撰述人。他早期的著作，对介绍法国社会学年刊学派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起



了重要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多次深入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进行民族识别和实地考察。主要著作有《灶神考》、《葛兰言研究导论》、《莫斯教授的社会学学说与方法论》、《民族学概论》、《民族与民族学》、《民族学调查方法》、《原始社会发展史》等。

### 杨懋春（1904—1988年）

山东胶县人。山东齐鲁大学社会学系学士，后就读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攻读社会学硕士学位。抗日战争爆发后，到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乡村社会学，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他的关于中国乡村文化的研究著作《一个中国的乡村：山东省台头村》，成为美国和西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者了解中国乡村文化的必读著作。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国，任农林部督察、东北行辕经济委员会副处长和齐鲁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系主任、文理学院院长等职。1949年赴美国讲学，曾任康奈尔大学、斯坦福大学、华盛顿大学的客座教授。1958年赴台湾，先后任台湾大学农经学系乡村社会学教授、农业推广系主任和东吴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系主任等。长期从事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教学、研究工作，在乡村社会学的研究和农业推广方面贡献较大。主要著作有《中国的集镇制度与乡村生活》、《勉斋文集》、《农业技术改变对乡村社会之影响》、《乡村社会学与农业发展》、《乡村社会学》、《社会化与生活礼节》、《台湾土地改革的社会经济成果》、《中国的社会结构》、《我们的社会》、《今日台湾乡村生活的透视》、《台湾土地改革对乡村社会制度之影响》、《农业兴衰的社会因素》、《致富有道》、《社会学》、《中国农业社会的变迁与发展》、《当代社会学说》等。

### 杨庆堃 (1911— )

广州市人。193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34年获该校社会学硕士学位后赴美国留学，1939年获密执安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其后先后担任了《美国纽约商报》的编辑、《华侨日报》主编、华盛顿大学助理教授、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和匹兹堡大学副教授、教授等职。1948—1950年间，担任广州岭南大学副教授兼社会学系主任。被授予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聘为中山大学社会学名誉教授，任亚洲研究协会理事、美国社会学协会会员、亚洲研究协会会员等。长期致力于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对于中国社会学的重建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对中国的人文区位学研究、特别是对中国农村社区研究方面成就较多。著有《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村社会及家庭变迁》、《革命中的中国农村家庭》、《初期共产主义下的中国社会和家庭》、《过渡期中的中国农村》、《中国社会中的宗教》、《19世纪中国群众行动某些统计模式》等。

### 杨希枚 (1916— )

北京人。194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生物系，获理学学士学位。曾任中法大学理学院生物系助教，历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1952年任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兼任教授。1959年、1969年两度为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人，1981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兼学术委员，是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长期从事古史研究和体质人类学研究，将人类学与历史学进行结合的研究方法受到学术界的注意。著有《体质人类学讲义》、《殷代头骨研究》(合著)等。

### 杨贤江 (1895—1931年)

笔名李浩吾、李膺扬、杨谊、叶公仆等。浙江余姚人。1917年毕业于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后，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1920年与李大同、恽代英等人一同任中国学会评议员。1921年担任《学生杂志》编辑。1927年以后逃亡到日本。1929年回国，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文委的领导工作。1931年病逝于日本。他翻译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这一名著最早的中文译本。主要研究兴趣为教育学。著有《教育史ABC》、《新教育大纲》等。

### 杨兆钧 (1909— )

笔名杨涤新、迪心。北京市人。回族。1940年毕业于土耳其安卡拉大学。1941年以后，先后任西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教授、边政学系教授和西北军政委员会民族教育处副处长、青海大学教授兼教务长、云南大学西南亚研究所教授等。侧重于西南亚民族文化、中国西北民族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曾主持了西北大学边政学系对西北地区的实地考察。著有《维汉字典》、《世界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史》等。

### 曾昭抡 (1899—1967年)

字叔韦，湖南湘乡人，1920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后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留学，获化学科学博士学位。1926年回国，从事科学、教育工作。1935年去英国留学。回国后，先后任中央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教授和北京大学化学系主任、北京大学教务长、教育部副部长、全国科联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化学研究所所长等职。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后到武汉大学从事化学教学、研究工作。是中国

著名化学家。抗日战争时期，曾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从事调查、研究，著有《大凉山夷区考察记》。

### 张镜子（1907— ）

名睿，以字行。浙江嵊县人。上海沪江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后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院，获社会学硕士学位。先后任厦门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和上海沪江大学、大夏大学、交通大学教授。抗战时任国民政府经济部统计主任、国家总动员委员会调查室主任、财政部钱币司总稽核等职。1949年到台湾以后，先后任台湾省立法商学院的教授、社会学系主任和东海大学的教授、社会学系主任、训导长及国防研究院讲师等职。在学术方面，长期从事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并参与了沪江大学、大夏大学等校抗日战争前的社会调查工作。著有《社会调查》、《北京司法部犯罪的分析》、《中国农村信用合作运动》等。

### 张其昀（1901—1985年）

字晓峰。浙江鄞县人。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中央大学教授，历任浙江大学史地学系主任、史地研究所所长、文学院院长和美国哈佛大学的访问教授，是国民参政会参议员、国大代表。1949年以后任国民党总裁办公室秘书组组长。到台湾后，先后任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兼教育部长、国防研究院主任。1962年以后，在台湾先后创办了中国文化学院、中华学术院、华冈兴业基金会。1980年任台湾总统府资政。研究领域广泛，在学术方面主要研究中国地理、中

国通史和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等，在中国地理概况与民族分布方面着力尤多。著有《中华五千年史》、《中国民族志》、《中国地理学研究》、《东西文化》、《民族思想》、《三民主义概论》、《党史概要》等，编纂了《中文大辞典》、《正史新刊》、《中华民国地图集》、《世界地图学》等。

### 张少微（1903—1985年）

安徽无为县人，1927年毕业于北平平民大学。以后到美国留学，获美国密苏里大学研究院硕士学位。曾任上海和贵阳大夏大学历史社会学系、成都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重庆中央大学和四川碧山、江苏苏州社会教育学院、南京金陵大学等校社会学系、南京大学历史系、徐州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长期从事社会学、民族学的教学、研究工作，对民族学理论方面有较多研究。著有《社会科学概论》、《法国社会学思想家》、《儿童社会问题》、《研究边疆社会之内容方法及步骤》、《民族学体系发凡》等。

### 张之毅（1919—1987年）

又名张子毅。湖南醴陵人。193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同年进入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工作，并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代理系主任。抗日战争胜利后，任福建省研究院研究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在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统计处、国家统计局农业统计司任职。1956年以后，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国农村社会的调查、研究，在云南所做的研究尤为引人注目。著有《易村手工业》、《玉村商业和农业》，上述两书收入与费孝通合著的《云南三村》；另著有

《冀西山区考察报告》、《无锡、保定两地调查报告》等。

### 赵承信（1907—1959年）

广东新会人。1927年入北京燕京大学学习社会学。1930年获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学士学位。后赴美国留学，先后就读于芝加哥大学、密歇根大学，获博士学位。1933年回国，先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系主任、法学院院长，后任中央财经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等职。长期从事社会学的教学与研究，在社区调查和人口问题方面尤有突出成就。积极将人文区位学的理论和方法介绍到中国，并进行田野调查的实践。著有《从分与合的观点对中国的一个区位学研究》、《中国人口论》、《社会调查与社区研究》、《社区人口的研究》、《平郊村研究的进程》等。

## 附录四

### 中国民族学大事记 （1895—1949年）

为方便读者以编年顺序了解 20 世纪前半期中国民族学发展的大致脉络，特编制此附录。谨说明如下：

1. 本大事记中的一般记事仅列出年份，有些较为重要的事件列出了月份。在一年内排列的事件前后之顺序，并不说明事件发生时间的先后。

2. 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民族学发展的背景，记事的上限为 1895 年。

3. 为了节省篇幅，所列的外国人物、外文图书均未注明原文。如有需要，请在正文中查找。

#### 1895 年（光绪二十一年）

上海强学会成立，宣传新学。

严复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同年发表文章《原强》。

鸟居龙藏到中国的辽东半岛、台湾进行考察。  
斯文·海定开始对中国的新疆和西藏进行探险。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

日本人伊能嘉矩到台湾进行调查。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

王树枏著《欧洲族类源流略》，简述世界各国民族的起源和发展。

严复译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的前两篇，并在《国闻报》上发表。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

年初，日本成立“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

9月，梁启超发表《文野三界之别》一文。

伊能嘉矩的《台湾番人事情》出版。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

鸟居龙藏受东京帝国大学的派遣，到台湾对高山族进行调查。

斯坦因开始对中国的西部地区进行考古、调查。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

2月，梁启超发表了《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

3月，梁启超发表了《史学之界说》。

鸟居龙藏到中国的西南地区，对苗族、布依族、彝族、瑶族进行田野调查。



###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

4月，上海文明书局出版了斯宾塞著、严复译的《社会学研究》，书名译为《群学肄言》。

7月，林纾、魏易将德奥民族学家哈伯兰的《民种学》英文本译为中文出版，此书为中国第一本民族学译著。

刘师培著《中国民族志》，记述了中国历史上诸民族的分布、兴衰及其同化。

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大学章程》，将人种学列入国史及西洋史两门课程内。

闽学会出版了《闽学会丛书》，其中包括鸟居龙藏的《人种志》、有贺长雄的《族制进化论》等。

### 1904年（光绪三十年）

《奏定学堂章程》公布，废除科举制，开始实行新学制。

《新民丛刊》发表了蒋智由的《中国人种考》。

章太炎发表了《馗书》，其中包括《序种姓》等文。

严复将英国民族学家甄克思的《政治小史》译为中文，书名易为《社会通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

鸟居龙藏夫妇到蒙古地区进行调查。

章太炎发表了《俱分进化论》。

###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

鸟居龙藏夫妇再次到蒙古地区进行调查。

日本“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开始对台湾进行习俗调查。

日本军官日野强到新疆伊犁等地考察哈萨克族、蒙古族等民族。

台湾建立省博物馆，开始收藏人类学标本。

### 1909年（宣统元年）

外务部、学部会奏派遣学生赴美谨拟办法折，以退还庚款培养中国留学生。

### 1911年（宣统三年）

用庚子赔款开办的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招生。李济为首届学生之一。

### 1912年（民国元年）

2月，吴稚晖、李石曾、吴玉章等建立“留法勤工俭学会”，推进留法勤工俭学。

4月，瑞典人安特生在中国的河南发现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

5月，创建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严复担任校长。

燕京大学和北京社会实进会一起进行北京人力车夫的调查。

史禄国开始对中国东北的民族进行调查和研究。

文明书局出版麦开柏著、吴敬恒译的《荒古原人史》。

杜明烽的《峨马雷屏边务调查记》出版。

### 1913年

严复发表了《天演进化论》一文。

北洋政府教育部规定，大学开设人类及人种学、人类学、社会学或社会学原理课程。

上海沪江大学由美国人葛学溥执教，开设社会学课程。

### 1914年

丁文江对云南和四川的少数民族进行调查和体质人类学测量。

日本“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完成台湾的汉族及平原的高山族习俗的调查报告书。

### 1915年

上海沪江大学建立了中国的第一个社会学系。

鸟居龙藏研究中国东北的著作《蒙古及满洲》出版。

### 1916年

北京大学开设社会学班，康心孚任教授。

孙学悟发表了《人类学之概略》一文。

### 1917年

1月，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实行大学改制。陈独秀受聘任该校文科学长。

清华大学开设社会学课程，由美国人狄特莫讲授社会学与社会起源。

金陵大学设社会学门，将社会学作为在本科中开设的

科目。

### 1918年

2月，北京大学成立了民谣研究会，向社会广泛征集歌谣。

5月2日，美国哲学家和教育学家杜威来华讲学，前后游历十余省，历时两年多。

陈映璜编写的《人类学》，作为“北京大学丛书”之四出版。

上海沪江大学开始广东潮洲的凤凰村调查。

日本“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与番务本署出版《番族调查报告书》及《番族图谱》。

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严恩椿根据欧美著作大意编译而成的《家庭进化论》。

### 1919年

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开始搜集包括西南少数民族在内的各民族的各种文物和标本。

乌居龙藏对西伯利亚东部和中国东北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进行人类学和考古学的调查。

### 1920年

3月，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发表。

夏季，李济进入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人类学研究所学习，攻读博士学位。

12月，北京大学民俗研究团体歌谣研究会成立。

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发表，引发了东、西

文化论战。

英国哲学家罗素开始在中国讲学。

乌居龙藏再次对西伯利亚东部和中国东北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调查。

## 1921年

秋季，英国哲学家罗素到南开大学教授社会学。

上海复旦大学开设社会学课程。

乌居龙藏向东京帝国大学提交《有史以前的满蒙》的论文，获博士学位。

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过耀根的《人类进化之研究》。

## 1922年

2月，广州举办展览会，其中古物馆陈列有彝族文字经典八册，民俗馆中有各种民族学标本。

12月，北京大学《歌谣周刊》创刊。

12月，李济在美国人类学年会上作题为《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的报告。

蔡和森在上海大学讲授“私有财产和家族制度的起源”。

中国社会学会在北京成立。

北京大学建立考古学研究室。

厦门大学建立社会学系。

燕京大学成立社会学系，由美国人步济时任主任。

华西大学成立华西边疆学会。

## 1923年

5月，北京大学成立风俗调查会，向全国印发《风俗调查表》。

暑期，李济受聘担任南开大学人类学、社会学教授。

李济完成博士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

顾颉刚、常惠、孙伏园、容庚、容肇祖到京西妙峰山调查庙会风俗。

上海沪江大学在沈家行进行了农村调查。

华西协和大学华西边疆学会开始印发英文刊物《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

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东方杂志社编写的《蒙古调查记》。

## 1924年

暑期，李济赴西北大学讲学，内容为社会学大要、人类学概要、人类进化史等。

暑期，上海学联组织上海夏令讲学会暑假研究科目，内有瞿秋白的社会科学概论、施存统的社会进化论、董亦湘的唯物史观和周建人的进化论。

美国社会学家华德在北京、广州、上海各大学讲演。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设社会学课程。

蔡元培出席在荷兰、瑞典举行的国际民族学会会议。

民智书局出版蔡和森的《社会进化论》。

商务印书馆出版德国学者米勒利尔著、陶孟和等译的《社会进化史》。

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顾寿白著的《人类学大意》。

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陈长蘅等人的《进化与善种学》。

张其勤、沈古伯的《西藏调查记》刊印。

沈作乾发表《畚民调查记》。

## 1925年

李济受聘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人类学讲师。

冬，李济在清华大学开设“人文学”（民族学）演讲，每周2课时。

上海复旦大学设社会学系。

葛学溥调查广东汕头凤凰村的成果《华南乡村生活》出版。

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迪尔凯姆著、许德珩译的《社会学方法论》。

国光书店出版张伯苓的《社会进化简史》。

## 1926年

12月，蔡元培在《一般》杂志上发表《说民族学》一文，提出“民族学”术语，对民族学进行界定。

拉铁摩尔进行越过天山和喀喇昆仑山的长途旅行，沿途调查各民族的情况。

中国地质调查所成立新生代研究室。

李济主持进行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考古发掘。

厦门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其中设社会调查（礼俗方言）组、闽南文化研究组等。

清华大学建立社会学系。

商务印书馆出版张镜予主编的《沈家行实况》。

上海昆仑书店出版李达的《现代社会学》，有两章专门讨论家族和氏族。

宫廷璋根据泰勒的《人类学》编译的《人类与文化进步史》出版。

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刊印廖化平编写的《社会进化史》。

## 1927年

5月，中、瑞联合西北科学考察团第一批团员从北京出发，考察至1933年。

7月，中山大学筹备设立语言历史研究所。

暑期，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开始招收研究生，设有人类学、民族文化、民俗学等组。

中央大学社会学系成立。

岭南大学社会学系成立。

上海北新书局出版陈翰笙的《人类的历史》。

上海北新书局出版黎明的《社会进化史大要》。

日本高岛素之著、李继珍、夏丏尊等译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出版。

## 1928年

3月，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成立，第一组为民族学组。

3月，广州中山大学的《民俗周刊》创刊。

夏，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颜复礼和商承祖调查广西的瑶族，为时六个月。

7月，史禄国夫妇、容肇祖、杨成志开始云南人类学调查。

8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黎光明到川边作



民物学调查。

9月，杨成志从昆明出发，深入彝族聚居的地区进行调查。

9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建立，其中设人类学及民物学组。

孙本文、吴泽霖、吴景超等人发起建立了东南社会学学会。

清华大学改社会学系为社会学与人类学系。

大夏大学成立社会学系。

中山大学成立语言历史研究所。

鸟居龙藏第三次对西伯利亚东部和中国东北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进行调查。

上海春潮书局出版陆一远译的恩格斯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译名为《马克思主义的人种由来》。

上海泰东书局出版德国柯诺著，朱应祺、朱应会译的《马克思的民族社会及国家概念》。

## 1929年

年初，林惠祥到台湾对高山族进行调查。

4月，凌纯声和商承祖赴东北地区对满—通古斯语族民族进行调查，历时三个月，主要针对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的调查。

5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往北平，考古学、人类学、民物学为第三组。

12月，农矿部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发现第一个“北京人”的完整的头盖骨。

德国学者史图博、李化民赴浙南和闽北的畲族聚居地区进行调查。

辅仁大学成立社会经济学系，分社会学、经济学两组。

岭南大学博物馆分出人类学器物一类。

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专刊颜复礼、商承祖的《广西凌云瑶人调查报告》印行。

新生活书店出版彭斯原著、王斐孙译的《社会进化论》。

上海新生活书店出版杨贤江译的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上海民智书局出版美国学者威廉著、刘芦隐译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史观》。

## 1930年

4月，凌纯声在中央广播电台作了“最近侵入西藏之尼泊尔民族”的演讲。

5月，中国社会学社在上海成立。

6月，林惠祥在中央广播无线台作了“台湾番族调查报告之撮要”的演讲。

夏，钟敬文、娄子匡等发起成立杭州民俗学会。

拉铁摩尔考察内蒙古地区，考察延续到1932年。

孙本文在中国社会学第一次年会上演讲时提出建设中国化社会学的主张。

厦门大学委托林惠祥代采高山族文物数十种。

商务印书馆出版林惠祥的《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一书。

神州国光社出版卫斯特马克著、王亚南译的《人类婚姻史》。

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马雷特原著、张鼎铭译的《人类学小引》。

开明书店出版法国民族学家鲁妥势著、卫惠林译的《婚姻与家庭的进化》，译名为《男女关系之进化》。

### 1931年

3月，南京国民政府决定组织西陲学术考察团，进行地质、人种和生物考察。

商务印书馆出版弗雷泽著、李安宅译的《交感巫术的心理学》。

6月，岭南大学陈序经、伍锐麟进行沙南疋民调查，调查延续到次年8月。

7月，史图博到海南岛进行黎族、苗族等民族的调查，为时近两个月。

留学英国的刘咸作为中国代表出席国际人类学会。

中山大学设立社会学系。

上海大东书局出版沙尔·弗勒克著、许楚生译的《家族进化论》。

史图博和李化民的《浙江景宁敕木畲民调查记》出版。

### 1932年

春，北平协和医学院许文生博士与罗香林一起到粤北山区进行体质人类学的调查。

春，岭南大学社会学系设立了社会学研究所。

9月，燕京大学请美国社会学家派克担任客座教授。

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人类学组开始招收研究生。

黄文山为中央大学社会学系开设“文化社会学”课程。

罗香林到广东北部地区进行实地调查。

史图博第二次前往海南岛进行调查。

华西协和大学成立博物馆，由葛维汉任馆长。

杨堃在《鞭策周刊》上发表了《介绍霍布儒的社会学学说》一文。

上海大东书局出版威斯勒著、吴景崧译的《现代人类学》。

### 1933年

5月，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凌纯声、芮逸夫、勇士衡前往湘西南，对苗族、瑶族等民族进行调查。

秋，厦门大学古物陈列室改名为文化陈列所。

12月，燕京大学印行《派克社会学论文集》。

孙科等人在上海创设中山文化教育馆，民族学组由黄文山、卫惠林主持。

中央大学教授何联奎对浙东的畬族进行调查。

清华大学文科研究院社会学及人类学部建立。

罗香林的《客家研究导论》在广州出版。

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马雷特著、吕叔湘译的《人类学》。

台北帝国大学教授与台湾省博物馆人员组成博物馆学会。

## 1934年

3月，伍锐麟、陈序经等对西江一带的蛋民生活进行调查。

春，中国科学社等机构合组海南生物科学考察团，刘咸率人类学组调查二月余。

春，中国西部科学院组织了雷马峨眉考察团，进行以生物、地质方面为主的调查。

春，庄学本开始对川西北、青海南部和西康北部的藏族和羌族进行调查，历时六个月。

5月，凌纯声、芮逸夫、勇士衡到浙江考察畲族的生活状况及社会情形。

夏，中国民族学会召开筹备会。

秋，中央大学增设文化人类学、中国民族文化等课程。

10月，凌纯声、陶云逵、赵至诚、勇士衡对云南的各民族进行调查，调查持续近二年。

12月，中国民族学会在南京中山院成立。

林耀华对福建莆田的宗族社会进行调查。

厦门大学社会学系与历史系合并，称之历史社会学系。

林惠祥与陈育崧发起筹办厦门人类学陈列室。

英国伦敦举行第一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吴定良、杨成志、欧阳翥出席，李济等被推选为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会理事。

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与北平社会调查所合并，民族学组划归历史语言研究所，为第四组。

国民政府教育部拨出专款，在金陵大学、西北大学、

云南大学、大夏大学、复旦大学等校设立边疆史地讲座。

商务印书馆出版林惠祥的《文化人类学》一书。

凌纯声、商承祖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书出版。

## 1935年

春，中山大学成立研究院，内设民俗学组。

秋，四川大学设立西南社会科学研究处，就四川省及西南边境经济及民俗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秋、冬，费孝通、王同惠对广西大瑶山的瑶族进行调查。调查过程中费孝通受伤，王同惠遇难。

10月，拉德克利夫·布朗教授到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担任客座教授，讲授比较社会学课程，主持社会学研究班。

12月，中国民族学会在南京举行第一次年会，拉德克利夫·布朗教授到会发表题为“社会人类学最近之发展”的演讲。

徐益棠入广西的大藤瑶山进行调查。

方国瑜参加中、英会勘滇、缅边界南段未定边界，对傣族、拉祜族、佤族聚居地区实地考察。

大山彦一任建国大学社会学和人类学教授，并在中国的东北进行调查、研究。

凌纯声的《民族学调查表格》印行。

吴文藻著的《功能派社会人类学的由来与现状》等文，介绍功能学派理论。

上海世界书局出版威斯勒原著、钟兆麟译的《社会人类学概论》。

商务印书馆出版美国学者罗维著、吕叔湘译的《初民

社会》。

商务印书馆出版马凌诺夫斯基著、李安宅译的《两性社会学》。

上海泰东书局出版德国人柯诺著，朱应祺、朱应会译的《马克思的家族发展过程》。

### 1936年

1月，中山文化教育馆编辑的《民族学研究集刊》第一辑出版。该刊成为20世纪前半期中国最主要的民族学期刊。

6月，厦门大学人类学陈列室与文化陈列室合作举办展览。

9月，广州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编辑的《民俗》杂志复刊。

12月，中国民族学会在南京举行第二次年会。

勇士衡对云南的少数民族进行补充调查，持续近一年。

中国民族学会西南分会成立。

燕京大学请美国密执安大学教授怀特讲学，以人类学及方法论为讲题。

广西大学设立社会学系。

费孝通到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进行为期一个多月的调查。

四川大学教授胡鉴民在川西的理番、汶川一带对羌族进行调查。

商务印书馆出版王同惠、费孝通的《花蓝瑶社会组织》一书。

鸟居龙藏的《苗族调查报告》译为中文，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商务印书馆出版马凌诺夫斯基著、李安宅译的《巫术科学与宗教》和《原始心理的神话》的合译本，名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刊印《社会学界》第九卷，作为纪念布朗教授来华讲学的特辑。

### 1937年

初，中央博物院筹备处马长寿等人对四川的彝族和羌族、藏族进行实地调查。

2月，岭南大学与中山大学合作进行海南岛的黎族、苗族的调查。调查持续到是年6月。

4月，吴泽霖代表中国社会学社参加行政院京、滇公路周览团。

5月，岭南大学与美国地理学会合组桂北科学考察团，研究瑶族的风俗习惯。

岭南大学的冯乐对广州的疍民进行调查。

国民政府内政部举办全国风俗简易调查活动。

商务印书馆出版哈顿著、吕一舟译的《南洋猎头民族考察记》。

马凌诺夫斯基著、林振鏞译的《蛮族社会之犯罪与风俗》出版。

### 1938年

4月，西南联合大学组建，文科初设历史社会学系。

春，大夏大学建立社会经济调查室，由吴泽霖主持。



暑期，金陵大学的柯象峰、徐益棠，对西康的社会、文化和少数民族生活的情形等进行调查。

夏，岭南大学的一些学生有组织地到连县一带调查瑶族的生活。

秋，云南大学建立社会学系。

10月，中国民族学会（成都）《西南边疆》创刊。

冬，任乃强赴康定、泸定等藏族、彝族、汉族等民族聚居和杂居的地区进行调查。

赈济委员会组织滇西考察团，调查民族、地理、物产，李景汉、江应暕等参加。

燕京大学法学院施行导师制。

李安宅到甘肃从事藏族文化的促进工作和社会人类学的实地调查，调查为期三年。

岑家梧到云南东北部嵩明的苗族聚居区调查。

杨堃发表《莫斯教授的社会学学说与方法论》。

马凌诺夫斯基著、费孝通译的《文化论》发表。

## 1939年

年初，贵州省教育厅民俗学会委托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搜集贵州省内各县的苗族、彝族等民族的民俗资料。

2月，大夏大学组织“西南边区考察团”。

10月，梁甌第由中英管理庚款委员会派遣，考察四川西康的社会及教育，10月抵达西昌。

11月，柯象峰带领金陵大学社会学系的一些学生到峨边县，进行彝族社会、生活的调查。

教育部组织西南考察团，足迹几遍西南，前后八个月。

云南大学与燕京大学联合成立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开展云南内地乡村的调查。

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迁到四川。

乌居龙藏被燕京大学聘请为客座教授。

日本社会学家冈田兼任台北帝国大学讲师，其间对高山族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察。

重庆生活书店出版张仲实译斯大林的《论民族问题》。史禄国在北京病逝。

## 1940年

春，大夏大学受内政部的委托，组织人员分赴安顺、定番、炉山等处实地调查，历时八个月。

春，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派员随贵州省政府边远农村工作宣传团分赴苗族、彝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调查。

5月，《民族学研究集刊》第二辑出版。

夏，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社会学系分为历史学系和社会学系。

夏，四川省政府组织四川边区施教团，柯象峰、徐益棠任正副团长。

暑期，中山大学组织学术考察团，考察滇、黔、桂、湘、粤五省边区。

秋，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建立，闻宥任主任。

12月，台北帝国大学教授金关丈夫到海南岛实地考察。

岑家梧任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主任。

辅仁大学成立东方人类学博物馆。

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先后发表了《关于回回民族

问题的提纲》和《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

岛田正郎受伪满洲国文教部嘱托，在东北、内蒙古从事少数民族资料调查。

吴文藻开始主编《社会学丛刊》。

## 1941年

4月，甘肃的拉卜楞巡回施教队，以当地的寺庙、家庭、机关等为对象进行调查。

7月，许烺光对大理进行调查，为期14个月。

8月，吴定良、吴汝康对贵州的少数民族进行体质测量，同时调查文化和人口。

8月，蒙藏委员会的《边政公论》创刊。

9月，中国边政学会成立，吴忠信任理事长，吴文藻任理事兼研究主任。

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添设边疆社会组，由徐益棠任主任。

1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在中央图书馆举办边疆文物展览。

冬，中法汉学研究所在北平成立。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合组川康民族考察团，调查川西北及西康东北的羌族、彝族、藏族等民族。

江应暕到四川的小凉山和云南的彝族地区进行调查。

教育部组织大学生暑期边疆服务团，分川西、西康两队。

教育部蒙藏教育司主持对四川西部地区的考察。

中山大学派毕业生到康藏、云南等边区服务，从事边

疆语言文字、民俗、经济等方面的考察工作。

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的师生赴粤北考察瑶族的体质、文化、语言。

西南联大组织川、康科学考察团，考察森林、矿产、居民俗尚等。

吴泽霖建立“苗夷文物陈列室”，在贵阳举办了三次民族文物展览。

郑德坤任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馆长，确定以研究边疆问题为中心，筹备成立研究室。

国民政府行政院分别组织康昌和青康旅行团。

李安宅到华西大学社会学系任教。

李安宅对川、康、甘三省的边境地区的民族教育进行视导。

华西、齐鲁与金陵三所大学合作组建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和《中国文化研究汇刊》。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向国民党八中全会提交“请设置边疆语文系与西北、西南边疆文化研究所，培植筹边人才，而利边政实施案”。

延安解放社出版李维汉、贾拓夫等人编写的《回回民族问题》一书。

重庆中正书局出版高长柱的《边疆问题论文集》。

庄学本的《西康夷族考察报告》出版。

## 1942年

1月，金陵大学边疆社会研究室办的《边疆研究通讯》创刊。

1月，卫惠林、吕叔湘、徐益棠、凌纯声、芮逸夫、马长寿等在成都举行座谈会。决定由驻蓉理事负责中国民族学会的事务。

7月，云南第一边胞服务站在丽江地区建立，至1946年结束。

9月，张之毅到新疆调查经济，调查持续到第二年底。

12月，芮逸夫对川南与黔、滇交界地区的苗族进行调查，调查持续到次年五月。

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的陶云逵等对云南的新平、元江一带的少数民族的语言、宗教、巫术、市集、地理环境等进行专项调查。

辅仁大学东方人类学博物馆出版了《民俗学志》创刊号。

## 1943年

1月，于式玉、蒋旨昂到川西的汶川、墨水、理县等地进行调查。

6月，吴文藻参加中央设计局组织的西北建设考察团，负责以新疆的少数民族为主的西北民族问题调查，调查至是年底。

7月，蒋介石致电中央研究院，要求以科学方法对民族素质作多方面的研究。

暑期，林耀华与胡良珍等到大、小凉山地区考察。

11月，中山大学社会学系组织调查郴州的瑶族等民族的语言、历史、社会、文化。

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的陶云逵等对云南的新平、

元江、峨山等地的语言、文字、物产进行了调查。

任乃强被聘为华西大学的教授兼边疆研究所研究员。

《民族学研究集刊》第三辑出版。

伪中日合作华北总合调查研究所成立“习俗委员会”。

乌居龙藏的《黑龙江和北桦太》出版。

## 1944年

4月，中央研究院成立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吴定良任主任。

夏，林耀华赴西康北部调查康北的藏族。

秋，谷苞到兰州大学任教，教授民族学和社会学课程。

10月，《民族学研究集刊》第四辑出版。

12月，清华大学研究院恢复社会学研究部。

12月，《中国民族学会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在成都出版。

李安宅与华西大学边疆文化研究所在川康的藏族聚居区进行调查。

任乃强与华西大学考察团赴西康省的北部考察。

中央大学设立边政学系，设蒙古族、维吾尔族、西藏藏族文史三个组。

西北联大建立边政学系。

杨兆钧率西北大学边疆考察团到青海的循化和甘肃的拉卜楞寺调查，为期二个月。

马学良到云南调查彝族的语言与文化。

辅仁大学文科研究所增设人类学部。

商务印书馆出版雷蒙德·弗思著、费孝通译的《人文

类型》。

中法汉学研究所出版《汉学》杂志第1期，发表杨堃的《灶神考》等论文。

### 1945年

夏，林耀华带领陈永龄对川、康交界地区的藏族进行调查。

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的高华年调查云南的路南地区的语言与文化。

国立边疆文化教育馆开始筹备，凌纯声任馆长，出版《中央边报》。

商务印书馆出版博厄斯著、杨成志译的《人类学与现代生活》。

费孝通的《被土地束缚的中国》（英文版）在美出版。

### 1946年

5月，《民族学研究集刊》第五辑出版。

10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回南京。

芮逸夫、石钟健在四川南部进行为期二个月的悬棺葬研究。

国立边疆文化教育馆的梁瓯第对贵州的榕江县进行社区调查。

谷苞到甘肃的洮河和白龙江上游的藏族农牧区进行社会调查。

《中国边疆学会丛书》开始出版。

阿格拉·朗根据其学生问卷调查所搜集的资料写成的《中国的家庭与社会》出版。

内蒙古出版社出版《蒙古民族问题》一书。

## 1947年

春,浙江大学史地系增设人类学组,吴定良任组长。

6月,西北大学边政学系的师生到甘肃、青海考察政治、宗教、语言和风俗人情等,历时三月有余。

暨南大学人类学系成立,刘咸任系主任。

秋,浙江大学人类学系成立,吴定良任系主任。

秋,岑家梧等创办私立珠海大学,岑家梧兼任法学院代院长,江应暕任社会学系主任。

11月,林惠祥在厦门大学举办人类学标本展览会。

商务印书馆出版凌纯声、芮逸夫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

清华大学设立人类学系,隶属于文学院,由吴泽霖任系主任。

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历史学部下设人类学组。

杨堃到云南大学任社会学系教授兼系主任。

西北大学文学院边政学系改属法商学院,增设蒙文组。

中国社会学会华北分会在北京召开第八届年会华北区会议。

林耀华的《凉山夷家》出版。

## 1948年

1月,浙江大学成立人类学会。

3月,杨成志提出《国立中山大学设立人类学系建议书》。



4月，中国民族学会在南京国立边疆文化教育馆召开第三届年会。

5月，中国民族学会西南分会在广州召开1947年度年会。

5月，中国民族学会西南分会“民族学刊”作为《广东日报》副刊正式出版。

夏，岑家梧主持调查广州的伊斯兰教徒社会。

夏，西北大学边政学系的师生到新疆进行了四个多月的调查，行程两万里。

暑期，谷苞等到甘肃的山丹、秦安、会宁的三个汉族村进行为期三个多月的实地调查。

8月，《民族学研究集刊》第六辑出版。

秋、冬，中央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部分教师和研究人員南迁。

12月，浙江大学人类学系举办了台湾的高山族的文物展览。

清华大学人类学系与社会学系、哲学系、建筑学系合办文物陈列室。

中国社会学会第九届年会华北区会议在北京召开。

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的人类学组改组为历史研究所人类学部。

辅仁大学建立了人类学系，开始招收人类学专业的学生。

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恢复工作，研究重点转向西南的经济。

杨庆堃到岭南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并代理系主任。

江应暕应云南大学聘请，任该校的社会学系教授。

王兴瑞的《海南岛之苗人》出版。

江应樑著成《摆夷的生活文化》。

## 1949年

1月，中山大学人类学会成立。

年初，浙江大学建立人类学研究所。

5月，岑家梧的《广州回教社会调查》出版。

7月，黄文山应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系的邀请，在该校讲授文化学课程；同时，应纽约各大学之邀请，在该校演讲世界文化改造问题。

7月，台湾大学历史系的陈绍馨、李济、董作宾等到台中县调查瑞岩的高山族泰雅人的体质与文化。

秋，台湾大学文学院建立考古人类学系，李济任系主任。

11月，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邀请余天休讲“中国秘密社会”、邀请周信铭讲“社会心理学中人类学有关问题”。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往台湾。

辅仁大学将人类学系并入社会学系。

江应樑著成《摆夷的经济生活》。

岑家梧的《西南民族文化论丛》出版。

岑家梧的《中国艺术论集》出版。

## 附录五

### 索引

本索引仅收录本书所涉及的主要的人名、机构名和少数重要的术语。索引词后是该词在书中正文及附录所在的页码。为方便查找，根据名称、术语的第一个字为条目的排列顺序，并按照汉语拼音的音序排列：

边疆人文研究室

207, 216, 217, 230,  
231, 315, 354, 372,  
374, 435, 437

边疆文化教育馆

209, 299, 300, 310,  
314, 317, 437, 439

边政学会

221, 222, 268, 269,  
338, 433

步济时

94, 95, 170, 190

蔡和森

91, 157, 338, 419,

- 420
- 360, 376
- 蔡元培  
25, 28, 76, 88, 96,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31,  
132, 135, 167, 172,  
180, 185, 186, 187,  
199, 204, 264, 277,  
329, 338, 339, 344,  
356, 417, 420, 421
- 岑家梧  
23, 24, 27, 193,  
194, 231, 235, 262,  
285, 286, 287, 288,  
295, 300, 301, 309,  
310, 321, 339, 340,  
343, 375, 431, 432,  
438, 439, 440
- 陈 达  
87, 96, 174, 191, 340
- 陈国钧  
34, 193, 206, 234,  
235, 247, 269, 340,
- 陈序经  
96, 152, 163, 166,  
175, 191, 194, 231,  
258, 282, 301, 309,  
310, 377, 425, 427
- 陈映璜  
77, 78, 341, 377, 418
- 陈永龄  
20, 22, 25, 82, 202,  
227, 234, 296, 321,  
322, 341, 350, 378,  
437, 459
- 大夏大学社会学系  
193, 402
- 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  
234, 235, 374, 376,  
431, 432
- 戴裔煊  
28, 128, 130, 296,  
300, 301, 306, 309,

310, 341, 378

丁文江

85, 112, 247, 344,  
417

方国瑜

182, 183, 218, 342,  
379, 428

方壮猷

238, 342, 379

费孝通

19, 20, 21, 25, 27,  
28, 126, 129, 140,  
143, 144, 146, 148,  
163, 173, 179, 184,  
191, 200, 201, 206,  
217, 218, 231, 232,  
258, 263, 264, 282,  
283, 284, 289, 292,  
293, 301, 308, 314,  
317, 325, 335, 342,  
343, 361, 380, 411,  
428, 429, 431, 436,  
437

冯汉骥

28, 163, 195, 206,  
232, 343, 380

冯家升

201, 321, 381

辅仁大学人类学系

316, 440

傅懋勣

31, 243, 244, 381

甘博

87, 94, 171

高华年

216, 230, 243, 246,  
343, 382, 437

葛维汉

182, 206, 242, 426

葛学溥

90, 93, 192, 417, 421

- 功能学派 195, 298, 383, 429  
 53, 125, 126,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9, 150,  
 151, 156, 165, 170,  
 174, 201, 232, 262,  
 264, 284, 285, 287,  
 293, 297, 324, 325,  
 398, 428
- 谷 苞 28, 217, 231, 313,  
 321, 343, 382, 436,  
 437, 439
- 顾颉刚 89, 109, 164, 219,  
 224, 235, 381, 420
- 何联奎 26, 96, 162, 173,  
 186, 187, 298, 299,  
 344, 426
- 胡鉴民 96, 162, 163, 173,  
 182, 186, 187, 192,
- 胡庆钧 217, 232, 297, 302,  
 305, 321, 344, 383,  
 459
- 华西边疆文化研究所 219, 225, 344
- 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219, 432
- 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 95, 206, 418, 434
- 黄 迪 143, 170, 201, 258
- 黄文山 96, 132, 133, 136,  
 138, 151, 156, 162,  
 166, 186, 187, 188,  
 192, 202, 218, 274,  
 281, 282, 298, 299,  
 300, 301, 302, 309,  
 314, 345, 367, 378,

- 384, 426, 440
- 暨南大学人类学系  
303, 391, 438
- 贾拓夫  
228, 384, 434
- 翦伯赞  
158, 159, 345, 385
- 江村经济  
144, 325, 326, 336,  
342, 380
- 江应樑  
3, 5, 20, 23, 27,  
28, 166, 177, 178,  
200, 202, 235, 236,  
237, 266, 267, 269,  
270, 271, 295, 300,  
301, 309, 310, 311,  
321, 345, 346, 385,  
431, 433, 438, 439,  
440
- 教育部蒙藏教育司  
209, 237, 241, 273,  
344, 433
- 金 翼  
147, 149, 174, 326,  
335, 350, 390
- 柯象峰  
96, 138, 162, 192,  
212, 213, 222, 232,  
238, 347, 386, 431,  
432
- 拉德克利夫·布朗  
30, 53, 141, 142,  
143, 144, 146, 150,  
156, 157, 188, 196,  
201, 263, 336, 354,  
428
- 黎国彬  
208, 216, 217, 241,  
315, 347, 459
- 李安宅  
124, 126, 146, 148,

- 150, 163, 166, 201,  
219, 224, 225, 232,  
273, 326, 347, 386,  
425, 429, 430, 431,  
434, 436
- 李 达  
91, 92, 421
- 李方桂  
223, 243, 244, 387
- 李 济  
27, 28, 86, 87, 96,  
98, 110, 133, 136,  
189, 190, 282, 308,  
347, 364, 387, 400,  
416, 418, 419, 420,  
421, 427, 440
- 李景汉  
87, 138, 171, 191,  
218, 222, 237, 347,  
388, 431
- 李维汉  
228, 388, 434
- 李有义  
20, 170, 200, 202,  
217, 231, 295, 305,  
321, 348
- 历史学派  
53, 125, 126, 145,  
146, 152, 153, 154,  
155, 202, 258, 261,  
262, 287, 294, 324,  
325
- 梁启超  
58, 59, 60, 79, 81,  
82, 259, 348, 349,  
414, 418
- 梁钊韬  
20, 27, 31, 117,  
121, 162, 202, 268,  
269, 301, 306, 321,  
345, 349, 363, 364,  
367, 386
- 廖泰初  
139, 219, 258, 324,



330, 349, 364

林惠祥

5, 8, 28, 88, 96,  
108, 134, 135, 154,  
163, 168, 194, 197,  
204, 205, 261, 262,  
265, 266, 300, 321,  
331, 349, 389, 423,  
424, 427, 438

林耀华

3, 19, 20, 25, 27,  
28, 31, 138, 140,  
142, 143, 146, 147,  
149, 150, 163, 173,  
190, 200, 201, 217,  
219, 233, 234, 236,  
249, 258, 284, 289,  
293, 294, 296, 299,  
321, 326, 331, 343,  
350, 353, 390, 427,  
435, 436, 437, 438,  
459

凌纯声

5, 26, 96, 108, 132,

133, 138, 153, 154,  
157, 162, 168, 169,  
172, 179, 180, 181,  
184, 186, 187, 210,  
211, 212, 213, 214,  
216, 218, 229, 265,  
266, 273, 274, 292,  
297, 298, 299, 309,  
310, 314, 322, 329,  
348, 351, 390, 423,  
424, 426, 427, 428,  
435, 437, 438

岭南大学社会学系

194, 310, 422, 425,  
439

岭南大学西南社会

经济研究所

175, 282, 295, 309,  
346, 351, 360, 439

刘师培

82, 415

刘 咸

96, 162, 177, 184,

- 187, 189, 219, 303,  
351, 391, 425, 427,  
438
- 吕振羽  
158, 352, 391
- 罗常培  
243, 244, 245, 352,  
392
- 罗香林  
137, 138, 163, 164,  
176, 184, 186, 202,  
300, 301, 314, 352,  
426
- 罗致平  
19, 194, 300, 352,  
393, 459
- 马长寿  
25, 28, 153, 154,  
159, 182, 192, 229,  
230, 249, 274, 287,  
288, 298, 299, 301,  
309, 321, 348, 352,  
356, 393, 430, 435
- 马学良  
27, 31, 243, 244,  
246, 295, 309, 353,  
393, 436, 459
- 蒙藏委员会  
180, 221, 222, 227,  
238, 268, 269, 433
- 民族学报  
187, 188, 298
- 民族学研究集刊  
19, 130, 132, 133,  
136, 138, 146, 151,  
153, 156, 177, 188,  
211, 252, 281, 296,  
341, 344, 345, 351,  
355, 356, 358, 360,  
362, 363, 364, 373,  
399, 406, 429, 432,  
436, 437, 439
- 鸟居龙藏  
61, 62, 75, 76, 293,

- 320, 353, 354, 356,  
414, 415, 417, 418,  
419, 423, 430, 432,  
436
- 派 克  
139, 140, 141, 150,  
201, 258, 359, 426
- 潘光旦  
25, 26, 28, 29, 96,  
137, 163, 191, 218,  
272, 308, 344, 394
- 齐鲁大学社会学系  
407
- 清华大学人类学系  
206, 305, 316, 383,  
402, 439
-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174, 190, 216, 305,  
309, 383, 411
- 全国风俗简易调查  
213, 214, 267, 430
- 人类学及民俗学组  
5, 110, 423
- 人文区位学  
140, 141, 150, 170,  
308, 408, 412
- 任乃强  
27, 233, 355, 395,  
431, 436
- 容观复  
202, 355, 459
- 容肇祖  
89, 110, 114, 115,  
405, 420, 422
- 芮逸夫  
26, 28, 29, 144,  
153, 154, 156, 157,  
162, 172, 179, 180,  
182, 184, 229, 230,  
265, 292, 298, 299,  
301, 309, 348, 351,  
355, 395, 426, 427,

- 435, 437, 438
- 商承祖  
108, 117, 168, 187,  
299, 356, 396, 422,  
423, 424, 428
- 社会学丛刊  
126, 129, 283, 284,  
293, 294, 360, 433
- 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  
217, 432
- 史国衡  
217, 231, 284, 396
- 史禄国  
65, 66, 88, 109,  
110, 111, 115, 163,  
191, 194, 196, 201,  
251, 252, 337, 416,  
422, 432
- 史图博  
108, 172, 176, 184,  
255, 356, 424, 425,
- 426
- 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  
132, 168, 292, 391,  
423, 428
- 孙本文  
93, 95, 96, 128,  
130, 136, 151, 152,  
156, 162, 185, 186,  
187, 192, 213, 279,  
280, 281, 283, 288,  
289, 299, 340, 357,  
396, 423, 424
- 陶孟和  
76, 89, 90, 190,  
224, 420
- 陶云逵  
23, 96, 138, 153,  
155, 156, 181, 182,  
184, 191, 216, 230,  
236, 270, 357, 397,  
427, 435

## 体质人类学

3, 4, 6, 8, 9, 31,  
66, 77, 85, 86, 87,  
88, 98, 99, 101,  
111, 115, 138, 164,  
183, 184, 190, 243,  
247, 248, 249, 256,  
272, 286, 302, 303,  
304, 306, 321, 357,  
364, 369, 374, 377,  
400, 408, 417, 425,  
436

## 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

248, 302, 303, 357,  
364, 369, 374, 400,  
436

## 田汝康

217, 231, 284, 294,  
303, 357, 398, 459

## 王同惠

144, 179, 428, 429

## 王文萱

221, 240

## 王兴瑞

134, 159, 177, 178,  
200, 202, 294, 295,  
300, 301, 310, 314,  
358, 398, 440

## 卫惠林

26, 96, 124, 153,  
154, 162, 186, 188,  
192, 202, 213, 214,  
274, 298, 299, 301,  
306, 309, 316, 356,  
358, 399, 425, 426,  
435

## 文化学派

145, 151, 152, 156,  
261, 280, 325, 328,  
384, 397

## 闻宥(闻在宥)

206, 219, 243, 244,  
245, 305, 399, 432

## 吴定良

96, 162, 187, 188,

- 189, 190, 208, 247,  
248, 272, 299, 303,  
304, 305, 358, 400,  
427, 433, 436, 438
- 吴金鼎  
87, 111, 219, 359,  
400
- 吴景超  
96, 185, 191, 192,  
218, 222, 269, 308,  
423
- 吴汝康  
31, 248, 305, 400,  
433
- 吴文藻  
25, 27, 28, 96, 128,  
129, 134, 136, 139,  
140, 141, 142, 143,  
146, 150, 163, 166,  
169, 170, 171, 187,  
190, 196, 197, 198,  
200, 201, 202, 217,  
218, 221, 226, 227,  
251, 264, 268, 269,  
273, 283, 284, 285,  
289, 314, 326, 336,  
347, 350, 359, 360,  
401, 428, 433, 435,  
460
- 吴泽霖  
26, 27, 96, 162,  
166, 185, 191, 193,  
205, 206, 220, 222,  
234, 235, 263, 271,  
272, 274, 301, 305,  
319, 340, 342, 358,  
360, 365, 402, 423,  
430, 434, 438
- 伍锐麟  
163, 175, 177, 194,  
309, 360, 425, 427
- 西北大学边政学系  
409, 438, 439
- 徐声金  
87, 88, 96, 163,  
194, 402

## 徐益棠

19, 96, 154, 162,  
169, 178, 179, 186,  
187, 188, 192, 209,  
213, 214, 219, 221,  
232, 236, 238, 298,  
299, 309, 361, 403,  
428, 431, 432, 433,  
435

## 徐雍舜

201, 219

## 许焯光

193, 217, 218, 231,  
362, 403, 433

## 许仕廉

94, 96, 170, 190,  
192, 404

## 严复

56, 59, 74, 79, 80,  
81, 83, 362, 404,  
413, 414, 415, 416,  
417

## 言心哲

96, 173, 405

## 颜复礼

108, 117, 168, 422,  
424

##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

128, 140, 141, 142,  
161, 170, 190, 196,  
199, 201, 217, 219,  
227, 234, 258, 293,  
308, 359, 362, 373,  
374, 385, 388, 390,  
404, 406, 407, 408,  
412, 428, 430

## 杨 堃

2, 3, 7, 19, 27, 28,  
96, 128, 129, 135,  
136, 154, 163, 166,  
186, 187, 191, 251,  
252, 311, 321, 331,  
363, 406, 426, 431,  
437, 438, 459

## 杨成志

8, 26, 28, 116, 117,  
121, 125, 154, 155,  
163, 176, 177, 178,  
186, 187, 189, 194,  
202, 207, 262, 269,  
275, 300, 301, 306,  
335, 357, 362, 363,  
405, 422, 423, 427,  
437, 438, 459

## 杨开道

96, 170, 190, 192,  
406

## 杨懋春

170, 201, 363, 407

## 杨庆堃

200, 201, 258, 266,  
310, 364, 408, 439

## 杨希枚

274, 302, 364, 408

## 杨贤江

126, 409, 424

## 杨兆钧

221, 225, 237, 312,  
409, 436

## 游嘉德

96, 136, 162, 192

## 云南大学社会学系

199, 397, 398, 401,  
406, 411, 438

## 曾昭抡

241, 294, 409

## 张镜予

94, 193, 194, 269,  
410, 421

## 张其昀

410

## 张少微

96, 132, 133, 137,  
192, 193, 234, 364,  
411



- 张之毅 437  
217, 226, 227, 231,  
343, 365, 411
- 章太炎  
59, 75, 81, 82, 83,  
84, 89, 365, 415
- 赵承信  
141, 170, 190, 196,  
199, 365, 412
- 浙江大学人类学系  
208, 303, 305, 316,  
438, 439
- 中法汉学研究所  
251, 406, 433, 437
- 中国本位文化建设  
15, 280
- 中国边疆问题研究会  
221, 222, 366
- 中国边疆学会  
222, 269, 296, 374,
- 中国边政学会  
221, 222, 338, 433
- 中国化  
13, 15, 24, 25, 200,  
237, 257, 261, 263,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283, 284,  
285, 288, 289, 290,  
326, 329, 333, 347,  
397, 401, 424
- 中国民族学会  
19, 25, 34, 142,  
162, 185, 186, 187,  
188, 189, 214, 218,  
219, 221, 298, 299,  
300, 301, 302, 339,  
345, 362, 366, 367,  
374, 399, 403, 406,  
427, 428, 429, 431,  
435, 436, 439
- 中国民族学会西南分会  
300, 301, 367, 429,

- 439
- 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  
边疆服务部  
242, 367, 372
-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4, 20, 27, 30, 117,  
121, 162, 305, 307,  
345, 363, 364, 367,  
386, 440, 460
- 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  
人类学组  
200, 202, 426, 439
- 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  
109, 110, 112, 113,  
114, 115, 116, 120,  
121, 163, 164, 306,  
355, 361, 362, 368,  
370 ~ 371, 373, 422,  
429
- 中山文化教育馆  
162, 188, 218, 317,  
358, 373, 378, 399,
- 426, 429
- 中央博物院筹备处  
182, 229, 388, 430,  
433
- 中央大学边政学系  
218, 309
- 中央大学社会学系  
173, 192, 383, 384,  
393, 397, 422, 426
-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6, 35, 110, 111,  
116, 117, 120, 132,  
163, 169, 172, 181,  
182, 184, 189, 190,  
203, 216, 229, 230,  
243, 246, 248, 265,  
268 ~ 269, 272, 292,  
301, 302, 309, 353,  
359, 373, 374, 387,  
388, 392, 394, 397,  
400, 408, 422, 423,  
433, 437, 440

## 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

5, 108, 117, 118,  
120, 162, 167, 168,  
172, 173, 176, 179,  
181, 189, 190, 203,  
204, 210, 226, 265,  
266, 349, 356, 370,  
395, 396, 399, 422,  
424, 426, 427

## 周信铭

176, 192, 194, 307,  
440

## 庄学本

183, 208, 240, 304,  
371, 427, 434

## 后 记

本书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之一。1995年我们申报了《中国民族学史》课题，这项研究得到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评审委员会，特别是民族研究评审组评议员们的高度重视，1996年4月批准了课题立项，给予经费支持，使课题得以顺利进行。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的。在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之下，经过半年的修改，终于杀青。对中国民族学的研究，特别是对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民族学的研究，是一件十分艰苦的工作。这需要翻阅大量的资料，进行广泛的访问，真需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虽然我曾经在北京、上海、南京、天津、杭州、福州、厦门、广州、武汉、成都、香港等地进行资料搜集和访问，但也明白，我走的路不够、读的书不多。直到今天，呈献给大家的作品中依然有很多不尽人意之处，敬请各位同仁不吝赐教，以便在将来加以弥补。

望着眼前厚厚的书稿，此时此刻，来自老师、同行、朋友和亲人的种种帮助和支持令我没齿难忘。

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陈永龄教授。他一直鼓励和指导我在中国民族学史方面的研究；在我开始撰写博士论文时，他将一大提包资料拿来，供我使用；他数次提出以他本人薪金资助我的论文写作，我在婉言谢绝的同时感受到了莫大的鼓励；数年前，在我初写成博士论文时，他以近80岁的高龄逐字逐句修改了我的博士论文原稿，并逐章细致地审订；此次出版又蒙先生写序。可以说，如果我能够取得点滴成就，正是导师谆谆教诲的结果。

同时要感谢的是王晓义教授，他作为陈永龄教授的助手，也是我的博士论文的导师之一。他扎实的理论功底和对中国各民族广泛的田野调查的经验，对我帮助匪浅，在论文的理论阐述深化方面得益尤多。

我要感谢许多老师和朋友在观点上的切磋、具体工作中的协助和精神上的鼓励。

从事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民族学史的研究，需要访谈的对象多是老一代民族学家。杨堃、林耀华、杨成志、厉天予、田汝康、罗致平、马学良、林永侯、容观复、张寿祺、胡庆钧、黎国彬、王辅世、章复（人英）、宋蜀华、吴恒、王辅仁、朱宁、施联珠、金天明、李光谟、李绍明、陈国强、陈树德、刘圣梅、林嘉煌、徐富荣、陈元熙、叶文程、夏元敏、吴融酉等许多前辈专家都十分慷慨地给予了帮助。在此之前，我在编辑《中华文化名人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过程中，负责民族部分，与更多的民族学家有过书信往来。

杨堃、林耀华、罗致平、陈永龄、王晓义五位教授组成的答辩委员会认真地审阅了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并提出了周详的修改意见，积极鼓励和支持我在略加修改后尽早交出版社正式出版。此次本书正式出版，再蒙95岁高龄的杨堃教授的热情

鼓励，并亲自作序。

中国的第一代民族学家吴文藻教授，生前十分关心中国民族学的研究；吴先生的夫人冰心先生也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殷切的关怀，此次又蒙这位世纪同龄老人题词。这本书也是对包括吴先生在内的老一辈中国民族学家的追忆。

同时，在本书的写作和出版过程中，又一次感受到了老一代学者对中国民族学史研究的深切关注和莫大支持。

1993年底，当我在搜集资料和访问阶段的第一次长途旅程中，已经完成了大部分工作，到达行程的最后一站广州时，资料和行包在当时乱得出名的广州火车站被近乎抢劫式地偷走。大约20万字的手抄资料、一些珍贵的无法弥补的照片、一本记录了访谈全过程的笔记本和一大叠复印资料全部都贡献给了小偷，大概作了卖给纸厂的废纸。当时的心情绝望之至。在此时，我在中央民族学院读硕士生期间的老师和领导、时任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主任的黄淑娉教授给了我慷慨帮助。在广州的朋友陈延超、盘小梅、林滨也给予我全力的支持。在朋友们的鼓励之下，我又由原路返回重新调查起；其间，又得到贺晓昶、蓝达居、郑明雄、蒋方雯等诸友的帮助。终于完成那次不同寻常的旅行使我拥有了在本书中占有十分重要地位的20万字的资料。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浙江省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广州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和香港中文大学服务中心、中国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等单位的图书馆，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方便和支持。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纳日碧力戈、张海洋协助翻译和修

改了英文提要、目录，王晓莉协助整理了大事记初稿，李祥福帮助查找了几位学者的简历，王筑生协助联系了出版事宜。张海洋、胡鸿保等朋友经常就本书的写作交流意见，我从中获得了许多收益。除前述各位外，杜荣坤、任一飞、夏之乾、沈关保、石奕龙、郭志超、庄孔韶、王庆仁、周星、王铭铭、翁乃群、高丙中、何星亮、周大鸣、秦和平、宇晓、李玲艳、萧霁虹等各位师长、亲友和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的同仁，均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十分的关注和支持。

此外，我也特别感谢云南教育出版社的张强先生，他在得到本书稿已成熟的信息后，积极与我取得联系，商讨出版事宜，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修改意见，进行了细致的编辑工作，为本书添色不少。

最后，还要感谢我的家人对我从精神、物质，特别是时间上的莫大支持，使我能够集中精力在较短的时间里将书稿奉献给大家。

**王建民**

1996年7月20日晨

于北京西郊魏公村